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人怨



一、为真诚付出血泪代价

我收到了母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办公室校友联络部的来函。

亲爱的校友：您好！值此北大世纪大典临近之际，特致书各位校友，愿与诸君同酿美酒，共举金杯，庆祝母校百年华诞……这里还有中文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同学们重返燕园，并参加校友教学、科研、创作成果展，把离校几十年的成绩向母校汇报。让我们在母校百年华诞时，相聚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重温往日美好的校园生活，叙谈纯洁真挚的友谊，憧憬规划北大及中文系的光辉未来……我立即给北大老同学方燕打电话，想问他接没接到母校的来信，他早在四年前就说要写一部我们那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活的长篇，是否完稿。如果早日交稿，还可以赶在百年校庆时间世，那一定会让校友们感到无比亲切，也会让今天的大学生们感兴趣的。

好不容易拨通了方燕所在的戏曲剧院的电话，却找不到他，听传达室的人说，好像他回河北石家庄去了，说碰上了什么麻烦事了，具体情况不详。

这让我担心：他已经办了离休手续，还会碰上什么麻烦？人活到六十岁，还有什么想不开的？莫非又是因为他的呆、傻，出了什么风波，他应该早告诉我才是！

离校将近四十年，他经历的坎坎坷坷太多了！

我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住一个宿舍，是名符其实的同窗，不仅是同窗，还是同床——双人床，我在上铺，他在下铺；在大学里共度失眠之夜。辗转反侧之时，谁翻身，那床吱呀一叫全都知晓，真可叫同学同窗同床同心了。

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就像手心里的纹络，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那是我们经历最丰富的波澜壮阔的的大学生活。他是最应该在大学时期入党的，然而却没有入党，在当年，我们都认为是最遗憾的事。不像今天的年轻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那些腐败分子在党内，使共产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叫人伤心的地步，使一些年轻人不想入党，甚至说，那么好的人怎么还要入党！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把入党视为最神圣、最向往的大事。今天可以说，他那对共产党赤诚的心和行动，真正像共产党员。

没有让方燕入党的原因是两次政治运动。他是 1954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和作家刘绍棠同班，他和绍棠又是早已相识的少年朋友。刘绍棠少年写小说成名，他也在 14 岁时出版了诗集，在河北也小有名气。刘绍棠读了一年大学便退学去当专业作家了；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便托说神经衰弱，要求休学，回家乡组织农业合作社去。他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化运动，真正和农民滚在了一起，对家乡百姓有了深情，习惯用乡亲的眼睛看世界。而这也就成了他的病根。

一年后，他复学到了我们班，那正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他还做诗人、作家梦，到北大后每天都写诗，写农村生活，写百姓的心声。他是烈士遗孤，9 岁时被老同志带到革命队伍里当小通信员，在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是刘秉彦。后来，环境残酷，组织上便把他送进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即冀中第一中学；他没有再回部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由解放区培养的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保定一中读完高中，考进北大，他可以说是解放区共产党培养出来的

第一批大学生了。到大学后，他便成了党的积极分子，急切地想入党，因为他的 1932 年入党的老母亲总叮嘱他不要忘本，要早日入党。不入党，简直没脸见老母亲，见父辈的战友了。

没想到对农村的感情，对文学的热爱竟害得他好苦。1957 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来了，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清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北京大学，这所具有五四民主传统的学校的大学学生们首当其冲，他们在校园的墙壁上，在大饭厅外墙贴出了大字报。有一首他的朋友写的诗《是时候了》，最有鼓动性，中央挂了号，说这是右派进攻的信号。整个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他难以接受那些把党的问题说得严重尖锐的言辞，他的生活经历单纯，他不会相信党内竟有那么黑暗的角落。凭着对党的真挚感情，他写了一首《绝不允许》的诗贴在墙上。他认为有人借除母亲身上的毒瘤之名，想举刀把母亲杀死，他绝不允许，号召保卫母亲——党。人们说他受教条主义毒害太深，说他这是本能的条件反射，名为保卫党，实则妨碍党整风。他迷惑了，他开始独立思考、面对着关于农村问题的大字报，他感到可信。他同意大字报说的“农民太苦了”，他要为农民呼吁，晚上回来他很激动，大讲农村情况，却使在大城市长大从未到过农村的同学大为惊讶：报纸上讲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他竟说起那么多阴暗事儿。报上说农村办起高级社，粮食增产，他却说他见到的是不如过去打的粮食多；报上说农民全拥护粮食统购统销，他却说只给农民留下 360 斤粮食，老百姓说不够吃，农民种地打粮，却不让农民吃饱，农民们意见大多了……人们用报纸上的话反驳他，他生气地说：“不信，你们到村里去看看。”夜里他睡不着觉，床吱吱叫，我在床上也睡不着，听他嘟嘟囔囔：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了天下，今天坐了天下，有多少大官还想着农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只考虑工人利益，以后，若有农民党，我入农民党，为农民说话……不知他是不是在说梦话，这些言论了得！不久，中央提出反右派斗争，他的关于农民的言论，被同学揭发出来。好危险哪！更危险的是，秋天正在讨论划右派时，中文系接到了河北省文联的揭发信，说这年春天，他在寒假期间曾和他初中的同学老纪议论过办“同仁刊物”，暑期他又来保定想和文联的朋友一同下农村调查人民内部矛盾，现已查明：他的老同学老纪和那些要同他搞农村调查的人是一个“反党集团”，他应划入这个集团，是资产阶级右派！那信是以党组织名义写来的，盖着省文联的红印，这使中文系党总支对他划不划右派大伤脑筋。

这倒不是他有什么后台，那年月，谁也不敢说包庇右派的话。多少高级领导因为“右派”说公道话也跟着沾包。况且，他也没有硬后台。也不是因为他是烈士遗孤，从小被党培养大的而谅解他。他的同学、有名气的号称神童的作家刘绍棠，还在中学时便加入了共产党，此时也划成右派了，他还被迫参加了批判刘绍棠右派言行的大会哩。刘绍棠尚且如此，把他划成右派还不容易。很难把他划成右派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写的诗，他朗诵过的一首长诗。

1957 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正是“右派”在北大向党“猖狂进攻”之时，这些年轻学子越来越偏离党所希望的轨道。

他们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译成中文用大字报贴了出来。一本“斯大林时代”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匈牙利、波兰发生的动乱更叫年轻人思索，共产党的形象正在变得不那么一贯光荣、正确与伟大了。人们对党的感情受

到破坏，此时怎样纪念党的生日？

校党委书记江隆基说重要的是调动同学对党的感情，才能进行北大的反右派斗争。北大团委、学生会要主持纪念“七一”大会。

团委参与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红楼》，编辑主力都是中文系学生。

我和他全是《红楼》编辑，我知道此刻他正写一首他自己家庭命运的长诗，便把此信息告诉给党委，我看了那长诗，是十分感人的作品。学校团委负责人找到小方，于是，北大举行的“七一”大会，便有了内容：让方燕本人在大会上朗诵他的长诗《命运》。

北大可容数千人的大饭厅坐满了同学，他在台上朗诵长诗。

该诗叙述了作为地下共产党员的父亲，在白色恐怖的北方大地从事革命斗争，被捕牺牲，留下遗孤，为防敌人斩草除根，母亲、祖父母一家如何把孩子养大，让孩子继承父志，以后如何在党的养育下成了大学生的故事。他是含泪朗诵的，感动得全场同学都眼里含泪，竟还能听到女同学的哭泣声……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同学，也感动了北大校领导，真正起到了调动同学热爱党的感情的作用。

写这样诗的同学，对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与党命运相联的同学，怎么会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他的言论，不过是思想右倾，认识不清吧！他想与同学搞什么“同仁刊物”，是他成名成家思想作祟吧！留到运动后期，让方燕提高觉悟，自己认识吧！领导们这样说。

一首诗，使他没有被划成右派。

多少知识分子从反右派之后接受了教训，不再说与党不同的任何意见，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再也没有“逆耳之言”了。

党是谁？党支部书记就是党，官越大越代表党。你只要代表党，便没人敢反对你。

到了1958年初，北大开展“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拔资产阶级白旗，向党交心，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年轻人的心更加赤红，方燕看到和他有同样思想，有的比他还进步的同学划成了右派，他既心惊胆战，又对党感激涕零：他的中学好友老纪是党员，成了右派；大学同学刘绍棠明明是“左派”怎么也划成了右派？绍棠在大学一年级有个发言让方燕难忘，那简直就是名言。绍棠说：“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你的思想和党的政策、做法发生了矛盾，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否定自己，肯定是你错了！”

这样的赤子怎么会成右派？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自己的个人主义就是成名成家思想，再就是农民思想，这是两个毒瘤，非连根挖掉不可，否则太危险了！这时方燕找我谈过多次，我是党员，是他的大哥哥，帮助小弟是我的责任。他每次谈话都流出痛心的泪水，这确实是真诚的。在“双反”运动中，他向党交心，写了一篇很长的检查，叫《挖掉心灵中的两个毒瘤》。从此，他真的换成了另一个人，真是彻底挖掉了“个人主义”，叫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完完全全没有了“自我”，真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比方说，我们班迎接早日到共产主义，搞了个“共产主义之家”：取消私有观念，把每个人的书籍全归到一起，布置了一个房间。方燕平时好购书，书最多，一说归到一起，他先赞成，先把全部的书拿出来。他回到家乡，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他欢呼共产主义的到来，写诗高唱；回到北大，他以家乡红徐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自豪，向大家讲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他从心眼里高兴，

大家也受到鼓舞，大家高喊，取消知识私有，跟上共产主义脚步。自然，方燕又成了党的积极分子，他有信心以跃进步伐早日跨进党的门。这时北京市有不少大的活动，都要以诗代发言，如“七一”向党宣誓，总路线公布后的誓师大会都要有诗。

共青团市委把这写诗任务布置给北京大学，北大就把任务落实到方燕，他以激情写诗，都能很好地完成。他成了当年北大最红火的诗人。

没想到，正准备吸收他入党之时，灾难却降到他头上，他太真诚、太幼稚、大不成熟、太愚蠢了！他太傻太呆，真正成了不记教训的书呆子了。在当时，能让我说什么呢？我内心深处称赞他和人民的血肉感情，却不能不批评他的不成熟。也许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人，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这也许会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那是1959年的暑期，本来他应该参加我们年级的集体科研，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那样做，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他在这时接到村里几位党员的联名来信，要他放假一定回家。那是几位在他父亲闹革命时吸收的抗战前的农村党员啊！他经过支部同意回家了。有什么事等他？原来是要他回乡来，农村老党员向他反映当时村里的严重情况：上级强迫命令让说谎话，吹大话，他们因说实话受到党纪处分，要方燕为他们申诉。此时，方燕见到的、听到的是农民严重不满，大办钢铁把老百姓的铁锅全砸碎了，连门锁全被摘走，结果，把那么多大树砍掉填进小高炉，烧成没有用的铁疙瘩。食堂里吃的稀汤寡水，乡亲们吃不饱，地种的打不出粮食，还叫他们说瞎话，报亩产几万斤！方燕的眼里含着泪水，听那正直的老党员说：“你在北京，一定要向毛主席说说农村的真实情况呀！也许毛主席身边出了奸臣，要害咱老百姓啊！”方燕在这个暑假，一家一家地调查采访。他为几个受处分的老党员写申诉书，又把老百姓的反映和农村真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回到北大，方燕的情绪低沉，口中总吟着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开学后，党员便听传达中央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就在这时，方燕把他给毛主席写信的内容向我说了，我的心感到沉重，越听他那含着泪水的叙述，我的心越沉重。听完，我对他说：“中央刚开完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和你说的差不多呀！学校马上要开展反右倾运动了，你不要向同学们说了。”

他有诗人的天真和激情，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心里存不住。其实，他从农村回来便把那真情向同学们说了；敏感的青年大学生早从报纸上感觉到了什么，大部不表态；和他有共同语言的是一个安徽农村来的同学老后，说他们那儿因为吃不饱，已经饿死人了！他甚至说：“民以食为天哪！老百姓要吃饭，饭字怎么写？一个食，一个反，没有食，不就剩下‘反’字了吗？”

不久，方燕和老后便成了北大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中学生里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整整批判了几个月。

方燕在大学里入党的希望彻底告吹。那在这两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同学却入了党。一些同学为了保护自己，表示靠拢党，便声嘶力竭，引经据典，摘报抄社论对他进行批判，可叹的是方燕还认死理，不服，不断地进行反驳。批判他是代表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说话，他反驳说：“向我反映情况的全是老党员，老贫农，连一个中农成分的都没有！”

斗争一直延续到 1960 年初。我们年级 1960 年毕业，在毕业前做鉴定时，组织在方燕鉴定表上写的第一行，便是他对三面红旗有很多错误看法。方燕不服，在自我鉴定栏内逐条进行反驳。

大学毕业，人们各奔工作岗位，我和他一起在北大未名湖畔、西校门留影，留下的是对北大五年生活的无限留恋和无可弥补的遗憾。方燕并不知道，他在 1958 年向党交心写的厚厚的深刻检查和这个大学鉴定表，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到了中国文联，以后又跟到冰封雪冻的长春：他多次申请入党，都被告知要再认识 1957 年，1959 年；直到 1966 年 3 月，他在兰考“四清”时，因表现突出才被吸收入党。可不久“文革”风暴起来，造反派翻出他的档案，根据他向党交心的检查，把他打成“漏网右派”。找到了根据，他便成了“长影翻案集团的头目”而被批斗。这些大学档案，直到二十年后的 1979 年才被撤掉，他为真诚付出了人生的血泪代价！

北大，培养了多少聪明的人，又出了多少像他这样的呆子呢？北大百年校庆，将从世界各地聚校友数万人，5 月 4 日，要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百年庆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节和教育节，还将有世界著名大学校长在北大聚首，研讨 21 世纪高等教育发展大计，国内外一流学者和校友来北大参加百年庆典和各院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这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应该是这次百年校庆的主要人物。

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在学校学习，离开北大又各自走了什么道路，有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经历最坎坷、负担最重、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代人。二十年前有湛容的一篇《人到中年》，写的是这代人，蒋筑英、陈景润是这代人，罗健夫是这代人，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做出许多奉献的知识分子……遗憾的是，描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作品太少了！这一代之后，是知青一代、倒出了一批有名的知青作家，像梁晓声、叶辛、张抗抗、陈建功、高红十、高洪波……他们有知青著名作家丛书系列，而我们这一代的辛酸苦辣却很少有人写。这样，当我们在离开北大三十周年，1990 年重在燕园聚会时，方燕的全家又都回到北京，他在聚会时说准备写我们这一代的纪实文学，记录我们一班几十名同学三十年的命运，我便非常感兴趣。大家鼓励他：“你写吧！”

写出来，献给母校 100 周年华诞吧！”

今天，北大百年华诞，正以倒计时催促我们，我却找不到他。即使他不写别人，就写他自己的命运也够曲折坎坷，也够有悲剧性了。他本身的“这一个”，就有典型性。真实记录我们这一代命运的作品，本身就有史料价值、认识价值，还发愁不能出版吗？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给他所在的单位打电话，听说他是去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官司去了。打什么官司？他这一生打了多少官司？怎么老了老了还打官司？他自己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我记得：“世间多少不平事，一生都在打官司”。年轻时。他为别人抱不平，打官司；以后为求真理，反邪气打官司；再往后，为自己的生存打官司……以书呆子打官司为题，也可以写一部书了！

二、一场房子官司，惊动中央，闻名全国

我真不希望他再打“官司”，因为那太耗生命，他不该再那样呆！世界上哪有事事公平的？你又没有济公的本领，“哪有不平哪有我”，你还能潇洒吗？

当年在河北，他为房子问题打了一场近三年之久，经历了两届省委，最后惊动了中央纪委、《人民日报》才算了结的官司；那场官司后，有作家柳萌在《新观察》杂志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名为《房子风波》。人民文学出版社邀他本人把这三年官司写一部长篇，他答应了，但后来听了老朋友劝告没有写。人们说，你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或者可以叫失败的胜利者，你的官司得到了省委书记支持，发了红头文件，得到《人民日报》支持，发了半版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中央纪委的支持，书记做了批示。看表象，你是胜利了；其实呢，你失败了！你本人耗了三年生命，你得罪了多少搞不正之风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亲朋好友，你得罪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到处骂你，败坏你，你不处处都感到别扭吗？！你若想在这儿生活下去，劝你别惹事生非，不要再得罪人了！千万不能写什么作品，那样你就别想安宁了。

听人劝，吃饱饭，他记住了朋友的劝告，那个“失败的胜利者”没有写，据说，他的长篇提纲都列出来了。

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故事。

方燕的“5·16反革命”问题，是1970年由我先成了“5·16”之后而被牵连进去的，说这是“北大5·16网”。因为恰在那时，我因心情苦闷，去了一次东北，见到了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学方燕，他还陪我一同从长春到了哈尔滨……我回北京不久，被隔离，随后他也被揭发成“5·16”，我给他的信全部被他的专案组收截，他本人没有见到。一直到林彪爆炸死在温都尔汗后，“5·16”问题才渐渐清楚，我们先后在1972年底“解放”，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此时，他从东北来信说，他因为在东北经历十年动乱，有六年当“反革命”，心里留下病根，一见那些地方触景生悲，毫无温暖之感；加上他的小女儿患过敏性哮喘，环境过敏，刚5岁多，便已住院抢救50多次，医生建议换个生存地方，也劝易地治疗”，可救孩子性命。因此，他决定调回河北老家，河北省也正招贤纳士，愿意接收他全家。

1979年年底，他全家迁到河北省石家庄。

从为他彻底平反后，他的本性又出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见到真正的共产党了。他激情满怀，歌颂新的生活，仿佛还是那个热情的年轻人，还是那天真的孩子。不是这种本性本色的性格，便不会发生后面的风波了。

他回到故土，便写了一部歌剧《泥土之歌》。这也是他调到省歌舞剧院的第一部歌剧。当时中央文化部正向全国征集歌剧本。《泥土之歌》让大家耳目一新，在全国送来的九十多部歌剧本中，这个剧本被选成“一号种子”。中央歌剧院老领导海啸、刘莲池看了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去找方燕，请他马上来京与作曲家合作修改剧本，决定立即投入排演，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部歌剧与观众见面。他所在的剧院领导闻此信息急了，马上电告在长春写电影剧本的方燕，说不能答应中央歌剧院，你是我院的编剧，我们有首演权！这时有两种选择摆在面前，朋友们说法不一。有的说，省的水平肯定不如中央歌剧院，为了你的作品获得成功，应该交中央排；有的却劝说，不可！你端谁的碗听谁管，你既是歌舞剧院编剧，本单位绝不可得罪，这也是组织观念。第一个剧本排了，以后你分房、提升都有好处。方燕一想也是，便决意谢绝了中央歌舞剧院。

就在这时，两栋给知识分子建造的新楼房落成了，马上要进行分配。这是在省召集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些歌舞演员、艺术家提出住房严重困难后，由省委领导拍板建造的新楼。

房建成，剧院领导组建分房委员会，实际是聋子的耳朵，院领导早已把房子内定下来，那些一直巴望分房的艺术家们却没有份。

内部消息传出来，炸了！他们纷纷找到方燕，诉说分房中的不正之风，激起了方燕的义愤，他是党员，便在党支部会上把群众意见反映上来，当时，支部正组织党员学习新党章和政治生活准则，他想应该真正执行。党员应起模范作用，这新房应首先让给非党同志，最好是咱党员一个也不进新楼，这必然会大大提高党的威信，有助恢复共产党的形象。这一片言辞虽无人反对，却惹当头头的心中不满，暗骂他书呆子，不识时务。党员也是人，也要有住房，有谁还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谁还当那傻瓜？

不得好处，人这执政党有啥用？

他本来对分房事不大关心，他正专心修改剧本，没想到反映越来越强烈，那位歌剧作曲老肖，便是一家三代五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多年了，这回却没有他家的新房，他还写什么曲子？自家的曲够难唱的了！方燕又去找老院长反映情况，老院长劝他说：“你放心，你的住房我已留下来了，别人你就别管了，专心搞本子吧！”

如果他不呆傻，老院长的话已说得那么清楚，他听了也就好了，哪知他的牛犟劲又上来了，竟按书本和党的章程说话了：“我反映情况可不是为我个人要住新房，我主张我们党员应该让，不要和群众争，咱们这样办了，我想胡耀邦总书记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胡耀邦同志不是讲了么，如果党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若干年得不到根本好转，就会变成不治的癌症，这可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们都是党员，为何不能为党分忧，为党风好转尽一定力量呢。”他说得很激动，老院长听着并不发火，以微笑对之，最后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们研究研究。”他信以为真，便回去捉摸剧本去了，他的剧本就是写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他想舞台上怎样演，在生活中也应怎样做。

老院长说“研究”，那是托辞，他们的方案丝毫未变，知识分子们急了，黑夜聚在他的小屋不走，要方燕代表广大群众仗义执言。第二天，他便去了文化局找到局长办公室，说领导正开党组扩大会，他闯了进去，人们都愣住了。“你有什么事？”一位副局长说，“我们正商量大事，你有什么话，今后再说，你先走吧！”他急了，竟站立在正中，说：“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组开会，还有什么事能比生死存亡的事更大？”他激昂慷慨毫无惧色，大家惊愕，局长答应了解一下然后去解决，他这才退去。出门后，他竟听到屋内的笑声！

局长们也是把他推出完事，并没解决此事，僧多粥少，都想要房子，有意见还不是常事；也不认为老院长把好房子留给主要领导有什么不妥。老院长知道方燕竟去文化局告状，颇为不满，真是不识好歹，有你的房子就得了嘛！这就更让老院长我行我素，决定马上按内定的房号发钥匙突击搬家，让生米做成熟饭，谁也没法改变了。

方燕这呆子不甘心，他想明明我是符合共产党要求的，为何共产党的领导却不实行，要应付，支应？他听说剧院在发钥匙，马上跑到省直党委反映，书记全力支持他的行动，马上打电话，要剧院停发钥匙，纪委马上去调查。得到新房的住户都骂他不是东西。他们得到钥匙，便有人鼓动连夜搬家，

于是剧院得房人庆乔迁，电灯通宵不灭，把家具搬进新房，有人还放鞭炮喊：“崩崩瘟神方燕！”

只有三个正副院长没有搬，空下三套最大的三室一厅。

矛盾尖锐化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开始了。为此事，方燕骑虎难下，如不斗争出结果，他也就没法再在这里呆下去，这时他的那部歌剧已不可能再排，他和老院长没话可说，他只有给党，给省委领导们一一写信，求得支持了。他一国又一回地写信，后来干脆来个刻印，分发各领导，九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那时省委领导换人，几套马车，谁去管这种小事？

秘书见又是这个呆子写来情况，早扔到一边去了，几十位领导，竟无一人批示。人说打官司告状反映情况都要认识人。走后门，方燕便想走此路，正巧，当年的十分区司令员，后来到七机部当副部长的刘秉彦调来河北省委当副书记，他便找到他，讲起当年往事，刘司令员依稀还有印象。他把材料交给刘书记，又讲了情况，刘秉彦说：“我就可以批示处理，你再给我几份，开省委常委会时，我亲自交给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同志。”方燕兴奋极了，以为这回可找到门了，他马上把消息告诉给那些等房子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不兴奋不已！

金明等领导真的全批示了，要查处此事，然而却没有人来查，没有动静。原来是批到宣传部，那常务副部长兼文化局长，用一个反映情况不实回答了省委，此事便不了了之。

方燕好生奇怪：难道这明显的不正之风就真的没人管了？这样下去，党不完了吗？我是党养育的儿子，党完了，我还不完吗！他又找刘秉彦书记。老司令员嘱咐他：“如今不像战争年代了，你要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还要侧着身子战斗才行，急不得的！”

正在方燕苦闷之时，中央调来高扬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金明、江一真等全调离了。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告状机会。当他从电视新闻里知道这一消息后，连夜给高扬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个斗争过程，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死马当活马治吧，高扬刚来河北，也不一定顾得上管这小事，他不抱希望了。

不抱希望的事却有了希望，第二天的晚上，一个陌生人来到阴暗破旧的筒子楼，打问方燕可住这儿。方燕开门请进，打量此人并不认识，那人自报：“我是高扬的秘书。高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你的信，高扬今天见到的，他想和你谈谈。明天晚上怎么样？到招待所去……”方燕竟怀疑这是做梦！

第二天方燕见到高扬，高扬说：“你是党的孩子，党保护你，不怕歪风邪气打击报复！”

方燕的热泪滚滚流下来了。他仿佛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么亲切的党的声音了！

高扬说，这种不正之风要刹，必须抓实，还要一抓到底，只在材料上批个字，没有人具体落实检查怎么能刹住歪风？！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民主监督，那些谋私利的有权者胡作非为也没有人管呵！

高扬老人说得太对了，太好了！方燕把这位老革命家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十分敬佩。他仿佛是和自己的老人说话，没有一点拘束。

高扬把材料批给省纪委要他们认真查处。此时，老院长也做绝了，他恼羞成怒，让人去东北调查方燕的问题：他这样闹，在“文革”中肯定是造

反派，说不定是“三种人”，听传闻他有人命，把长影的一个副厂长打死了！如果查出有问题，他今天就是破坏安定团结……这一来，斗争变成了“你死我活”，方燕更无妥协的余地。这种打击报复的行为，使老院长自己走到更错的路上。

在高扬到河北省之前，方燕给《人民日报》群工部写了一封信反映此事，半个月后，两名女记者来做客观调查，不带任何框框，就建房、分房全面了解，记者回京，没了音讯。省纪委的检查也没有结果，不知何故，方燕心里急躁起来，以为有省委第一书记过问了，还不很容易解决？他急切要见省委书记反映新情况，他怕老院长的打击成为事实，可听秘书说高扬正准备去中央开会，没有时间，只有等半月从中央开会回来再谈了。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火，问秘书同志高扬去开会何时动身，他说今天下午一点的快车，现在已十二点。方燕没有回家和妻子商量的时间了，他向朋友借了点钱，从火车站买了张站台票，便上了快车，直奔软卧车厢去找高扬书记。

“哈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车厢里？你可真有办法呀！”老人乐呵呵地对方燕说，让他坐在一边。他说：“高扬同志，我知道你太忙，没有时间，我想到火车里跟你汇报他们对我打击报复的事。”高扬笑呵呵他说：“不用那么紧张嘛！你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能把你怎么样？！这时候还能像‘文革’动乱那样，说整你便整你吗……”这两代人谈话很融洽，他们从石家庄上车，一直说到丰台，方燕这才离开软卧。

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人民日报》准备发表作家方燕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清样出来后寄河北省有关部门，要求一个月内回复。方燕把高扬开中央全会的消息告诉《人民日报》记者，记者便又亲自把大样送京西宾馆，没想到高扬却不同意发表此稿，说他正处理此事，待有了结果再见报。高扬从北京给省纪委打电话，要他们拿出处理意见来。省直党委纪委见到《人民日报》清样稿，认为符合实际，同意刊发，盖上公章寄回了报社。一个月，未见河北省纪委的处理意见，《人民日报》按时把此调查报告和作家方燕的信发表了，整整占了半版，大标题是“为谁建房，给谁分房？”这天是1982年9月25日。

这张报纸对搞不正之风的人是晴天霹雳！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方燕向我激动他讲述当年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是可以想见的。不久，方燕收到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上千封来信，有的说，感谢你为知识分子说话，你写的事情太普遍了，因为你的信，使我得到了一套新房，我单位的分房得以按政策落实。有的信上说，你是作家，但我还没见到你别的作品，你这封信，我想比你任何作品意义都大！

高扬同志主持常委会，批评了省纪委办事拖拉，对他的意见没认真办。之后，省纪委发出红头文件，对搞不正之风压制民主的老院长等给予了批评，支持了方燕反不正之风的行动。省委纪委通报指出：“省歌舞剧院领导不仅不认识错误，还拒绝批评，压制民主。方燕同志将建房分房中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反映后，院领导大为不满，以剧院名义写报告，散发有关领导和报社，不仅否认建房分房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无理指责方燕同志，甚至派人到方燕工作过的单位调查方的问题，这一系列压制民主的行为，造成了恶劣影响。”

然而，生米做成熟饭，确实已没有办法改变，纪委同志和方燕谈话时说：“已经分了，大多数是群众，不好再搬出来重分了，你理解我们搞纪检的困难吧？但一定要让剧院领导在全院做检查并向你道歉，把整你的黑材料

当众销毁。”

这些话，很快得到落实。

但是，斗争的实际目的，纠正不正之风，按政策给知识分子解决住房之事却说没办法解决，只能是下不为例，得到的使得到了。院领导搬出来的几套房，却迟迟不敢动，这要等待时间。因为得罪了院领导，那一部本可以在全国叫响的歌剧，没有再排演，中央歌剧院也早选用了别的剧目。

一年以后，省委领导知道作家方燕一家4口仍挤在筒子楼的一间屋里，便指定让他搬进那空闲了一年半的老院长搬出来的房子里。方燕不搬。他说：“我一家搬进新楼，别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怎么办？人们会说，我反不正之风的目的是为了个人住房，我还怎么面对大家？”他坚决不要。此事让高扬得知，说了句：“真是书生广便命新任文化厅长亲自把钥匙交给方燕，两天后省委领导要亲去他的新家。作曲老肖劝方燕：“搬进新楼，就说明了我们的斗争是对的，搬吧！”

这样无可奈何，带着苦笑，他搬进了新楼：三室一厅，面积70平米。果然，两天后，省委文教书记到了方燕家。

省委书记关心作家住房的一则新闻刊发在《文学报》、《文汇报》上。

《人民日报》将由此事引起的全国数万封信反映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的情况上报中央纪委。王鹤寿书记做了批示。不久，中央纪委发出为纠正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给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信。

方燕此时心稍安了，他付出了代价，总算对全国纠正不正之风起了点作用，总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吧！

可是几乎所有关心他的亲朋挚友都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蠢事，你真是书呆子！你的胜利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如果不是高扬调来河北，你的结果便不堪设想了。以后可别再做这种呆事、傻事了。你们的老院长，其实也冤，比他搞不正之风严重的人大多了，他这点事算什么？提不起来！他倒霉就倒在碰上你这个认真的书呆子了，逼得他犯了更大的错：整你的黑材料，搞非法外调。如果当时你按照他的意见做，你有了房住，还排演了你的大歌剧，省了你多少精力，少得罪多少人……你那样生活得不更好吗？

方燕三思友人们的话，觉得有理，自己应该学聪明一点了。

可他本性难移，这便是他的性格悲剧。

十多年过去了，他又打什么官司去了呢？

三、交给陈希同的新华社内参

照我看，他在河北省的那场房子官司还是胜利了。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那一件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住房问题，却那么难以解决，两届省委，为时三年，还有高扬这样的老革命家亲自为此事开三次省委常委会才有了那样一个结果，这既让人感动，又让人感到沉重。

我对他说，不要光看这件事耗了你的生命，从作家角度说，不正给了你一种生活的切实体验，让你有了了解中国国情的好机会吗？房子风波结束，方燕被任命为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他还得到了一个让作家羡慕的机会。高扬说：“你们作家一写高级领导。

就是哼啊哈的，摆出一种架子。写不像是因为没生活，想当然。

这样吧，你跟我一段，你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生活的。但咱们约法三章：不许写我；我跟你的一些谈话，不要外传；你可把我看作省委第一书记，又不视为第一书记，说话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方燕一一答应了。果然，他有啥说啥，还不断和高扬争论。比方高扬有个关于文艺方面的谈话，开座谈会，文化部门领导一致称赞高扬决策英明，没有不同意见。他却反映下面的不同意见，和高扬老人争个脸红脖子粗。高扬老人说：“只有你这个作家，能跟我这样说话呀！”方燕说：“因为我头上没有乌纱帽，我又不想得乌纱帽，我才能说真情吐真声啊！”高扬感叹道：“现在阿谀之风盛行呵！领导如不提高警惕就会在阿谀之风中出错了。”高扬不久写了一篇谈阿谀的杂文发在报上。

后来，方燕跟随高扬到唐山地区各县调查研究，他为老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所感动，他也体会到老前辈的工作作风，他真想写写这位七十多岁的省委第一书记，但他记住了约法三章没有写，后来这个书记的形象被作家袁厚春写出来，引起很大反响。

如果他不是呆子，他也不用像现在那些‘跑官’的人那样去千方百计送礼行贿钻营，他得到省委第一书记的欣赏，是可以当上厅局级领导的，他不知道中国是“官本位”，什么都是讲官级的，他一心要写书当作家，却不知就连作家协会这种群众团体，为争个官位也早已斯文扫地了！为了他的专心写作的目标，他要求连副所长这个官也不当了。这时，中央歌剧院领导刘莲池、海啸听说他想搞创作便答应要他，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也支持他来京工作。他的一部歌剧，在全国歌剧交流演出会上获奖，他决心再写几个歌剧，为中国歌剧事业做出贡献，所以他想上中央歌剧院。

命运不好，正在他准备调来时，中央歌剧院的老领导离职无权了，新的领导听说是文化部介绍来的，产生了误解，便不想要。骑虎难下，卡在半路了，北大同学说，你到市里文艺团体吧，那里户口好解决。市里就市里吧！经过北大老同学和刘绍棠的介绍，戏曲剧院同意了，说他们正需要熟悉农村和革命历史的一级编剧哩！

1989年，作家方燕调进北京。

本来他不想全家进京，他想一个人过来写剧本就是了，可没有想到一年后，文化局人事处找他谈话问他想不想解决两地分居，如果想，马上填表，有进京户口名额。方燕和家中商议，上中学的一儿一女都要上北京，母亲只好来，因为儿女的户口随母亲。于是填表上报，很快批下来了，全家进京，住房没有，文化局正建宿舍楼，与戏曲剧院谈定：暂在剧院落户，住房由文化局解决。

一家住进了文学组腾出来的办公室，书呆子又成了无房户。

女儿自己考进了可以住宿的八中，儿子上了丰盛中学，要回家住，办公室放不下床，导演组长同情，说：“我们组的人不经常来，你儿子晚上可住导演室，反正白天他便上学了。”住房虽困难，毕竟全家进了北京，不知情者全议论他家不知花了几万元才买下北京户口；也有人怀疑是通过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关系，因为陈希同是北大中文系校友呀，方燕说，我根本不认识陈希同，想找也摸不着他的门呀！于是方燕以《北京公民》为题写散文发在晚报上，也表彰那廉洁的人事部门同志。

人生是个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一个二十多岁小

伙子到两鬓白霜，该有多少教训，他应该成熟了吧！哪想到他本性不改，还是个呆子！为了住房，他竟又打了一场官司，虽惊动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到头来却没有解决……事情是从剧院换了院长之后发生的，文化局派一名叫马仁的副局长到这个剧院任院长，此人四十多岁，一表人才却官气十足。有院办公室主任小夏向他反映，编剧方燕一家应由文化局给房，却占了两间办公室。马仁当即决定，让方燕搬出导演室，否则以非法占房论，每月罚款 100 元，直到他搬出为止。导演组长擅自借房也罚 50 元。艺术处把此命令告知方燕，让他在一周内搬出，方燕急了：“让我搬到哪去，总不能睡在露天吧。”他找到马院长，请马院长上 19 级台阶看看他家住房能否容得下一张床？

马仁不理。说如果都这样，剧院还怎么办公？你自己想办法吧！

方燕无法可想，只得听之任之，到月初发工资，果然扣了 150 元（因他说不能扣导演组长的，若扣罚只罚他一人），他当时工资一共 280 元，还剩下 130 元。妻子到京后患病休息，只能领百分之六十中的百分之七十工资，不过 160 元。一家四口，两个中学生共花 300 多元，已难以维持生存了。但他实在不想和院长讲理，有什么理？理是里加王字，你是王，便有理！当官的总是占理的。他只向马仁哀求：“让我顶替清扫工，每天清扫大院吧，我好占清洁工住的那个床，也为剧院省下点开支。”，马仁也不理会，只说两字：“不行。”逼得方燕无路可走，便只有借债维持。

他对妻子说：“不用愁！我在北京有这么多北大同学，我向每个人借 10 元就足够维持生活了。”他便开始了向北大同学校友的求援活动。

他向每个同学借钱时，人家无不感到惊奇，怎么回事，混到了这么惨的地步？

先到《华声报》社，见总编辑周侗，周说：“这马仁太不仁了！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你妻子病了，还毫无人道之心，可恶！”

我刚得了 200 元稿酬，你先花去！”

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社长吴绪彬处，吴立马拿出 200 元交给方燕，并建议说，你把求援信给市委书记陈希同寄一份，他也是北大校友嘛，看他如何表示。

方燕去北京市委找到北大同学贾秘书长，说明借钱原因，秘书长大惊，说：“你可不要向陈希同求借 10 元钱，他会误认为是开玩笑哩！你不妨把此事写一封信，我转给陈，让他给解决一下房子吧。”方燕却不想给陈希同写信，这不又成了告状吗？让马仁知道了，我还有好果子吃？贾秘书长点点头，又出主意：“你去找新华社社长借钱吧，他不也是咱北大同学吗？你可别说是我的主意。”方燕说：“这戏就由你导演吧！”

方燕去找社长，秘书说出国了，问何事？听说此事，便道：我们派记者去了解一下。

新华社两名记者来到方燕的住室调查，一进屋便大吃一惊：“你这居住条件，在中国目前的作家中恐怕是最差的了。”调查后他们又说：“这类问题太敏感，不适宜公开见报，我们发内参吧。”

一个月后，一份给中央领导看的内参送到中央各位领导的桌上了。陈希同桌上的内参是由贾秘书长亲自送到他手上，并让他看那篇文章。

标题：“剧作家方燕呼吁解决住房问题”。里面写道，方燕，烈士遗孤，1946 年参加革命，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

员，著有诗集 8 部，电影电视剧 8 部，歌剧舞台剧 6 部，小说纪实文学等 9 部。全家四口调入北京，妻子是全国优秀家长，受到李鹏总理接见；女儿是中国最小的作家。现全家只住一间办公室，儿子因借住一间导演室而被每月罚款 150 元，无法生存。

“为此，方燕曾多次找剧院、市文化局领导反映生活、住房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方燕希望能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他全家能有一个栖身之所，能有一间可以安静地进行创作的住房。”

陈希同看完，当即批示：“请万副市长解决。”

此件转到常务副市长万展手上了。应该说，掌握数万间住房的领导，只要想给你解决，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举手之劳。

此事过去两年之后，陈希同。王宝森问题暴露，尉健行主持北京工作，曾当众质问：王宝森作案时间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办”、“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据透露，王宝森曾擅自令财政部门购买了 100 套住房，陆续批给亲朋好友。尉健行同志曾就此事讲，市政府、市委的某些人也有幸分得了“一杯羹”。

那些“人民公仆”一个人把儿子孙子的住房都安排好了，他们可以把国家的财产据为己有，把国家的住房像自己的财产一样随便批给对他有用的人，或者恩赐一些人，让人对他“感恩戴写报告去了。临走，院长又把小夏叫回来，叮嘱：“不知方燕通过什么关系找到市里的，我们也不知市领导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以院的名义写报告，不要带上情绪，要客观冷静。你告诉财务处，这个月先不要扣罚款了。”

如果万展那儿没有回应，说明我们的报告让他相信了，不再过问了，那时再继续从他的工资中扣除罚款！”

方燕当时可不知这些事，他还处在等待分房的兴奋中。方燕去领当月工资时见没有扣 150 元的“罚款条”夹在工资袋里，一数钱，果然照发 280 元，十分高兴，他以为是万展秘书的电话果真起了作用，诗人的幻想联翩又生出了希望，可过了一个月没见动静，再去领工资时又照扣罚款 150 元，他才彻底明白：完戏了！

他去找找到秘书长贾某的家，问其缘故，秘书长同学嘬着牙花子，一副犯愁的模样，久不吭声。方燕知他有难言之故，便道：“没什么，你说给我真情，也便放心了。”他这才说出原委：“你们剧院给市里写了一个报告，我不好给你说全部内容了。总之，是说不能给你解决住房，说了你很多坏话吧。万展也没有办法，他说，看来要给你解决住房，就需要你调出这个单位，这要由文教书记、宣传部长把你调离剧院……”方燕没有想到会引出这么麻烦的事，事到如今，还上哪个单位？他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房子不给，没关系，我们也没睡在露天，这无所谓，怎么还会对我全家调京无事生非，怀疑我走后门，这不是造谣吗？”他要求公开这个“报告”，以正视听！秘书长说：“那是以组织名义给上级写的，你怕难以看到！”

下一步怎么办呢？

方燕向秘书长讨办法，秘书长沉默良久，说：“陈希同批给万副市长，没有解决问题，我也不好多说了。看来，你得罪了剧德”，总之，国家财产便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给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无权元势的平头百姓落实党的政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据说，万副市长曾为不少人批过住房，就说文艺界吧，不也有几位女演员的住房是由他批给的吗？当方燕从秘书长电话中得知陈希同批给万展了，他高兴得一夜未睡：“这下可好了，万展批个住房还不简单！我可以有个放写字台的地方，正常写作了。

儿女们过春节时可以团聚了。”

妻子却提醒他：“你就是好激动，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真让他妻子不幸而言中了。

万展不仅没有给方燕解决住房，还由此引发了以后的灾难，使这位作家、诗人为了生存，重复上演了在河北省的悲剧。因为在北京没有遇上“高扬”，他这回可是彻底的失败者了。

据方燕本人和北大校友、市委贾秘书长所谈情况是这样的：万展让秘书给戏曲剧院打电话，了解情况。

马仁接了电话，怒火中烧，连连说：“我们马上给市领导写报告，说明真实情况。”他把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小夏叫来说：“方燕把剧院告了，告到万展那儿去了！刚才万副市长秘书来电话，让我们写个报告，你马上起草，把他是怎么调来北京的，到剧院后强占办公室，不干工作，不服从领导等等问题都写上。最后还要写上，如市里因为告状便解决住房，会助长告状之风，影响剧院的安定局面。此外，还要写写咱剧院广大群众的住房困难情况，有不少为剧院做过贡献的同志都还没有解决住房，在这种情况下给方燕解决住房，群众会有很大意见，如果市里能解决，希望一同解决。”

小夏听着，连连点头，口说“就是就是”，然后按院长指示院领导了，对你有了成见，就很难办了，你直接给文教书记写写你的情况，看能不能调离剧院，请领导想想办法吧！能不能起作用，可不好说了。”

久在官场的同学是了解官场的。方燕对老贾的帮助非常感激。北大同学呀，是重友谊的；可重友谊的同学应该当官，当大官，才能为老同学办成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呀！

贾秘书长感叹一番：“当官的没有感到压力，他就难为你解决问题；如果陈希同也感到不解决你的住房会对他本人有影响时，他还会管，那时肯定会解决了。”

“可我一个无职无权没有后台的穷知识分子，有房没房，活与死，会对陈希同有什么压力？”

老贾笑笑，不说话了。

方燕回到那间斗室，把见老贾的话一学说，妻子受到刺激，竟一夜睡不着了。

她没想到家里的日子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革”中，方燕的妻子珊月正在总后的文艺宣传队演“阿庆嫂”走红，如果不是受方燕的株连，入党、参军、提干，全解决了。当时一起在部队的同志，如今最低也是师级了，房子还是问题吗？至少也是四间一厅了！

俗话说：“男怕找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一家，男的找错行了：怎么会搞上文艺，当什么编剧，又怎么要调到这剧院来？女的嫁错郎了，倒了一辈子血霉！

夫妻俩想到这一生，都哭了。怨谁？怨天怨地还是怨人？谁也别怨，只有怨命了！

方燕越想越窝囊。他的本性难移，凡事总要弄个是非，争个明白，为了生存，他要斗争，要同倚仗职权欺负人的马仁做斗争。共产党的天下，不信就没有理可讲！

方燕一夜未睡，头晕脑胀，没吃早饭，便去文化局了。挤上 102 路无轨电车，因脑子里全是“官司”，乱糟糟的，他坐过了站，到了菜市口才忙往外挤着下车，售票员要票，他没有买，挤下去了，也不想补，急匆匆走了。售票员在背后喊：“你这大把年纪，看样子像知识分子，怎么还沾公家便宜不买票呢，真不像活！”

方燕想：“他妈的！不像话的事儿太多了！我这么大把年纪，干了快一辈子了，是教授，用得着为生存为找栖身之地这么挤车奔波吗？”又挤上往回开的 102 路车，心里有气，有意不买票，到站便挤下车，向文化局奔去。

他找到人事处处长。处长正为此事上火，说市里真的要查他方燕一家是怎么调来北京哩！怎么来的？光我们人事处能办的了吗！那是要经宣传部、组织部和人事局几个大关才能办成的，市里还是去查宣传部、组织部为什么批吧，我们没有鬼，不怕查！

吃饱了撑的，没事可干，就去找事吧！你是怎么得罪了剧院呢？

果然，马仁的“报告”起了作用。方燕太想见到那个“报告”了！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一些官僚整人的招数也大体相同。

方燕想当初在河北，因为房子问题，得罪了老院长，院长便派人去东北搞调查，整“黑材料”；没想到来北京又碰到了马仁，也用此法治人。不过他更狡猾，用给市政府领导写“报告”的办法，让市里批示去调查了。

方燕想见见新来的局长，又一思量，局长能不听马仁的而听你方燕的吗？去他的，不见了，回家吧！方燕一路走一路想：马仁你为何如此歹毒，我哪儿得罪了你？我并没有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写信告你，是新华社的内参让陈希同见到批给万展引起的事呀！要不要回去找马仁解释解释，消除误会？不！没有必要了，看来你是逼我上梁山，逼我上告，逼我给市领导写信了！

四、步步紧逼的灾难

回想起方燕在此后发生的一切，我的心难以平静：我难过，为他的命运，为他的生活；我难过，为在 90 年代，在首都北京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竟把一个不想惹事，害怕得罪领导，忍受艰难困苦的高级知识分子又逼到了一封封给市委领导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生存问题的路上，甚至把他逼到想以死解脱痛苦，以死和官僚们进行最后抗争的可悲地步……回忆这些是不快的，但我必须如实地记录下来，因为他是我们的北大同学。这是历史。也许那些做了高官的同学想像不到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事情早已过去，他自己也仿佛在做梦：我怎么会想到死？还要死在市委书记陈希同家的门口？是的！你是这样想的，你在街头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从头说起。我的手头有他写给各级领导的信及有关文字材料。是他说，如果我死了，这些遗文就留给你吧……我这才听他讲述了这些文字的来历……他先给我看了 1991 年 5 月 13 日《北京晚报》上发的方燕的散文《北京公民》，文章如实记下了他

全家调来北京的过程。他写此文的心情是愉悦的——1989年初。我把户口迁移证交给丰盛派出所，办好落户手续后，那位女户籍员用甜甜的北京音说了，一句：“好啦！”

从今儿起，您是北京公民啦。”——我久久难忘。这声音，这笑容，时时让我想到：北京公民应有的素质和责任。

人生是个圆吗？三十年前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全国文联，那是许多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一年之后，党中央号召精简机构，支援边疆，我出于青年人强烈的事业心，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长影去。不少朋友闻讯跑来劝阻：“你可要慎重，出北京易进北京难哪！也许你只有离开北京才能更体会到在北京的优越性，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北影要你，你去北影岂不更好？”

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所向，百折不回的劲儿，使我对多好的话也听不进去。带着浮肿，迎着刺面的风雪，飞过山海关，满怀豪情走进长影的大门。

不几天，我便对北京产生了强烈的思念。是的，只有离开北京，才感到作为北京公民的光荣、幸福。

时光蹉跎二十八载，我又回到了北京。老朋友也都两鬓如霜，感慨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家属孩子一块儿弄来？是钱不够吗？不要舍不得送礼，一个人花一万都不算多！”

我笑了，如实相告：我来北京，一分钱没花。他惊愕，半信半疑，猜我有“中央”级的“硬后台”。我说没有，他似乎仍不信。不好多做解释。他谆谆告诫：“家庭进京要早做准备，没有二三万的积累，肯定办不成，不信你试试！”

这些年我也听了不少传闻，说为了户口进京，送彩电、摩托车并不稀罕；一个户口送一万元是常有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因为腐败现象的存在，人们对传闻往往都信以为真。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我会立刻反驳一番的。现在只有沉默。

喜从天降，我没有精神准备。上级人事部门领导主动关心我，说中央对高级知识分子关怀，要求尽量优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并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妻子没有想到，竟说出“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吗？”这句傻话！表送到市人事局调配处。调档案，开有关证明，补身体检查……这一切办妥，调配处领导批了，向河北发函，一共用了二十九天。我告诉关心我的朋友。祝贺，惊愕！一致对我说：对人事部门的同志的热情关心，你无论如何要有点感谢的表示。

我给调配处具体办事的小陈打电话（说明一下：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姓名是打听出来的），请他告诉我他及领导的家庭住址，以便拜访。电话回答：“谢谢！”

您的心思我们明白，不必到家里去。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放下电话，我涌出了热泪。

我把这事儿告诉朋友。他们相信，我说的不是天方夜谭，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事儿。

此刻，我想到，我们都是北京公民，我应怎样无愧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1993年4月开始的“非法占房罚款”一直罚下去，如果没有马仁院长和小夏主任打击，方燕也就忍下去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借钱过日子也习惯了，这种受压抑的生活也有好处，它给孩子以深刻的教育：

要争气，以后再不过爸爸这种窝囊日子！记住，你的爸爸是穷作家，没权势，没后台，只有你们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生活的教育是深刻的，刻骨铭心的。那些生在高干家的子弟，没有这种生活，便难体会普通百姓的这种感情。

方燕的儿子从这间导演室走出去了，他以优异成绩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提前录取。但方燕认为：他报错了志愿。儿子随老子，不会搞人际关系，犟种，绝不是当官的料。已经考上就好好上吧！

方燕的小女儿在罚款的日子里就住在这间导演室，填写表格，被八中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爸爸的校友，然后在这间屋里，整理出版了她在高中时写的散文集。她一直整理修改文稿到深夜，为的是早日出版，用这本书的稿酬，偿还因罚款而借的债，给父母减轻一点压力。

1993年9月，方燕的女儿把这间屋子清理出来，提上行李，去北大报到，10月份方燕通知剧院：我们把“非法占房”交出来了，请从本月停止罚款。

小夏听到此消息，心中怀疑，本想对他进行打击，让他家日子过不好，竟想不到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办公室的人向方燕祝贺说：“这可是大喜事，你应该请客呀。”

书呆子竟不明白这种提醒。如果他是聪明人，趁此机会请夏主任，或暗里送点礼，以前的矛盾也许便和解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他就是因为不知送礼上供，才和马仁、小夏搞僵的嘛！

书呆子听不懂那提醒的话，反而扔出一句难听的话：“每月罚款150元，我们家连吃饭的钱都要借，还有钱请客？那一千多元够请客的了！”

夏主任脸面铁青，却没说话。

1993年12月30日。方燕左思右想，决定给万副市长、文教书记写信。不写，心里头憋闷：妻子严重失眠，每夜都睡不好觉，总叨念这些事，他也忍受不了！那无故罚款就算白罚了吗？

人家打报告查你，就不弄个水落石出吗？你这个书呆子，软松货！

半夜，拉开灯，方燕写信。

万展同志：

向你拜年！

在这一年里，得到您的关心，我全家感激之至！新华社记者见我家惨状，写了内参，希同同志批转给您，您便想给解决；但由于剧院写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给您，您便感到棘手了。您和这个剧院关系密切，有人可以直接找您，您会完全相信这级组织的报告，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但许多事情也坏在这里，下面为了保自己或讨好上级，常常用说谎欺骗领导，给事业带来损害，而领导却被蒙在鼓里！

因此，我希望能找您面谈，谈谈剧院真相。如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请让秘书通知我。

我的北大同学刘绍棠知我真情，他给您写信，但未得回音。

他还要为我呼呀。

您也许早已忘记，1958年您当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

我曾接受团市委领导指示采访过您，写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朗诵诗，在北京市宣传总路线誓师大会上朗诵，其中写了多面手万展。

如今您当了副市长，仍管城建工作，有多少房都握在您手里。而我调

回北京已五个年头，还是无房户，暂住在剧院办公室里……我是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我 1946 年参加革命，应该落实老干部政策；我妻是民进会员，是受全国表彰的优秀家长，也应考虑落实对国家表彰人员待遇的政策；我是烈属，国家有优抚政策：我女儿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多次获国际国内大奖，也该有个栖身之所吧！

如果是由于剧院那不切实际、歪曲真相的报告，使您很为难，我诚恳要求，将此报告复印一份给我，我将按事实反驳，以正视听！您也可以由此事引发思考，看您所信赖的下级领导是怎样欺骗您的。

秘书同志，请您务必将此信转交万展同志过目。请体谅一个老同志在困境中的心情！

此致

敬礼

方燕并全家敬上

1993 . 12 . 30。

他又给市委常委、文教书记写信，也约面谈。他写道：“据说，万展的意思是将我调出剧院，否则不可能解决住房，而此事只有靠您亲自过问了。如果不是剧院马仁等人逼人、欺人太甚，使我无法生存下去，我实在不愿去麻烦领导，给领导写信。我要求给我一家生存的权利：住房、吃饭；我希望两个孩子能有家可归，春节能够团聚！”

这真是诗人的天真！他想以理服人，还想以情动人。因为他写信时眼里含着热泪，他想以他的条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解决住房，以他诗人的真诚，赤子之心，一定能感动领导，最低也能把秘书感动吧，只要当官的有情，不会不关心百姓的痛苦。

他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他对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印记太深，他想的还是过去那样的人和人的关系，由于和高扬老人的接触，他又加深了那种对大家庭同志关系的感情。

两封信全交给他的秘书长同学，肯定能收到。他想像着，掐算着……盼着像那年给高扬写信，秘书第二天便来找他，然后让他去当面谈话……他失望了，有点伤心。他的思想实在落后于现实，他不知道，今天当官的有多么忙，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问题，比你的事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哪有时间去找你谈话，耽误宝贵的时间。

你有痛苦？就像你有病去找医生，总觉着病给你带来多大疾苦，你想让医生感动，对你的疾病高度重视，给你认真治疗，开最有效的药物……可医生听了你的述说，脸上很平静。不必奇怪，你不知道他每天接触的病人太多太多了，他听惯了，听烦了，甚至有些麻木了，他表现出来的冷淡。冷酷也就难以责怪了。

当官和当医生的相似。他面对那么多要处理的“脖，能够都有动于衷吗，那不把人累死！

所以，我总劝说像方燕这般的有呆气的知识分子：放弃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当官的关心。支持和恩赐上。不要浪费精神去找他们求援求救。别烦人家，让他们安宁些吧。你们应理解当官的难处，理解万岁嘛！

因为两封信没反应，方燕又去找秘书长“导演”了，他怀疑是否交到了。秘书长说：“肯定见到了，肯定不会找你谈话。

他们太忙，何况这是你一个人的住房问题，人家下级给上级写报告，也是人家的权力，这也难说有什么错。你若想让领导重视，除非找刘绍棠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联名给陈希同写信……还是那意思，你的问题没让当官的本人感到对他的官位有影响，他是很难过问、重视的！”

这真是至理名言，只有熟悉今日官场的秘书长才有这种体会。

方燕和妻子去找他的老同学刘绍棠，说出秘书长的意思。绍棠是市人大委员，说话爽快，反映敏捷，因偏瘫不能离开座椅，但对方燕仍欠起身热情握手。他说：“领导最腻歪联名上书，这是给他加压力，形成反感，便更难办了！今年二月开市人大大会，我为你在人大会上发言呼吁吧。”他还帮助想办法：“珊月不是受过李鹏总理接见吗？他一定还有印象，你不妨给李鹏写个信，只要能得到总理一个批字，市里就重视了。万展那儿我得问问，为什么不给回音呢？珊月是民进会员，我建议你们也找找民进领导方向明，他是市人大的副主任。如能和他谈谈，他会主持正义的。”

方燕和妻子还未见到方向明，便感到方向明了。

就在他们和绍棠商量时，剧院院长马仁和夏主任已商量好进一步整治方燕的办法。马仁告诉艺术处负责人：“不能给方燕发年终奖。他不干正事，整天去告剧院，搞得剧院不安，我们不能奖这样的人。还有，你们可以通知方燕，今年剧院不聘任他了，工资还可以发给他60%，但不能用了。”

停聘，不再聘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他下岗了。

方燕回到剧院便被艺术处的处长唤到办公室。今天是集合的日子，发年终奖金300元，方燕想这下可以过年了！但却一直不叫他的名字，直到没人领了，他问：“怎么没叫我？”此时处长才说：“院里说没有你的年终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成工作任务。”“我什么任务没完成？你们给了我什么任务？今年在没给我任务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个戏曲剧本《燕赵石》，要拿出来吗？毛主席诞辰百年，要排演小节目，我都写了……你们说，有什么任务没完成？”

聘不聘用，是他院长的权力，方燕无话可说，临出门喷出一句带火的话：“他院长想置人于死地！我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马仁这一招很损，却也是常用之法，这是领导权威所在，你不听话，便摘你的“鸟食罐”，让你没饭吃，看你老实不老实。这两年一些工厂厂长利用“优化组合”之名，让得罪了他的工人下岗，暗中报复给小鞋穿的事屡见不鲜，马仁用的就是这一招。

这年国家实行岗位工资制，方燕属于国家一级编剧，相当正教授级。他又是1946年参加工作，是第一批评定的职称，所以工资最高是950元，马仁身为院长，副局级待遇，那工资却不如方燕，也心里来气，不聘用方燕便只发60%，那就是570元了。

这样他心里好受。

方燕当然不好受。凭什么不聘我，让我下岗？这是打击报复，明目张胆给小鞋穿！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人一月300元，就得600元，日子还是艰难的，为了生存，他被逼上梁山，只有斗争了！下岗没事了，正好全力以赴。

方燕夫妇照绍棠的指引，去北京市民主促进会找方向明，不在，打听到他家住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宿舍，便又奔向首都师大。天已很黑，路又不平，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座住宅楼，却黑着灯。他们上去，自然敲不开门。向明呵向明，你怎么家却不明？方燕看到一幢幢高楼万家灯火，那每扇明亮

的窗子里都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他们夫妇俩却面迎刺骨的寒风，在不平的路上奔波，为了什么？还不就为有一个可以栖身之所，可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吗？

方燕顶着寒风走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流出了泪，又被寒风吹干了。他嘴里吟出这四句诗来：高楼林立入云端，万家灯火写诗篇。

何时有我灯一盏？

望楼兴叹又一年！

他回到家，立刻把诗抄出寄给北京市委陈希同了。

第二天，方燕又去文化局，他一定要见见新来的艾局长。一直等到上午下班，方燕在门口迎上局长，自我介绍。艾局长马上说：“你的房子问题我知道了。我手上有房可以给你解决，现在文化局役房，有什么办法？你回去吧，再说也没用……”他一边说一边往食堂进，方燕跟进来还要说压在心头很久的话：“为什么你们不给房，我们没地方住，还要罚款，一共已罚1000多元，如承认是局里的责任，应责令剧院退我；为什么打击报复，今年不再聘我，只给百分之六十工资？我是1946年的老干部，我离休还要给百分之百的工资呢！为什么？应给我答复……”他紧紧跟着艾局长，并不管他要不要吃饭。艾局长无奈，虽心烦却不好说别的，问：“你没有吃饭吧？”“没有吃。他们打击我，就是不让我们全家吃上饭。你吃饭吧，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你太忙，找到你太不容易。”

“那就一块吃，我请客。”

方燕也不客气说：“可以，今天吃局长一次。如果我一家吃不上饭，我们全家都要找你来，你精神上有点准备吧，我从来不会客气的！”

方燕和艾局长同桌吃，局长要了4个炒菜。他算是第一次接受局长请客。让领导请客而不是请领导吃饭，只有他这书呆子能做得出来。

方燕从艾局长谈话中知道，他的耳朵里早灌满了马仁副局长的谎言，先入为主，对方燕的话有点听不进去了。方燕的印象是，这个从知青中提拔的年富力强的新局长能说会道，也敢说敢做，有魄力，但也是不了解下情的官僚。

方燕口到他的斗室便躺下了，心悸，早搏，自己摸脉，每分钟120次，心里闷得难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无依无靠。

他是个孤儿，可从投到革命大家庭那天起，他便把党组织，把前辈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大家庭同志情给他温暖，他性格开朗乐观，因为他处处有亲人。

而现在竟有了无依无靠的感觉，他下意识中的凄凉感也许是自己要死了吧。不！不能这样稀里糊涂死去。此刻，他觉得给不给住房已不要紧了，要紧的是这种凄凉感。他不甘心，他要找寻那失去的温暖感觉，他不能没人管呀！这些官们，都想个人私利，怎样往上爬，保住乌纱，掠夺财富；老百姓死活疾苦与他们升迁似乎无关。

他想，自己还算小有名气的作家，还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也还不是找不到门的人，也还不是这样艰难地活着。至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又该怎么样呢？！

方燕不相信中国像美国每年都攻击说的没有人权。人权最根本的是生存权！那些官僚不管百姓死活、不给老百姓生存权利，就是和美国那些敌视我国的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为这些敌对分子提供攻击的材料，实在大可恶了！

他这时觉得这绝不是对待他个人的小问题，而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声誉的大事。

想到这儿，他支撑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给李鹏总理写信，他知道李鹏也是烈士的遗孤，是周总理，是党把他养育成人。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给总理写信，竟像和一位兄长倾吐心中的痛苦，向兄长求援。他的言辞没有思考推敲，想什么就写什么，他写道：“我从小丧父，是烈士遗孤，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了作家，而现在竟无依无靠，没有人管；我和妻子都患了重病，但仍希望在死前能看到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让我全家得以生存，这不是我一人一家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免得在我死后装入骨灰盒时，让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说，他终于解决了住房问题……我的住房本应由文化局解决，但新局长官僚主义偏听偏信，只对我回答“无房”了事；剧院领导让我家无存身之处，只想推出了事……我相信党，只有依靠党来管我；如果党不管我们，也只要一死了！”

他写出心里的话，心里倒轻松了些。

他把信装进信封。不能从邮局寄，那样便转到信访办公室去了，李鹏总理不可能看到，他要亲自送到中南海去。

他从长安街向新华门走去。

新华门前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向他招手。他想交到新华门的传达室就可以了。他走到那石狮子旁，从旁边过来两个穿便衣的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去找李鹏同志，给他一封信。那便衣说，你去前门外信访办吧。他说，我把信交给你们，由你们转吧，便衣说我们没交信的任务。方燕连大门都难靠近，只好自己把那信装起来来回走。去信访处吗，还不是一样？于是花两角钱贴上邮票，投入了邮筒……就在方燕给总理写信的时刻，那个夏主任把他起草的一份《通知》交给马仁院长了。他汇报自己的辛苦和为剧院的打算：把咱们这个后院出租，每年可以收入20万，咱这里寸土寸金哪！

我这几天跑好了南城的一个旅馆，好说歹说，人家总算答应租给咱们一个小院。砍价砍到租金7万5千元，这样一来，剧院便可多得10万多元呢！我们需要让住在剧院院内的住户全部搬走，好腾出房子创收。

马仁赞扬夏助理能干后，问：“怎么对这十几户说呢？到那旅馆去，住户每平方米每月要交2元，怕有阻力吧？！”

夏助理一笑说：“院长考虑周到，我们自然不能说为了赚钱，你看我写的理由：为剧院基建改造拆迁做准备，加强管理，维护正常工作秩序……这样谁也说不出来什么了。”马仁看了一下《通知》，说写得不错，不过如果方燕不搬，怎么办？得有个办法。

夏助理说：“我想补充一条，逾期不能搬完者，每滞留一天按每平方米25.61元收取滞纳金……”马仁说：“他还不搬呢？”

夏助理说：“给他限定日期，再不搬由剧院配合有关部门强行搬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剧院就要有剧院的办法！”

马院长拍拍夏助理的肩膀，表示了对这位院长助理的信任：“改一下打印，发给住户。”

打印的盖着剧院行政处公章的通知送给方燕家的时候，方燕妻子因子宫肌瘤大出血，正要去医院，方燕扫看一眼便放到一边了，不用细看，给他的通知不会是好事，眼不看心不烦，眼下看病要紧。他送妻子去了医院，医生埋怨为何到这么严重才来，立即安排住院。方燕马上给珊月的剧院打电话，

取支票……这京剧院的领导真好，一位副院长劝说不要急，并派工会的人马上把支票送来了。这和他所在的剧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日。

这年我应邀到全国政协参加迎新春茶话会。我惦记老同学，会没有结束，便提前退场来看望方燕。我们虽同在北京，见面机会很少，我只从电话中知道他生活得不痛快，问何故，他便说：“一言难尽，是长篇小说题材。”这政协礼堂离方燕所在的剧院很近。

我来到他住的办公室，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惨状：一间十多米的办公室丁字形地安了两张单人床，占去近一半面积，三个书柜和大包小包的衣物，又挤去近一半面积。进屋只能在书架空隙中穿过。因为珊月住院，床上未及收拾，乱七八糟，被子没有叠起。方燕正躺着，见我进来才慢慢爬起来。我说你不舒服？他说妻住院了，他本人心脏病也犯了，心动过速，早搏胸闷，他一会儿要准备给妻送饭，先歇口气……我这几年到全国各地去，到过无数作家的家里作客，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生活状况、住房条件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像方燕这样的一级作家，都有了四室一厅的住房，最差的也是三室一厅了。而方燕他竟还挤在这样的窝里——我只能叫它是“窝”。

我说不出口，心里压上沉重的铅块，气闷难忍。我说什么呢？我作为他的同窗同床的大哥哥，有些自疚，我对老同学小弟弟关心不够。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问：“孩子们呢，不回家吗？”

他说：“家里没地方，他们都住学校。女儿在北大，辅导留学生，算勤工俭学可以有点收入；儿子在青年政治学院也找了个家教。孩子大了，知道家里的处境，他们的妈妈住进医院不让我告诉孩子，免得他们着急。北大留学生要来我家，被女儿婉言谢绝了，怕外国人见了写文章，捅到国外，给攻击中国没人权的人提供口实，内外有别，咱不能做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事呀！”

我说：“你不该来北京呀！”

他说：“北京是中国首都，首善之区，谁不想来呀！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这就值！其实，如果不是有人找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很安宁的，真是逼上梁山哪！”

我问他是怎么和剧院领导搞得这样僵，是不是得罪了他们？

方燕讲了得罪夏主任的原委：

“……我调来时的老院长是个好人，是不整人的，我永远感激他那片好心。可他在剧院不痛快调走了。调来一位能干的女书记，像个党的书记，要求很严格，可她也没有呆长久，也走了，事情就出在她身上——“我被批准到家乡白洋淀深入生活，挂职县委常委，是1992年的事儿，是女书记支持的。这年夏天，行政处处长小夏找到我，说他们想到白洋淀旅游，你是县委常委，跟县里说说给咱们照顾一下吧。我满口答应，立即和县委联系了，告诉他们何时到白洋淀，我当然以为剧院办事为荣了。由我做向导，剧院的大客车开向白洋淀，直奔县委招待所。谁知到后便遇到麻烦，原来安排在县招待所，因为一个省里的会议延长了半天，尚没腾出房间来。县委办公室的人直向我抱歉，说是在这儿等呢还是转到县文化局招待所？不好让人们久等，便把客车开进文化局招待所。这里条件当然较差些，我立即找到局长，安排找船，以便明天在淀上游玩。第二天，我带文化局长去招待所接大家上船，他们已不辞而别。招待所所长说，当他去结帐时，那个姓夏的头儿说：方燕是你们县委常委，还管我们要钱哪？并且还说：‘我们挨了一宿蚊子咬，还

要花钱！’一句礼貌话没有，走了。文化局长对我说：‘你们是大剧院的人，怎么连点礼貌都不讲？我们租好船了，不用，也得告诉一声呀！请你向剧院领导反映我们的意见，这样的大爷，再来我们可不敢伺候了。’我回到剧院把这情况如实向女书记谈了，女书记很认真，说：‘我让夏处长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太不像话！’我说：‘算了，回头我去解释吧。’我不知女书记怎样批评的夏处长，只知从此后夏处长见我怒目而视。早有剧院朋友劝我不要为他们办事，这夏处长是小人！我不听，辛苦一场落此下常不久女书记调走，这小夏也报复了书记一场，要车没有，让她自己想办法，马仁一上来，他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并对我行此报复伎俩。真是宁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哪！”

我对方燕说，“对这种势利小人，你得格外小心。”

他说：“领导信任，我小心何用？”

是啊，是没有用，一个单位有了这种小人，又得领导信任，这里的书呆子可就要受罪了。

我劝他别生气：“你是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讲讲，找你们现任的书记谈谈。马上过年了，怎么过呀？”

他说：“怎样都得过去，无所谓，我找了块红纸写个春联贴上就是。”

正说话间，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两位同志来看他了，代表市政府对烈属进行慰问，带来一条毛毯和一瓶“绿宝”植物油。方燕接过来，连声说谢谢：“这是给我送来的一片温暖和生命的绿色呀！”

他又感动地做诗了，我却仍感沉重：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给他一点点安慰，他便激动了。欺负这样的老实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走时，给他留下500元，他接过去，什么话也没说。

这年春节，他把一幅对联贴在门上。上联：与命运搏斗，车到山前必有路；下联：同灾难抗争，泰山压顶不弯腰。

横批四个大字：否极泰来。

事物走到了极处就要往回走了，方燕的灾难应该到了极处了，他应该转运了。

事实却没有像祝福的那样。

五、想在陈希同家的门口死去

他祈盼1994年否极泰来。

没料到新的灾难却来了：行政处给方燕在南城一个小旅馆安排了两间房，让方燕搬家。他说，我爱人还在住院，不能动。行政处让他先去看看房，然后与之签合同。他去看了，两间，一共20米，却是常年不见阳光的屋子，妻子有病是不能住的。

祸不单行，不久，河北省来函，让他去腾出河北的三间住房，说他已调京5年了，我们这儿住房紧张，应该让出来了。方燕无话可讲，只有去找文化局。文化局说，河北来了公函，我们已给复函了。剧院不是给你两间周转房了吗？！你就从河北搬来，给人家把房腾出来吧！

天哪！方燕大叫：那河北三间房里，光书就有一万册，那是他一生的财富，这如何装得下？文化局能否给找个仓库寄存？答复：没有，书嘛，你自己想办法去。

书呆子被书累住了。

“你们怎么回答河北来函的？能否让我看看？”

答：“这是公函，你不能看，告诉河北省，我们的新宿舍楼年底竣工，那时可以解决你的住房，对你来京没有搬家，请河北谅解。”

北京没地方，方燕无法去搬家。

河北等急了。

一天，来了封电报，是在石家庄的方燕的远房外甥打来的，说是那房内书物等已被搬出，望速去石家庄查看。

方燕只好离开医院，赶去石家庄。那剧院院长见了方燕，连连道歉，说那房分配给了一位编剧，他急于用房，见你不在，就让行政处的人把门打开，把你的东西全部堆放到锅炉房去了。我批评了他们，没有主人在场，他们这样做是不妥的，你去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方燕无话可说。

回来向北京汇报，北京说：“河北这样做是犯法的，应该告他们。”

方燕拿出从河北复印回来的北京复函，说：“他们说是你们支持做的。”

复函原文是——

河北省文化厅：贵厅关于要求方燕同志尽快搬出占用河北省歌舞剧院三居室住房的信收悉。方燕调入我局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分到住房，致使其一直占用省歌舞剧院的住房。我们对贵厅及省歌舞剧院要求方燕迁出的做法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我局现在暂无可供分配的住房，新建的宿舍楼今年年底方可竣工。接到贵厅来函后，我局已责成其所在的剧院为其联系租用临时周转房，特此函告。

对此带给贵厅及省歌舞剧院工作中的不便谨致歉意。

北京市文化局

1994年2月26日

北京文化局领导让方燕找剧院，说让他们给你解决吧；剧院不承认此事，说给你两间旅馆房都是照顾，你的房是该局里解决的……上下推，把书呆子夹在中间。

北京让去告河北；河北说你回去找北京……两地都不管了。是的，方燕有理由告河北歌舞剧院非法，但人家也出于无奈，都是老朋友，便忍了。

方燕回到老家去，把这苦楚向乡亲们讲了，他说完，竟让一人流下泪来，他叫刘茂林。他说：“你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是咱县第一代共产党员；你从小离家投身革命，没有谁住的地方也得给你想办法。我们城关房地产开发公司空着一套房，先借给你，你把石家庄的一万册书和大件搬来吧。别人反映，我去解释，你甭管了。

走吧，我领你去看看。”

刘茂林是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他与方燕并无深交，只是知道方燕一家；方燕也没有给他送一分钱的礼，倒让茂林请他吃了饭。

没想到因后来书呆子写书得罪了县领导，给茂林找了麻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方燕的两个大学生，寒假无家可归，见外地同学回家过年，北京的学

生也都与父母团聚，他们感到孤独，到医院病房看母亲。母亲说：“你们的父母无能，过春节也不能让一家团聚。你们是大学生了，家里的担子该放在你们肩上了。铁梅年龄十七不算小，还为爹爹挑八百斤担子哩！你爸也病了，不能跑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兄妹俩一商议，便在腊月三十去了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

值班人接待了这两个大学生。他们说：“春节到了，我们大学放假了，我们要求帮助，给我们一个回家团聚的栖身之处。”

值班人马上给剧院打了电话，院里答应给他们打开一间办公室暂住几日。这个办公室，就是他们搬走后一直闲置无人住的那间导演室。

过完春节，方燕领工资时才知，又扣了一个月的住宿费 150 元！方燕当时还以为夏主任发了善心哩！财务处会计说是夏主任让扣的！

方燕无奈，只有一边看着住院的病妻，一边在病房给文化局领导写信，含泪要求解决周转房（他感乡亲之谊，却总觉不如求组织安排为宜，这是他一生依赖组织的观念，难改）。

他在信中写道：

剧院三令五申要我搬出办公室，我一点也不想赖着不搬，住此如坐火山，日夜不宁。现在妻病加重，腊月二十八再次住进医院……无论如何请文化局帮我度过难关，使我能在妻出院后立即搬出剧院办公室，不然会导致剧院对我误解加深，印象更坏，成见更大，难以存身。

河北多次来电让我搬家，不好请他们再宽容我些日子了。他们已把我万册书堆放锅炉房，夏天风雨到来，我一生积累也实不忍心损坏！现在剧院给我一间 9 米、一间 11 米的旅馆租房，我感激剧院对我的照顾（因为不该由剧院给房）。那房子一间放不下两床，一间终年不见阳光，也不能让病人居住，能否解我燃眉之急，给我找个存放一万册书的地方，使我今年能安居乐业……书呆子没别的本事，就会写字。写这信有什么用呢？这就是病！

你可还记得他冒着寒风跑到新华门前，要给总理送的那封信吗？后来不是通过那邮筒送走了吗？你以为石沉大海了吗？如果真的沉入海底也就好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他曾在那痛苦无奈时给总理写了信。这封信真的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人家一见是北京的事情，便批转给了北京市政府，市政府见是文化局的事儿，便转给了市文化局……如果是只写剧院的事还好，唯独此信中有一句“新换的局长官僚主义”，这很叫新局长恼火，这不是他呆子自己找事么。

书呆子要记住：世界上的人都愿听好话，当官的更容易这样，所以溜须拍马者才如此众多。你给总理写信，最终落到了你批评的人手上，不麻烦了么！

诗人的呆劲就在于撞到南墙不口头，你不解决问题我就还写信！

当时方燕不会知道，文化局那个被他说成“官僚”的局长见到市政府转来国务院信访办的信，立即把马仁叫来。马仁趁机说了方燕许多坏话，新局长也更加恼恨专和领导闹事的呆子，便让马仁去给市政府写个报告，算做回答。

方燕心闷，他从报上得知市人大会议已开过，全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也要召开，不知老同学绍棠在市人大会议上如何为他呼吁的？他去找绍棠问个究竟。

他从宽街中医院出来，倒两次车到了那为北京作家们盖的新楼，这是

令许多没进去的作家十分羡慕的一幢楼房。绍棠住7楼，从电梯上去，见到绍棠在门口贴的告示：老弱病残四类俱全伏枥卧糟非比当年整理文集刻不容缓下午会客四时过半谈话时间尽量缩短方燕却不管什么时间，按响了门铃。半天，绍棠才拖着腿开了门，绍棠的妻子曾彩美不在，根据说话时间尽量缩短的要求。

方燕开门见山：“老兄怎么在人大会上为弟呼吁的？有什么反应？”

因为在方燕调到北京的那年，绍棠患了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是说话不大清楚了。他说：“你们剧院来人看我，给我送来一封打印的信，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给万展打电话，万展也对我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由剧院给解决了，说是你不去，让我不要管了。我本来是要在人大会上提出这事儿的，现在剧院以组织名义给我写了情况，我便不好在会上说了。”

方燕已经听清楚了，看来马仁知道了绍棠要为方燕呼吁的事，走在方燕的前面了。他们带来了信，还为看望绍棠带来了礼品，而方燕看望同学却空手而来，无法请走不出门的老同学去调查。面对一级组织的话和老同学的话，对一贯听党的话的绍棠来说，自然要相信剧院组织的话；方燕理解绍棠，不好再说什么，告辞出来。

他离开作家楼，迎着料峭春风，边走边想：“剧院怎么会知道我找了绍棠呢？”

他想起来了，是他在给万展的信中提到“绍棠也要为我呼吁”的，这肯定是十分关心这剧院的万展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剧院，然后共同研究的对付他这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

方燕回到他那个家时，正巧他中学的老同学。作家老冉来看他，他们亲如手足，无话不谈。老冉以部队作家身份为吕正操写了几本书，成了吕老的秘书。方燕把自己的处境向老同学一说，老冉说：“吕老那里不行，管不了北京。我的大学同学荣君是全国人大新闻局的副局长，也是两会新闻中心副主任，你写个信送到全国人大大会上，肯定解决问题。”

方燕觉着又见到了光明。

老冉给荣君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说了方燕一家情况后写道：“方燕一家可谓走投无路，朋友们给他出主意，向正召开的两会递份材料，请你在百忙之中接见一下方燕，帮助他一下。把材料转给能解决问题的人手里。烦劳，谢谢，三月八日”。

这天，方燕带着信和材料向人民大会堂走去。大会召开，警察很多，几步一个卫兵，他有刚调回北京那时的感觉，从大会堂后边去，被拦；他又去南门，又被拦住；他向东门去，拿出给荣君的信，被一工作人员安排在一个地方，不一会儿那人回来告诉他：“你找的主任不在，请回去吧！”

找不到人，只好回去，他不敢把此信和材料交给别人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例会在北京召开了。方燕照常关注着大会的内容，关心着国家大事。虽然很多人劝他不要关心政治，像深圳、广州的朋友那样关心你自己怎么抓钱好了，那些国家大事，你管不了，也就不必浪费神经细胞。可方燕却觉着每件事都和他有关，位卑未敢忘忧国嘛！果然，他看到了与他密切相关的内容，李鹏总理在北京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多给老百姓盖房的意见，方燕大声叫好！

不久前，方燕听到小道消息说是市政府、市委某些领导人在有名的豪

华饭店包房办公，一年要让国家拿出多少万元来，而他们本人家的住房并不是没有他办公的房间呵！为什么非要去豪华饭店租房？而他方燕全家竟连求个栖身之地也成了奢望，这是何等地不公平！他这时很容易想起党章中的一些词句，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这些“党员”去个人享乐？千百万烈士的牺牲就是为了让他们谋私利吗？

方燕从报上看到北京市公布的一个目标称：到 1997 年，北京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要达到 19 平方米以上。可他却听到公共汽车上有人骂：“陈希同光吹牛，说谎欺骗中央吧，现在又说谎话了。人均 19 米，屁话！”另一位道：“这是照建筑面积平均给居民的，可惜的是你我平头百姓均不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怕要平均 190 平米呢！”旁边一个人甩出一句：“老百姓就是‘老背兴’！”

方燕听了这话，便给他的秘书长同学打电话，把群众反映报告了，让他转告陈希同老校友，不要因吹牛说谎而挨群众骂！建议立个“居民最低人均居住面积”目标，这样老百姓才服气。

秘书长说这个建议很好。

方燕马上提笔写一短文，给《人民日报》。

1994 年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出方燕的漫谈，题目：《安得广厦千万间》。

在方燕写此文的时候，那个掌握行政大权的夏主任在马院长的支持下搬进了横水车胡同一处四间的住房里，他只有三口人，孩子 6 岁。为什么要 4 间？说要为孩子找保姆，有一间让保姆住的。

夏主任搬完家，便起草了给方燕的一个“最后通牒”，让办公室的小女孩抄写之后，盖上行政处的红印，交给了从医院回来的方燕。

方燕同志：

剧院外迁住房，住户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剧院外租房屋已经花费了很多人力、精力。按剧院规定春节前应该搬完，考虑到一些同志的具体困难，拖了一段时间，目前绝大部分同志已经按剧院规定搬出了，剧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支付了巨额房租。

为了搬迁住户问题，您曾给市里及新闻界的一些朋友写反映情况的信，市领导和您的朋友们均已将信息反馈回剧院；市文化局也承认过去的允诺，答应今后由局负责解决您的住房问题。以上各方领导及朋友们，均表示让您尊重剧院的决定，速按剧院规定执行。

我们想，您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明白个人应该服从组织这个基本道理，应该在各项工作中带头维护党组织的威信，服从党的决定。因此，您应服从剧院迁户大局，迅速按院规定迁出剧院。若您在 4 月 18 日前搬迁不出剧院，剧院将执行有关搬迁通知规定，并采取组织措施。

谢谢您的合作。

剧院行政处

1994 . 3 . 31

方燕清楚，行政处小夏是千方百计要让他搬走。既然他给万展等人的信都转回来了，他们便可以任意而为，因为有了支持的后台。说文化局答应“今后由局负责解决”住房的允诺并没见到明确的文字，就是说，别人迁到临时周转房，将来由剧院负责迁入新居，而他方燕，剧院不管了。他想在这时刻必须明确一下。

方燕和患病的妻商量，还是给院领导和文化局写信吧。

1994年4月9日，方燕给剧院行政处并剧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借住剧院办公室已5年之久，给剧院带来不少麻烦，我一家也忍受着困难，早就应该迁出。为此，我个人已多次向应允给我家住房的文化局反映情况，并恳求剧院领导。

文化局领导一同视察我的困境，一同找出一个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今日再次通过行政处，再次恳请剧院、文化局领导到我借住的办公室同我谈一次，了解实情。

我妻于去年腊月二十八日因病情加重住进北京中医院妇科病房，因颈椎病严重及其它疾病，暂不能做瘤切除手术，只能服药治疗。剧院再次为我安排借租房我衷心感谢，那房我们已看过，因妻病情不能迁入。恳请领导体察我们的实际难处。

1990年7月，剧院行政处即通知我，今后你的住房由文化局解决。四年内，文化局、剧院领导更换，因当时未见文字根据，成了麻烦事。今日见行政处信中所言由文化局解决我住房，也尚未见正式的文字通知，也没正式谈话，虽然局长口头说过，但如他再调走，便没了根据。为了防止今后因领导更换造成无人负责的情况，我恳求能有正式的文字的允诺：何时解决我家住房，在哪里解决，解决什么样的住房？

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为国家、文化局、剧院的困难分忧。

因此，五年内暂住办公室，只要能生存，从未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我愿遵守剧院规定，同时也恳请文化局、剧院领导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困难，以求矛盾缓解，安定团结。请求把此信上报文化局，我相信共产党各级领导都是关心群众疾苦的。

方燕

1994.4.9.

方燕怕剧院不正式报文化局。因为马仁院长便是副局长，他一手遮天，既可代表局又可代表剧院，故方燕又给文化局领导一封信：剧院通知我在本月18日必须迁出剧院，否则采取组织措施。

信复印件附上。

今再次恳求、哀求局领导、剧院领导亲自到我现住所来同我谈话，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地找出一个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我祈求缓解矛盾、安定团结，以使我全家能平安生存。

……只要领导能亲自去视察一下行政处给我家租的两间房，就会明白一切。妻的病情，医生叮嘱实不能搬迁。我已给剧院行政处回信。

行政处给我的信中说，文化局答应今后由文化局解决我的住房问题。1月14日，行政处夏处长命我搬房说：“你的房由文化局解决，你应该去住文化局的办公室，不能再住剧院的办公室！”

时到今日，我只求文化局给我一个文字的回答，以免因领导更换，出现无人负责的麻烦。如果可以分给我年底竣工的新宿舍楼，我能见到希望，住房有日，我们可以忍受这几个月时光，熬过200多个日夜。局领导认为我目前必须迁进那终年不见阳光的阴冷小屋，我便将家具等物迁入，我和妻另去借宿，或到外地投亲靠友，暂让两个孩子无家可归……妻子在呻吟，痛苦已极！我要去熬药了，恳求局领导关照，感激不尽！

方燕

1994. 4. 10

方燕满怀希望，亲自把信送到了文化局。

他不知道，此时，文化局由马仁写给市政府的报告已批回来了。

4月13日，方燕刚把妻从医院接回他的小屋，把开来的一大包草药放进他自己用木板搭的一米多的小厨房里，就听到艺术处支部书记老槐喊：“老方，你来一下！”

方燕心里咯噔一下，心跳加速，他知道不会有好事。

方燕进到艺术处，见行政处夏处长也在，槐书记让老方坐下，说要向他宣布政府批示。

在这之后，方燕想到以死抗争，便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写过一封万言长信。他曾复印一份寄我，信中写了这一段情况，抄录如下：一年多来，我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剧院、文化局反映我的实际困难，恳求领导能直接和我谈一次话。看看我家的处境，实事求是地找出个解决办法，连这最低要求也不能达到。共产党的领导在战争年代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共产党是依靠这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而取得政权的。同样，当共产党失去广大群众后也会失去政权的。我还不是最底层的百姓，还是个有教授级职称的1946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他们竟连我这种请求、恳求以至哀求都不理，这太叫人伤心、寒心了！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北京市吗？我给局里的信为何全由马仁处理，让他一手遮天，下欺上骗？

1994年4月13日，剧院艺术处支部书记与院行政处夏处长（也是办公室主任，马仁的助理）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宣读了由万展同志圈阅的市文教办主任高兰天同志批示：“接市文化局报告……一、方燕同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剧院的决定，搬迁分配给他的宿舍；二，对方燕同志的错误，剧院要给予批评……”。

槐书记宣布后，夏处长补充说：“你给上级及新闻单位反映情况的信都转回剧院了。现在万展市长已圈阅了批示，这是政府的命令。你必须在本月18号前搬出办公室，否则，我们将根据批示，对你采取措施。”我说：“听了批示，我很震惊，也很恐怖。我不过是想求生存，找个栖身之处而已，而这批示却对我的困难只字不提，文化局给市政府的报告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情况；高兰天在不了解情况下挥笔批示，是官僚主义的批示！我要问一下：我的具体困难没有一人过问，我只为了求生存，怎就成了‘错误’？”

我错在何处？作为命令，我服从，但保留申诉的权利。”支部书记说：“这是市政府的批示，我们没说的，服从。高兰天是市文办主任，他是官僚主义也好，是资产阶级也罢，他在那个位置上就代表政府，我们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我说：“不，我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我服从；他若真是资产阶级，我就不服了，希望把我的意见向文化局反映……”4月13日，我以带病之身收拾书物，做搬家准备：先把3000多册书装入编织袋，堆放在门口。

4月15日，我收拾完毕即向行政处刘副处长要那小旅馆房间的钥匙。刘答应下午送来，我一直等到晚上，却不见送钥匙来。我很奇怪。又等过了16日、17日，一直到18日这通知限定的最后一天了，仍不给我钥匙。我去文化局办公室找到负责信访的郭同志。上次我给艾局长的信就是由他转交的，我问他：“我结局领导的信，艾局长什么意见？”他回答：“局长太忙，

还没有看。”我问：“文化局给市政府写了报告，高兰天批示说我有错误，高兰天根据什么批示的？我想弄清楚。”郭说：“报告写了你是怎么调京的以及文化局答应给你全家解决住房的情况，没说你有错误……”我说：“这就怪了，高兰天为什么批示说要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呢？”郭答：“那咱就不清楚了。”我又说：“我已服从命令，准备今天（18号）搬家，为什么我从15号就要那租房的钥匙，到现在还不给我？”郭同志对此也感到奇怪。

“就在不给我钥匙的同时，夏处长布置了对我采取的“措施”。

18日下午，因妻病情加重去医院，医生又见她大流血，要她住院。她说：“已经花了京剧院5000多元住院费了，郎副院长还亲自来看我，对我太好了，京剧院很困难，我不能住院了……”医生叮嘱：“千万不能受刺激，不能劳累，不能受寒冷潮湿……”我说，因为要搬家，她闲不住，累了点。医生说：“搬家？有金驾殿房也不能在这时搬哪！回去要静卧不能动！”我们带回中药。

要当晚煎服。

我们万没有想到，5点多回到剧院时，我家的电线全被剪断了。饭不能做，药不能煎了。妻痛哭，倒在床上。

我下楼找到剧院院长马仁，他正在排练场看排《杨三姐告状》。我说：“院长，请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了个事儿。”他不动。

说：“你不就是搬迁的事儿吗？别找我，你去找行政处刘副处长。”我说：“请你上19级台阶，到我家看看，看我是不是已准备好了搬家。我从15号便向行政处要钥匙，至今不给我。我上哪儿搬？我搬不了，为什么搞断电线，不让我做饭煎药，不让我活，请你去看看我重病的妻子……”我流着泪，向他苦苦哀求。

马仁漠然不动，最后说了句：“你去把行政处刘副处长找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走出排练场，在院里大喊：“刘副处长！刘副处长……”没有人应，我心里像烧着火，只好先回来照看倒在床上的妻子……半天，夏处长敲门进来了，这是我在这儿居住5年，行政处处长第一次走进我这屋里。妻流泪向他恳求：“你是处长，我们一家全靠你关照，方燕有错，你可以处置他，可你也得管我们一家的死活呀！我们要吃饭，我要吃药，你们怎忍心……”我见妻难过得说不下去，心里发抖，就对夏处长说：“你们断电断水，不让人活，大过分了吧！”夏处长冷冷地说：“我一点也过分！”

我们明令在前，你18号不搬就断电断水！”

我问：“为什么我从15号要钥匙一直不给我？让我往哪儿搬？”

夏说：“我今天下午给你送钥匙，你家没人。”

我说：“今天下午我妻病重去医院了，你今天下午才给我钥匙，我能搬走吗？”

夏以无赖的口气说：“你不就是会写告状信吗？你不是还去纪委告我多占公房吗？你还去告吧！告诉你，告到哪儿也得把材料转回剧院，你也得听我的。哼！”

说完，他冷笑着出去了。

我说：“小夏！你等着，我还就是要告你去，告你打击报复，告你不让人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拿上一件棉衣，当天晚上来到市委，来找到你家门口，因为卫兵把守不让我进门，不能和你当面一诉，便坐在门口，

在昏暗的路灯下，给你写了那封准备在死之前留下的遗书……这是方燕在1994年5月9日写的万言书中的一段。

方燕4月18日那天晚上与夏处长的对话，可谓一封宣战书，是一场注定要以无权无势的百姓失败而告终的战斗，因为正如小夏所说的，最后还是要听他摆布。这是因为他有权。这是无权百姓的可悲之处。明知要败也要去试一番，哪怕以死相拼，也要出这口心中的闷气，这是方燕的性格。

他披着棉大衣，坐在陈希同的门口，被卫兵拉起来，一定要推他出院，一人还质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和陈希同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你给我通报一声，他肯定要见我的，你知道吗？北大校友都是重校谊的！”

“不行！我们只负责首长的安全，我们不管什么北大校友……你这样，我们担不起责任哪！再说，陈书记不在家……”见那人无奈的表情，方燕只好退出大院。

他又坐在这5号院的大门外了。还不行，他又往远处站，最后退到马路边坐下了。

他向卫兵宣布：我一定要见陈希同！我就在门口等，等他出来，哪怕我在这儿一死，也要见他……方燕心想：陈希同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知道陈希同的历史，是当年曾和陈希同一班的老校友告诉的。

陈希同是从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聪明、机智。1948年入了北大不久就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解放后从北大出来在公安局一个派出所当了副所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市委办公室当干事。他是学中文的，聪明灵活，能说会道，笔杆子也行，便被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中了，给他当了秘书。

陈希同的官运是从当秘书开始的。当今有不少大官都是给领导当过秘书的。前些年群众中曾流传过“秘书班子太子党”之说，就是说首长秘书和高干子弟当大官者多，刘仁对陈希同严格要求，注意培养，见陈希同当时只有23岁，便让他到基层挂职锻炼。他被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一车间当了党支部书记，在那里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一系列政治运动，因头脑灵活。

不像书呆子，自然不会成为被批判挨整的对象。

1963年，陈希同33岁时，当了昌平县委副书记。

“文革”开始了，“旧市委”彭真、刘仁被打倒了，因为陈希同当过刘仁的秘书，自然成了旧市委刘仁的“小爬虫”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劳动，但专案组查不出什么问题，很快便获得解放。

当方燕在东北因“5·16”现行反革命罪挨整写交待时，陈希同已当上了昌平县十三陵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了，以后又升任昌平县委副书记了。他又重新回到那副书记的位子上。

1978年12月，标志历史转折的“三中全会”召开。这时，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开始恢复，对历史、现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文革”时期被打倒受压制的北京市委干部，纷纷官复原职了。刘仁同志得到平反昭雪，给他当过秘书的陈希同，这时便有了提升的资本。

1979年12月，陈希同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从此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1981年9月，陈希同当了北京市委常务书记。

1982年，陈希同成了“十二大”中央委员，意味着走进了中央一级干部的行列。1983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

1988年1月，他连任北京市市长，4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1989年春天，是陈希同精神最紧张的日子。北京发生了世界瞩目的政治风波。

风波发生在他当市长的北京，他责任极其重大，这关系着他的命运。

当时北京的动态主要靠陈希同向中央汇报。风波平息，陈希同以市长和国务委员身份所做的关于这场风波的报告长文公之于世。不久，北京举办了亚运会，又开始申办2000年奥运会，陈希同从此成了世界瞩目的人物！

1990年5月，陈希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亚运会的准备工作，7月3日，陈希同又陪同邓小平到北京京广中心视察；9月，亚运会开幕，他作为东道主北京市市长在亚运会上致开幕词。

1991年4月，陈希同任申办2000年奥运会委员会主任，更不断在中央电视台上露面，这时刻，在北京的一些大商场也出现了陈希同的题字……不论他升了多大的官，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的心目中并不看重官位的，还是把他视为校友，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平等观念、民主思想，成了北大的传统。体现在学生身上，便是人们常说的呆气和傲气！

呆气十足也有几分傲气的方燕坐在市委陈希同大院外的马路边上，迎着料峭的春风，想了很多……真是侯门深似海呀！

他很气愤，那些驱赶他出门不让他见陈希同的那些人，一定是按照陈希同的指示办事，不许外人进入的，你陈希同如果不走仕途，做学问的话，现在不过是个教授吧。我进教授家门是随便的。你当了高官就怕见群众，是怕人杀你、抢你？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上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家里也不会有什么怕偷怕抢的财物吧！再说，如果你是人民公仆，和百姓一心，还会警戒森严怕老百姓吗？

方燕想起他的少年时代，他9岁时离家到冀中十分区，那是1946年，比你陈希同参加革命时间还长，那时他当小通信员，随便出入首长办公的地方，到哪儿都被首长抱起来亲，那些首长今天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到今天也还是让他敲门便进的！

再后来，他想起去见高扬伯伯的情况……苏联解体，共产党垮台，方燕夜难寐，想不通，他又去看高扬同志。门口一通报，高扬老人便迎出来，他进到屋里，也像回到家里。他在这儿仍会记起“革命大家庭”这句话来。

他问老人：“苏联是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故乡，怎么共产党说垮就垮了呢？”

老人说：“苏联是1917年十月革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到它垮台是70多年的时光，不短了。我们国家，如果这样腐败下去，不能制止，还用得了70年吗？”

老人的话重重地压在方燕的心中，似警钟长鸣。方燕不是官，但他是和党命运血肉相连的人，他不能不对党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高扬老人说：“脱离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的有效监督机制，没有民主，把民主变成了主民，能不腐败吗，这是我们的病根方燕说：“伯伯，你是杂文家，你多写点杂文呀！”

高扬老人笑道：“杂文作用也不大，我讽刺的那些人，是不看杂文的；看我杂文的人又没那毛病。我们老家伙，革命一辈子了，老了，也尽点责任，给中央写点情况报告吧。别的，我们也管不了啦。”

此刻方燕在陈希同大院的门口想的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他有些悲观：

如果党亡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己参加革命 48 年了，竟让人叫号逼着去告，而自己竟哭告无门！普通百姓有冤枉又上哪儿去诉？这是共产党吗？真共产党员在哪里？

方燕感觉心里特别难受，心脏病犯了，怕不行了，他想如果死，就死在这里吧！

他把棉衣铺在冰凉的地上，躺下了。

大院里来了个老同志和一个警卫，唤起方燕，说：“你这么大年纪，天气又冷，……你还是回家吧，总在这儿也不是事儿，有什么问题，明天到信访办来，我们一定转达给陈书记……”这个老同志是市委信访办的。

方燕缓慢地说：“你给我找点纸来，我给书记留下一份遗书吧！”

老同志劝说：“可别这样想，我给你找纸去，你写个便信吧。”

老同志一会儿拿来了几张纸。

方燕在昏暗的路灯下，在寒冷的春风里，在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希同住的大院门前，激动地写了一封信……他写完信，看都不看，便交给了老同志，在老同志的搀扶下站立起来。他还是乘坐 103 路最后一班车回到了住处。

妻子没有睡。

方燕当时绝不会知道，当王宝森自杀、陈希同问题暴露之后的那些腐败的严重情况。也许当一个老干部、作家、共产党员在寒风中坐在陈希同大院门口等待与他一见的时候，他正在与他小 30 多岁的情妇，在豪华的饭店高级间的龙凤床上寻欢作乐呢！

一年以后，陈希同问题揭露出来，方燕想到当时对这个窃据高位的国家盗贼、社会蛀虫的真诚信赖，真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是后话。

六、第一次给江泽民同志写信

1994 年 4 月 19 日凌晨 6 点，电话响了，是方燕打来的。他说，他一夜没睡，等到天亮才拨电话告诉我。他讲了这几天发生的情况，讲他想见陈希同，没有让进门。他说话激愤，仍像年轻时写诗那样激动；他也很悲观：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想以死抗争，像当年跳海自杀的范熊熊。面对不管百姓生死的官僚腐败，他愿以死警世！电话告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死去，要我把他这一生，把他的血和泪、苦和累、生存之难、辛酸苦辣写下来，告诉今人和后人，不要像他这样生活了。

我在电话里劝说他一定要向前看。我们都从死亡中走过来了，不要因一时的气愤做无谓的牺牲。活着，要为我们的理想斗争。别忘了高扬同志对你说过的话：你是党的孩子。

我告诉他，得道多助，我将把你的情况告诉北大同学，大家都会支持你、帮助你的。

放下电话，我立即给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关注一下。我介绍了方燕，是革命烈士后代，也是在我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作家，起码应该有领导和他谈一次话，关心一下吧。如果他由于诗人的激愤，

真的采取自杀行为，对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你本人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的信作为急件，由机关派车直送北京市委。同时，我给贾秘书长通了电话，请他务必尽快交给陈希同。

4月19日上午一上班，方燕所在的剧院热闹起来，议论纷纷。

方燕住的办公室对面是剧院的打字室，邻居是院三产办公室。一上班，人们发现没有电，电灯不亮，没有照明，无法工作，怎么回事？是昨天电工剪方燕的电线时，本该剪断他家的小厨房和屋里的照明电线，却剪错了，不知是电工的疏忽，还是有意而为。结果是方燕家的室内电灯是亮的，而他家小厨房和打字室、三产办公室却一片黑暗了。

院内群众议论：“为啥剪老方家电线？太欺负老同志了！哪有这么干的？”

“叫老方家搬走，留这房干啥，又不急用。剧院别的办公室不也住人吗，为什么要把事做绝呢！”

“老方也是老脑筋，他没和夏处长搞好关系。他暗中给送些老头票，早就安生了。如今毛泽东那套不灵了，什么都得用钱说话。”

“可老方家有两个大学生，他又只拿百分之六十工资，他家可够艰难的。”

艺术处有个搞美工的老常，从年轻时便读过方燕的诗，对方燕仰慕已久。听说方燕调来剧院，他便前来求教，两人关系甚好。听说老方遭难，一上班，老常便来方燕家，讲了他知道的情况：“我告诉你，电工师傅老黄这人有良知，你是得道多助哇！”

那夏处长在18日安排黄师傅给你家掐断电线，黄师傅找到我说：“我不能干这缺德的事儿呀。人家老方的爱人病得这么厉害，要做饭熬药，你掐了电还怎么生活？可处长让我做，我又不好硬顶，你说咋办呢？”我说你找个因由别去。他还告诉我，马仁院长拿你做赌注，公开说不把方燕治了，我院长不当了。看来你家的日子不好过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大权在手，给你穿小鞋，报复你，还不是比吐口吐沫还容易，我看你能忍则忍吧。”

听了老常的话，方燕感动得流泪，妻子说：“世上还是好人多，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让他马仁、小夏猖狂吧。六道轮回，早晚要报应的，你们不能不让俺一家人活呀！”

方燕找到了电工黄师傅。黄师傅说：“夏处长让我去剪电线，我说：‘这样做不是激化矛盾吗？’他说：‘这是院的决定，叫你干你就干，别的别问。’他走了，我见到院保卫处副处长，向他说了此事，副处长说：‘你怕什么，叫你干你就干呗！有马院长呢。马院长说了，不治了方燕，他院长不当了。这是多大的决心！院长对老方的劲大啦，你还怕什么？你不干，不服从院领导，可不会有好果子吃。’我说：‘这缺德事我不能干，让我去，我在一边也不动手。’那天我说突然肚子疼上医院看病了，夏处长让别的电工干的！”

这天，在北大上学的女儿回家了，还带来了六个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同学。

女儿原本拒绝他们来，说家里没有地方，而同学们不相信，说你爸不是咱北大校友，也是教授级的作家吗，再困难也不至于没我们坐的地方吧，你是不欢迎我们去呀！女儿说：“不信，你们就去看看。反正有外国留学生、香港《大公报》的记者要去我家，我都谢绝了。”同学们跟着女儿来到方燕住的地方，果然如女儿所言，让青年大学生们大出所料。

青年大学生们也像当年方燕上大学时一样容易激动。有的竟大骂起来，

如果是在方燕那个年代，他们的言语一百次“右派”也打成了！他们说心中所想，毫无顾忌。

一个学生对方燕说：“方伯伯，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大学生最可悲了。你们没有自我观念，失去了自我价值，活得太苦太累！我们可不能像你们这样……”方燕说：“是你们不了解中国国情啊！”

那个大学生说：“什么国情？不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嘛。”

方燕制止了大学生的偏激言论，示意女儿快回学校去吧。但那个同学却说：“我口去便向北大同学讲你的处境，让北大同学都来声援，我们可以排队去市委找陈希同，有什么了不起！”

女儿带同学们离去，方燕又把女儿叫回来嘱咐：“你一定不要让他们写信声援，更不要组织什么找陈希同……千万记住，你们毕竟年轻，咱家的困境你不要向同学们说。”

女儿点点头：“你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那小伙子是诗人气质，一时激动罢了。其实，你们都不了解今大的大学生。每到5、6月，你们就去看着我们，总怕大学生闹事。其实才不会哩，每个人都想个人的前途，找好工作、出国啦……这都顾不过来了，谁都想得很实际，爸爸也不要总想没用的。爸一辈子都想国家命运，打我记事你就反不正之风，到今天还不是越来越厉害了么！你照顾好我妈，老爸你也好好活着，你的女儿大了，尽管放心。”

女儿追上同学们，走了。

方燕想：“这90年代的大学生真和我们那一代完全不同了。”

1994年4月20日下午，方燕夫妇从医院看病回来，见门口贴一纸条：方燕同志：今日下午5点，古平书记有急事找你。

是隔壁三产办公室主任下班前留的，方燕一听说找他，心脏就慌跳，形成了条件反射，因为没有一次找他，是给他带来愉快的，就像农民怕听大队的喇叭喊名字一样，没有什么好事的。

方燕是想和马仁院长能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原本敌对的国家都可以对话，化干戈为玉帛，怎么就不能交谈一次消除误会？但马仁一直拒绝和方燕谈，而这次党委书记古平却来找他，是为什么？方燕对这个从小在剧团长大的党委书记印象不坏。那是1992年，市委号召剧作家深入生活下去挂职，方燕首先响应，要求回家乡白洋淀。有人说不能离开北京市区，但古平书记却支持了。方燕在白洋淀挂职由剧院报文化局及市委宣传部，经组织部和河北省委组织部联系才挂职县委常委下去的。他下去一段，回来要报路费，那位夏主任却不同意给报，说他不是为剧院写剧本下去的，不是剧院交给的创作任务，剧院不能报账。方燕为此找到古平书记，他很干脆：“不深入生活怎么写本子？报，全都报！咱不能眼光那么短浅、急功近利。”

书记批字，这才报了几十元的路费。以后方燕很难下去。一是他家生活困难，难以有多余的路费；二是因为夏主任刁难报账，他不愿为此致气。

今天方燕来到了书记的办公室。书记非常客气地请方燕坐下。

古平书记面带微笑，使气氛平和，方燕也放松了。

“老方同志，我作为剧院的党委书记先向你道歉，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对你关心不够，也可以说对你的困难了解不够。”

我代表院里，也代表马院长吧，向你做检讨，今天局领导把我叫去了，传达了陈希同书记的意见，要局领导一定要找你谈话；局里委派我先和你谈，听取你的意见，咱们都是党员，你对院里，对我，对马院长有什么话，都可

以直率地说出来。

”

方燕感到书记的诚恳。他也感激陈书记的过问。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的话，恐怕不会有这个谈话，他奇怪这一戏剧性的变化。

既然要谈，方燕便把堆积于胸中的话全吐了出来：“我感谢文化局领导的关心，我的意见已多次反映，都一直没有人找我谈一次话。我请马院长上19步台阶，看看我家惨状，他都不去。现在，我仍要求能直接和院长谈话。

“我开始并没有想告状，后来告了，是逼上梁山。实在是为了生存。是新华社记者同情我家的困难发了‘内参’，本想解决问题，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知道，以剧院名义给万展同志写了个报告，致使市里也无法给我解决困难，我要求公布那个‘报告’。

“我曾给槐书记提过此事。他说，那是组织给上级写的报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无权过问。我认为，如果是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我自然不问，现在我知此报告是歪曲事实真相，对我进行攻击、陷害，是马仁同志借组织名义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就有权要求公开。我不知道古书记知道不？你可参加了讨论？报告是谁起草？上报前可经党委讨论？是否经文化局党组审查备案？是经文化局上报的，还是通过私人送给万副市长的？这个报告不公开，没有道理。

“第二个报告是后来由文化局给市政府写的，请转告文化局领导，由此报告引来万副市长圈阅的文教办主任高兰天的批示，剧院正是根据这个尚方宝剑对我采取措施’的，断水断电，不让我生存……”古平书记一边听一边记，这时他拉了一句：“马仁院长在局里说，这是为了防火的措施。”

方燕气愤地打断：“一派瞎话！防火，还要把照明线掐断，点灯还能引起火灾？广大群众眼睛雪亮，夏主任也承认这是报复，并叫号让我去告的！”

“我家四口，没有住处，借住了办公室，便每月罚150元。

这合乎政策吗？夏主任把非法扣我的生活费用在了何处？群众反映他用公款给自己买了BP机；他以剧院出租小院赚钱为名，把群众赶走，让经济困难的剧院每年花75000元租房，而剧院的小院至今没有租出去，给剧院造成损失，这是谁决策的？据反映夏处长在这其中吃回扣，捞了好处，是不是也该查查呢？

“去年年终奖金300元为什么不发给我？”

“剧院又根据什么不再聘我？是马仁一人说了算，还是要民主讨论决策？我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行为……”方燕把想到的全说了。

古平书记听完后再次道歉，说：“听了你的情况，我更感内疚，许多情况，我都不了解，你说的都是实际困难，我一定请马院长和你谈一次话，许多问题都由他定。你爱人病重，也不必急于搬家，文化局新宿舍建成，我们也要向局里反映，当初调你全家来京，是局里答应给解决住房。文化局给河北的公函上也说新楼建成给你解决。白纸黑字，盖着文化局大印，咱共产党得实事求是，说话算数。你说的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都要向艾局长说，需要文化局解决。你的问题，希同同志很关注，告诉局里，一定要找你谈，今天算我代表局里先和你说到这儿吧。”

文化局如何给市里写报告，让高兰天批示说方燕有错误，这是个谜，认真的方燕想找高兰天了解底细。

他给市文教办打电话，说高主任不在，家庭住址不知。

听说高主任原来在东城区教育局工作，他便通过朋友找到东城区，打听高的地址，那人告诉了一个地址。

4月24日，星期天。方燕和妻子一同去找高兰天。他们按地址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打听，却说搬家了，搬到蒋宅口附近的一幢新楼里，具体说不清楚。

他们抱着非找到不可的决心，找到了那幢新楼，并从居委会查到了几单元几号房。

他们敲开了门，真巧，有人！

那个瘦瘦的同志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两位不速之客。方燕自报家门，见高主任还茫然不知，便说：“你不是给文化局有个批示，要对我进行批评吗？我就是那个方燕。”

高兰天忙让他们夫妇在沙发上坐下，问是为何事而来。

方燕讲了当时传达他批示的情况。高兰天吃惊地说：“下面的同志怎么能这样传达我的批示呢？我刚到文教办不久，见到了文化局的一个报告。你也不必看那个报告了。我记得的是说你长期占了剧院的办公室，剧院照顾你，给你安排好两间周转房，你不去，产生了不好影响，使别人也不搬了，妨碍了剧院工作进行……我就是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两点意见，认为你应该搬过去，不能占办公室。……我一点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我是完全相信报告中说的事实。唉！没想到给你们造成这样的结果。共产党是给出路的，叫你搬出来，总得要解决你的实际困难，要搬到可以解决困难的地方呀！那两间房只有20米；你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还是没有地方住呀……时到今日，我向你们表示歉意。看来光看报告，不深入调查，就容易出错。”

有错的应该是我这个主任，该批评的是我的官僚主义。你看有什么要求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太能忍耐了！”

方燕听了高兰天的话，很感动，化解了对他盲目批示的不满情绪。

后来他在给市委及陈希同的万言书里，详记了他和高兰天的谈话及高主任的这一段话。方燕在信中写下了这一段：“……高兰天同志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自我批评，使我化解了对他盲目批示的意见，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我说：‘我认为你是共产党人，我才找你反映情况。我只要求一点，派人亲自到我现在住处和分给的周转房看看，一切不言自明。’他说：‘我明天一上班就找艾局长……让他派人去看看，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果然，第二天，4月25日，艾局长派文化局行政处处长及一名同志到我的住处来，书记在场，听了妻子谈了实际困难。”

她见领导派人来，便感动得哭了。谷书记当即表示，这都是实际问题。他向局长派来的何处长说：“方燕全家调来，文化局领导答应由局里解决住房，我们剧院解决两间周转房，是否局里再给两间或者让京剧院再解决两间？不然，俩孩子没法回家，老方的书也多，连东西都放不进去呀！”“我向文化局何处长说，我们已决定搬到周转房去，能搬进多少是多少，但大儿大女回家仍无住处，石家庄的家还没有搬来，也请局里帮助解决，并向关心我的局长们表达感激之情。何处长说，局里向市委写了报告，新楼建成后肯定给你家解决。我说，只要有希望，我们是能够忍耐的。更希望剧院某些领导；不要再激化矛盾无事生非，我们都有病，活得很累了，让我们过一段安宁日子吧！”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能忍受，也容易满足，方燕更是这样。你看，局长派何处长来看了他一下，他便满足了，冰化雪消、春光满眼了。

他想起北大学生来他家说的偏激之词，很不放心，怕惹出什么事来。他忙打电话给在北大的女儿，说了这几天发生的变化。

女儿说：“那个文学社的诗人，还真和同学们说了，他们要联名给陈希同写信，为知识分子待遇鸣不平哩。”方燕说：“你马上制止他们，告诉他们，陈希同已关心此事，肯定能解决了。”女儿说：“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要去咱家看爸妈，我谎说你们不在北京……”方燕说：“做得对，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可脑子里也还要有根弦，咱不能把咱家里的事宣扬到外边，给社会主义抹黑呀……”女儿听不了老爸的唠叨，说：“老爸，我知道！”把电话挂上了。

傍晚，北大的几个同学又跟女儿一块来了。那个“五四文学社”的青年诗人，带来了他们几个人签名的一封信，要让方燕看看再送走。女儿对他说：“你写我家的事，一定要让我爸看。”他们这才来了。

方燕接过信，只见信是这样写的：

陈希同同志：

您好！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方园的好朋友。一次我们去方园“家”，被她“家”满目凌乱与她父母身份之间的差距惊呆了。我们在了解到她家的具体情况之后，都觉得愤愤不平 and 莫名的悲伤。烈士之后，投身革命 48 年，我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方燕一家四口竟然住在 10 多平方米的所谓的家中——剧院文学组办公室。中国最年轻的作家方园竟然住着每月“罚款”150 元的办公室。“家”里的桌椅书籍充斥了整个空间，连我们看着都觉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我们想，难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果真如此？难道这就是党教导我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吗？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北大的我们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此的境况是始料不及的。回去之后，我们对同学们谈起此事，同学们都十分同情只能寄宿学校的方园，又都很不理解，这件事为什么总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方园家的事引起了北大同学普遍关注，今日得知：由于陈书记您的关怀，文化局已经派人来了解情况，表示回去立即逐级向领导汇报，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并说文化局已向市委领导写了报告，文化局宿舍楼今年年底竣工后，便落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老干部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给方园一家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听完很高兴，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感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以前的疑惑不解和焦虑在您的关怀下已荡然无存。我们期待着不久文化局的允诺能成为现实，能够尽快解决方园一家的具体问题，进一步体现出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方燕老师和方园能够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方园同学能够在假期回家有住处，不再四处流浪，无家可归！

在您的关怀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和希望，切实体会到了党的温暖，社会主义优越感油然而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我们代表仍旧生活在 10 多平方米的“家”中的方园一家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也想说出我们——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决不奢求，只要一片属于自己的蓝蓝的天！

北京大学

五四文学社、北大希望工程支持会

北京大学海社……

(八名同学的签名)

1994年4月25日

方燕看完，大学生们问：“伯伯，行吗？”

方燕说：“这后半部分，尤其是信的结尾不错。”

大学生们一同大笑，说：“我们知道伯伯会这样说。就像伯伯写书，不论腐败多么严重，总要写出光明和希望嘛！”

大学生们笑，方燕也笑。笑的含义可能不会相同吧。

方燕嘱女儿去复印留底后寄出去。

在方燕最后交给我的一包材料中，我见到一封给江总书记的信，写在1994年4月18日，是他在医院陪妻子看病时在候诊室写出的。此时，他望着候诊的一个个病人，浮想联翩，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疾病，想起当年胡耀邦总书记说过的，如果在几年后，腐败问题得不到控制，便会变成癌症，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癌？癌可以切除，可以化疗，如讳疾忌医，任癌细胞增长，便会转移全身，使人致死。老革命家陈云说“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绝不是危言耸听！想到这里，他浑身发冷，仿佛自己也患了大病。他想，自己的处境无所谓，党的生死存亡事大，应该向总书记倾吐自己的心声，说出自己的忧虑。于是，就在候诊的座椅上，他把书放在膝盖上，上面铺上信纸，给江总书记写了这封信：江总书记：一个参加革命48年的小鬼，向总书记倾诉心声。我是烈士遗孤，我落生三个月，父亲被杀害，是党养我长大，我9岁（1946年）投入革命队伍，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国家一级编剧。

我于1989年从河北调到北京。在河北，我曾向不正之风进行了两年艰苦的斗争，在中央纪委、河北省委高扬同志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我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幻想得到安定环境为党为人民多做出贡献，而事实却很凄惨。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向总书记写信。我个人处境已无所谓，我极忧虑的是关于党的生死存亡的党风问题。希望能派人来以我的遭遇为事例，解剖麻雀，以便找出有效疗治办法。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已极严重。

我已不幻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老干部政策的落实。我全家到京5年，一直借住在剧院办公室里。我不说困难，也没有一个领导考虑过我的住房。我的上学的儿女借宿闲置的房间，每月要扣150元工资。因大儿大女无栖身之处，只好听任扣工资。我多次恳求领导能到我住处看看能否放得下一张床？竟没有一个领导上来看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困境！

只有在春节时，来给烈属送优抚品的居委会同志进过我一家四口住的十几米的小屋。

党的传统作风失去了，我为此痛心！

二、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遭到打击报复。

1993年4月，剧院每月扣我“非法占房罚款”150元。我妻患病，不能拿全工资，我每月工资不足300元，只有靠乞借维生。新华社1993年5月发了“内参”，今呈上。据说，陈希同书记曾批给万展同志解决。剧院知道了，领导不仅不解决，反而写诬陷歪曲事实的报告给万展同志，万展自然相信“一级组织”，从此，我便遭到种种打击：把我“编外”不用；扣发年

年终奖 300 元：下去深入生活不报路费，剥夺我工作权利，让上大学的儿女无家可归……这些新领导同志迷信“权力”、“金钱”，动辄压制、罚款，头脑里没有“群众”，哪还有一点民主？谁碰着他，就滥用权力！

这是极不安定的因素，我对此担心。

三、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必制造冤案错案！

我妻在 1987 年曾作为全国优秀家长代表受到了李鹏等领导接见。我家在哭诉无门之时，给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李鹏同志没有看到，国务院办公厅转到北京市政府，政府又转回到市文化局。我的信中说“新局长官僚主义”，这就使局长大为恼火。今日一些干部是只愿听阿谀之词，不能听逆耳之言的。文化局给市府写了报告，市府文教办主任高兰天同志根本不了解真情，又不调查研究，便批示，说我有问题，要对我的“错误”批评……并命令我“无条件地服从剧院规定”。我一家四口，无存身之所。

我妻因之病重住院……无一位领导找我了解实情，竟批示我“犯了错误”。

我知道我的“错误”在于我总忘不了党的光荣传统，总想按照真共产党的要求去要求假共产党。假共产党是不许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

四、希望领导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勿滥用权力，欺压百姓，激化矛盾。这是我向文化局、剧院领导的呼吁恳求。剧院少数领导打击报复我，社会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家深为同情，建议我给总书记写信。我儿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因无钱交纳饭费，曾找到文化局长，要求不要扣我的工资，局长却置之不理，引起大学生的不满；我女儿在北大读书，是中国最年轻的作家，海外人士要来我家采访，被我婉言谢绝，因为儿女放假都不能回家，没有住处。同学们对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老干部受此“待遇”很不理解……我劝大学生们时刻不忘安定的大局。我祈求领导不要人为地激化矛盾，我祈求平安，祈求生存、工作。江总书记，我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心声。为了掩社会舆论，他们对人说给我家“解决了住房”，他们勒令我迁出办公室，住进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屋去，根本不考虑我妻子患重病不能居住，也不考虑我大儿大女无家可归，更不管我需要写作的地方……领导有权，咋办都有理，我找不到领导，只能给总书记诉说。我相信总会走出黑暗小屋见到灿烂阳光的！有党在，总会有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一天。

如总书记能就此典型事例批示调查，将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幸运，是我全家的幸运。

如不能批示，请万勿转下来，转到我反映有问题的领导手上，我的命运会更悲惨！他们将说：“你反映到中央总书记那儿也没有用，还得听我摆布你！”我永不会向不正之风屈服，党永在我心中！

此致

敬礼！

方燕

1994 . 4 . 18

我问方燕：“这封信咋没有发出去呢？”

方燕说：“我从医院回来，就见给剪了电线，不能做饭了……便发生了那场风波，没有心思寄了……”我说：“如果你寄出这封信就好了，江泽民

同志非常重视群众来信的，你的这封信会引起江总书记关注的。”

我告诉方燕，就在你写这封信的前两个月，即1994年2月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应有“忧患意识”。

1994年2月，江泽民同志说：“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在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江总书记提出“忧患意识”，不正表达了你的心声么！

方燕点头称是：“这是党心、民心啊！”

我告诉方燕去找找两月前中纪委会议的文件看看，便会给我们增强信心。不失信心，积极行动，才会有希望！

江总书记说有两种垮台的危险：一是经济搞不好会垮台；二是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但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盛行，也会垮台！

远见卓识，说得太好了。如果不制止腐败，我们的经济也不会搞好呀。方燕变得兴奋激动起来。

1994年5月7日，方燕还是搬家了。这一天他找来了搬家公司把书、书柜和大床……装了一车。行政处派一位同志看着装车，怕把公家的东西装走。到那小旅馆发现，这些东西已把两间小屋装满了。那个大衣柜。大书架因为高大竟无法进那小门，把门框卸了也不行，只好又搬了回来……这样，因为家具搬不进去，因为妻子的病，只好还住在原来的办公室。

从此，剧院没有再逼催方燕搬走，事情便消停下来。我想，他们到年底新楼竣工后，便可迁入新居了，于是使用这几句话鼓励方燕：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住房会有的……方燕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感到活得太苦太累了。这年夏天。

他把一年来写的一大包有关材料拿给我，详细讲述了以上的内容。

最后一句话是：“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做这种傻事、呆事了！”

可他的本性真能改吗？

我只希望他早日写出关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争取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拿出来。

他答应了。

七、可悲的自救

时光荏苒，转眼过去近四年时光。我们虽同在北京，竟然四年没有见面。

这四年间，因为我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还有机关事务缠身，总在忙忙碌碌中，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时常痛悔过去耽误了太多的时光，就是再拼命也是难以补回来的。我每当看到作家赠我的长篇小说，便想起方燕，想他也许正在写我们这一代命运的长篇吧！

1995年春大的一个周六晚上，我突然接到方燕的电话，声音响亮，情绪高昂，一扫一年前4月9日凌晨那个电话的低沉的愁云。

他在电话里说：“我报告给你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情……”我问什么事，是你写北大生活的长篇脱稿了吗？不是，是比那写书还好的事；是给你

分到新房，乔迁之喜吗？不是，乔迁新房不着急，一切都会有的。那是什么好事呢？

“请你明天，星期天上午九时到作家协会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来，我在那里等你，再详细告诉你，你一定要来！”

到文采阁去？这里经常为作家举办作品研讨活动，我想一定是作家们的一次活动，是关于方燕诗的讨论，还是剧本的讨论？

那也应该告知我内容，我好有些准备，何必这么秘而不宣，是给老同学一个惊喜吧！

可惜，第二天星期日，中央宣传部要开一个座谈会，指名要我参加，我便没有践约去文采阁。之后，方燕再没来电话。

从此竟没有再联系。

直到最近，百年校庆即将到来，我又想起他写北大生活，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活的长篇，不知可否完成，我才给他打电话询问。问了几次，人家只说他又遇到麻烦了，但说不清楚，这使我很不安。去年，我在晚报上见他发一小文，叫《六十岁开始》，知他已办离休。那小文的情绪很好。怎么会又碰上麻烦事了呢？

这天，我又给他打电话，是方燕的妻子珊月接的。

珊月说：“他又去石家庄了，我们叫人坑骗了，他找省领导帮助去了……谁骗？是你们北京大学的同学，你不认识，是高智商的骗子。我们还没搬家，上哪儿搬哪？给新房了也没钱买啦，10万！全被骗走啦……一言难尽，别浪费电话费啦！你放心，没事儿，我们早想开了。他也无所谓了，你别为我们着急，挂了。”

她挂了电话。

北大同学骗北大同学，怎么回事？

骗走了10万元，书呆子咋会有了10万元？

我能否替方燕急吗？

我一定要到他家看看，也把他几年前存在我这儿的一包材料带去。

方燕家还是那间办公室，我带着一系列问号进屋，见到珊月。

我询问1994年5月离开这间小屋后的情况，为了联起这几年方燕的生活……“当年不是说1994年年底，文化局新宿舍楼就建成，就给你家新房吗，为什么四年过去了还没有搬家呢？”

“没有钱哪，文化局那栋楼盖到半截停了。找钱，够局领导忙的。1996年才完工，整整晚了两年。盖房容易分房难，文化部门穷，房少，缺房的人多，那就看谁先排上号了！”

“这回你们肯定要解决住房了，按着国家规定，应该给你家四居室，不会有问题的。”

“四居？！三居室也没有哇！”

“你们分配房不打分吗？按照工龄、职称、职务、人口……等等条件打分，按住房面积大小编成号，谁分数高先住，住最大的……我们早就这么办了，行之有效，也少出毛病，领导也没压力，为何你们不按此法？这不是领导自找不快吗？”

“打分？公布的办法也是讲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也是说打分、张榜的。”

局机关是按此办法做的，许多院团没有公开按分走。若真打分，我们

家该是头一份：从工龄说，方燕是 1946 年参加工作，局里头一份；论职称最高，还是第一批评定的一级编剧；论人口，我家大儿大女；论困难，是应该首先解决的无房户，我们家还是烈属，论哪条，都不该这么办哪……”“你们打算咋办呢？”

“没事儿，不急。我们在这个院住办公室八个年头了。八年啦！抗日战争把小鬼子都赶跑啦，熬过八年了都不急，现在还急什么？说心里话，俺还不想搬了呢，你知道这儿有多好！别看屋子小可这大院宽敞，一下班，全院就俺一家。多大的院落呀！门口还有传达室，我们出来进去从不锁门；上班，楼下就是排练室，丝竹悠扬，锣鼓伴响，每天听戏还不收票；锅炉里可以打开水，不要钱。这位置更是交通便利，买卖繁华。这儿是火锅饭店一条街，想吃啥有啥，就怕你没钱……多好！只要不赶我们，真不想搬进新楼的单元房里，像个大鸟笼子，多憋闷呀……不过，我想多呆人家不lets了。这儿是北京金融一条街，到今年 10 月以后，就要拆迁了。到那一天，还能把我们全家晾在大街上吗？我们急什么呢，大哥你说是也不是？”

她说得多么开心豁达。

我问：“我的老同学咋想呢？”

“他呀，比我还乐观，什么都想开了。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了……”活着太累太难，人经历的磨难太多了，就把磨难当成一种享受，把痛苦当成体验生活了。1994 年，他回农村老家，见到下面的腐败现象，听到老百姓的呼声，回来便说：咱们知足吧！

有的村里的干部简直是地头蛇，土皇上，欺负老百姓，还没处说理去；我们若住在农村，遇上这样的地头蛇，还不憋气一辈子！

若看到下边那些腐败现象，真不该再告马仁这样的干部了。他收集了几百首流行的民谣。有一首说，‘只吃不带，作风正派。

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叫多怪。’像马仁、夏处长这样的就太平常了。说他不关心群众疾苦，官僚主义，……过去方燕觉着不能容忍，才写信反映，这时他才觉着自己少见多怪了。

“他去了山区老根据地，说那里当年为革命做过巨大贡献的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他便更满足我们的日子了。没房子，全家挤一室又算啥！我们总没睡在露天，我们拿着工资，少点，也够吃够喝了，比山区百姓，比那些吃不上饭的百姓强多了。人哪，咋不是一辈子。他在给他初中考同学的一本书写的序言里这么说的，你看就是这本《苦辣酸甜》，这是他写的一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欢和苦辣酸甜。现在人们喊‘潇洒走一回’，比之他们，我们活得太苦太累了。昨天是这样，今天仍是这样，你我尤其如此。我们是无论如何潇洒不起来了，因为我们背负着‘使命’和‘责任’。对历史，对未来……还有无数有形无形的‘十字架’。

“让孩子笑我们愚蠢吧！这也许正是一种进步。正如我们想像不出后代人有什么苦辣酸甜一样，他们也难以体味我们今天的心态。我等把痛苦视为享受，把面临的一切自然的、人为的灾难都看成‘体验’，再加上不可缺少的‘阿 Q 精神’，才能使心理平衡——与啼饥者比，得以食足而为乐与号寒者比，得以温暖而为乐与身残者比，得以体全而为乐与疾病者比，得以健康而为乐”他总想比他艰难的贫苦百姓，想他幼年在农村结识的伙伴，他很满足，挺乐和，真叫：‘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遇什么事，他也能忍，不像过去那样事事叫真啦。

“大哥，你是理论家呀，你相信命运吗？方燕他相信了，我也信。你就说这几年的事儿吧，1994年5月7日，我们搬到南城小旅馆，十几家一个小院。夏天大雨，房子漏，儿子住那儿，把大床都溷透了。我们找房管科，告诉他们去修房，这时候夏处长告诉房管科修房的老刘，跟他去外地承包工程赚钱。本来说定，那天上午老刘来修房，我们等了半天也不来。怎么回事儿？”

打电话才知老刘跟夏处长离开北京跟大汽车去外地了。我们只好又找别人。就在这天下午，传来噩耗：出了车祸。修房的老刘死了……人们议论：如果老刘给老方家去修房，就不会死了。我们为老刘家难过。陈希同不让方燕进他的院子，气得方燕要死，一年以后，陈希同也搬出那个院子，他自己也进不了那个门了！陈希同辞职的消息一传达，当天，夏处长就又通知我家拆小厨房了，说是为了防止火灾，说这是违章建筑，我们服从，拆了。你说怪不怪，就在这一天，剧院宿舍楼发生了火灾……“你看，这是方燕写的一部电视剧的歌词，就是你们同学的心态：人生如戏，戏是人生，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

苦辣酸甜，几多体验，几多真情！

七情写尽，喜怒哀乐悲恐惊……

生存难，人生就是受苦难，

谁不想，活个自在别受穷？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并非因果报应，

苍天有眼，到终了还是地道公平！”

珊月说了半天，却一直不提他家受骗的事。我禁不住问她：“你在电话里说，你们被骗了，是怎么回事？方燕怎么会有10万元让人骗呢？”

“说来话就长了，还是等方燕回来，你找他说吧，是你们北大同学把我们坑骗的。为什么我们不着急要房？这也是个原因，如今分房，也要自己花钱，除去工龄、职称优惠部分，一平米照900元算吧，也得交六七万元，加上装修吧，要10万元了，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你们北大同学真是什么人都有，把我们辛苦挣来的10万元全骗走了。

“1995年，是我们一生中挣钱最多的一年，这一年挣的比一辈子拿的工资还多。那年春天，他给你打电话，让你来听听，怎么能既健康又发财。可第二天，在文采阁寻你，没来，我们想，你当着大所长，也没功夫干这事儿，便没再叫你。”

“什么事呀？”

“你还没听明白？可见你们只顾搞研究学问，不知道当今社会。这是一种红红火火的传销，这一两年已到了发狂的地步！国家工商局批准了几十家合法的多层次传销公司，全国传销商不下几百万了吧，我们在1995年干了不到一年，便再也不想干了。

你给我金山银山，我们也不再去做了！开始做时，我们是真诚对待、全力以赴的，可越做越让人伤心。方燕要把当传销商的苦辣酸甜记下来，写一本书，刚写了一半，就停下来了……珊月给我找出一大袋子书稿，拿出来，只见上写书名：《为了生存——一个传销商的手记》，已写了10万字。我问：“为何不把它写完？”

“唉！正写这部纪实文学哩，方燕去做体检吧，是你们北大同学让他去的，不用花钱，他一照B超，查出肾严重积水，便住了医院。为什么积水？”

医院查是输尿管有瘤，还判断可能是癌，便做了摘掉右肾的准备。他倒不在乎，在医院病床上还吟诗哩。

“那是 1996 年 6 月，手术前一天，他一边切西瓜一边口吟：‘明天做手术，今日我吃瓜，大夫来切我，今天我切它！’把同病房的人全逗个哈哈大笑。人们说：‘这老教授倒真乐观，死也不怕呀！’他说了：‘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大伙儿又一阵乐。

“把他推上手术台，大夫说你不要紧张，他随口给大夫吟了几句诗：‘生死富贵由天定，吉凶祸福靠医生，手术台上枕大海，任凭东西南北风，’并且开朗地说，‘这一百多斤全交给你们了。’“全身麻醉，切开腹部，才发现是输尿管结节，不是肿瘤，便切了一段，里面安个管子，缝上了，两个多月出院。

“他本想出院后写完他的那本纪实文学，没想到，新的内容又来了，发现他被老同学骗了，把准备购房的 10 万元全骗走了……他便开始写一部新的纪实文学《受骗记》。现在，他正写这部书哩。

“那他到河北省石家庄干啥去了？”

“为这事，我们已跑了一年多了。详细情况，你见到方燕便清楚了……”我饶有兴趣地翻开方燕这一部没写完的《为了生存——一个传销商的手记》……现摘录下其中他在“文采阁”的讲演录音稿。真实记下了方燕当时的心态，我今天读了，还让人感到心酸。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大家好！今天您被朋友领进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采阁”你们会想：大概是听作家的文学讲座吧！不错，这里是作家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现在，咱们这楼上便是探索诗的会议。我是作家、诗人，可我不去参加什么诗的会了。今天老百姓还看诗吗？对！诗是写得老百姓看不懂了，就连我这称为诗人的也看不懂了。一些诗人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过什么日子、净写广大百姓不关心的事儿，读诗不是白浪费吗？我今天从诗的象牙之塔走下来，不和诸位朋友谈诗，而是传给大家最关心的、对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信息。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兴趣的。

我们中国人最怕什么？有两样怕：一怕有病，二怕没钱。有病，你就要上医院。你自己痛苦受罪，还要花钱去治；即使有公费报销大部分，你自己也要花钱吧。

有了病，你总要吃点好的，加强营养吧，这是没地方报销的，这有病太让人怕了。

所以人说，最大的财富便是健康。第二怕，便是没钱。这些年，市场经济了，我们对没钱办不了事，感受已刻骨铭心了。当然，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过去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今天说，有钱能使官推磨！（笑声）我们百姓需要钱，是为了过好一点的日子，活得好受一点吧。

今天请诸位朋友来，就是传达最好的信息，送给大家两件世上最好的礼物：解决中国人的两怕的礼物，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财富！（鼓掌）就是我们挂着的条幅“健康事业会”两边写的：一是推广健康，一是丰盛人生。

我们相聚一起便是缘分，当我们共同和健康与财富结缘，我们也便是人生的好友。友谊最重要的是以诚相待，我相信：朋友介绍你来听我讲一个多小时，你就在漫漫人生长途不会忘记，因为它给你一种机遇，也许会成为你命运的转折点。

我要介绍的便是这种世界高科技的健康寝具：皇室磁性特级床垫。这

是日本国厚生省批准的医疗用具。为什么叫皇室，因为是给日本天皇用的。天皇想保健，便向日本医学家提出一个课题：服用保健药品，我常常忘记，不能按时服用，效果不佳；用医疗器械吧，需要特意拿出时间，能不能有一种不服用又不特意拿出时间，便能保健身体的办法呢？于是日本集中了医学家、物理学家……多种学科专家研究，研究出一种磁疗床垫，它可在你睡眠时达到保健作用。谁都要睡觉哇！进入中国，是我国卫生部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1994 年特别推荐的保健精品……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它的五层结构和它的作用。（略）现在所有的保健用品都标榜可以延年益寿，可怎么知道因为用了你的保健品就多活了几年呢？没法测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但是我可以说出用此床垫能延年的根据来。人活着需要阳光、空气和水，还有一种叫地磁气，共称四大生命源。现代文明的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建筑都阻挡了地磁气，人住高楼有什么好处？越高越离地磁气远；接不了地磁气，便会生病，这叫都市玻人的寿命应该是生长期的 5—7 倍，就是说最少要活 120 岁以上。为什么活不到？是环境恶劣造成的！缺地磁气是原因之一，都市的人不如乡村山里人能有更多的阳光、空气、地磁气，他们只是营养差，否则会比城市人更长寿的！

可以做一个试验，将同样的几只小老鼠分放在两个环境中。

一个用我们的磁疗，一个不用。结果，不用磁疗的小老鼠早死了；用小蝌蚪实验则更明显……好了，那边测试到时间了，请再量血压！请公布一下。好！

大夫公布，这位老同志躺上去以前高压 180，低压 110，经过 20 分钟，高压降到了 160，低压降到 90，效果非常明显。（鼓掌）好，这位老同志上去试试。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朋友们要问：那得多少钱哪？我现在告诉大家，这是全世界统一的价格，你在中国、在日本、到美国……到哪里都可折合成人民币，价格同一：床垫 15000 元，枕头 1700 元，合起来 16700 元，磁疗被 7500 元。

呀，这么贵呀！谁能买的起呀？别急，有一种方法，它不仅能让你买得起，还能让你发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部分：丰盛人生！

（介绍如何推销及提取回报的具体办法。此处略去）朋友们，下面向大家交心，说说我怎么会来文采阁讲这种课程吧！这是一个既叫人高兴又叫人心酸的过程。

那是去年 7 月的一天，我刚从医院给妻子取药回来，在马路上巧遇到长影的老朋友张力克先生。他问我过得怎样，我说了一句：水深火热，一言难尽。他跟我来到我借住的剧院的那间 10 多米的屋子里，电风扇排不走小屋的酷热。妻病倒在床上，从头到脚都有病，头晕，脑供血不足，颈椎病，腰尖盘脱出，子宫肌瘤出血。最严重。折磨人的是夜里睡不着觉，需要我每夜按摩，掐头，按涌泉穴，如此几千次才能睡一会儿，真是苦不堪言。我个人的心脏病也因不得休息而严重了。张力克此时便说，日本有一种磁疗床垫，可对这些病有好处，尤其能改善睡眠，他购买了，很有效。一问价钱，把我们吓呆了。我们要供两个大学生，我因剧院解聘，只能拿 60% 工资，妻拿病休工资，是 60% 中的 70%，每月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它？我们只听而已，像听海外奇谈。可张力克先生每来我家，必提此事。渐渐让我们动了心。女儿说，如真对妈妈的病有好处就借钱吧，毕业工作了我还账。这时，

我们写的一本书，折腾了一年得以出版，给了 5000 元稿酬。后来又从朋友处借来 5000，凑了两月才弄到一万元，还差 6500 元，张力克说：“这样吧，我借你 6500 元。”妻说：“我们怎么还你呀！”张说：“如果你的病不见好，我便不要你还了。”一言为定，由张先生从东北长春运回了一个磁疗床垫，是从日本进来的原装货，到我家的这一天，我们不会忘，是 1994 年的 9 月 18 日。六十三年前日本鬼子侵华发动“9·18”事变，六十三年后的这一天，日本国的床垫到了我家。正是：“9·18”，“9·18”，日本鬼子侵中华；“9·18”，“9·18”，日本床垫进我家。

（笑声）

这一天把床放好：头南脚北，和地球磁力线一致。晚八点，妻躺在床上。没有动静。我也睡了。半夜醒来却听不见妻子唤我按摩。我凑身听，她睡得正香还有轻轻的鼾声。我乐了，却睡不着。妻一直睡到早晨八点。我禁不住叫起来，他妈的，日本这床垫真好使，简直神了。妻说，别吵吵，说不定因为昨天累了。第二天，她仍睡得很好。第三天，第四天……从此，我也得到了解放，我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值了！难怪这么贵呀。

我们没有声张。过了三个月，妻子去中医院检查，医生大为惊讶：你这段服什么药了？答说没有。医生说，脑血流图表明已很畅通，子宫肌瘤也有些萎缩……我们知道这奇效是磁疗床垫的功劳。

张力克从长春来京，见此状况后很惊喜，得意地说：“怎么样，我当时没有吹吧！你不仅能得健康还能获得财富，它既是保健用品，还是一种投资，今晚我领你们参加一个会，一听便明白了。”

晚上的会在沙滩工商联礼堂开的，那情景和我们今天这里相似。听使用者讲用后的体会，我们是完全相信了，因为我妻自身的变化，比他们说的更生动。

这种偶然与张力克的相遇，就成了我家命运的一次转折。

我们把这事告诉亲友，或领朋友到这里来听……只三个月时间，我妻子便晋升到专卖店，得奖金还债，把床垫钱全部收口，把账还清。6 个月后，我做妻子的下线，每月收入也在一万元以上。这让我惊喜，我的手数着发下来的一万多元工资，手指都高兴得发抖哩。（笑）1995 年过春节，我们家也有了一万多元的存款了！

我买红纸写下一副新的春联，把 1994 年春联撕个干干净净！

1994 年，春联写的什么？

上联：与命运搏斗，车到山前必有路

下联：同灾难抗争，泰山压顶不弯腰

横批：否极泰来

真的这一年否极泰来！

1995 年春联：

告别疾病告别贫穷迁新居奔双康大道

迎接福星迎接成功登舞台获丰盛人生

横批：梦想成真

我们谁都做过好梦，谁不想梦成真？今年，1995 年的美梦就是这两个“告别”，走向“双康”。希望健康，希望小康，希望今年能够有一处自己的住房，能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安居才能乐业。我把这好信息对我单位一位要好的编剧说了，希望他也一同参加这个双康事业。他听完我介绍后，望了我

半天说：“说句心里话，你是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你现在从事这种事，我感到可悲！你是应该在写作上发挥你的所长的。”

是啊，朋友说得对，是很可悲！可我今天却从心里感激张力克先生，是他把这事业介绍给我，我不会忘记他！感谢这种可悲的事业，使我家过年有了欢笑，使我不再起早到早市去专挑最便宜的菜，不再为几分几角钱去和小贩争吵，不再因有急事等不来公汽而焦躁，我可以扬手打“面的”了；我也不再会为剧院无理罚款 150 元而四处求借……我过去那样，对于一个教授来说不更可悲吗？

我们就要分配新房了，可我们赶上市场经济时期了，不可能完全分配而不花钱了。我们家按照规定应该给四室一厅，90 米至 100 米的房子吧，就按最优惠价说，一平方米 1000 元吧，那就要九万到十万，再按工龄扣除一部分，不也要六万吗？对于我们工薪族来说，这笔钱从哪里来呀？

不知诸位算没有算过自己的工资，我是算过了。我从 1946 年起参加革命当小通信员，一切由公家发给，是军事共产主义。

以后我上中学、进大学，仍享受全部由国家供给的制度，直到 1960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开始拿工薪。第一年是 45 元，第二年转正 55 元，从 1961 年到 1979 年，18 年一直没动，每月 55 元，这是 216 个月，一共拿到工资 11880 元；1979 年开始调资了，我变成了 110 元，没几年我成了副处级待遇，130 元，直到 1987 年开始评职称，成了一级编剧，工资增到 180 元，几年后调到 280 元。最近要按职称套级，算是增到 950 元。但我被“编外”下岗，只能拿 60%，即 570 元。把这些工资加在一起，我从国家那儿拿了多少？不到 6 万元！也就是说我们不吃不喝不花，这些工资一辈子也不够买这优惠又优惠的房子的！

怎么办？怨天尤人没用，说生不逢时也没用。我们参加革命是抱着求解放的理想走进这革命大家庭的，没有想到今天要自己购房，我心甘情愿，并不后悔当初。

今天，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虽然可以说这是可悲的自救。

我们不再躺在国家身上，我们把党和国家说成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把儿女养大，儿女就应该站立起来，独立。为什么儿女不救贫穷的母亲，却埋怨母亲不救你呢？

我们不怨天，不靠地，只有自己救自己，这是符合国际歌精神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报纸披露教授卖馅饼的事儿，这也没什么丢人的，只要你的钱不是靠贪污受贿而来，不是靠坑蒙拐骗而来，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救自己，便是光荣的。

我是作家，本职当然应该写书，可是我也愿告诉朋友，我写了社会需要的长诗《焦裕禄之歌》，都已经要付印了，可就是因为征订印数少，不能出版：让我补贴 5000 元，我借了又如何还呢？这不是作家的可悲吗？！如果我通过这种健康事业获得了资金，我绝不会去吃喝玩乐，挥霍浪费，我还要用于事业。我们的理想，就是对联的下联：“迎接福星迎接成功登舞台获丰盛人生”。

我妻子从幼年学戏，是戏校高材生。她演阿庆嫂，演遍半个中国，可今天，却不能登舞台，是何等痛苦的事。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一定自己写个戏，自己投资自己组班子演出去！

说到底是没有钱，最需要发展事业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钱。真是有钱的

没文化，有文化的没钱哪！

怨谁？怨你自己不会抓住机遇。

老百姓有个歌谣说得好：“你受穷，别怨邓小平，机会都均等，看你行不行。”

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你行不行了。行，就是要行动，要干！

坐而论道没用，发牢骚没出息。

从参加日宝来福事业，我便没有牢骚了，谁也不怨，就怨自己了。

记住这句名言：“强者创造机会，弱者等待机会，智者抓住机会，愚者失去机会。”

我们要做强者、智者！

现在，我讲一个月的课可以获一万元人民币，相当北大教授近一年的收入。这才体现出了我自身的价值。

是可悲吗？谁可悲呢？

我早已没有了虚荣和清高，有人看不起这个那个，认为只有他清高，可为什么在评职称时要争个不可开交斯文扫地？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知识分子的可悲！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有用他们自己的智慧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才有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不然便是没有根的穷酸、清高。

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只能依附。依附于单位，依附于某个领导；企求某某领导恩赐……是可怜虫的形象呵。

多少年来，我就是这种可怜虫。

因为什么？多少年来，知识分子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总是处在被人救的地位呢？

我想如果我在今天，便不会有那种故事发生了，你不是罚款 150 元吗？可以给你 150 元，把这间房租下来，让儿女放心地住吧！你还说什么？

因为我家穷呵！因为穷，才总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神仙皇帝救你于水火之中。

我把这段故事和作家梁晓声说了，他说了这样意思的话：作家、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毛泽东都说成是“毛”是要依附在共产党、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独立的。只有今天，我们成了自由职业者，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便可以独立了。一些领导，你再给我指手划脚，好像都要听你摆布……去你的吧。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现在不住着你分的房子吗，你什么时候说要我交钱买，给你钱就是了。知识分子在今天要成独立的阶层。

我久久思索梁晓声的话。

我们不要希求任何人救，要自己救自己。

这是我做此事业最深的体会，向旧友新交汇报到这儿吧。

（热烈鼓掌）

祝朋友们人人健康，人人发财！（鼓掌）我来不及翻完《为了生存——一个传销商的手记》就问珊月：“为什么没有做下去呢？如果没有停止，坚持下来，你们不成百万富翁了吗？”

珊月说，方燕还没有写到后边，可热闹哩。我们如果真干下去，也许真成百万富翁了。我们认识一个下岗职工，早在 1995 年便成了百万富姐，租了写字楼，有几辆车，那时就成一级批发商了。人们传说着她的故事。据说是当年她因倔强，好给厂里提意见，得罪了厂领导，实行优化组合时，让

她下岗。她想不通，可又有什么办法？一咬牙，下岗就下岗，我不信就活不好，活得不如人。她是因为要治病，听南方亲戚给她介绍了这磁疗床垫，便东凑西借，买了个床垫，同时，把这作为一次性投资，开始传销。她干得早，北京几十个专卖店都是她的下线。哎呀，那两年不知咋回子事，人们疯了似的买床垫，16700元的，还有二万多。三万多的，就像不要钱似的去抢！你说人们有多少钱吧！那女士赶上好时候，发展得快，当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好像一眨眼功夫，她富了。

她所在的工厂呢，越来越不行了，困难得竟发不出工资来了。工厂的姐妹找到她，说了厂的情况，骂厂长胡搞。工人们还编了歌谣：“别看厂子小，厂长有‘蓝鸟’。企业不赚钱，厂长坐‘丰田’。”

那富姐对姐妹们一人赠一千元，有的干脆在她的公司干了，每月工资一千。这一天，她让姐妹把精制的请柬送到厂头头的手里，说她要请客，地点在天伦王朝饭店。这一天，厂头头们陆续来了，那女士热情接待，厂头头们都猜不出这是为什么。那女士请厂长点菜，想吃什么点什么，不要看价钱，厂长更摸不着头脑。丰盛的佳肴摆了三桌，一桌是厂头头，一桌是车间头头，一桌是她的一个班组的姐妹哥们。端起酒杯，那女士致辞：“今天请厂领导、车间领导、班组姐妹、哥儿们来，是向大家表示一点感谢。感谢我的班组的姐妹哥儿们，在工厂里，感情很深，我要离开的时候，你们含泪送我，祝福我、劝我，说下岗没啥，说不定你会闯出一条新路来哩！我感谢你们；请干了这一杯！”

她又倒了一杯，走到车间领导桌前说：“谢谢你们，当我下岗时，你们为我说了公道话，说我在车间干得不错，不该让我下岗。为你们的正直、正义，我谢谢你们。请一同干了这一杯广接着她又倒了一杯酒，走到了厂头头的桌前，厂长低头，不好意思看她，那女士却笑呵呵地说：“我最该感谢的是厂领导们，特别是冯厂长！”冯厂长把头低下。她大声说：“感谢厂长让我下岗，使我有今天！这是教育我要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如果你们当时重用我，不让我下岗，我今天还不是和姐妹一样，等着你们发工资吗？感谢你们！我以前在咱们厂工作过，对厂子有感情，如果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说话。我能帮助厂子做一点事，也感到是尽了一点责任。如果厂子办不下去，要宣布破产前，请先告诉我一声，让别的公司收了，还不如让我收了它，我会和姐妹哥儿们一起，把它搞好，再造辉煌的！”她的话引起其余两桌热烈的鼓掌……两桌饭菜吃个光光的，唯独冯厂长这一桌菜剩下了。他们羞愧，吃不下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这个女工大约有上千万元的资产了。从1996年，我们不干了，不知她是否收了原来工作的那个塑料厂。

我们在1995年，干了不到一年，发展成了专卖店。我下面有五个专卖店，再创100万业绩，我就可以升为二级批发商了。

可到了这年国庆节，我们便不想再干下去。一是我们发现这个中日合资企业大权掌握在日本老板手中，为了应付中国国家工商局和中国政府不许搞非法多层次传销的法规，他采取的对策是欺骗性的改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他讲话，说真话，再赚钱也不干了。二是由这种名为批发制实为传销造成的上下线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大部分人购买此物，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赚钱；当他们赚不了钱，推销不出去时，便大叫上当，说上线欺骗了他，闹起了矛盾，使原本亲密的朋友在利益金钱面前成了仇敌。还有，就是抢线，

争顾客的现象很残酷，我们为弱者打抱不平，而公司却不为正义主持公道。官司又打到日方的总经理那里……我们看透了，不想因为钱字伤了友情。另外，发现包括我们的上线在内的不少专卖店都在偷漏税。我们不到一年就交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5万多元，我们照章向国家纳税，并扣了下线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引起个别下线的的不满，并要我们也漏税不交；我们不能这么干，便和他们打起来了……我们不能做自己睡不着觉的亏心事呀！说我们傻就傻吧，不然，我们是可以多得5万元的……这方面的故事可多了，你等方燕写出来看吧！

我们本来想存下十多万元，够买房的钱算了，可以安居乐业，重新搞事业了……想不到竟被你们北大同学全部骗走了……他是怎么骗的？我们为什么会受骗？这里牵扯的腐败现象就更严重了……还是等方燕回来让他告诉你吧！

后来，我见到方燕，问他受骗的事儿，他递给了一本黑皮日记，说：“你去看吧，这就是我的受骗纪实。”

我打开了他的日记，一页页读下去……

前序：祭奠先烈的日子里

1997年，先父凤翔辞世已整整六十年了，我也在今年2月办完了离休手续，国务院发的有国徽标志的红色光荣离休证揣到我的怀里，听着我的心跳。清明节，我应家乡民政局的邀请，回家乡为父亲扫墓。

今年民政局邀我，有一个机缘：民政部发了文件，要编辑一套大型丛书《中华著名烈士》，我县有四名烈士入血——我父亲凤翔，抗战时任过县长的刘济民，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叔侄胡德林、胡福才。3月，民政局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写我父亲的传记，要求在3月25日前一定交稿。时间紧迫，通完电话，民政局的朱久安、何平两同志便赶来北京，让我看了民政部编书的要求。

我说，今年是先父辞世六十周年，我写下父亲的传记，也算是对先烈的纪念。

今年清明，我想回乡祭扫……。

老朱说：“你回去吧，县里每年清明节都有安排，回头我给局长汇报一下再正式通知你。”

4月4日下午，我坐长途汽车到了县城。

这里是我热爱的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可我已有两年不来了，我是被迫离开的。

没有想到，两年前，我因为写了一部为百姓所欢迎的书，成了县委书记宣布的“不受欢迎的人”，我再来县城，不许有人再接待我！而老乡刘茂林也劝说我：你还是离开家乡为好。

我这一生，吃了嘴和笔头的亏还少吗？真叫自作自受！

1993年这一年可谓“劫机年”，中国大陆有10架民航机被劫持到台湾，8月份有一架从北京飞往厦门的民航机是我的老乡、师庄村的师月坡劫持的，引起家乡震动的是，由此揭出银行系统的腐败现象，百姓大哗。改革出

出版社的朋友听我讲述后向我约稿，要我写一本关于动机犯的书。我从 1993 年 10 月回家乡采访，经过几个月时间，写出《追踪劫机犯——采访实录》，1994 年由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麻烦。我没料到，它在家乡反应如此强烈！

写完初稿后，我返家乡核实、补充，此时，见到县新华书店经理陈新，他翻看了初稿说：“太好了！这部书保证受群众欢迎，我在咱县和附近县就能保证发它八千册到 1 万册。”原在广播局工作的朱嘉，自己办了个“友谊书店”刚开业不久，他说：“方老师，让我也发吧！我来组织一个首发式，您回家乡签字。”

书里有“半仙说鬼”一章，以韩半仙讲故事的形式写县级领导的腐败问题，我的老乡、原来当过副县长的老友反复劝我：“这章可不能要，你没有写名字，可谁都知道是谁，你还能回县吗？人家还不恨死你？”我反复考虑，老友说的在理，为了我能回县，忍痛割爱，最终删去了这一章，这样便可安全了。

书印出来，样书刚拿到县，便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炸开了。

我写的“追踪劫机犯”，是以调查师月坡劫机的过程为线索，写出另一种“劫机犯”：劫持中国大好“时机”的腐败！对这腐败，实在他说，揭露得是很肤浅的，县级领导的问题并未涉及一字，然而这也触怒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和一些搞腐败、有种种不正之风的人。

县新华书店经理告诉我，他被免职了。那本书，县委有话，一本也不让进，那八千册书的想法只好“作废”，唉，人家是顶头上司呀！新的经理你别找，找也没用。

个体书店的朱嘉受资金所限，从出版社购来一千册，群众闻知，一抢而光，银行系统几乎人手一册，朱嘉高兴，请我和广播局的记者、中学高级教师朋友吃了一顿饭，听到群众争购此书的情况，我心感安慰。我的书本来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那次我来县城，去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老安面有难色，对我说：“你那部书出来，我受批评了，说我为什么不把关？我说文责自负，我能说不让作家写吗？所以……你这次来，我们就不能接待你了，实在无奈。”我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这样吧，为了感谢你，也为你因我而受到的批评，今天我请你吃个便饭。”他忙说：“不，不，不……咱们两便吧。”

他还敢吃我的饭吗？我真是书呆子！

朋友送我离开县城，在等汽车时告诉我，县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说：“方燕光写咱县的黑暗面，以后不能再接待他，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此信息一出，有不少百姓给我捎信、找我，说当官的不欢迎你，我们老百姓欢迎，将来打起仗来，还得靠老百姓掩护你。

我很感动，立志一辈子为老百姓写，写老百姓，绝不和腐败同流合污。

1995 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到老乡刘茂林的长途电话，说我的房子漏水，怕我的一屋书被淹，让我快回县城看看。我回去了，见房子确实淌出水来，打开屋门，水把墙淌得脱落一层皮，书没有被淹，却少了不少，那书架上明显的空了，丢了什么，也不去管了！老乡告诉我，他压力很大，当官的说他不该借给我用房。我明白他叫我来是为告知我，请我搬走，我理解他，也感激他。

他说：“咳，因为你写书写坏了！按说，你的书老百姓谁看谁乐，都说好，可老百姓有什么用？人家当官的都腻歪你回县里住，他们不安宁啊！”

我感受到茂林为我承担的压力，我既然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我就照茂林的意见搬走吧，免得惹麻烦，找别扭。

我的老友王彦民对我依恋不舍，他说：“咳，别听那个，还是老百姓长远，那些腐败官僚，还能呆多久？你还是留在家乡吧。”

考虑再三，还是搬走为妙，惹不起还躲不起？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保定军分区第二干休所租到一套房子。

我搬家时，王彦民一家全来搬书、搬家具，茂林也找了些人来帮助，分手时，我和茂林紧紧握手，眼里都含着泪水，却说不出什么话了。

从此，我再没有来家乡县城。

今天，我回到熟悉的土地，感情是复杂的，下了汽车，想先去看看老朋友王彦民，听说他患了脑血栓，我惦记他。走在马路上，没有人认识我。我一路走一路想，想了很多很多。人回到家乡，就像走向童年，重新走向人生，最容易联想人生的坎坷和命运。在长途汽车上和乡亲们说了一路。知道我就是写那本老百姓最喜欢看的《追踪劫机犯》一书的作者，便分外亲近，他们都邀我到他们村里去。一个乡亲说：“你如果当上官还不坐专车吗？”

如今县里的局长、乡长都坐上小汽车了，谁还像你这么寒酸，挤在大汽车里和老百姓说话？可话说回来了，你若坐专车，可就跟我们说不到一起了。”这话朴素而深刻，是社会存在、社会地位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因为我至今仍是无权无钱无势的三无百姓，才对腐败和不公正有和老百姓同样的愤慨。

我又走进王彦民家，彦民老伴把彦民叫出来。他蹒跚走来，双目呆滞，不说话，坐下了。老伴对他说：“你说话呀，见了你的知心朋友了，讲讲你的情况吧。”

老友还是不语，只用两眼看着我，他竟变得这般衰老了！

1993年，我来采访劫机事件，县政府、公安局全不配合，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彦民给我出了主意，说收集材料写电视剧，让文化局支持；到劫机犯所在村师庄去找你认识的张吉星，做民间串亲访友，不就可以办成了吗？我照老友指的道，果然成功了。……如今，爱说的老友，怎么会不说话了昵？

我能为老友做些什么？我向他讲按摩手脚，多活动多走路，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他点点头竟活动起来，在屋里走动了。我说：“最要紧的是精神不垮，要乐观而有信心，一定会恢复好的！”

我不好久留，告辞出来，老朋友这时说话了：“你什么时候还来？你可来……”我答应：“有时间一定再来看你。”

我出门，他拖着脚蹒跚走出大门，走到胡同口，目送我走，直到我走完这长长的胡同，扭过头看，老友还在那儿站立着。我的眼湿了。

我还没有去民政局，先打通电话，去看“半仙韩川”，他曾在我的《追踪劫机犯》一书中出现。他是县里一个“怪人”，从小爱书法入迷，后自创一种行草，成为民间书法家。因爱书法痴迷，老婆说，你是爱字不爱人，你去和你的毛笔过吧，几年前与他离婚。他便带儿子和老娘过，他是农业专科学校学果木栽培的，为自由写字，他放弃了林业局给他承包的果树。他停薪留职，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一酒葫芦四方讲学，说他的速成草书法。别人对他的痴不理解，称他为“怪人”。没有工资，写字要花钱买纸，说他本人

有“半仙之体”也要食人间烟火，渐渐知道需有钱买米购菜，他这才开始跑北京荣宝斋，卖他的字了。那么多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又多次得奖的书法家的字在荣宝斋卖不出去，而他的字却被承认了。他没名气，却有好字，价不高，一幅字千元，卖字可换回纸墨钱和花用，这给了他激励。这些日子他闭门在家，打磨一个才做的长案板，做表字画用，见我到来，匆匆收起，让我帮他长案抬放进里屋。

他向我展示一本厚厚的精美的书画册，称其为中华精品艺术展作品，由卢嘉锡题的书名，是他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成果，里边选了韩川的两幅草书，飞龙走蛇，真美。看他的墙上，也贴满他的作品。他见面便谈字，说，“我不管县里当官的事儿，他们求我写字，我不给，我有三不：我不赞成的人求字，不给；不孝父母、为人不好的求字不给；喝老百姓血不给百姓办事的官儿求字不给。”他问我为何这么久不来家乡？我说了因由，他说：“你不写县官们的腐败，也不行，还不如把我说的那章说鬼留下呢。中央纪委来查了几个月，没解决问题，那搞腐败的人更猖狂了。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惊动了中央公安部，你知道吗？”

这事件真是耸人听闻！县里某公安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指导员三人开着警车去查歌舞厅，喝个醉醺醺的又来到洗桑拿浴的地方，老板一见，慌忙接待，让按摩小姐过来照顾。这个小姐是东北姑娘，见那所长又来，心想：你们仗着这身皮，又来占便宜，欺侮人吗？今天要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但姑娘还是脸上赔笑，说：“先洗洗再按摩吧。”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各找一个姑娘作陪去单间了。他们对这儿是熟悉的，从上级布置“扫黄打非”。清查卖淫嫖娼以来，他们以公安人员身份到这儿来过，听说这儿有“三陪”问题，那所长曾对老板训过话，告诫过不许有此类现象发生，老板点头称是；而今日到来，老板已从他们那发红的眼睛、酒气熏人的嘴里知道他们今天需要什么。

老板把那个漂亮的东北妞叫过来，说：“你要照顾好所长……”小妞说：“说好价，多少张？是全面服务，少了10张不行！”老板使眼色斥责：“这是谁你知道吗？只要伺候好，便给咱们开了财路。”小妞说：“那是以后，说的是今儿个，我们不是白给的。”老板说：“你找我说吧，快去，别让人家急……”那所长见到漂亮小妞，早就忍不住了，还顾得洗什么桑拿浴？他进到单间，早把警服脱了，扔到一边。东北妞一进屋，所长便如恶狼扑食一般，把小妞抱住，压倒在床上，小妞挣扎不起，躲着那酒气熏人的嘴巴，咬牙不让他那舌头进来。所长便扒小妞的裤子，并慌忙解自己的腰带。这时，那挎在腰带上的手枪脱落下来……恶狼所长亲不上小妞的嘴巴，便掀开她的上衣，一口咬住姑娘雪白的乳房吸吮起来……姑娘此时见到了那只落到床上的手枪。在恶狼不顾一切地咬她乳房。扒她裤子的时候，她扯下头上的枕巾，把那黑乎乎的东西包好；在恶狼的那个硬硬的东西，向姑娘的身体里插的时候，姑娘猛地翻身，把那枕巾里包的东西扔到床下去了。所长把姑娘的身子翻过来，姑娘一把抓住了那个硬东西，说道：“你知道，你可是公安派出所所长，你讲过，不能卖淫嫖娼的！”所长哪听得进去？他色迷迷他说：“那是说别人的，你和我……这不算事。”所长把姑娘的手推开，正要施暴，却有人敲门大声说：“桑拿浴的水好了，去洗洗吧！”这所长出了一身冷汗，把粘乎乎的东西抹到姑娘的身上，便慌忙穿起衣服，出门而去。门口站的是他的同伴，一个副所长，一个指导员，说时候不早该回去了。

他们三人上警车时，所长骂道：“你们俩小子咋这么快就完事了？”那俩小子说：“伺候我们的是安徽的小姐，老实。温柔……”当他们的警车又开到一家歌舞厅门口时，所长才发现，自己的手枪不见了，立时出了一身冷汗。“坏了，大事不好，丢东西了！”所长说这话时，指导员还开玩笑哩：“一分钱不花，你还能丢什么？不就是说些精液嘛！”他妈的，我的手枪！他们三人这才感到真的大事不好了。

手枪丢在何处？谁也说不清。他们这一晚从歌舞厅与坐台小姐跳舞。吃瓜子，又到酒楼吃饭喝酒，然后又去洗桑拿原……这时，那个东北小妞把那支手枪用枕巾包着已扔进地沟里了，让你这派出所所长去急吼。想占姑娘的便宜，仗势欺人，强奸我，没那么容易。我要给这种人一个警告！

所长丢了枪，不能不报公安局，公安局又如实上报。因为三人一同嫖娼丢了枪支，惊动了公安部，省委书记批示：一定要严肃查处！

不知现在是什么结果了？

腐败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说不出别的，韩半仙只有骂：“这些王八蛋，不会有好下场的，都是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听了这事，我久久说不出话，我想到父亲，想起无数为人民牺牲的先烈。他们若地下有灵，能容忍这妖魔鬼怪再现于世吗？

我在这儿为祭奠先父写了一首祭诗，韩川给我铺开宣纸倒出墨汁，我蘸墨写下《六十年祭》……我带上祭诗去县民政局。原来这个局就在县委大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办公条件简陋。它专管烈军属的优抚。荣复军人转业安置……眼下清明节，民政局负责安排接待烈属祭奠事宜，见我四点才到，老朱说：“中午就等你了。明天清明，我们去后台烈士坟祭扫，你看是否今天下午便去城里烈士碑下？我答应说好，他们便通知县电视台来，民政局已备好献给先父的花圈。

我们抬着花圈走向县城大礼堂旁边的烈士塔下，摄像跑到前面，记录下祭奠的情形，父亲的灵魂在这儿，看我们走来，我把写父亲当年斗争的剧本及《追踪劫机犯》和刚出版的《清和世界》放到父亲碑前，用它们压住我写的祭诗，仿佛对六十年前的先父说话、汇报……我请摄像拍下父亲的碑文，这个青石碑已刻成半个世纪了，它经历了家乡的沧桑，日月星辰照着这冰冷沉默的石碑，但我却感到石碑的灵魂……我的心和父亲对话。

碑文永在，它记述父亲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姓争取生存的斗争以及 1937 年 4 月被害的历史。

我面对父亲的碑文，如面对沉重的历史。

此时，我把祭诗铺展开，对着历史倾诉：

六十年祭

先父辞世六十春

浩然正气万古存

血沃大地千树绿

心系家乡百姓亲

中华富强英雄梦

世界大同烈士魂

魑魅魍魉如再现

打鬼自有后来人祭奠结束，民政局同志安排我到县委招待所去休息。

招待所所长对我说：“你那本《追踪动机犯》可给我们招待所食堂招来

了麻烦，让我们检查了一个礼拜，问我们向你提供了什么材料……”我向他表示歉意。如果不是民政局邀我，恐怕今天还难以回来呢。

晚饭由民政局安排在一家饭店的楼上，民政局的朱久安、何平、办事员小周作陪，有我请来的广播局的老郑、县中学的特级教师老孙。

饭桌上，人们又说起“腐败”问题，孙老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说：“你写的书已深人民间，记下了真实生活，诉说了百姓心中的愿望，老百姓不会忘记。你我对腐败深恶痛绝，可这‘现象’已渗入‘本质’，它才腐而不败；它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恐怕与我们没有有效监督机制有关。不过，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总要走向民主，我对前途总抱乐观态度。”

人们说，那个坐着警车去嫖娼而丢枪的事件已有了处理意见：三个所长，双开除——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三年！如果派出所所长不是丢了枪，怕此案永不会暴露，也该着这仁小子倒霉，只图一时痛快，一辈子的前程丢了，划不来呀。可他们当初是没想到会暴露才这么干的，人犯罪都有侥幸心理。

民政局的同志说：“你那本惹麻烦的书，不客气他说，写得很浅，好多深层的事你没有写呢。”另一同志说：“再写深方老师更回不来了，到此为止吧。这么大年纪了，求个安生吧，何必让当官的不戴见。”他们说的都在理。吃饭说话也到此为止，约定明天清明我去父亲的坟前祭扫。

1

4月5日早八点民政局的同志来通知我：给我找了一部212吉普车，送我上坟。

吉普车是农业局的，在所有的局中，民政局最穷，只有借车。汽车向县东驶去，过金三角娱乐城，老友介绍说：“这是给有钱人开设的，只要有钱，这里什么享受都有。”

汽车过八于乡，下公路，向东去，奔我们村——李家庄。吉普车上了堤坡，沿着我童年小脚丫踩过无数次的大堤向我们村驶去，我去找志芳弟，门关闭，侄儿永春见到我，说：“他们上坟去了……”永春骑车在头前带路，我们去张庄村西坟地。

幼年记忆，这块坟地是风水宝地，古柏森森，从北边最高的坟头，依次向南排列下来。从1958年人民公社后，坟头便全部平了，却留下了烈士的坟茔，我父亲的坟前有解放后小学生栽下的一排榆树，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掉，化成了土高炉的灰烬。

这坟地，留下了多少血泪……

古柏树早就消失了，连同那苦难的历史。

抗战胜利，村里搭庆祝的牌坊，那柏树枝，便是从这坟地的柏树身上劈下来的。

幼时曾跟着妈妈在爸爸的坟前哭，哭日子的艰难，妈妈在这儿和爸爸倾诉了她心里的话，哭起来没完，都是邻居女人把妈妈扶起来，这才抹去泪水往前走。阴历7月15日是烧纸的日子，10月1日是送寒衣的日子……旧历大年三十傍晚，我跟二爷爷来“照庭”，挟一把干草在坟头上烧，说是给死者烧炕，怕孤魂经不住严寒……烧完之后，便呼唤死者“回饺子去”……清明，大家都来填坟扫墓，在坟头上压上纸钱。

现在我面前的坟墓，最西边的是我父亲的，父亲东边一个新坟是叔叔凤翔的，再往东，便是我的叔叔任凤岭烈士的坟头。他的儿子志芳早已在这

儿为父亲的坟填上土了，我父亲的坟上也由侄儿永春压了纸钱。

父亲的坟头光秃秃的，旁边没有一棵遮荫的树；坟上没有青草。父亲孤独地在这土地上已整整六十个春天了。

我站在父亲坟前，似有满腹的话要对老人倾吐！我的心掠过一阵凄凉，我的泪水洒在父亲的坟前……我把带来的悼诗铺在地上，让春风来读；然后，点着了，纸灰在坟前飘飞。父亲，你在九泉之下能听到儿的声音吗？

父亲，你离开人世时才 27 岁，你在人世的生命是短暂的，正当青春，风华正茂；你精神的生命永在，你永远是热血沸腾的。

你的孙孙今年已和你离开人间时的年龄相同，但他却与你那么遥远，他想的是怎样获得自己的财富，我把你一生传记的碑文拓纸钉在墙上，让孙孙读你的一生，读你的理想，他只看到一半，便扭过头去，他不能理解你了。何止是孙孙一个人呢？就是今天在家乡土地上掌权的县委书记，能理解你们一代的献身吗？

今天，在掌权以后吸收的共产党员，有多少人还记起你们，时刻以你们的献身精神做榜样呢？

我在你的坟前，感到孤独和凄凉！

我想到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耳边的“如果……”在那豺狼当道的黑暗年代，如果你安分守己当小学老师，不参加革命活动，不立志推翻人吃人的旧社会，你不是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让一家老小不遭大难吗？当时的人，多数人也不理解你；张庄的地主豪绅吴纪戴，在打谷场上望着贫苦的为地主招谷穗的女人们，对着我妈妈说：“你男人革什么命，纯粹是大傻瓜。

今天把自己的‘命’先革了！想共别人的产，哈哈，先把自己的产共了！”因为你革命，全家产业耗尽，在死亡线上挣扎，你当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后果吗？

父亲，今天的人看你，你不是世上的傻瓜吗？可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忠诚的傻瓜，能有今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

父亲，听爷爷讲，你当年为革命是不顾自己性命安危的，中央曾来函，用米汤写的字，用火烤出来了，说是批评你“长于勇而短于谋，以后还要多加小心才好”，你太不顾及周围环境的恶劣，太多地暴露了自己，不然，你也许不致早早牺牲了……父亲，如果你活下来，活到今天，九死一生，你躲过无数枪弹，也能在十年动乱后幸存，又将怎样，你今年该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今天，你会说些什么？也像那天我见高扬伯伯，听他那样怒斥今日一些干部的忘本腐化吗？

如果你不死，你是党的高级干部，我——你的儿子也不再是烈士遗孤，这几十年来我的命运还会那样坎坷吗？如果你还活着，我成为“高干子弟”阶层，我还会有这和百姓心连心的平民意识，还会这样对腐败嫉恶如仇吗：我还会被党的县委书记说成是“不受欢迎的人”吗？

如果，如果……

世界只有现实，而没有如果……

我在父亲坟前立下这个决心：我不写如果，我要写下你离开人世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你的后代的坎坷命运，也是整个时代命运的折光！

我在父亲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走到叔叔凤岭烈士的坟前，深深地鞠躬：叔叔，你是 1947 年参军的，

你是父亲当年吸收的共产党员。土改时，你是贫农团团长；分了土地的农民要保卫胜利果实，你带头参军，带出二十多名农民参加了解放军……环境艰苦，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回家当农民种地了，而你却留在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你抱雷去炸敌人的碉堡，一次成功，又一次成功，第三次你抱雷时牺牲了！你是董存瑞式的英雄！叔叔，你牺牲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1983年秋天，我在大清河畔曾寻找叔叔牺牲的地方，写下一首小诗《寻找》：在这里，在这块熟悉的土地，有我叔叔留下的冲锋的足迹；他怀抱爆破筒去炸敌人碉堡，一声巨响，用生命写下了胜利！

我来寻找：叔叔的足迹留在哪里？

一幅石油战场的图画，使我迷离：

叔叔倒下的地方，立起巍巍钻塔，

机泵声声，可是烈士的生命呼吸？

我的叔伯伯弟志芳站立在身边，对着他父亲的坟沉默不语。

志芳一直在乡政府广播站搞宣传，由于和父亲一样的耿直，不善人际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如今老了，儿孙都有了，也就不再想什么。那一年，我回老家，住在他村北新盖的房子里，我俩同睡一条大炕。他睡不着，对我说，某某当年参军开小差回家，生了几个大小子，如今当上村干部，有权有势；你家牺牲了，谁还管？活该！我爸爸若活着，我不会这样……他有一肚子牢骚。这次见他，该不会再提那些心里不平衡的事儿了吧？

我回到县里，老朋友王彦民的儿子王小顺找我。他是个孝顺孩子，子继父业，也在县文化局搞照相。上午，他带老父到保定脑血管医院打吊瓶去了，下午回来便找我，说：“陈铁利打听多少次，他要找你，他调外县当副检察长了，今天回到家里，听说你来了，他要来看你。”

我也正想见到他呢！

他因我在《追踪劫机犯》中“反贪科长”一章写了他而经受了一些磨难，我觉得对不住他。我一直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我歌颂表扬了一个为民办事，不徇私在法，不吃请受礼的正直的反贪科长，为什么会某些领导大为恼火？有人竟讽刺说，‘全县只有陈铁利一个好人’而无端地给铁利种种打击！好人在今天就这么难做，世界竟如此不公平。我反复看了我写的“反贪科长”这一章，我写的是客观平静的，没感情色彩，怎会惹恼了，‘县太爷’？我想见见铁利，一向他道歉，二想问个究竟。

我如不在书里宣扬他的无私廉洁，为民办事，他早就从反贪科长提拔成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了。因为他一直是地区和省里受表彰的人物，因为我如实地写了他的正派，竟使他得不到提拔，只能永远是“反贪科长”了。铁利对此是平静的，因为他本来就只是想为求官而丧良心的人。知道此事的人都为他抱不平。

是我写的书害苦了他。

但铁利对我却无抱怨。

我有什么办法？只有这张嘴，这支笔，要为铁利讨个公道。

我给有关领导写信，向省市有关领导赠送那本书，说铁利的遭遇我终于听到了让我的心安宁一点的消息：陈铁利在本县不能提拔，调外县当副检察长了。

晚上，陈铁利到招待所来看我，满面喜色，一扫往日愁云。

他胖了些，便是心情舒畅的证明。

我提出久思不解的问题。

他说：“唉！过去的事了，不用谈它吧！我现在不是挺好吗？”

我坚持让他告诉我。

他说，其实他们在书里也挑不出什么来。你写了这么一段吧，他竟然把那段文字背下来了：“我扫视这反贪科科长的办公室，除去有书、文件之外，便是那厚厚的一袋群众检举信了……”他们由此怀疑我让你看了检举信，说书里写的问题都是我提供给你的，就给我加压力……原来如此。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再提它了，铁利反复说这句话。他请我到博野县去看看，他在那儿几个月，已打开了局面，工作有了新的成绩，我为他高兴。我真想跟着我写的“反贪科长”去了解新的生活。我的主人公已更加成熟了，面对真诚的朋友，我不能不以真诚相对，说实在话了。

“朋友，我不能不告诉你，如果不是县民政局邀我来，我们真没机会见面了。

为这件麻烦事，我已经整整耗了快一年的时光了，我的生命空耗在这毫无结果的事情上了。”

“什么事啊，告诉我吧，看我能不能对你有些帮助。”

“简单说吧，我们被熟悉的朋友坑了！他拿走了我们辛苦积蓄的准备购房的血汗钱……”他怎么坑的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太相信了。

“他是我北大的校友，曾在北京市委工作过，以后到河北，给副省长洪毅当秘书；后来到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北方大厦当总经理，因为把大厦的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被免职……1993年到了家乡廊坊，几年内成了暴发户，盖起了高级别墅。1995年年底，他以合伙在北京开饭店的名义把我们钱全部拿出来……我们把钱交给他，他却给了他的情妇。他骗了一拨又一拨，坑了国家坑个人，年底，他的情妇携款跑了，不知去向……我们多次向他索要借款，他一次次推托、我们分房要交款了，款却没有，能不心急引我们诅咒这些坑人的人，我我的律师不少于10位，只有一个律师收过咨询费，他们无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律师们说不好办，法院判决你赢了，可不好执行。他说没有钱，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按规定，打官司要花一大笔费用，没钱的百姓，最好不要打官司……”铁利听完我的叙述，沉思良久说：“这种事在今天很多，打官司是下策，依我看，还是采取疏通之法，他不是原来副省长的秘书吗？你不妨找找那位副省长，让他出面劝说欠款人还钱；你看他还有那些朋友，能对他施加影响的，从侧面劝说，也给他一定的压力，说不定，他会把钱还给你们的……如果他仍不还钱，就说明他是认钱不认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决心坑你们了。到那时候，你不是还有支笔吗？把你们受骗的原委全面托出来，让社会评论这件事，告诉人们不要像你们一样受骗……那就是为出一口闷气，钱也就别想要了！”

最后他劝说我：“不要为这事伤心伤身体，把事儿看透，金钱也是身外之物，那些坑人骗人的，虽然得了钱财，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放心吧，我早就想开了。人生如戏，我把这些当做演一部多集电视剧了。”

铁利、小顺都走了，我洗了热水澡，把一天的尘土洗去，睡了一个香甜觉。

我当天晚上赶回北京，妻拿给我一张4月5日的《北京晚报》，就在清明这一天，我的先父辞世60周年的日子，该报发表了 my 《六十岁开始》，

这可作为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六十岁开始

我已经离休，我在去年给剧院的报告中写道：“从1946年10月当小通信员参加工作起到今天已整整半个世纪，仿佛刚见朝霞却已是黄昏；事业好像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回忆五十年蹉跎岁月，八万里路途坎坷，感慨万端！我被列入作家、诗人、一级编剧行列，有多少成果？令人汗颜！再思之，这一生真正从事自己事业的日子又有多少呢？我从发表习作的1948年开始写日记，写了四十八年，近一百本，是能计算出真正写作的时光的。而我写得最长的一个作品是“文革”十年中写的血泪交代，三中全会后为我平反，退回的竟是六十万字。……有人说，老年人的书是往后翻的，青年人的书是往前看的。可如果你在回顾碌碌无为的历史只有痛悔时，便加速了衰老。去年6月，我在医院做了大手术，全身麻醉，体验了死亡，醒来大彻大悟。

我这六十年九死一生。死也不易！人生苦罪未受完，岂能轻上八宝山？人生不幸作家幸。六十年苦辣酸甜，各种痛苦体验恰恰是宝贵财富。以积极心态对待人生坎坷和种种不幸，便感到充实和幸福。我不感觉面临事业的“结束”反而觉得是新的开始：六十花甲子，让我从六十岁开始吧！我开始写我的“血色家族”，共计十五部，每一部三十万字左右，不想它能否出版，只想给世界留下一个真实的人生。

六十岁换笔，我已背过“王旁青头兼瓦一”的五笔字型口诀，提高效率就延长了生命。市文化局将分我一套新房，我可以有自己一张写作的书桌，把计算机放在桌上，我要用电脑写作了……从人生的苦梦中醒来，是一个清新的早晨，我迎着朝霞做“中华养生益智功”，把宇宙的大气搂进我的胸中，我口吟出《六十感怀》——六十花甲子人生大循环旧我已逝去新我刚开端万事全看这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

无欲心自宽

再造辉煌日

重写青春篇

这篇小文，可算是我的《离休宣言》。

我多想有一个安宁的地方，让我能完成我的十五部作品，可今天，面对生存，我还不得不去奔波：去呼吁，去求助，我需要索回钱来，购买一个能放书桌的房间……先让我好好想想我是怎样被骗的吧。

一、鬼使神差：要要发（财）

绝不是有意安排，完全是鬼使神差，让我和妻今天去河北省廊坊市找陈曾。这是哪一天？日记记载：1995年11月8日。

这真是个吉祥日子，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气候转暖了，我们从白塔寺乘103路无轨，到沙滩转2路汽车，去海户屯长途汽车站，虽然一年来推销日宝来福的磁性健康寝具，赚下十多万元，可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从不打“的”，过清苦日子过惯了，也过怕了，不敢有一分钱的浪费，因为我们还

没有住房，如今房屋制度改革，分房也要交钱的，不留购买房屋的钱还行？反正是一天的时间，也不是急事，何必打“的”多花钱呢。

来到长途汽车站，有去廊坊的班车，半小时开一趟，我们乘上汽车，从北京往东上京津唐高速公路，直奔廊坊。

前天和陈曾通电话，他十分热情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我非常欢迎埃我这儿有五个饭店，有宾馆，吃住都没问题，快来看看吧。要不要我拿车接你们呢？不用，那就坐来廊坊的汽车，一进廊坊，你打听‘星星酒家’，司机知道……”果真，我说到“星星酒家”停一下，司机、售票员说：“放心，那儿有一站，车上的人也都知道。”

廊坊，这是我第一次来，可对这儿却有一点特殊的感情。在战争年代，这原是冀中十分区，分区机关所在地就在今天廊坊市固安县牛驼镇。1946年深秋，我才九岁，被老同志带出来，在这儿换上大到膝下的军装，算当上小通信员参加革命队伍了。当时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刘秉彦，政委是旷伏兆……汽车进入廊坊开发区，大片的土地被划进开发区里，新的高楼起来了，却见不到多少人。我开始注意两旁的酒家饭店，叫太阳岛，哈尔滨饭店的，定是东北老乡开的；高大的富丽华酒店，是李德生将军题写的，可门口不见有出入吃饭的人……突然，“美食世界”几个立在房顶的大字出现，售票员指给我们：“到了，那就是‘星星酒家’了。”

“星星酒家”是我的老司令员。后来的河北省省长。省人大主任刘秉彦题写的，我感到特别亲切。

门口站着两个穿一身绣花红旗袍。肩背“星星酒家”绶带的漂亮小姐，让我们“请进”；我们说找陈曾，里边出来一个小姐说：“找老董事长呵，他在后边。”她领我们穿过酒家的餐厅，向后边的“宾馆”走去，又穿过宾馆的过堂门，便是一个院落，红油柱走廊里有几十间客房，客人不多，显得冷清。走到靠南边尽头，有一个铜牌：星辰商贸总公司，推开门，陈曾在里边，他从软黑皮沙发上站起，笑咪咪地迎接老朋友了。

办公室里挂着几幅题字，正中间棱起的最大一幅，是现任河北省副省长郭洪歧题的：“把星星酒家办得更好。郭洪歧；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旁边有一幅是原河北省副省长洪毅的题词：“星星起步，四龙腾飞，生意兴隆，造福社会。洪毅，一九九五年六月于石家庄”。

还有廊坊市现任市委书记张成起的题词和陈曾自己写的“谦受益，满招损”。

见我观看墙上的题字，他让办公室的小青年给我拿来一张刚印出来不久的“星辰”小报，题头是陈曾的手书，下边印着：廊坊市星辰商贸开发总公司主办。

“好呀！你真有气魄，还自己办报了。”我大加称赞。

这是张 16 开四版的小报，第一版上除影印上郭洪歧副省长的题词，还有让我注意的“顾问”名单，他们不知是这张小报的顾问还是总公司的顾问，反正是顾问，上面的名字及官衔的排列顺序是，先省后市，先在职后离职，离职者加一‘原’字，也标明顾问的档次不低。

陈曾有两个儿子，大虎、二虎，一个女儿小西、大虎，是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二虎为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实际是陈曾坐阵，两个儿子具体操作。二虎是个高中生，后来念了党校大专班，是这张小报的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写道：“三年前，在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星星酒家在京津走

廊上的明珠城市——廊坊隆重开业……短短三年，我们从一个星星酒家发展成为以之为龙头的五个饭店，成为廊坊餐饮市场上一支有生力量，为家乡餐饮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还是这短短的三年，我们以餐饮行业为基础，又创办了粮油贸易、通信器材、汽车贸易等贸易公司，成立了一个融餐饮和贸易共同发展的多功能的星辰商贸开发总公司……”好家伙！

老陈，你真不简单，三年不见，想不到你搞得这般辉煌了。

陈曾笑眯着眼，眼珠在松眼皮里得意地转，说：“老同学，方兄，怎么着，叫嫂夫人吧，咱们去转转。”他叫来司机，开上黑色的微6型高级轿车，拉我们去看他的五个饭店：先去全顺德饺子庄，经理是他的女儿陈小西，这儿经营十几种风味的手工水饺。老陈把他女儿叫出来，认我们叫伯伯阿姨。吃饺子的人不少，已翻了一次桌了。我们看完了，便去全顺德蒸饺店，它经营十几种风味的蒸饺和柴沟堡熏肉，陈曾的外甥李燕生是经理，这儿也挺火爆，出门见卖柴沟堡熏肉的，老陈叫切一块让我们带回北京吃。他讲了这熏肉的特点，全是用松柏枝烤的，所以上边不落苍蝇，当年，西太后因八国联军进京，被迫西逃，路过柴沟堡想吃肉，当地人用松柏枝烤了，胆战心惊地呈上，老佛爷吃了味道甚美，大为称赞，从此这地方的熏肉便有了名，店里的师傅是他从张家口地区请来的。听他讲完，我佩服老陈的能耐。

从这儿又去了星星饼子屋，那里专营家常风味菜和大饼子；停了一下看一看，并不想去吃，老陈说：“以后再来吃吧，还有能人居火锅城呢。”

能仁居不是在我们北京白塔寺吗？怎跑到了你这儿？待一看字儿才明白是音同字不同，是“能人居”，这是他取名的妙处：猛一听，以为是能仁居，那是北京当今最有名的涮肉饭店哩，自然食客云聚；实则差了一字，还算不了商标名誉侵权，这是北大哲学系出来的陈曾的得意之作。

实地参观后，老陈说：“咱们还回星星酒家吃饭吧，你们来长了，再一个个轮流去吃。”

我内心称赞他的气魄、他的大方，这一转圈，我更目睹了他的辉煌，我说：“老陈！你这么辉煌，我可没有想到，你的资产该有千万了吧？”

老陈扭过身来，得意地笑了，停了会儿说：“我这也是逼上梁山。我在河JL供销社创建了北方大厦，我为它赚了几百万，有人妒忌我，写黑材料，打小报告，说我有经济问题，查吧！是那个叫梅风的领着干的，查了半年，屁大点的问题也没查出来。到头来，糊里糊涂地把我免职了。免吧！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了，到了是这个下常我决心再也不给共产党干了。1993年，我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廊坊，我是永清县人，这算是回到了家乡，我要在这里创一番事业，体现一下我的价值。我是一万多元起家，不到三年，我已有资产一千多万，这速度够可以的了吧？香港船王包玉刚发起来还十多年呢！”

珊月插话说：“看来你要超包玉刚、李嘉诚了？”

老陈说：“照我这速度，用不了十年！我研究过包玉刚、李嘉诚的发迹史。噢，到了。看看我的别墅……”小轿车没去星星酒家，却向北穿过一行树林掩映的路，在一座铝合金的大门前停下了。大门关闭，门右边一块汉白玉石上刻写着三个金字“仁德斋”，是陈曾的手笔，司机小高按一下车喇叭，看门人立即把大门打开了。

好一座宽阔的大院，气魄豪华的楼房呵！

院正中有花池，汽车直进，我们下车去参观老陈家的别墅。

这是二层的楼房，楼顶是乘凉的平台，也有遮顶，可以娱乐，不住人。

走廊全是玻璃镶嵌而成，楼下正中间是百米平方的大客厅，客厅左边是老陈和妻子汪荣的住房。书房、厨房、卫生间、娱乐厅、台球厅、餐厅有 300 多平米；他的两个儿子占在两边，楼上楼下，各有自己的楼梯，我们沿不锈钢做的楼梯扶手上楼，就见一宽大的台球厅。这西边一套，也数不清有多少房间，都是空的，却放着豪华型的大床，并没人住，楼上也有全套设施：书房、寝室、厨房、餐厅、卫生间……要这么多房间，你们住的过来吗？一天睡一个房间，一周也转不过一遍吧，老陈只得意地笑，他看出我们是由衷地称赞，这和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十多米的办公室，真是天堂和地狱了。

社会上常谈论共产党高干有特殊化问题，说他们如何依靠权力为自己建安乐窝等等传言，我听了不少。我没有去过当今的国家领导人的家里，可我参观过毛主席、周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房；我去过省长，省委书记、部长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中，他们的房当然比之我这普通干部的住房要宽敞得多了。

当时，我曾感叹：还是要当官呵！官衔永远胜过职称。正教授比不过正局长。

就连沈从文这样的国宝老作家才享受副部长的待遇，而这还是在多次呼吁后落实政策的结果！可我今天看到陈家别墅，我便觉得那些部长、省长，省委书记们太寒酸了。我曾在北戴河参观过林彪的别墅，当时我曾惊叹：世间竟有如此享乐之处。而今看了陈家别墅，林彪也不过如此吧。

国家给干部的住房是有标准的，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副司局级、处级……比方说厅局级是 4 居室一厅，副部级 5 居室一厅，部级 6 居室一厅，能给 300 米吗？能“特殊”多少呢？那些倚权谋私多占几处住房的，是在查处之列，不能算数。老陈，你能数清这有多少室多少厅，这别墅的建筑面积有 800 平方米吧？

你这恐怕是总理、国家主席一级的了吧？反正比我见过的主席、总理的住房还要宽绰阔气呢。

老陈只是得意地笑，不回答，也不纠正我的话。

我说，看了大虎的住房，还没看二虎的呢。他说，一个规格，完全一样，时间不早了，咱们吃饭去吧。

这次和陈曾的妻子王荣打了个招呼，她也六十来岁，全身显得臃肿，她不跟我们去吃饭，让司机小高给她带回几个可心的菜来，小高连连答应。我们走出别墅屋子，才惊动了他家的狗，大概闻到生人气了，狂叫起来，老人大骂两声狗，又叮嘱小高，别忘从酒家给狗带食物来。

上了车，我们问：“老太太在家做什么呢？”

“她还干什么呀？”小高说，“家里有做饭的，她就是打麻将呗。一打打一宿，找人跟她玩，她输了，别人把钱拿走了；她若赢了，也不要，还把钱分给输家……”哈！跟她来是光赢不输，所以牌友不断。

小高评论，老陈一声个吭。

回到星星酒家，上二楼雅间，餐厅女经理拿着菜单进来，叫陈总点菜，老陈把菜单交给我们我们很少下饭馆，就是偶尔去吃饭，也不是看什么菜名，而是先看后边的标价，过 10 元的不要，管它好吃不好吃呢。我把菜单交给妻子，她推给老陈：“你看着办吧！”老陈笑笑，又把菜单交回女经理，说：“你给我们安排吧，四凉四热一汤就行了。”

老陈谈起他的打算：廊坊市的餐饮业，我们占它全部营业额的四分之

一了，我还要再扩大，再搞一个北京火锅城、家常菜饭店；这星星酒家要上正宗高档粤菜，已从广州聘请高级厨师来亲自料理，让廊坊人吃到真正的粤菜。再就是准备搞家庭用的汽车装配；还有一个大的计划就是搞大农场，黑龙江省肇东有个军马场，咱们有关系，可以让给咱一万五千亩土地，象征性地给他点租金，白给一样，国家的事嘛，不去租它就荒着。我准备投入 200 万去种玉米，一亩地少说也收 500 斤，一斤八角，这是 400 元，一万亩地就是 400 万，一万五千亩地是 600 万；每亩地租金一年 40 元，全部租金 60 万，加上种子、机械人工，投入 200 万，一年就赚 400 万哪！

妻先说：“我给你找个人才吧，准行！”她没有说出名字来。我也说：“行！”

他有经验，最喜欢种地！”妻说的是二姐夫赵青山，我们叫他二哥。

我们介绍二哥，他农民出身，参军当兵打仗，参加过东北黑山阻击战，又在空军当过团长，转业后到阿城继电器厂当厂领导，现在退下来了，自己就在院里种地、养鸡，还是农民的爱好，他懂农业，又会管理……老陈说：“那太好了！你打电话谈谈，看他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请他来这儿具体谈吧。”我们说好吃了饭便去打电话。

这时，老陈才问起我们的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们说的磁疗床垫是怎么回事？”

妻说：“陈总，你们家的别墅真好，就是寝具不行！那些席梦思床垫都该撤下来了，换上能给你健康的寝具，你让老校友给你讲吧。”

“吃菜，吃菜，一边吃一边说。”老陈给我们夹菜，说：“八个菜上齐了，不够，想吃什么再上。你尝尝这炸鲜奶……”妻用电视广告的一句词：“味道好极了！”

我给老陈做简短的介绍，在日宝来福的“推广健康，丰盛人生”的健康介绍会上，我是讲师，要说一个小时呢。我说，这叫皇宝磁性健康寝具，是给天皇用的，后来中日合资在深圳建厂。

最近已被批准为我国的医疗器械，它有五层构造，主要靠 1200。

高斯的永久性磁石在你睡觉时进行磁疗，它对骨骼、心血管，神经三大系统的疾病均有疗效……妻插话说：“你不知道，我前几年病倒了：睡不着觉，整宿整宿地让他给我按摩，浑身没有一个地方好受，有颈椎并腰椎间盘突出、脑供血不足，还有子宫肌瘤……朋友介绍了这床垫，我咬牙买了个单人的，是 1994 年 9 月 18 日那天进到我家的，头一宿，奇迹出现了：从晚八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八点。几个月睡不着觉的毛病一下子好了！以后每天都能睡好啦，你说奇不奇？睡了三个月以后，全身病的症状消失了，我去医院做检查，老大夫奇怪：你吃什么药了？没有哇！脑血流图正常，连子宫肌瘤都萎缩了几公分。……”老陈问：“这么奇？多少钱一个呀？”

妻说：“你应该买双人加大的……”

我报了价：“全世界一个价，单人的 16700 元，双人加大的 27500 元。”

老陈有点惊愕：“这价码可不便宜。”

妻调侃道：“你还在乎这点钱？我们工薪族说贵可以，你那高级别墅用这床垫才相称呢！”

老陈二话不说，一个字：“买！”

我心里乐了！

“买什么规格的？”

“我买个最好的吧，双人加大的一套！”

接着我便说起“事业”来：“你买了，如果介绍别人来买，你还有奖金哩！你还应该再买个单人的，放在办公室，工作后休息，有人来了，让他试试，也便于推广。你试试看，躺前量一下血压，躺半个小时再量，高血压能降10多毫米，我们测试百遍，尤一次不灵！”

老陈说话痛快：“好，再买个单人的！”

还是应该找有钱的推广啊，这比对工薪族的人讲可省劲多了，一万二的东西，让他拿出来，对工薪族说不下大决心可不行。

因为专注于讲床垫，我糊里糊涂吃饱了，菜的味道也吃不出来，只有炸牛奶的甜香味留在口中。不过，心里很痛快。

回办公室，妻就给阿城二姐家打电话，请二哥去管理农场对方干脆说二哥年纪大了，干不了，妻劝说再想想。是二姐接的电话，妻是想把这事促成。这是互相帮助啊。人家陈总买磁疗床垫如此痛快，真是干大事业的气魄，不是小家子摆设，我本来想详细他讲讲日宝来福的奖金制度，可是又想：这种推销是小买卖，陈总是干大事业的，说那赚小钱的事，他看不上。

在办公室里，陈总问：“你们推销床垫，赚了多少钱？”

我说：“一年时光，有十万元余剩了。”

陈总说：“我在北京和平里又办了个饭店，这饭店的利最大，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你们有钱应该让它滚动；存在银行，实际在贬值，你们投入北京的饭店10万，我使你一年还回成本，再加3万元的纯利，这是最低的保证，怎么样？这饭店是我自己搞的，别跟我家里的人说……”说到这儿，他声音变小了。

妻说：“行，我们看看再说。”

陈总说：“回头我拿车接你们，一块去看，我准备把地下餐厅装修好，扩大一下，你们一看便知道了。”

他留给我们一个考虑题目，妻问了具体的地点。

下午四点，我们在星星酒家大门口等车，一会儿长途车过来了，便和陈老扬手告别。上车一路顺风，五点多回到北京。晚上写日记时又想起今天的日子，1995年11月8日，这一天办事如此顺当，这是一种神示：11.8是要发呀！看来，我们真要发展、发达、发财了！

二、“丢了事业，我真为你惋惜！”

为了能帮助陈总找到农场合适的管理人才，妻用大哥大同阿城多次联络，说服二哥，二哥的心活了，心动了，决心下了，他又找了他们厂搞供销退下来的石万学和他一起干，这事成了。电话告诉：二哥昨天已从哈尔滨动身，今天到北京，立刻去廊坊。

又是一个吉祥日：11月18日——要发，是周六。上北大的女儿听我们介绍了陈总，也很想去见见这个伯伯，于是全家决定这天我和女儿打前站，妻在北京等到二哥，再随后去廊坊。

我们的车顺利，11点就到廊坊了。中午，老陈带我们去全顺德蒸饺店

要了不同馅的蒸饺。因为车出事故，妻到下午七点才带二哥和石万学赶到廊坊。陈曾让人给安排好住房，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俩老头很兴奋，有信心把地管理好。老陈说：“先吃饭，路途劳乏，今儿个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老陈将我们一行领到星星酒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我们去到卡拉 OK 歌舞厅，老陈把管音响的国辉叫来，找唱盘放，让我们点歌。这个厅已停了几个月，为什么不开呢？陈总说：“原来是承包给人了，他们在这儿跳舞，完了，有的就和舞女一块住到我这宾馆开个房间‘打炮’……后来让公安局给查出来了，我这儿的歌舞厅也再没人承包，那时候，我这星星酒家每天纯利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政府多余管这么多，食色性也，吃喝和性爱这是人的本性，没有食、色，就没有人类。

咱们的旅游事业为什么上不去？没有性服务，人家谁愿来呀……我们来点歌唱吧。”

妻是京剧演员，被老陈介绍为京剧艺术家，自然要找京剧卡拉 OK 唱段了。第一首唱段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战，那最后一句高遏行云，响亮有力，一下子引起热烈掌声：想不到，在廊坊还能听到这么好的京剧。陈总还让妻再唱一段，说人们没有听够，这儿有懂京剧的，说唱的真有味儿。会听的听门道，不懂的只听嗓子高，珊月的多年压抑的事业心跳动了，她又唱了一段“贵妃醉酒”，是梅派名段，这便又掀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人们还要她唱，妻将陈总：“你也该唱一段了吧？”陈总笑了：“我？我五音不全，从小就不能唱，不行，不行！”珊月说：“那不行。”“好，尊敬不如从命，再点一个我唱。”国辉拿过歌单，有的全是这些年流行的，名字都不知道。

终于从中发现了五十年代的一首情歌，老陈上歌台拿起了话筒。

他真是不行，这大概是他开办星星酒家以来第一次在这儿唱歌。

看来今天他也很高兴。是这支五十年代流行的“红梅花儿开”把他带回了青年时代吧。最后，还要珊月唱，她说：“我们三人唱沙家浜智斗。”找出唱盘来，我唱胡传魁，老陈唱刁德一，妻自然是阿庆嫂了……引起一阵阵笑声，最后以阿庆嫂的唱结束，又是更热烈的鼓掌，达到了高潮。

完了，我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老陈便大加称赞，大发感慨，大加惋惜开了。

就从这大开始，他在办公室，在与他同坐的公爵王汽车上，在一同进餐时……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多次重复了这些话，不能不让人感动：“今天我可是大饱耳福了。

我没有亲听过刘长瑜、洪雪飞、李维康这些人的唱，我听你唱，她们也不过如此吧？你这可真是个人才，难得的人才呀！”

妻插话说：“我是人才，可没有伯乐……”“我就是伯乐。我看的不会错！你这样的人才，不上舞台演出，不发挥你的才能，这可是国家艺术的大损失；你窝在家里，真是太可惜了！你是难得的人才呀，可不能再窝下去，一定要在舞台上大放光彩，我一定支持你搞事业！一定要把事业搞起来，我这个人最爱人才，最支持搞事业的人……”他的一番话，是那样真诚，妻受感动了：这一生到今天，何曾有人支持过她的事业？如果有人支持，全力支持她，她不早就名声大振了吗？不光没人支持，有的是拆台的人，拉后腿的人……我从她的感动里知道她内心的这些话。此刻，妻却真的向陈总说了：“你支持，那么我们排一出新戏吧。方燕写他多年准备的京剧《杨继盛》，

我演杨的夫人张贞，你可得投资！”

陈曾毫不犹豫，干脆地答应：“行啊，没问题，方兄写吧，我一定支持，把戏排出来！”停了一下，又说：“我想有一个题材可搞，贺子珍。她这一生可真不易，这若立在舞台上，一定很感人。方兄你说呢？让珊月演贺子珍，可能一炮打响，你搞剧作，我可以帮你找材料……”我也颇兴奋，如果真能找到一个艺术事业的支持者，有经济实力做后盾，我们一定能成功。我写了多少人们称赞的好本子，不是因为找不到资金，还在箱底压着嘛。《杨继盛》这是我酝酿多年的题材，早在十年前，我在家乡的档案馆里就看了杨继盛的全部档案，我为家乡有这样的人物而自豪。他的妻子张贞是贤内助，性子刚烈，在杨继盛被严嵩之流陷害入狱，要判死之时，张贞上书皇上写了《请代夫死书》，却被奸臣压住未报，致使杨含冤被害死在北京菜市口。张贞愤而自缢，以完名节，真叫人感动不已！这场大悲剧是会震撼人心的。然而，我迟迟没有动笔，心想：我即使写成，没有人投资，岂不是白耗精力吗？

如今，见到陈曾，他竟如此干脆地说给投资，看来，在香港回归前，我们的戏能和观众见面了。

杨继盛和张贞，是大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是为民说话的忠臣的大悲剧，是为丈夫、为正义献身的大悲剧，人生的大悲剧会与亿万人心心相通。

妻最爱看悲剧，她最能演悲剧。我们的一生也是一场悲剧。

这一夜，我没有睡好。

妻的事业没得到发展，全是因为我造成的，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我不愿想，不愿提，可还是常常想起、提起……我已经立志，在我告别人世之前，一定要写出这部书来，写我的悲剧，写我给妻子一生造成的而又是我已无法挽回的痛苦。

我要为妻写一部她主演的戏，这是我在痛苦中唯一的选择，想用我的心和血来弥补遗憾于万一，让她在这部戏里尽情地倾诉自己的悲苦，让她在舞台上流下她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泪吧，尽情地流吧，让我在台下看着她的演出哭吧。

在人生路上，我们都是悲剧角色。

我们去登记结婚的那天是1970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天色阴沉，下着小雨，她走到半路要回去，我说走吧，强扭着她进了登记处。我们以后的灾难，是否和这个不吉祥的日子有关？这是给鬼上坟的日子，我们怎么就赶在这一天？

我们的“蜜月”没有过完，我便被长影作为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审查了，当时名字叫“批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我在长影挨整，回家不敢告诉比我小10多岁的年轻的妻子，可她已从我的神态上感觉到我出了什么事。她最害怕“运动”，一听说要来什么“运动”，她的肚子就疼，这是多难熬的日子！

可不久，她的命运有了转机：解放军总后271部队要组织宣传队，从下属军工厂里借调演员，当时文艺界去总后勤部3504厂的就好几位，她自然被挑选到沈阳，成了没有军籍的文艺兵，他们要演《沙家浜》，妻便是阿庆嫂。

他们的《沙家浜》在总后调演中打响了。连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他夫人胡敏看戏后接见时都称赞阿庆嫂演得好，《总后通讯》上作了报导。妻的才能第一次受到重视，于是，部队政委领导一致决定让她参军入军

籍，不再当“装甲兵”，按连级待遇，自然便提干了，跟着要解决入党问题了。当时年轻人中最向往的是参军、入党、提干呵！

当领导找她谈话时，她却提出要调我到部队去的要求，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这是合理的呀，没问题。谁知好事立即变成坏事：一发调函，知道了我是审查对象，不仅不能调我去部队，连上级已经批下来的妻的军籍，也因此不能公布了。

一同报上去的同志，别人都穿上了叫人羡慕的军装，她却沒有；而在上级审批时，谁不知阿庆嫂是第一名呢？为什么？传开了，说她的丈夫是“反革命 5.16 分子”……本来就妒忌的人此时便幸灾乐祸，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受了多少刺激！她起早为那个被称为司令员儿媳的假团员打来洗脸水，那司令员“儿媳”把水泼了，说我不反革命的妻子给打水，以示她革命……妻表面上坚强，内心是软弱的，她自己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地到沈阳西陵的树林里痛哭……此时，我正在长白山区受难。在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别人是走“五七道路”，我是受审查，要干别人不愿干的重活。

沉重的石头压在肩头，不小心会滚下山去，而心中的石头比肩上的更沉重。为了忘记心中的痛苦，我在森林里伐木时便放声喊叫歌唱。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住所时，等我的的是晚饭后的批判斗争大会，还让我没完没了地交待……我知道部队来调查我的情况，只要有结论，妻的参军便可以解决，最怕的是挂着没结论。于是我找到专案组问：“我的问题查了快二年了，何时清楚有结论呢？”

专案组长回答：“我们也愿早日结束，不然我们也回不去，可你也得配合呀！”

什么问题你都不承认，可人家有揭发，对不上号，如何结论？”

我急了，说：“那我都承认算了！说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江青、康生……那些话我承认说过不行吗？”

专案组长却认真：“那也不行，还得实事求是，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你负责，对历史负责呢。”

因为心里郁积的痛苦，我哭了：“我要结论！结论！你们知道结论对我，对我妻子是多么重要吗？！我顶多不过是严重政治错误吧，还能把我打成敌我矛盾吗？！我承认算了！”

组长严肃地说：“不能认！那样糊里糊涂都承认了，就可能把你定成‘现行反革命’，会判刑，甚至会枪毙，这不是闹着玩的！”

他说得我发冷。是啊，我不能因一时冲动再出错了，如今已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和我共命运的妻子！

组长翻开卷宗：“就说人们揭发你攻击林副主席这一条吧，你说林彪没办法统帅全军，反对他的老师将军太多，他不会长久的。党章是全党的章程，上面不应写林彪是当然接班人。你说过没有？就这一条就可以定成现行反革命，至少判你 10 年徒刑。”

我说：“我说过林副主席，但不是攻击的意思，我是担心他，说他打倒的老师太多，担心他不好领导……”专案组长打断我的解释：“你这意思已经写过多少次了，所以，你着急不行！因为你是烈士子弟，从小参加了革命，说话随便，政治问题是不能不谨慎对待的，对你的问题，我们也很慎重。你知道，如不是这样，早给你定成‘反革命攻击罪’了。对你，还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我们是立足于拉，早日把你拉回来……”我感激组长的心，我

无话可说，含泪出来，只有咬牙等待。

妻不再来信了，她的日子也更难过了。

她怀上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快临产了，几次大流血，可还要她演出，有人还说她娇气呢。

她要生孩子做月子，我在长白山里喂猪，却不能让我去伺候月子，她只有挺着大肚子，由父母陪着到开封我母亲那儿……1971年5月19日，在长影大剧场揭发批判我“反革命”言论之时，我的儿子在开封落生了。我在长影收到了妹妹的来信，看着信，我哭了。妻在自己受难，我却不在身边，那是最需要丈夫的时刻。

一个月后，妻回部队演出，他们要到贵州、云南三线工厂去。她把刚过满月的孩子留给我的老母，母亲也在为我儿子受罪。两个月后，正是热天，因喂奶不适，我儿子得了肠梗阻，要动手术，可他的父母却都不在身边。接到了加急电报，我去找五七干校领导请假，不准，说我的问题没完，不能离开。别忘了，我是受审查的人。

我说，如怕我串供，可以跟我去人，费用我负担……“这不是费用问题，你不要再说了，说也不行。”

这天夜里我想逃走，我一定要去救我的儿子，我要走出大山。半夜，悄悄溜出帐篷……很快，被发现了，我走不了，坐在大石头上，一会儿被人们找回去了。

从此，对我看得更严了。

过后，我知道，儿子动了手术，是焦裕录的大女儿焦守凤代儿子父母签字的，儿子留下了性命……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我的问题越来越轻了。把我攻击林彪的言论抹掉，我轻松了不少，直到1972年10月，我才被“解放”，结论是有错误言论，属认识问题，但这结论对我妻的命运已无作用：宣传队宣布解散了，她又回到3504厂当缝纫工人。军队没有进，军籍虽批下来但没公布也就没这回事了，不可能再穿军装了，妻最好的人生机会被耽误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到来了……这全是因为我造成的！

1972年10月，我回到《吉林文艺》编辑部当了编辑。

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得到彻底平反，因我受了株连的妻也才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来。

1980年，为了女儿的“易地治疗”，全家调到河北石家庄，妻到了河北省京剧团，她虽然可以当主演，却因不是“一窝的鸡”，连排个二路活角色都难。

一个偶然，她作为B角，排了京剧《赶女婿》到北京演出，A角病了，让她上常其实她从没有正式排过这出戏，全是站在一旁看的，谁想到这一次上场，就叫响了，台上台下都叫好。电视台的导演也看过A角演出，那是这个团团长的夫人，可要录像时，导演却要录B角珊月的，说她演得好。导演只从效果看，哪知背后的“关系”，领导当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只好按团领导的意思录了。

这次偶然的上场，却因演出好而遭到永远不派角色的命运。

如果真正按艺术说话，那主演还能站在台中间吗？

为此事发感叹，我曾在《河北戏剧》上写一杂文，提倡演出团AB制，以便不压抑人才；作家叶蓬还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杂文，题为《鸡诫》，由此事引出不要因不是“一个窝的鸡”便自己窝里斗，而应解放人才的讨论。

文章能起多大作用？以后剧团搞精简，竟把妻作为精简对象，让她看大门，当了清扫工。

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忍了，把精力和希望注入到两个孩子身上，希望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体现自身的价值……女儿七岁写诗作文，九岁发表作品，并获国际奖，10岁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岁女孩方园诗文选》，河北电视台录制的专题节目《小诗人方园》打入同步卫星……这每一步里都渗着妈妈的心血。

女儿在1985年的一天看到妈妈早生的白发，写下一首《妈妈的头发》：
妈妈的头发，墨黑墨黑，妈妈的头发，很美很美，我长大啦！我发现啦！

妈妈的黑发

哪儿去了？

妈妈挤出里面的墨水，

妈妈挤出里面的智慧，

写下了一个“爱”字。

印到了女儿的心扉……

女儿12岁写的这首小诗，由李正谱曲，获全国“妇女心中的歌”征歌第一名，这是1987年的“三八”节公布的，也就在这一年6月，珊月被授予“全国优秀家长”称号，作为全国百名优秀家长中的十名代表之一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李鹏握着她的手说：“感谢你，为祖国培养了一个小诗人！”

她的心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

然而她自己从小钟情。苦练多少年的京剧艺术事业呢？她最应该发光的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唱京剧，但却没有她的舞台。她自己事业心很强，却受着压抑。她不甘心，却没有办法实现。想起来，一阵阵烦躁发火……这一夜，想到妻子跟上我以后的命运，想自己这一生的坎坷，我躺着却不敢翻身，怕惊动了妻；实际上她也没有睡好。黎明了，她头一句问话是：“你说，陈总能支持我们搞事业吗？”看来她想了一宿，她知道我没有睡。

因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便肯定地说：“我看，陈总会支持我们的，他不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

妻立刻起来了，说：“从今天起，我早晨要吊嗓练功了。”

我也起来了，只觉头晕乎乎的。

隔壁住的二哥赵青山、石万学也早早醒来说话呢，我进去，他们说，想了一宿，想这地怎么种，怎么管理，要和当地军队搞好关系，让他们帮助，不然，玉米一熟，当地人去偷，可受不了……玉米地里还可以种大黄豆，看陈总什么意思吧，是分成，还是承包……早晨，“星星酒家”没有饭，我叫练功踢腿的妻停止，同二哥、老石一同去街里吃油条，喝豆浆，老石一路讲他们的想法，说搞好了几年就发起来了，我们不能忘你们夫妻俩，我们要从我们的分成里给你们一份……吃完早点，我和妻去陈总的办公室，他见面就说：“珊月真是个人才，不搞事业太可惜了。你们去和平里那个饭店投资吧，你们什么也不要管，到时候给你们钱就是，你们就专心把事业搞起来，我全力支持你们。”

妻说：“可说好了，我的事业可靠你了。”

老陈端着茶杯喝一口，笑眯着眼睛说：“没问题。我一定把你的事业扶植起来，不然，太可惜了。你早就该唱红了……”妻说：“还不是叫你的同学给我误了。”

”

老陈笑眯着眼，像开玩笑似的说：“是啊，你要跟我，早就让你发展起来了，方兄，怎么样，让珊月跟我吧，我一切负责啦！”

我不接茬，只问他：“你买的磁疗床垫，什么时候交款？”

陈总说：“好说，回头你把床垫拉来，先试试。”

珊月说：“你再去北京，把我的床垫拉来，在这儿当场测试。

你把那些有钱的、想健康的人找来，让他给讲。”

陈总又说好说，定下他再去北京拉床垫测试。

我想，说不定在廊坊还能发展一下日宝来福事业呢。

二哥和老石留在廊坊，我和妻先回北京了。

在回京的长途汽车上，我想起从事日宝来福磁疗寝具时讲的几句激励话：强者，抓住机会；弱者，等待机会；智者，创造机会；愚者，失去机会。也许和老陈的此次相逢又是一个机会，要抓住它。从此，我和妻的事业也许会再造辉煌。当今，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什么事业也办不成呵！

三、和平里有个龙迪……

呆了两天，二哥和老石从廊坊回来了，说老陈给他俩报了路费，说一同到那农场看看，老陈去东北时再约时间，先让我们想一个协议方案……他们回东北了，带着希望回去了，说不定从此他俩成富翁了呢。临走，他俩一个劲儿说：“我们好了，忘不了珊月。”赵青山说，他自己还想要一片地种大黄豆呢。

他们走了，我们便和陈曾联系，如何订农场协议，可怪了，电话总要不通，老陈也不来电话，也不来人，我们担心出了什么事。

等到 11 月 24 日，周五，我和妻又乘长途车去了廊坊。十点半到了星星酒家，陈总不在，我们进了老陈的二儿子当总经理的中云公司办公室，这和陈总的办公室在一排房。没有烧暖气，点着红外线炉，二虎正坐在大黑桌子后边向他的表弟李燕生交代什么，我们进屋，他站起来迎我们，李燕生应着“行行行”出去了，我见到墙上有个铜牌，上书红字“青年优秀企业家”，是廊坊市给发的。

二虎说：“我爸爸不在，我叫他。”他拨通了电话。

我问：“为什么在北京给你家打电话、总占线？”

二虎说：“是老头老太太嫌烦，把电话线掐了吧。等等吧，一会儿我爸爸就来了。为搞这东北农场，我们家想法不一，我爸光想弄大的，恨不得倒飞机、军火……他弄了多少大买卖都干不成，又想起搞农场了。我根本不同意投资农业，时间长，收效慢，那是靠天吃饭，风险大哩！有那几百万，干什么不赚？不就是为赚钱嘛。我爸和我大哥加在一块儿，也没有我的风险意识大呀。让他们干去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老陈过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谈。

我把二虎的一番话转给老陈，老陈笑笑说：“我这老二干不成大事，谨慎有余，魄力没有，胆小不得将军做嘛。不能听他的。你姐夫走的时候，我

给他们俩来回的路费了，我让他们考虑个意见，过些天一块去农场看看。”

妻说：“我们这么跑，算什么呀？他们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参加进来，也算股份，名正言顺……”陈总打断她的话：“忘不了你，放心。我会拨给你一份的，你们就不用入股了。北京和平里有个龙迪饺子苑，你们在那儿入股吧，那儿我注册资金 50 万，现在还需要扩大，把地下餐厅装修好，有卡拉 OK，有雅间，赚钱快，没有一个饭店不赚 50%的…你们想好了没有？我看这事得方兄拿主意，女同志嘛，总是想得过多……”妻说：“我们哪像你呀，高级别墅住着，公爵王 V6 小车坐着……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房子，还住办公室呢。我又不懂开饭馆的事儿……”陈总又是笑眯眯得意的样子，他说：“我说了，又不让你去开饭店，你应该搞你的事业，演戏。你只要把钱交给我，我给你升值，交我 10 万，一年还本，再给你 3 万，外加 5000 元的签单权。你有朋友吃饭领到那儿，吃了一抹嘴就走，只要你签个字就行了。回头我领你看看，可以在那儿搞京剧茶座演出呢。”

陈总光拣珊月爱听的，一说到能演出唱戏，珊月便全浸到艺术的思维中去了。

我问和平里龙迪饺子苑是租的谁的房子，陈总看出我动心想投入了，便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原来在和平里七区那片地方，是一片葱郁的树林，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想在这片地方盖一栋楼，但环保部门不批准，要保护北京的绿色呀！这时，他们通过朋友吕先（现在他在河北省人大，是处长）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我原来在市委工作，有关系，我找有关领导，也费了些力气；如今我们国家虽有多种法规，什么环保法，那还不是得叫人管，让人执行嘛，我跑下来了，环保部门批准可以把树伐倒，那是 60 多棵大树，全砍倒了，地质局便在这儿盖起一栋大楼。从此，我和地质局局长章星成了朋友，他感谢我，说让给你一层楼开饭店吧。他们也是想开饭店，那地方也缺个像样的饭店。那楼上和地下室一层一共是 400 多米，说到租金，也是象征性的，说一年给他 30 万，你知道这在北京算最便宜的了，可我们得先赚够咱自己的才给他呢。一点问题没有。你算算这账：楼上，营业额每天至少 2000 元，楼下装修好，雅间每天至少 5000 元营业额，一天 7000 元，纯利 3000 元，每月是 9 万，全年 10 个月是 90 万纯利，我给你三五万还有什么问题？

一听算账，确实让人有底。

老陈又说：“这可是个机会。我们合作把这个饭店搞起来，你的事业也就起来了。”

这天老陈决定去北京，领我们去看看和平里的龙迪……实在说，这一天，我们已经往那龙迪饺子苑走去了。陈总给我们描绘的发财的图景和事业的蓝图，正一步步引我们走到向他的饺子苑投资的路上……11 月 25 日，是星期六，我们叫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书的儿子，把自己用碎木板搭起来的小厨房拆掉。上周剧院下达“最后通牒”，必须在本周内拆除，否则后果自负。这是为了防止火灾。我家从 1990 年调到北京，就住在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二楼房间，在楼的南头。固有的两间小棚，是人们放自行车的地方，不过两平方米，一间让一位搞美术的占了，放他的破烂，另一间我自己用破木板夹了个门，当小厨房。全部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加炉灶菜板菜墩、粮米袋子，挤得喘不过气来，做饭只容一人转身。我已在这儿五个春夏秋冬，真是充满了酸甜苦辣……然而要拆除它，却有留恋之情，又感无可

奈何，拆了它上哪儿去做饭？在我的住屋里做饭，不更易失火，更不安全吗？剧院一定以为我是“钉子户”，顶着不拆。所以给我的通牒是命令口气，十分严厉，不容你考虑。其实，接到通知我们毫无违反之意，只是儿子不回家缺劳力，才拖到本周末的。

这次下令让我拆除小厨房，有人对我说有背景：正是在王宝森自杀、陈希同被审查传达之后，人们想起当年因陈希同对你的住房问题“关照”，才这样做的。难道一个小小厨房还连着大的政治背景？我看不过是巧合罢了。

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拆掉它了，心里还想：以后，如果真的有了自家的饭店，还做饭了呢。那小厨房，冬天灌风雪，夏天闷身汗，并不是享福地方……拆了正好。

小厨房拆了，有的东西堆到了门口走廊，有的又挤进了住的屋子里，从今往后，只能在小屋熬粥做稀饭了。

生活又逼我们去找吃饭的地方，从另一方面，推进我们走向和平里龙迪饺子苑的路上……11月28日。

早上陈曾来电话，说中午到北京，妻催他：“你若决定买日宝来福的磁疗寝具，可以把钱带来，我们给你落单提货。”对方答应：“可以呀。”我们想，还是陈总办事痛快，说买就买，不像有的人翻来覆去的拿不定主意，这也是因为经济实力不同的缘故，陈总家有万贯，买个床垫，一二万元，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们等到中午，不见陈总的影子。妻准备请陈总来吃涮锅，去廊坊，他招待我们，来北京，我当尽地主之谊。我们剧院住的这条街，成了火锅一条街，以能仁居最有名。我们门口，租剧院房子的有五龙居、三和轩，都很火。请陈总吃饭，也想借机看看人家是怎么经营的。剧院穷，经费是前几年的包干数，可物价在涨，人员在增，入不敷出，医药费每人每月只能报一百元，如果你排队在后，也许到不了你那儿，药费便没有了，只好在下月10号早早排队。剧院只有搞三产增加点收入，这门口的房子便出租了。据说，有规定不许靠出租瓦片（房屋）得收入，可剧院哪有人懂开饭店呢？上边不明白剧院的难处吗？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不在剧团，不知剧团的难处。首先得说生存，然后才能说发展。团体、个人家过日子一个理。

陈总不来，我们自家便凑合吃了。

下午三点多，陈总呼我，说马上就到白塔寺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会儿，黑色的公爵王V6小车到了门口，停在三和轩饭店跟前。陈总出来，我让司机也出来喝口水，陈总说：“不用啦，叫上珊月去和平里吧。”

我还是拉陈总到了我的住处。

妻从屋里迎出来：“陈总，到我们贫民窟看看吧。”

他进到屋来，眉头皱了一下，不知坐到何处。我们要沏茶，他不让，说：“咱们去看看那饭店吧。”我让他坐下，问他可带来购磁疗床垫的钱，他连说：“好说。”我又让他看看珊月睡的那磁疗床垫，说：“就是它让我们走向健康的呀！”我本想多介绍几句，见陈总心不在焉的样子，便不说了，他让我们一块去和平里从他那高级别墅来到我的小屋，当像皇帝从皇宫来到乞丐的破庙吧！可他并没有发出感叹，也不惊讶。

我们上了他的公爵王小车，走三环，往和平里开去。

路上，有人呼陈总，他用手机说话：“……我们这就过去啦……你不能

屁大的事也找我处理呀！你要和厨师长处好关系……行啦！我过去再说吧。”他关机了，扭过头对我们说：“这是那个经理打来的，厨师长是我从星星酒家找的，一点问题没有……你们看看就知道了。在北京开饭店，肯定会比廊坊更好，我那星星酒家一年就上百万的利呢。”

从陈总的电话里，我感到这个经理与他的关系不一般，他说对方，像说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小车从和平里北边过来，过了和平里大酒店往南，从一条农贸市场向西，看到一栋高楼顶上竖着霓虹灯制的大字：“龙迪饺子苑”。车停在门前的树林里，我们从北门进去，门口两个小姐迎我们进到餐厅。这一层有十六张餐桌，吧台小姐见陈总到来，热情招呼，问吃什么，陈总问：“孟经理呢？”小姐说：“在办公室等你哩。”

出了餐厅向后边一栋楼走去，来到地下室一层，敲门进屋。

迎上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人高马大，丰乳肥臀，徐娘半老，却还有几分姿色，眉眼带笑，甜甜地叫声：“陈总，你们到了。”她把我们引进里间的办公室的长条沙发上坐下，陈总给我们互相介绍：“她叫孟花，是这龙迪饺子苑的经理；这位是我的北大老同学、作家；这是他夫人，京剧艺术家珊月……”孟花递上她的名片，中英两种文字，名片后边是龙迪饺子苑的位置示意图……按说这位置是不错的。

陈总说：“他们来看看咱们的饺子苑，想投资合作。”

孟花热情地：“太欢迎啦，咱们去看看吧！”

妻问她：“您原来在哪儿工作？”

“我？我原来在国家工商局，后来到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办公室，局里派我办这个饭店。”

一听说她在国家工商局工作过，妻便想起她在总后 271 部队宣传队时的战友，便问：“你认识国家工商局公平交易局杨昆吗？”

孟花停了一下，说：“……我调出两年了，不知道……工商局人很多。”

“杨昆是局长呀！”

看来孟花真不知道杨昆。我们当时闪过了一丝疑问：凡在工商局工作过的，该都知道公平交易局的局长呀，她怎么说不知道呢？可我们却没有抓住这点疑问深思，一打岔就过去了。

我在外屋看到了营业执照，北京龙迪饺子苑，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孟素花；注册资金：5 万元。

我明明记得陈总说他注册资金是 50 万，怎么在营业执照上成了 5 万元了呢？我把这问题提出来了。

陈曾笑着说：“别看那执照上写的，那是假的，注册资金多，纳税多。现在，只有贪污受贿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呀！”

我也一笑了之，对此并没有多想。咳，这是一种麻木！以后，陈曾还说过“除去说假话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这一对生活的概括。“报纸除去那个日期是真的，别的也全是假的。”这也是他说过的话。我为什么对此毫无警惕呢？为什么不想想，他说的话也全是假的呢？人家都已提示给你，你还不去想，这又怨谁？

此时，我们对陈总却是完全相信的！

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是孟素花，她给我们的名片上却是“孟花”，这是一人两名，就更不去多想了。

孟花在前，陈总紧跟在身边，领我们又进到餐厅，楼上是 200 多平米；从餐厅西头下去，是地下室，推开一扇大铁门，拉开电灯，地下有一股暖气，潮气熏人，这是人防工程，陈总说可以改造装修，变成地下餐厅。孟花说：“我想这儿可以搞桑拿按摩，咱们对面一家开的异性按摩，可来钱呢！”陈总白她一眼：“公安局查了咋办？”孟花说：“从这儿开个门，他们查的人一下来，就从这边溜走了。永远逮不着。再说，这派出所咱也有关系，我请过他们几回。”

我们从西头走到东头，这地下室和楼上一样大的面积，不利用也是可惜。

陈总说：“这楼下装修成雅间加卡拉 OK，肯定会赚大钱！”

孟花说：“就是！咱们这儿现在主要是饺子，属于中低档，地质局和附近几个部都要一桌花几千元的，我们没有，人家就不来了。这下面按 5 个包间说，一大最少也是 5000 元的营业额！”

她说的和上次陈曾算的账一样。

走上去，孟花一边安排上菜，一边悄声对陈说：“我这儿也有鞭菜了，你要不要？”陈总摇摇头，说今儿个免了，上四凉四热，主要是尝尝饺子。孟花拿过菜单来，让我们点：“想吃什么点什么，咱们自家的饭店！饺子有 18 种，薄皮大馅，绝对好吃。”

一样二两，要了二斤。陈总说：“记着下回要别的，别重样。”

怎么样，想好没有？把钱投到这儿，你们就在这儿吃，不要放在银行贬值了！

把钱拿来吧，咱们好装修，过年就正式开业。”

我们实在不懂开饭店，拿不定主意，但陈总和孟花的热情招待，又使我们不好意思说否定的话。

饺子味道的确不错，不过剩下不少，陈总让拿几个饭盒来：“给咱的女儿带回去尝尝吧！”他说成“咱的女儿”，便感到更亲近了。

妻说：“算了吧，她在北大，又不回家。”

陈总还是把饺子装好，套上塑料袋，对司机小高说：“你跟方兄他俩去北大吧，给女儿送去……”小高看看陈总和孟花，没有一点违拗，笑说道：“我们回来，还回廊坊吗？”

陈总说：“你先去北大，然后把方兄送回剧院，再来这儿接我，多晚也得回去……”小高开车送我们去北大，我们感到过意不去，为这饺子要专送一趟，打上花的汽油钱，这点饺子可够贵的了。可陈总并不这么算账，他可不是那种小气人。

“这没什么。”小高说，“陈总跟孟经理在一块有事商量呗！”

咱们不急。”

当时，我们还听不出小高这话的内涵。

如果我写的是一部小说，我根据后来对陈曾与孟花关系的了解，自然要写上一段：在司机小高送我们离开饺子苑之后，孟花急不可耐地把老陈拉进她的办公室旁的卧室去……因为据“办公室”的邻居反映，孟花的屋里有男人粗悍的说话声和孟花的哭泣……但是，我不能根据道听途说，使用合理的想象去编织故事，以求它的趣味性、可读性。不能！我这是一部绝对真实可靠的根据我亲身经历写出来的纪实文学，我绝没有一点虚构，所写的一切都有根有据。因此，我不怕其中所写的人物以伤害他的名誉而起诉我，因为

我绝对忠于事实！

第二天，11月29日，我到保定姨弟张洛卯家。姨弟当年参军在北京军区，和诗人王石祥一个部队，他转业到保定地区招待处，地市合并，他在保定宾馆任纪委书记。多少年来，我每次来保定，都先在他这儿落脚，因为紧挨火车站，乡亲们来保定办事也多来找他。他是个热心肠，能帮忙的都全力帮忙，一天忙个不停闲。我这次来保定是特向他咨询开饭店的事儿。弟妹通书多年来在饭店工作，她侄儿在云南开饭店都把她叫去管理，我想她会帮我们拿个主意。

姨弟在班上，通书听我讲了情况说：“北京开饭店肯定赚钱，不过要自家干。常言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搭’，这里边的事可多了。你们要合作，就要一方出会计，一方出出纳，不然，他可以说一分钱不赚，全落进他一家腰包！这跟做账有关系，他一加大成本，便不赚了。这你们可要想好，不知道跟你合作的这个同学人品怎样？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哩。你们合作前要说清楚，先小人，后君子。如今坑人的事可多哩！”

通书的话实在，我点头称是。我说：“你去北京帮我们吧。”

她说：“我倒想去，可有这小孙子，把我拴住了，我是哪儿也去不成，动不了窝呀！”

12月1日，我和妻一同去石家庄，直奔兰英家。

我们和兰英的友谊，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在《一个传销商的手记》一书里详细地写过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官司。我们在商品经济大海中相识，在共同搏击风浪中相互了解，成为深交，依赖的便是真诚和理解。说来有趣：1995年2月，我们开始传销日宝来福的磁疗床垫，在石家庄先告诉了河北电影制片厂的王庆，我们早就认识了，是通过王庆认识的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兰英。我到石家庄电力宾馆讲课，兰英听了，很爽快地加入了日宝来福事业。她先购买了一个单人床垫，而后又反过来介绍王庆夫妇来听讲。精于心计的王庆想的是“发财机会到了”，却又舍不得先自己购买，他想先找自己的下线，等下线决定加入了再加入，岂不保险：他家有钱，又不想拿出来，便向兰英借钱，说：“你让我做下线，我朋友多，会推着你升级发财的。”兰英借给王庆一万多元。我们虽先认识的王庆，却觉他这做法“太尖”，不主张兰英借钱给他。可他们到底是老同学，在中学时，王庆还追过她，这时说了话，不好不借。王庆告诉兰英：“别让你爱人知道哇！”拿了钱，我们提醒兰英，得让他打个收条，写明哪天还钱才好。兰英听我们的话，这样做了，谁想到这个借人家钱购了床垫的“下线”，经不住省话剧团一位演员的诱惑，竟加入到她的下边，这是传销中最忌的“抢线”，于是打起了一场官司，一直打到日宝来福公司的总部……几个月的官司，实在让人伤心。在利益面前，像王庆说的：没有永久的朋友，一切随利益而变化。

我为善良的兰英受欺侮打抱不平，这样，失去了原来的朋友，却得到了新的友谊。但此事思想起来是叫人伤心的！有人曾得出结论：朋友之间绝对不能做生意，生意场上只认利益，否则，往往失去友谊。

结识了兰英，是那场风波中的唯一收获；在风雨考验中结识，有了牢固的信赖基础，这友谊会延续到下一代。

我们决定和兰英商量投资饭店的事儿。

兰英说：“日宝来福总改制度，不稳定。报纸、电视台总讲不许传销，现在不好推销了，我党着还是搞个实体稳当。可选个什么项目呢？方老师，

你的长处是写作，你来讲推销床垫的课，我总觉着‘掉价’，你是国家一级编剧呀！咳，这也是生活所逼呀。开饭店，咱一点也不懂。陈曾若是可靠的朋友，他倒不一定坑咱们，他又给副省长当过秘书，不会像王庆一样，只认钱不认人吧。……你们若真有了饭店，朋友们去北京，都介绍到咱的饭店去。”

善良的人，总往好的方面想。说到这儿，大家都乐了。

一进 12 月，陈曾的电话就不断了，总催问：“想好了没有哇？”可我们让他交钱购磁疗床垫，他却只是一个劲儿地应“我一定买”，就是不拿来。

家乡的房子不能再借住下去，我们在 12 月 8 日把家乡县城的万册书及家具搬到了保定军分区干休所。11 日从保定回北京，一下车，陈曾就呼我们，要我们去和平里龙迪饺子苑，招待我们吃大馅饺子。我们还在犹豫，陈曾看出我们的心思，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看你们还不富裕，我想帮助你们。你们，尤其是珊月，都是国家的宝贝，难得的人才。你们把钱投进来让它每天在运转中升值，你们便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了。你们再考虑考虑，明年开业，把地下室装修好，一定会火起来！”

吃完饭，陈总送我们回家。他动员我们投资饺子苑的话，洒在北京三环路上。

像有一条线紧紧牵上了你，从这天起，他一天一个电话催促我们，让我们感到：如果不按他的意见投进去，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时，我们也闪过这种想法：陈总家有上千万，那廊坊五个饭店，哪天不进几十万元，为什么非要我们这点钱投入呢？可又想到他要好心帮我们，便否定了这种疑问。

12 月 15 日上午两点，陈曾又呼我们，让我们去和平里龙迪饺子苑。他说他要购一套 24200 元的磁疗寝具。这使我们颇高兴，他说了这么多天，终于落实要购床垫了。我们也便决定向龙迪饺子苑投资了。

我们在孟花的办公室见到老陈，孟花却不知上哪儿去了。老陈说：“咱先起草个合作协议吧。”他已胸有成竹，拿起笔来一会儿就写成了“合作协议书”。

他写完拿给珊月，珊月看过又交给我看，我们都没有提出意见，因为双方都没有公章，便说再考虑考虑。

陈总笑眯了眼，露出一一种满意的微笑，让小高开车送我们回家，他要等不知去何处的孟花回来。

四、孟花说，陈总一家对不起我……

本来妻的失眠症因为睡了磁疗垫好了，她这几个月一直睡得很安宁，可因为昨天的合作协议，妻折腾了一宿，大约到凌晨三点，她叫我，跟我说了她一宿想的事儿：“陈总写的这个协议。我越想越不对劲儿。那龙迪饺子苑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吗，咱们投资去装修算什么？不是有个终极产权问题吗？饺子苑黄了，陈总投资了，他可以得那些桌椅板凳，我们的钱都装修在墙面上了，还能揭走吗？还有，他写咱们分利润按 1 和 5 的比例，这根据是什么呀？是按咱投资 10 万，他投资 50 万算的吗？可他那 50 万在哪儿呀？

这可得先问清楚，他得给咱们个投资清单，开头不能稀里糊涂的……”妻想得很对，我也完全同意。我们心里有问号，决定今天便去饺子苑问个明白。

我们已经感觉到，陈总没有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我怀疑他的投资绝没有50万！

作为我们信赖的北大校友，给副省长当过秘书的陈曾，为什么要欺骗我们，不说他的真实投资数呢？他们租用地质局的房屋，关系再好也会有个文字合同，为什么迟迟不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带着一系列问号去了和平里。和平里呀，我们希望和和平乎……今天，当我们记述这段历史时，连自己也感到奇怪：当时的感觉多么准确！那些骗子在骗人时，并非不露出一丝蛛丝马迹，可悲的是我们不去深思！陈曾这位高智商的骗子，从一开始就布下套我们钱的圈套，我们并非没有一点察觉，为什么后来又不去深究，弄个清楚，然后再把钱拿出来呢？后悔药难咽，妻在回想这些时说：“以后我再也不否定自己的最初感觉了。”

我们到了“龙迪饺子苑”，见到了孟花，她眼圈发黑，好像昨夜也没有睡好。

她领我们到她的办公室去说话。

“大姐，你怎么认识的陈总？”

“他和方燕是北大校友，还是在石家庄认识的。”

“你认识陈总的老婆汪荣吗？”

“见过面，不熟。”

她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不知从哪儿开口。

我问她：“你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她说：“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原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专业，我入北大的第二年，从中文系中分出去并入人民大学。我向她打听教新闻的几位教授，她都不认识，可能这些先生也都离开人大了吧。

妻又问：“你爱人在哪个单位呀？”

她沉了一下，说：“他在总参。”

妻说：“我原来在总后……”

地球很小，人和人之间说不了多少话，便能找到有关联的亲近，女人之间，更有她们容易沟通的语言。

“你跟陈总什么时候认识的？”妻把她提出的问题转给她。

她说：“我们合作有几年了……在广州，有我们的公司，陈总现在坐的那个小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为他们家挣了几百万呵！”

她的话，引起妻的兴趣，称赞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有本事，你真不简单，也真不容易呀！你们去广州怎么挣这么多钱呢？”

孟花激动了，向我们讲起她和陈曾的合作。像见到了知音，结识了知心，她倾诉了压抑在她心里的话。过后，我们也不明白，那天她为什么那样激动，竟向她刚刚有一面之交的我们说了那么多话！是她在头一天晚上，受到陈总的什么刺激了吗？据说，头一天，孟花见到了陈总，她想留他说话；诉说一下她独自一人办这个龙迪饺子苑的艰难，说说她内心的痛苦。陈总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了，可到了她身边却接到地质局尤副局长的电话，说要去陈总那儿看他的存留的汽车，想买几辆，陈总便马上跟尤副局长去廊坊看车了，

把孟花晾在一边，好像她根本不存在，这事让她伤心。

昨天晚上，孟花真的没有睡好……

“昨天下午两点多，我们来了，陈总和我们草签了个协议，等你，不知你到哪儿去了，陈总好急呀！”

“他怎么不知道我上哪儿了？胡说！他让我办联系化肥的事了。……我回来，你们走了。他为卖他的汽车跟尤局长回廊坊了。他哪儿是寻我？他是找尤局长跟他做汽车生意哩！”

说到这儿，她忿忿不平，讲起了她和陈总的过去。

“我们在广州的公司，制作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金表，全是我通过总参找的关系，老首长全给开了信。我们的金表，每块优惠价是八千八百元一块，平价九千元，每块金表上都编了号，我后来负责销售，几十万，几百万……都从我手上过的，到头来，我却两手空空，他老陈家什么也没有给我！我不在乎金钱，我要的是老陈的情谊，可他陈家怎么待我的呀？”

“老陈的媳妇汪荣，是个母老虎，她还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呢，什么也不干，就会趴在老陈身上享乐，纯粹是个寄生虫。她整天在那别墅里招一帮人打麻将，赢了钱不要，输了照给人家，就为了能招人跟她玩。她把老陈看得挺严，可她能看得了吗？老陈明面上听她的摆布……他们过的有啥意思？我原来在廊坊跟陈总销售金表，她汪荣跑到办公的地方骂我；我不能给陈总打电话，她听出是我的声儿，就骂我，我能忍就忍了……“他家那大虎二虎更不是东西，纯粹是流氓。大虎在石家庄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耍流氓……是我找关系，把他捞出来的。可那小子就认得钱，什么也不认！我都不理他了。这个龙迪饺子苑，我只跟陈总打交道，他陈家别人我都不沾，他陈家欠我的太多太多了……“陈总办这个龙迪饺子苑，汪荣不知道，大虎二虎也不知道，你们也别跟他们说。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儿上，我出任经理，他家大虎要掺和这儿的事，我就不干了！我不想和他陈家合作了，太让人伤心了……”孟花的眼圈红了，一定有不少难言之隐。

突然，她问妻：“你喜欢跳舞吗？”

妻说：“不会。”

她说：“我在这儿，就是玩，玩个痛快。我晚上都去跳舞，跳个痛痛快快，跳累了，才回家哩。人活着，就得自己找痛快，明儿咱们一块去跳舞吧，可好玩呢。

”

这天晚上我写日记时，想到托尔斯泰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开头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孟花诉说了她内心的痛苦，讲了陈总家庭的复杂情况，看来，表面上过得红火、住着豪华别墅的陈家也有自己的不幸呵！

孟花对陈曾的了解，可比我这北大校友知道得深。从她嘴里，我知道了陈曾的婚姻不幸。

陈曾是从他家乡考上北大哲学系的，那时，他已在农村结婚，媳妇是个农村姑娘，能为他陈家干活，伺候父母。在陈曾上大学时，媳妇生了一个女儿，而这时，他却与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汪荣搞上了，他没有说自己已经结婚，欺骗了汪荣。两个人搞得火热，如胶似漆，在大学期间就有了性关系，以致汪荣怀孕了。汪荣逼迫他必须结婚，不然，就去北大党委揭发他是流氓，玩弄女性。这在 60 年代可是大事，何况陈曾当时已是共产党员。

被迫无奈，陈曾与农村的媳妇离婚而与汪荣结了婚。当汪荣知道原来陈曾家里有媳妇的时候，她痛苦地哭了一夜，心里暗骂陈曾是个流氓，把自己的青春毁了。这样的男人，不知和多少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不然为什么也让我献出童贞？

想和陈曾一刀两断吧，可肚子里的小生命又在提醒她，她这样生下孩子，还能再找谁？她只好跟陈曾结了婚，在大学期间为陈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大虎。

汪荣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怕是她自己的不幸造成的。

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在和人交往中，也相信别人会和我们同样的真诚，我们轻信别人，把别人的话都视以为真。虽然我们多次受骗，却一直无法改变自己的轻信，总想，眼前交往的这个人该不会和过去的骗人的人一样吧，如果人和人之间全是虚伪。欺骗，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对孟花的话，我们都信以为真。

一直到一年之后，孟花离开饺子苑，去向不明，我们做调查了解，才想起这次谈话并非都是真的。在当时，她说假话也可以理解，她有自己的苦衷。

孟花并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她没有上过大学，更不用说是名牌大学，这一点我们已从她以后的行为中感觉到了她没有教养。她的丈夫也不在总参，她也并不是北京人……。

她是石家庄某工厂的工人，原来也有一个家，有一个儿子，后来，不知是妻子先背叛了丈夫，还是丈夫先背叛了妻子。她原来的男人，就是我认识的河北省歌舞剧院女中音歌手惠的丈夫，那年我还在石家庄，住省歌舞剧院宿舍。一天，孟花的丈夫和惠正在床上做爱，被孟花一脚把门踢开，要拉着赤裸裸的丈夫到门外示众。

此事曾沸沸扬扬了一阵子，现在对上号了，原来那个大闹的女人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经理！她离婚后认识了陈总，也有人说，是她先认识了陈曾。陈还给他们夫妻俩撮合过，劝其最好不要离，可貌合神离的日子孟花不想过，婚姻的绳索捆着她也不自由。最后，拖了些日子，还是离了，从此，她便跟着陈曾做起生意来了……他们从事的不光是经济生意，还做着一种感情上的生意，孟花把感情付出给陈总，而当她得到的不如付出多的时候，便失去了平衡，便和陈总闹腾，便和我们倾吐了内心的不平……“为了陈总，我没了家，没有了工作……我还挨他老婆的骂，受他大儿子的欺侮……我为什么呀？他陈家欠我的太多了……”这个女人说的话，让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她和陈曾到底是什么关系？陈曾是否欠下了她的……12月17日，星期六，儿子女儿都回到家——我们住的剧院办公室。我要重新考虑合作协议，也和儿女们商量一下怎么办。

关键还在于谁去参预经营。女儿说：“我们家都不懂开饭店，咱们自家人不去亲自经营，赚钱不赚钱还不是听人家的？没人去管，不如不投资保险点。”

儿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据说，别人都在寻找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儿子到今天心里也没有底，他的工作父母还得操心。女儿也说：“该联系工作单位了，现在大学毕业还不如爸爸那时候呢。那时候如父母包办婚姻，一切听组织分配，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可分配到哪儿，慢慢适应了，也像夫妻一样，慢慢有了感情，也不错！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让我们自由恋爱，

自己去选择对象，双向选择，还不如爸爸那一代省心哩！你看吧，下半年的课没法学了，全都忙于找工作了。”

我们上哪儿为儿子联系工作？

突然想到眼前这个饭店。儿子找不到工作，干脆让他参预经营管理，也可以锻炼一下他。因为家里困难，儿子上大学期间，给人家当家教，给杂志社编稿子、抄信封，给礼堂放录像、放电影……他倒愿意搞经营。知子莫若父，我知儿子性格犟，不善人际关系，幼稚天真，是不适合从政的，他的这些弱点也全是我的“遗传”。当年我在长影，领导曾有意把我做“接班人”培养，我自知不适合，还是要求搞业务了。张天民当年就说过我：“你若是当外交部长呵，都得和咱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是最合适的评价。儿子这点和我相近，我们和儿子说起自己参预经营饭店的事，他也含糊他说：“找不到工作，我可以经营饭店……”下午，原想去和平里，可陈总、孟花先后来电话，说不在龙迪饺子苑，儿子便回学校了——原想领儿子去看看的。

12月23日，周六，陈总呼我们，让去和平里，说今天把合同确定下来。我有疑问：他急切地要我们把钱投入饺子苑，而他说好要购的磁疗床垫为何迟迟不交钱呢？

我们到了和平里龙迪饺子苑，见孟花和陈总正说合同的事，让我们奇怪的是，陈总的大儿子陈大虎也来了，说是看看，找人帮助装修。妻问孟花：“你不是说不让他家大虎知道吗，他怎么来了呢？”

“他来了好，他有开饭店经验，帮咱参谋参谋，还找人给装修呢！”孟花今天眉开眼笑，一扫那天的阴云，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让人惊奇，比方演戏，从悲到喜，快速变脸，没有过渡。

这是怎么回事？

陈总拿出了修改的合同，让我们看了一眼，上面写了几条，很简单，我只记住，把上回说的我们投资占1/5股改成了我们占1/4，说共同投资40万组建龙迪饺子苑。陈曾开始说他投了50万做注册资金，上次写合同，又改为投了40万，这次又变成投资30万，陈曾到底已投资多少？

孟花拿走“合作协议”，一会儿便打印回来了，一式两份，让我们仔细看看。

合作协议书

甲方：龙迪饺子苑

乙方：三月保健品经销部

一、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四十万元，乙方投资人民币十万元，共同组建龙迪饺子苑，合作期限五年。

二、甲乙双方利润按股分成，风险共担。

三、甲方、乙方在饺子苑就餐享受80%优惠待遇。

四、甲乙双方组成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由甲乙双方推荐任命总经理。第一任由董事长孟素花兼总经理。

五、为了合作开拓业务，甲乙双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应互相支援。

六、合同终止，由双方议定，任何一方无权撤销合作协议；一旦终止，按照股份处理所属甲乙双方的财产。

七、未尽事宜双方议定。

甲方：北京龙迪饺子苑（章）孟花（签字）乙方：三月保健品经销部

珊月（签字）孟花拿过钢笔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看一眼眯着细眼的陈曾，他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珊月签下名字之后，才觉出不对劲儿：我认识的是陈曾，是你说这是你的饭店，你让我们与你合作，为什么在这合作协议上没有你的名字呢？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孟花，是你把我们介绍到这儿的，我应该和你陈曾签协议，怎么都成了孟花，孟花又是董事长又兼总经理，她投了多少资？不是你陈曾投的资，她只为你打工吗？

珊月把这问题提出来了，陈曾又笑眯着眼睛，把打印的一份协议书拿过来，把“第一任由”四字勾掉，在董事长后边添上他自己手写的“陈曾”，把孟素花兼总经理的“兼”字勾掉了。

我们觉得这么几条大空泛，应该有个具体协议，陈曾立即提笔，在第四条后边加上了“另有具体协议”一句话。

协议书的日子却仍是上次写的 1995 年 12 月 15 日。

还有什么话说？反正还要订个具体协议，就这样吧！

孟花给坐在桌边的大虎递个眼色，大虎说话了：“按说，我没权发表意见，不过，我愿把孟大姐的这个饭店搞好。我看了看周围环境，我看不错，一天七八千的营业额没问题。北京的客流量大，再把附近的机关单位联络好，把地下餐厅装修成高档的包间，一天万元的流水也没多大问题！一天有 3000 元的纯利，一个月九万，一年九十万不会有问题……不过，既然是大家投资嘛，有利大家得，有风险得大家担，也不能总想得利，如果亏了，你们的投资也就会消失，有了债务，还得大家摊呢！”

陈曾打断大虎的话，说：“开饭店怎么会亏呢？不可能亏的。

怎么样，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一块吃饭去吧！”

妻看看我，我想起陈曾答应的购磁疗床垫的事儿，就问：“陈总，你买的单人磁疗床垫一套是 24200 元，什么时候交钱哪？”

大虎说：“爸怎么能买单人的呢，让我妈在哪儿？要买，就买双人的。”

妻说：“你看你这儿子多孝顺，总是想着他妈。怎么，要买双人的？那就是 31100 元。”

大虎说：“大姨不得优惠我们哪？”

妻说：“可以优惠你 9%，算你们 28000 元，一个双人床垫加一个磁疗羽绒被。

”

大虎说：“就这么定了，买一套双人的！”

孟花领大家去就餐，她今天高兴，许是觉得老陈一家对得住她了吧！

五、“什么合同、协议，其实全没有用”

古人对善良的百姓有一句警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受骗被坑，全在没有防人之心！

陈曾对我们行骗，我们并非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可总以善良之心想：陈总能坑我们吗？总替他找不能骗人的理由，总原谅他一次次的不说真

话……订合作协议的那天，妻就问过：“陈总，你说投30万，那钱在什么地方呀？”

陈总不假思索地回答：“购餐具、桌椅、炉灶具，装修这上面，我已花了二十多万，下面装修我还要再投十多万哩。”

听他这一说，他投入近四十万了。

“陈总，你把装修的费用拿给我们看看嘛！”

“好说，孟花，你把那装修结算表给珊月。”

孟花向陈总递个眼色，陈总走出里屋，到外间屋去了。我听到两人小声嘀咕：拿这张吗？没关系，给她看看……（好像有不同的表格，在决定拿出哪张给我们看。）一会儿，孟花便拿出几张复印好的不大清楚的装修工程决算表来，可看抬头，写的却是“地质局”。珊月又问：“咱们租这房，要交租金，有没有租房协议呢？”

陈总和孟花又小声嘀咕几句，孟花打开抽屉，取出了打印的“房屋租赁合同”来。

出租方：地质局机关服务公司

承租方：石家庄市龙雨工贸有限公司

第一条：出租餐厅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七区七号楼北侧，为新建里外装修设备齐全中高档次餐饮业用房，面积376平方米（其中餐厅184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192平方米）。

餐厅配套用房七号楼11单元001号半地下一居室一套，面积45.5平方米。

出租方投资六万元，用于购置餐厅设备、用具，提供承租方使用，所有权归出租方（双方存设备、用具清单）。

第二条：租赁期限为三年……

珊月看完第一条便提问：“地质局提供给我们的是装修好的设备齐全的中高档次的餐饮业用房啊，怎么还投资装修呢？”

这个问题让陈总有点慌乱，他忙解释：“他们装修的不合适，我又改建了，这儿的卫生间、门口、上面的霓虹灯……都是我重新装修的……”孟花与他一唱一和：“是啊，他们原来装修的不能用。”

大虎也说地质局原本没有装修好……

当时就觉出这里面有假，陈曾跟我们说瞎话，却不好意思当场揭穿：这合同上明明写着甲方投资6万元用于购置餐厅设备、用具，你怎么还说投钱买餐具、桌椅？

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不好意思，咳！如果当时钉是钉，铆是铆的把这些搞清楚，陈曾的骗术早就露了马脚，怕也不会有后来的麻烦了。

回到我那小屋，把他提供的“装修结算表”仔细看了，越看越有问题。这里全部投资不过9万元，还是在与孟花订合同前的花费，肯定是地质局付的款，怎么成了他陈曾的投资？！

就凭这一条，我们就不该把钱交给陈曾。

第二天，妻早早就醒了，大约三点左右吧，她说：“咱可不能把钱交给陈曾，要让他给咱单独立一个账号，咱把钱投到账号，然后再往龙迪饺子苑投，咱好主动；再一点就是一定要先查清他到底投了多少，要把这儿以前的账目清理好；咱若没人参预经营，就让经理承包，每月报账，三个月一结算……”妻把事儿想到了，我干脆起来，草拟一个补充协议，以免过后忘记。

妻问我：“你说陈总能不能坑咱们？”

我说：“他是北大校友，又给领导当过秘书……我看他不会坑我们。”

妻说：“他家趁千八百万，怎么非让咱拿钱呢？他不该缺咱这 10 万哪！”

妻以女人特有的敏感看出他和孟花的关系暧昧：“我怕他是拿咱的钱还孟花的感情账。若真是那样，可就把咱坑了！”

我说：“那咱们跟陈曾说清楚。”

12 月 28 日，星期四，我和妻起大早赶到海户屯长途汽车站搭上八点去廊坊的班车，九点多就赶到了星星酒家，顺利地见到陈曾。

让小孔给开了个房间，我们想和陈曾坦诚地交心。

“陈总，你和孟花什么时候认识的？那天，孟花跟我们谈了半天，你是不是欠下人家的了？她现在独身一人……她说是从认识你之后，才和丈夫离婚的，对吗？”我们说话直截了当，直入主题。

“……说起来，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我还当北方大厦的总经理时，便有来往……她有事找我，我这个人做人的原则是能帮助人时尽力帮助。有一天，她找我来，说她不能和丈夫一块过了……说她丈夫和歌舞剧院的演员搞上了，让她堵住了！说着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劝她冷静处理这种家庭矛盾，不要把婚姻理想化，世上有多少家庭婚姻是百分之百幸福的？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你们有了个男孩，为了孩子，能不离还是不离。我劝她，她哭得更厉害了，那样子也怪可怜的……我安慰她，她疯了似的一下扑到我怀里，这时不巧有人推门进来，就风传出去了。我也不去解释，这种事不能解释。其实，我跟她什么事儿也没有……她离婚了，又辞去了棉纺厂的工作，我们后来合作搞毛主席百年诞辰纪念金表……她很卖力气，本来销售得很好，谁知出了麻烦，现在这场官司还没有完，她也没有得到多少。

不过，开头我向她说过，我照顾她的生活，不让她犯难，她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们还听到了什么？她怎么说我的？她的话，你们别信，我什么也不欠她的。”

也许是我们问得突然，他不知道我们听到了什么，才这样说出他和孟花“没有什么”的关系。其实，我们对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不感兴趣，只是担心我们的投资会让陈总还了他的感情账而已。

他的解释反而加深了我们的担心，他的声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那天孟花还说，陈总对不起她，她给老陈奉献的多，可还不如他对待河北电视台那个节目主持人玲玲！老陈给她做高档衣服，还在廊坊给她买了别墅……可人家到了还是去美国了，把老陈给坑了！老陈在北方大厦被免职，其中有他和主持人关系的问题，据说这是老陈的老婆汪荣给揭出来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看来老陈在女人身上是真敢投资！

“老陈，你不欠孟花的感情账最好，如果你欠她的，用别的 171 方式，从别的地方去还她，可不要拿我们投资饭店来还她。”

“我们想了个具体协议，你看看，”我把写的草稿交给老陈。

他看了一下，便连说：“可以，可以，我让人复写一式两份。”

没想到他竟这样痛快地答应照我们草拟的协议去做。

复印完，陈曾在甲方的下面签上“陈曾”两个字。

具体协议书

根据双方已签协议书的精神，拟具体协议如下：一、甲方以“龙迪饺子苑”（暂名）之名为乙方建立一般银行账户后，乙方将资金投入账户。

二、协议签订前，甲方提供在合作前与某工业地质局机关服务公司及有关部门的合同协议，各复印一份交乙方存档。

三、清理合作前资财账目，确定甲方已投资的实际金额。

四、确定投资项目，需先提出可行性报告及预算方案，经董事会研究，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五、总经理需每月向董事会报告经营情况，每季度结算分红一次（季度末 30 日结清），年终决算。

六、合作第一年度为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1996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年度应在收回双方成本基础上纯利不低于 50%，以此标准为承包总经理的承包底数。超额部分除聘任工资外，奖励由董事会决定。第二年度后根据经营状况另定。

七、甲乙双方确定企业名称后，由工商局更名。

甲乙双方签字

1995 年 12 月 28 日

有了这个补充协议，觉得万无一失了，心里踏实了，以为有了文字的东西，便是实际的可靠的，这是书呆子的习惯心理、传统观念，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实不知生活可不是这样简单。

不要小看以上的六条，那是我们夫妻俩认认真真讨论了两天两宿的结果，是我们的精心作品，绝不比我写剧本，写小说，写诗歌费的脑筋少。可在一年之后，当陈曾说那是一张废纸，毫无用处之后，当我们的律师也宣布没有用之后，就像我们精心创作的作品被宣布不能排演，不能出版，不能发表一样的伤心！陈曾当时就知道这个后果，却煞有介事，装作认真的样子，也让我们更加认真。这是在耍弄我们——所谓知识分子的无知！老陈，你真是够损的了。

签完字，他把一份装入口袋，说：“你们抓紧，把钱打过来吧。让孟花给你开个新的账号，以后按季度分红，把钱投入你的账户好了，我要让你账户的钱越存越多！”

“陈总，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做，我们才放心，才把钱投给你，我们可不认识孟花是谁呀！”

“放心，没错！我不会坑你们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和平里，陈总带着大虎赶来了，还带着一位装修设计师，说话天津口音，曾给大虎的星星酒家搞过装修。大虎拉他来可以得中介费。设计师去看了地下人防工程，丈量了实际面积、尺寸……他要画出装修的设计图和气氛图。

陈总催促孟花，快去给珊月办一个银行账号，以便把钱打过来。

孟花说：“咱们的账号开得多了，银行不让，要清理呢。”

陈总瞪她一眼，说：“那也得想办法开个账号！这点小事还办不了？”

孟花说：“建这个账号得交一万元哩。”

陈总看看珊月说：“咱要入十万哩，一万元算什么！那你去取几万先入账号，让小高跟你们去取款吧。”

孟花说先去银行办办再说。

“办这些财务的事，应该有会计去办，怎么还没有会计呢？”

“这怎么管理账目？”我说。

老陈说：“有哇，那是聘任的，因为家里有孩子，她不常来，反正现在

是试营业，也不忙，等装修好正式开业，会计、出纳都要有。咱们按大饭店的规矩，厨房有厨师长，他管买菜，多少鱼、肉、菜出多少盘，都是有规矩的，这你放心，准错不了。时间就是金钱，当前要抓紧装修，争取春节开业。方兄，你可以把文化界名人、艺术家、作家……都请来，把它搞隆重些。要搞些活动，争取新闻媒介宣传一下，要打出知名度，这就是钱！去年春节，我星星酒家拿出几万元搞了台晚会，请来歌星、笑星，市领导都参加了这个晚会，都知道是我们赞助的。我表面损失了几万，可暗中得的效益要比几万元大得多……”老陈为我们描绘了这个饭店的辉煌前景，这一幅图画是够吸引人的：“这儿要办成一个高雅而有文化层次的饭店，搞文艺茶座、京剧茶座，珊月可以主持这一摊。这儿也是艺术的排练场，方兄写戏，我投资，可以在这儿排……今后，你们作家有什么小型活动，都可以在这儿举行。地下室装修好，设一个磁疗间，可以推广日宝来福的磁疗床垫……”谈得正浓，孟花回来了，脸沉着，不大高兴，说：“要过年了，新账号不办了，明年再说吧。”

陈总叮嘱，过了年一上班就办！

再过两天，就是 1996 年了。因为有希望在前指引，也由于对陈曾的信赖，此刻我们的心很踏实。我想：新的一年会比 1995 年有更大的发展，我充满信心。饭店搞好了，我们就不必像 1995 年传销日宝来福磁疗床垫那般劳苦了。过去的一年，我们从北京到石家庄、保定又飞海城、呼和浩特、天津，妻去长春、哈尔滨……跑了多少地方，流了多少汗水，讲了多少遍课……不过还应该感谢张力克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事业，虽说有不少风风雨雨，最终还是以胜利告终，没有一年的辛苦，怎么换来这十万元的财富！

十万元意味着什么？

我们工薪族都可以算算，多少年才可以拿到十万元呢？

1995 年就说要给我家新房，我预测到这年年底该迁新居了，然而却“望楼兴叹又一年”，仍没有音讯；不过，我们心里有底了，分房时要交钱，而我们不用去借了，我们已有了十万元！

我们是想有了生存条件，就要求发展，妻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要在舞台上演一出自己的戏，我则要专心写我酝酿多年的大悲剧《杨继盛》了。

今年，我要写副什么对联，作为对自家的预测和祝福呢，我想，1996 年总该安居乐业迁入新房了吧？

我想，1996 年我该安定下来，写我想写的作品了吧？

1996 年，我们还想到国外旅游，最低该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走走……1997 年香港要回归祖国，我们该去香港多逗留些时日，写“回归前夕的香港”……这一生还没有出过国门，有权的官员可以用公款出国，以考察之名进行旅游；作家代表团又一直没有给我个机会，便自费出去吧。

新年伊始，我们想得多美！

于是，我买来红纸，写下新年对联：

上联：望安居求乐业鹏飞寰宇

下联：人安定心宁静方创辉煌

横批：水到渠成

1996 年 1 月 3 日，一上班，妻便从存折里取出两万元，我们一同跟孟花到银行立账号。不知何故，和平里龙迪饺子苑没在附近银行立账号却跑到和平门的中国银行办理。看来，孟花和这儿比较熟，她找到那个负责人说再

立个账户，立即同意。

珊月先交上一万元现金，送过一个卡片，上面留下“北京龙迪饺子苑财务专用章”和珊月的私人印鉴，说必须两个印鉴俱全才可以取款，否则，任何一方也取不出来，这是互相制约。

还有一万元现金，本该存入账户，但孟花却说：“不用存了，那还得转账，怪麻烦的，咱们装修马上就要用款了，你交给我吧。”

珊月顺从地把一万元交到孟花的手上。

“你给我打个收条呀！”珊月提醒她。不说，她似乎忘记了。

孟花拿出一张纸来，立即提笔写下：“今收到人民币壹万元整孟花”，然后盖上龙迪饺子苑的红樱珊月把收条收起了。

孟花把款放进她的黑皮包里，出门“打的”走了。

大虎找的天津装修设计师已设计出图纸，一核算，要价太高，辞了。又换了别的装修队来设计，但需要交购置材料的款，陈曾便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珊月，要我们快把款打入龙迪饺子苑，不然就要误了装修啦！

我有点奇怪：怎么只等我们出钱，你陈总为什么不投入呢？

珊月在电话里说：“咱们的协议得实行，我们已经把二万元交到龙迪了，可你答应购买床垫为什么还迟迟不交钱？”

陈总说：“这几天现金紧一些，我说一定买，你先把钱垫上，你们到廊坊来我还你，还不行吗？这几天我过不去，你们抽空来吧。合同呀，协议呀，怎么订都好说，要紧的是你们先把钱打过来，好抓紧装修，一开业，马上就来钱呀！”

看来，陈总急的是我们快把钱全拿出来，可我们说不出什么原因，总感觉不踏实，他越急，我们越不安……这种说不出的感觉，被后来的现实所证实。他对于订合同、签协议并不当回事，后来，他明确说了：“什么合同、协议，其实全没有用。”现在我才明白，这些文字不过是骗你上钩的玩意，是应付你的。

可我却傻呵呵地还在琢磨怎么使合同完善呢。

六、做梦犯小人

我去西四新华书店，不再去看文学艺术之类的新书，而是直奔经济管理类的书架，找寻有关饭店管理方面的书。嗨，还真有几本，厚厚的，翻开看，全是那星级饭店适用的，什么客房部、餐饮部……没有一本讲开中低档饭馆的书。街上那么多家中小饭馆，应该有这方面的书供应人读呀！可又一想：人家哪家开小饭馆的是从书本上学的？

龙迪饺子苑这名字一定要改，为什么叫龙迪，土不土洋不洋的，当初咋起这样的名字？叫什么名好？得新鲜，有特点，让人容易记祝饺子苑，小气，人家不想吃饺子呢？装修之后，包括美食、保舰康乐，应该把这内容包容进去才好。起名，是个大学问，所以有了起名公司，专给企业、个人起名字的。有“难得糊涂酒楼”，有“咱家的餐饮馆”，在白沟，还有个“上一当饭店”，好赖都有特色，名字一定要起好，妻是京剧演员，她主演过《沙家

滨》，曾走遍大江南北，据说已有了“沙奶奶饭店”，我们何不叫个“阿庆嫂饭店”？当年她开春来茶馆并不想赢利，只是为革命工作做奉献，是党的交通站。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虽然客户不少，若在今天看，也赚不了多少钱。开茶馆没有多少利，你看街头有多少茶馆？“大碗茶”办成了公司，那也是有其特殊原因，还是从开茶馆改为经营饭店吧。我说出这名字，女儿首先反对，她说俗气，不如叫“贵妃饭店”哩，如今讲革命传统少了，阿庆嫂已不如过去吃香；而贵族呀，帝王呀，富豪呀，那些被“革命”过的，又都回到了这块曾是红色的土地上了。只要沾上皇宫贵族，什么宫廷御制，甚至大恶霸刘文彩吃过的，喝过的，都有广告效益，都能赚钱，还是叫贵妃好！况且妈妈不仅演过“阿庆嫂”。“李铁梅”，她也演过“贵妃醉酒”呀！

一开始和陈总商量名字，他是怎么说都好，都没意见，并要我们快点想好，多动点脑筋；可若真叫他改名字，去到工商局申请，他却不急了。马上就要装修，要制作霓虹灯，不确定名字怎么做？

我们去廊坊和陈总商量这些事儿。

到廊坊“星星酒家”已十二点，陈曾安排我们吃饭，向我们介绍新任的经理王先生，大学毕业，学经济管理的，辞掉了铁饭碗来到这儿，要和陈总一起“干一番事业”。他很谦恭，听说我们是投资者，便更加恭敬。他跑前跑后，安排上菜，挑选饮料……吃饭的，人不少，旁边两大桌大概是吃支票的。给我们的印象是：陈总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了。

吃过饭，我们一同回陈总的大办公室，正要谈事儿，却跟进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南方口音，他自我介绍：“学生是从江南到北方的，见你这儿紫气笼罩，是兴旺之兆，特冒昧进来，学生愿献给老板一卦……”我大为惊讶：怎么算卦的走进企业家的办公室了，问他是怎么回事？

算卦的年轻人说，他是跟师傅学易经卜卦的，师傅让其云游各地实习。卜卦均不收费，只有一个要求：如果算的灵验，到年底请写信以告，他留下地址，说这算是他的实习成绩了。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陈曾在大学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也对易经略知，便和算卦人攀谈起来。

问：“你说易经是谁的著作呀？”

答：“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为易之四圣，易经为四圣人所作。”

问：“什么是易的哲学呢？”

答：“天地万象千变万化，一阴一阳谓之道，考察此变化之理，便是易的哲学。”

问：“那请你说说这八卦是怎么来的？”

算卦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天地万物总称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天地万物都在阴阳二大类之中：天地、日月、男女、上下、高低、刚柔、动静、寒暑，大容宇宙，小至微尘，运动变易，全是阴阳消长之理！两仪生四象，即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如春夏秋冬四季。这四象中各有阴阳，不是八卦吗？这八卦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以天地现象之物代表，即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先生，学生说得可对？…陈总笑了：“不错，你背得很熟。”

算卦人说：“那我为先生算上一卦吧。”

陈总连连摇头，说：“我自己会算，不用。…我倒想听听他如何算命，便极力鼓动陈曾：“你这北大哲学系的，不一定能算自己的命运，还是让他

献一卦吧。”

陈总说：“他越会算，我越不算，我不能让他先预测出来，那样就没意思了。”

”

算卦人摇摇头说：“非也，早知吉凶祸福，便可去凶趋吉，避祸招福！先生学问大，当知凡事一旦为之，必有业报，运即搬运，依过去的善恶，搬出今生之祸福，先生多行善事，自有善报，不算卦也便自知未来了。”

我对算卦人这些话颇感兴趣，加以称赞。

算卦的年轻人便要主动送我一卦，我不大相信他的六爻，便说：“你看看我的手相吧。”

我伸出手去，男左女右。

不是看婚姻、事业、寿命三条所谓命运线吗？他说不是，他是按“神相全篇”来看的。他端详一会儿说：“好手相，好财运”，并预测道：“你有贵人相助，今年要发财的。”

我说：“我的贵人就是这位陈总，你是真看的手相，还是看的面相哩？”

算卦人说：“今年年底见分晓，便知我看得对不对了。”

一个东北女孩进屋，听说算卦人在这儿，她要求一卦。她是自己独身跑到廊坊谋生的，命运坎坷，想找算卦人说个出路。她来星星酒家不到10天，怪不得不认识她。

我们不听他算卦了，走到外屋谈话。

珊月说：“账号立了，我们已投入二万了。算卦的讲话：我们要有贵人相助，你是贵人，贵人多忘事，你答应办的事可不能再忘了！”

“忘不了，你不是说我买床垫的事吗，你们给我快买了吧，我去车时拉回来，用好以后我一宣传，买的人就多了。”

“钱呢？你什么时候交款哪？”

“这一阵现金周转不开，这样吧，你给我买了，就算你们的投资，这样不行吗？除去我买床垫的钱，你们再把现金拿过来，咱们好装修营业。”

“咱这饭店的名字得快定下来呀！”

“这名字还真不好起，你们多想几个，我也考虑几个。”

“还有好多事得商量，孟花当经理，她要有承包方案；你们前期投资得清理，若从今年1月1日算起，以前的账目要截住，你们原来的盈亏，我们不能管，账月要让会计交待一下……”我们提了一系列要办的事，陈总说：“我明天去北京，咱们再一块商量，好吧？”

今天看来定不下什么，我们只好回来了。

第二天（1月10日）下午，孟花电话说，陈总要过来了，让我们去和平里，可待我们挤车赶到之后，孟花却说：“陈总来电话，今天又过不来了。他说，他的双人床垫要你们给他买了，他来车时拉走。”

1月12日，我们去交道口菊儿胡同日宝来福服务中心。这儿很冷清，没多少落单的，和去年此刻不能相比，和去年7月那个疯狂的月份更不能比，那时电脑小姐面前排大队落单购货，货场取不着，为取货排队打架……你说中国人穷吗？那一万多二万多元的磁疗床垫竟疯抢，而今，电脑小姐在台前闲得看起书来了，怎么说冷便冷到这个地步？这里边有什么规律？墙上又贴出一张通告，说在1—3月业绩做到100万的专卖店，可以免费参加亚洲大会，可以去新、马、泰走走。如果是去年夏天，这是可能的，今天，做一百

万的业绩可太难了。

见我们来落单，还是购双人的，引得店长狄勇走进来了，说我们不错，还在继续这个事业，他不知道，这二万多元是我们从自己的储蓄里拿出来买的，那客户没有拿钱，这在我们来说，可是第一次，在日宝来福购货的客户中也是少见的。

还能火起来吗？狄店长说：“我们心里也急，过去一天几百万营业额，现在才几万，不够交房租的！扛一段吧。三月以后，我们请赵明明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那以后也许会好起来。”

我落完单，还要去华夏银行交款。从这儿乘 104 路到灯市口，填单交款，拿上有华夏银行印鉴的收款单再回交道口菊儿胡同服务中心开提货单。小姐已打通电话，双人床垫有货，我们便去南城海慧寺仓库物流中心去取货。如今这儿也阔气了，四楼是装潢豪华的办公室，可买卖却冷清，服务是微笑，不似去年那提货的净吹胡子瞪眼……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从仓库取出货来，从电梯送下来，交给我们出门证。我去外边雇车，送回我的住所……这一切，花了我们两口子半天的时间！

1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陈总到了北京，呼我们去和平里说是搞装修和安电器的来了，要我们一块商量。

一介绍那负责装修的人，我好面熟。这脑子坏，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在哪儿见过呢？

那人和我握手，说：“见过见过，我在作家协会文采阁听过你讲磁疗床垫，你还让我上去躺了一会儿呢！”

噢，想起来了！是在那儿让他试验过，他从床垫上下来，连连说不错，可以后却不见他了。

他递我一张名片：张德泉。这名字咋也这么熟？还是他提醒我，他原来办《中国开发报》，当副总编，这已是三年前的事儿了。那时，我到《中国开发报》去，想合作编辑中国企业家的报告文学集，组织作者去写企业家，写谁收谁的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和张德泉的合作却没有进行下去，什么原因，忘记了。不久，老张离开副总编的位子，自己办起公司，搞起霓虹灯厂来了。

另一位是搞灯光音响的，属于电器方面的专家，一介绍，方知也是北大校友，叫王成璞。他说是为北大校友帮忙而来，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职称是高级工程师。他六十来岁了，一双审视四周的大眼如他搞的灯光照射四处。一说是北大校友，自然亲切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以家属的名义起的执照，自家办了个公司，搞灯光音响。他的公司租用的是张德泉租的房子，二人成了近邻，所以一块来了。

张德泉认识陈曾更早。

都是下海人，在大海里相遇。

张德泉、王成璞同我、珊月一块儿看了餐厅的楼上和地下室，商量装成什么样子，在哪个地方安装电视机，如何留出线路。本来楼上应该有一台电视，给客人看新闻也是必要的，可孟花说，楼上不要，怪吵的；地下室么，她要留起一间搞美容美发。她已和派出所一个副所长的夫人说好了，夫人是搞美容美发的。我们都觉得，地下室里又是餐厅又是美发，不大适宜。我和妻主张留一个磁疗间，给客人保健用，这倒是必要的。可是分歧很大，谁也不服谁，陈总也不说话。

说起霓虹灯，孟花说，张德泉上次做的“龙迪饺子苑”五个字不够尺寸，我上去亲自量过了，所以不能照原来说的付款。张德泉坚持说保证够尺寸，这是用电脑放大的，两个人争吵起来。

当时我站在孟花一边，对张德泉说：“既然孟花已量过了，上去再量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张德泉生气地说：“我这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给你们帮忙，不然，我不给你们办。霓虹灯款下次来一定结清，你们说话不算数，拖了几个月了……”陈总指指珊月说：“你放心，这一段的确钱紧，这不，投资的来了吗，下次一定给清。咱们吃饭去吧！”

我们去吃饭，今天是一大桌。

陈总对我们说：“过两天把款带过来吧，装修队等用哩。”

“1.24”——“要尔死”，这是个该诅咒的日子！

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一股狂风把我抛到天上，又摔到茫茫大海里，是黑夜，没有光亮，没有船只，任巨浪拍过我的头顶。我想大喊，却呼不出声音，而这时候，却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大浪把我推到岸边，见海滩上躺着一个光屁股小孩，我走过去，真奇，那个婴儿竟会叫我的名字，说：“你救救我吧，我爸爸是个传销商，被抓走了，让我跟你吧。”我抱起他来，要去找他的妈妈。他说：“我没有妈妈。”

我抱小孩来到一个大市场，花花绿绿的小孩衣服挂在树上，我给小孩买了衣服穿上。这小孩穿上衣服，就从我怀抱里挣脱出来，怪了，他一眨眼竟会跑了。他跑入人群里不见了，我喊，我寻找我的孩子，不见影子，脚上却踩上了人屎……这时刻，人群中大乱，喊叫：“日本鬼子包围了！快跑吧！”我扔不掉沾上臭屎的鞋，怎么也跑不动。我大叫，大喊……喊出声来，我醒了！

妻被我喊醒，问：“你叫什么？”

我出了一身冷汗，梦中情节还记得清楚，便向妻回叙了梦境。

妻说：“你这梦不好，犯小人哪，还有饥荒（欠别人钱亏空，我们家乡叫有饥荒）。”

这是根据民间习惯的圆梦说，做梦遭到光身小孩叫犯小人，即遭坏人算计；碰上屎，脚踩了，便是要欠债了。

我不相信这些圆梦说，纯粹是胡说八道！街头上出卖过非法印刷品，叫《周公解梦》，是讲梦见什么，在生活中就要出现什么事，里边竟有梦见飞机会如何如何，几千年前的周公竟知今天的飞机，岂不是笑话！

西方的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家的名著《梦的解析》，说的倒有一定的道理，它把许多梦都从“性”上找原因，那我这个梦，也和性爱压抑有关吗？去它的吧！不去想这个梦了。

我是喜欢做梦的，老了，做梦便成了我睡眠的标志，每睡必有梦，噩梦多，好梦少；年轻时，常常在梦中笑醒，而今却常常因噩梦中的喊叫而惊醒，这大概和我的心脏不好有关吧。

我想人生短促，你不做梦，只是活了一生，我每夜有梦又在梦里增加了一个梦里人生，比不做梦的多活了一倍，岂不是好事吗？

我更喜欢噩梦，不喜欢美梦，不像年轻时了。因为“噩梦梦中喊，喊醒庆幸是梦；美梦笑醒后，心中反怅然”。

把噩梦说破，就“解了”，今天会成个好日子！

妻说：“吃了早饭咱取钱吧，不要让陈总再催了。”

我同意。银行利率下调，就是说国家不支持你存钱，鼓励你把钱取出来在市场上流通。可多数居民因为消费不出去，又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所以还是存入银行的多，贬值就贬值吧，总比在自己手里放着好点。老百姓手里的钱真不少！工商行、城市合作银行、农行、建行，哪个银行的储蓄额都在飞速上升……我们去阜成门工商行，存钱的人排长队，取款处人不多。我们拿出存折，填取款单，那小姐见是5万大额，说：“你们没有提前说，我们这儿不能取，你去西四银行吧，那儿保证可以取出来，对不起了！”

只好去西四工商行了。

取出5万元装入书包，我们放回家里，纸包纸裹，压在被子里了。

女儿从北大回来了，要她的生活费，管妈要，妈说跟你爸说。我说，这才是24号，离下月5号发工资还差10天，给你的300元就花完了？女儿不高兴我的问话，坐在床上，向我报账：“这个月交往多，有几个过生日的都要花钱的，你算算，我这一个月300元够吗？我就够节省的了，不信你去学校了解，哪个女同学一个月不超过300元呢？”

两个大学生，若单凭我们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过700元，怎么能供得了？我们是每月每人300元，交给孩子，只剩下100元了，我们还生活吗？这也是逼迫！我们非做点事不可！对两个孩子，我们是严格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乱花钱的，我们给的钱少，却同时给了他们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女儿坐在磁疗床上，在她身边的被子下边就有5万元人民币……那是准备给陈曾的，不是给女儿的。

陈总呼我，他的车马上就到我家。

一会儿，陈总和司机小高一块上来了，我们一起把那双人床垫抬下去，放到公爵王的车后边。

妻从被子里取出纸包，说：“陈总，你可知道，这是我们准备买房的钱，你可别坑我们哪！为取这钱，我可一宿折腾，我给你，是对你绝对信任，知道你不会坑我们，才给你的呀！”

妻托着这纸包，心也托在上边了。

陈曾接过去，打开，是银行封好的五叠。

“你数数吧。”

“不用啦！”

“刚才女儿要生活费，我们都没给她。”

“一个月给女儿多少？300，太少！”陈曾从一叠钱里抽出5张一百元的，说：“以后，每月给女儿加500元，算是陈叔叔给的！”他把500元递给女儿，女儿不接。陈说：“你拿着呀！让她拿着。咱们再省，也不能让孩子困难哪！”

妻说话了：“算陈叔叔给你的，谢谢吧。”

“谢谢陈叔叔！”女儿这才接过这500元。

女儿回北大了，我们跟车去和平里。陈曾说：“你想想，我能坑方兄吗？我们是北大校友，坑了你们，我还有脸见北大同学吗？你一百个放心！”

珊月说：“我敢情是不放心呗！”

陈曾说：“交给我你若不放心，这世上你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他说得真对，我们当时对陈曾真是放心，一丝一毫也不怀疑，他家大业大，是千万富豪，还能坑我们这10万元？人家拔下汗毛也比我们腰粗哩！因为绝对放心，把钱交给他，连个收条都没让他开呀！这是疏忽吗？

这不该有的疏忽怎么会发生？当年，兰英借给她的老同学王庆一万多元购磁疗床垫时，我们还提醒兰英：“你得让他给你写个收条呀！”兰英照我们的话做了，那个巴掌大的收条后来在发生纠纷时，真起了重要作用。可我们叮嘱别人的话，自己却忘记了！

这全因为对陈曾有超乎寻常的信任！

陈曾，你拿走的不是 5 万元现金，你拿走的是我们的真诚的信任，是我们的坦诚的心！

你把我们为你辛苦购来的双人磁疗床垫、羽绒被拉走了。

那何止三万元呢？我们也没有让你开个收条。如果你还有良心，你回想一下，我们给你钱时的情景吧。

· 车到了龙迪饺子苑，陈曾说等张德泉找装修队来把款交了。

不知为什么，张总——人们的习惯称呼，因为他是德华经济贸易开发总公司和北京蓝光霓虹灯制作中心的总经理——却没有来。

陈总也不知有什么事，他要先离开，安排我们在这吃饺子……我们的心像被摘走了，突然也烦躁起来，说好是安排装修，一块研究，为什么都没人了？如单为吃饺子，何必非跑到这儿来？

我坐在凳子上，把提包扔到台上。

“你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妻说，“老毛病说多少遍了，一辈子也改不了。

这是你的家？丢了呢？”我明知妻说得对，也不愿她在公共场合说，我这毛病恐怕一辈子改不了啦。我还是不动，偏不把帽子、提包放在一块儿，心想，我眼看着呢，还能有人偷走，服务员过来问：“你们要什么？”妻生气了，赌气站起来：“不吃了！”她走了，我还吃什么？也走吧！路上谁也不吭声。

我们上了 104 路车，我把 BP 机装在棉衣口袋里。我的感觉提醒我：这趟车上小偷多，可别让人偷走哇！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一摸口袋，BP 机真的不见了！

我向坐在前边的妻说：“坏了，我的 BP 机没了！”

妻还在生我的气不理我。

她手拿着大哥大，如果呼一下，BP 机一响，就会知道它就在这 104 车上的小偷手里。可妻不理我，也没办法了。

明明知道是刚刚被盗的，呼喊也没有用，也没办法去查，车一停，小偷肯定下车了。

我的 BP 机呀！我用了多少日子的联络网，从今天起中断了。我回到家即呼我的 BP 机：“如果你把 BP 机还我，我愿给你两千元酬谢！”那小偷完全见得到我的汉字信号，他知道这是从我口袋里掏走的。我说丢失的，他也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真的拿我的酬金。我是真心，可小偷会以为是诱饵……我向呼台声明挂失。

“活该！”妻说。“你耍吧，不听我的话吧，怎么样，立马报应，把 BP 机丢了，这下老实了！以后别耍了。”

是呀，只要和妻闹别扭不说话的时候，准出事儿。

今儿一天不快。

我忽然想到昨夜的梦：犯小人，有饥荒……这下可真应了：我被小偷偷走 BP 机，这不是犯小人吗？一眨眼丢了 2000 元哪！

我并不迷信圆梦的花，可今天却真的应了梦中犯小人，这是巧合？真是怪！应了梦便想：丢了 BP 机是命运，就不必去想它了，破财有喜，自我安慰吧。哪知真正的小人还不是小偷呢！

七、书呆子被新的光圈套住

1996 年 1 月 25 日，下午三点，龙迪饺子苑孟花的半地下室的办公室。

张总德泉、王总成璞和陈总都在。

我和妻赶来了，是为了商量如何装修。到了实施阶段，装修队马上要干活了。

楼上一定要装上电视。我们不是要提高档次吗？到你这儿就餐，可以边吃边看，我们在这儿组织活动，没有电视咋行？妻向陈总强调这一点，陈总也点头了。

楼上要打隔断，妻说弄成活动的，下半截木箱，上半部是磨花玻璃，如需要大的场地，把隔断一推就行。陈总、张总都认为此意见好，可孟花总说不行。

说到楼下装修，妻建议从下地下室的楼道一步步说起，把要求具体记上。既然地下餐厅有卡拉 OK、雅间……是高档的，从这楼梯就要有吸引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之感总要有。下楼处要有一大镜子，让人整理衣冠用；楼梯扶手要漂亮雅观，最好做不锈钢的，像陈总家的别墅那样。陈总说，那怕要加大成本了。

楼梯下要有个卫生间。那人防工程的通气管道要包起来。至于楼上厨房，应打开一洞，用传递带送饭菜，不然，让服务员从楼上往下端，可来不及……。

说到具体装修，陈总心里没有谱，不如张总、王总说得具体在行，大概与他只管哲学的高度概括，不管具体行为操作有关，不过，珊月说的具体办法，他都是同意的。

说完上楼，又去办公室。

陈总催两位老总：“怎么样？就这么定了，上马吧！”

张总问：“先拿钱，让装修队备料吧？”

陈总看看珊月，从皮包里拿出一捆人民币交给了孟花，说：“这是珊月取来的 5 万元，上次你收的一万元现金，交给你做霓虹灯款了，这次再给你 5 万做装修用，王总的电器款，回头便给。”

孟花把钱交给了张德泉，一块儿到外间屋数钱去了。

这时珊月想起打收条的事儿，在孟花进屋时，便小声叮嘱：“你得让他给你打个收款条呀！”

孟花走到外屋，张总已把款收好。

“张总，你给我写个收条吧。”

“好的。”张德泉把收条写给孟花。

张德泉进里间，对陈总说：“霓虹灯还差几千哩！我上回收的是 5 千，不是 1 万。”

陈总用责备的眼光扫视了孟花一眼。

一同吃晚饭，餐桌上很丰盛。

今天，孟花坐在陈总的身边，不断给他的盘里夹菜，碗里加汤。陈总坐得规矩，眼也不扫看孟花，好像不知旁边一个丰乳肥臀的风韵女人在悉心照顾他。陈总在跟两个老总对话：“王总、张总，依你们看，装修立即上马，什么时候能完工？”

当然包括电器音响啦。”

王总说：“我这儿快，装修给我留出线路地方，我几天就完。

电视机订货不成问题，一次进10台，优惠10%”张总说：“明天让装修队去备料……二月初也就全完活了，墙上要加防潮层、隔音层，麻烦一点，干起来也快。

不怕慢，就怕站，陈总可别让他们停工待料呵。”

陈总说：“没错，咱们争取春节一过开业吧。”

他转向我们夫妻俩：“你俩找找文艺界朋友，能不能把文化部高占祥部长请来呀？我也争取请几位部长、副部长，到时候准备好纸墨，请部长们给咱们题词。”

我说：“只是饭店开业，恐怕难请领导，最好我们举行个什么活动，请部长们参加。”

陈总连说：“对，对，到时候咱们好好策划一下。搞商业经济活动，知名度很重要。这个饭店一定要打出知名度去！珊月，你准备好演出节目，咱们这儿要设个京剧茶座，吸引京剧票友们来……”陈总知道珊月对京剧的执著，又谈起京剧茶座来，珊月问：“咱这饭店得改名字，叫什么好哇？”

陈总说：“大家帮助想个好名字呀！”

说来说去，名字还是定不下来。

孟花很少插言，她只是专心照顾陈总吃饭。

饭后，陈总还让小高送我们，王总不让，他在路边唤个出租车，我们一同回白塔寺了。

路上，王总说：“这个孟经理和陈曾关系够密切的哟！”

他邀我明天到他和张总的办公室去噢，他们的公司在赵登禹路，我们离得很近，步行不过十分钟。

张德泉、王成璞这两位老总下海经商多年了，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从一次次被人坑骗中闯过来，不愿让和他们一样诚实善良的书呆子也受骗，本着这样美好的心愿，他俩约我过去，要对我做些提醒。他们说，一看你们夫妻俩，就是老实人，没有经商下海的经验哪！你们与陈曾、孟花合作，希望你们合作的顺利，这是大家都愉快的事儿，可我们看陈曾和孟花的关系不一般，你们合作，不能不有所注意哟！可不能糊里糊涂的……今天，当我回忆这次谈话时，我是多么感激张德泉、王成珍的提醒！他们很敏锐地看出我们可能要被陈曾、孟花合伙套进去，但在当时又不好明说。

我今天还保存着他们建议的记录：

一、装修开始了，你们的钱也投进去了……当务之急是成立董事会，研究章程，不能让孟花在这里边瞎搅和。她和陈总如是那么一种关系，这事很不好办。应该是董事会决定，找人承包，层层责任制，要写出承包合同来，多奖亏罚，不然怎么行呢？国营企业把国家吃穷了，你们若不承包，得让孟花把你的投资吃光！亲哥儿俩还要勤算账哩。董事会要检查经营情况，承包

总经理要定期向董事会汇报。

二、现在要落实你们双方的投资，陈总到底投了多少？按实际确定谁是大股东，谁当董事长。这个饭馆是去年8月开业的，应该把8月至去年年底的账目结清，如有亏损，由原来老陈他们承担，不能把亏的钱让你们背。从装修开始，应是另一本账。

我把陈总交我的以前的工程决算表拿给张德泉看，问这是不是能证明陈总以前的投资呢？张总看完说：“这不能证明，我现在可以给你拿出这样的表来，它不表明他的实际付款，应该以发票收据为准，况且，这里并未说明是陈曾交的钱哪！今天，你们已经把钱交了，按说都有点晚了——你们应该先把以前的事搞清楚，把今后如何合作的章程定好，然后再拿出钱来呀！”

我想：作为北大校友的陈曾也不会坑我们！

1月31日，我去和平里饺子苑，想见见会计，看看账上陈总的实际投资数。孟花说：“会计今天不来，周日才来弄账哩，你周日再来吧。”

我到地下室去看了看，装修正紧张进行，看来有个模样了。

只是那个上传送食物的洞还没有打，这将来怎么送餐呢，需要马上告诉陈总。

周日，我给孟花打电话，问会计可来了，我好过去。孟花电话里说：“会计的小孩病了，今天没有来。”

为何从我们到龙迪饺子苑来，就一直没有见到会计？本来应该是会计办的事，全是孟花一人包揽呢？我们多次和陈曾说，应让会计给我们清理一下以前的账目，下一步合作好“心中有数”，陈曾连连点头称是，让我们和孟花联系，找会计……可直到今天也没见会计的面。陈曾似乎并不急于会计给报账，莫非他心里清楚？还是有别的原因？

一进二月，张总、王总便给我们打电话，说：“装修停了！”

电器音响还没有动，陈总没有影儿，电话也联系不上，只有找你们，让陈总快送钱来……”到2月7日，离春节还有十天了，陈曾一分钱没有送来，就是说，把我们投入的6万元现金花完了，陈曾至今还没有投入一分。原来说好，楼下装修他要再投15万元，因为预计地下餐厅加一楼改装，添上音响，一共要20多万元。

陈曾原来答应张总、王总，钱马上就到，可多少个“马上”了，也没有到位，他说话人们便不相信了。张总也感到奇怪：他家开那么多企业，还会愁这10多万元拿不出来？王总办事心里有底：你陈曾让我先垫钱购买音响、电视，我才不买呢！

你拿了钱来，我便去购买，没有钱就等着，看谁急！我吃这亏多了，给你买了，你没钱让我垫上，压上我的资金，我怎么办？谁不想用别人的钱周转？

我们可真着了急，不断地给廊坊打电话找陈总，大哥大的电话费用了上千元！

好不容易找到陈总，我报告了这边的紧急情况：“你别的别说了，快把钱送过来吧，不然人家装修队就走了，人家耗不起呀。音响也得马上拿钱来买！”

对方又是安慰的回答：“好，好，我马上带钱过去……”2月9日是周五，我先后接到张德泉、王成珍的电话，说陈总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到北京，

带来了 10 万元，不知准否？如是真的，马上可以行动了。我心想：如再用空话甜活人，谁还相信你？便说应该是真的。听到这消息，妻又高兴了。然而到第二天，张总来电话说：“他说带 10 万元是瞎掰，他就带来 3 万元，交给王总了，我这边装修还是没有钱，我安抚人家，叫再等等……看来陈总那儿没钱哪！”

心里又堵上一块阴云。

我翻起陈曾、孟花给我们的装修工程决算表来，就把这些款当做陈曾的投入吧，陈曾在一楼的装修上多报了 7 万元！他为什么要骗我们？这是北大同学干的事吗？我怎么越来越不认识他了呢？

我在 2 月 7 日的日记中已经写道：“这也启示我接受教训，不能以同学感情代替商业活动呵！”

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断定：陈总从开始到今日，一共投入还不到十万元！这就是他总应付我们答应我们，却不愿让我们见到会计，查看真实投资数目的原因吧。

我们交给陈曾现金 5 万元，交给孟花现金 1 万元，加上给陈曾购买磁疗床垫、羽绒磁疗被的 2 万 8 千元，这也有 8 万 8 千元了，龙迪饺子苑应该给我们一个正式收据呀！我们跟陈曾说，他也总是答应，却一直没有让孟花给我们开出来，这又是怎么回事？是陈总太忙把这件事忘了吗？

他这次拿来的 3 万元，是他的投资款，还是我们卖给他的磁疗寝具的款，他说给他购的寝具 2 万 8 千元算我们的投资，那他就该把款投入进来。这样，他自己合算只投入 2 千元。

我和妻商量，不能再稀里糊涂下去，应该根据投资情况，重新和陈总签订合同。妻说：“对，应该把咱投钱的情况用文字记下来，以免时间长了说不清楚。”

我睡不着觉，起来，打开灯，写了一个新的“合作协议书”。

合作协议书

甲方：陈曾

乙方：珊月

甲乙双方本着相互支持、真诚、长期合作、共襄大业之精神，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在甲方的原龙迪饺子苑投资扩大为“美食保健康乐宫”，租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七区七号楼北侧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机关服务公司用房，期限三年，双方合作第一年度为 1996 年 1 月 1 日到 1996 年 12 月 31 日。

二、乙方已于 1995 年 12 月 30 日将现金壹万元存入龙迪饺子苑新开设的中国银行账号，将现金壹万元投入龙迪饺子苑；1996 年 1 月 24 日在地下室装修前，投入现金伍万元；1996 年 1 月至 2 月 5 日为甲方购买双人磁性健康床垫一套及双人磁性羽绒薄被一条，价格为叁万壹仟壹佰元，按照优惠价贰万捌仟元作为对龙迪饺子苑的投资。

以上四笔共合计人民币玖万捌仟元整。

三、甲方作为龙迪饺子苑（即美食保健康乐宫）的管理承包方，具体经营管理，保证利润额，向乙方做出保底利润，在第一年度内不得少于拾伍万元，分三次付给乙方，即：1996 年 5 月 1 日前付给叁万元；1996 年 9 月 1 日前付给伍万元；1996 年 12 月 31 日前付给柒万元。

四、1997 年度利润分配在 1996 年底议定。

本协议在公证后正式生效，如甲方经营有方，利润增加，甲方考虑适当增加给乙方利润，如经费不足，经营亏损，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以同价值的汽车抵押，直到保证乙方利益完成为止。

五、合同终止按照实际投资股份处理所属甲乙双方的财产，甲方实际投资在正式合作开始前核定，确定股份比例。

六、本协议生效后，在此以前双方所拟协议书无效，以此协议为根据，一式两份。

这个协议书的内容在此前都和陈曾谈过，不过由我用文字固定下来而已，它是上一个具体协议的进一步，反映着我们内心的忧虑。我们在陈总满口答应一年保证给我们 15 万元的时候，我问他：“你给不了怎么办哪？”他说：“我这儿有汽车，拿它做抵押还不行吗？”这里，把原来订的一年按季度分四次付利润还本的说法改成三次，因为此时已是二月中，装修还没有完，三月分红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们决定找陈总好好谈谈。

妻担心地问我：“你看陈曾能坑咱们吗？”

我想了想，说：“我们毕竟是北大校友，他不会坑人的。”

我相信在北大校园培育的友爱和真诚。

一过春节，我和妻便去廊坊，带着我起草的新的协议书，路上说好，这次不能白去，要有所收获……陈曾满面春风接待我们，问候新春好。我们说，因为没有房子，全家只好到保定临时租用的地方去过春节了。

陈曾说：“春天到了，方兄的剧本该考虑动笔了吧。我想还是先写‘贺子珍’，写出来会有震动的，珊月演贺子珍，一炮打响！我让人去给咱们找有关贺子珍的材料去了。”

他竟不提饭店的事，倒关心起我的创作、珊月的演戏了。一提到事业，我们的心便立即激动起来。……说了半天，我才把话题转到重签协议的事儿上来。我拿出那个协议书，说：“陈总，我们应该重新签一个协议，好照此执行，眼看第一季度要过去了我把协议书交给他，他看了一遍递给我，说：“其实，写不写这个协议，都没有关系，反正你们也不参加经营，饭店的事儿，我看你俩就不用操心了，这 10 万元就算我借你们的，到年底我给你 15 万好了。”

珊月笑了：“饭店经营不好，你拿什么给我们？”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么大家业，从哪儿也能给你们拆兑出 15 万来，这你们还不放心吗？我最关心的是你们的业务，这可不能再耽误了。以后咱们要长期合作，我想搞个星辰艺术团，或者咱们注册个影视公司，搞电视剧……你们看怎么样？”

陈曾在我们面前，又投出了一个新的耀眼的光圈，吸引着我们向前去，这是我们受压抑的心长期所向往的呵！

陈总的想法太好了，和我们想的不谋而合！

陈曾说：“你们考虑一个组建星辰艺术团的方案吧，我投资，珊月当团长，排咱们自己写的戏，第一个戏可以先写你们考虑多年的《杨继盛》，然后再编演《贺子珍》，咱们说办就办，争取 7 月 1 日建成。我这人就是想支持有才华的人干事业，挣钱多了有什么用？”

陈曾的组建艺术团的设想，把我们又引到一个幻境中去了，越想越激动。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缺陈曾这样有实力又爱才爱艺术的企业家的支持，

若早有这种支持，我们的事业早就起来了。

我草拟了组建星辰艺术团的方案：

一、由星辰集团投资，为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企业知名度而组建星辰艺术团。

二、该团挂靠在北京京剧院，民办公助，陈曾为艺术团名誉团长，珊月为团长，方燕为副团长。

三、艺术团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剧组为基础，根据剧目招聘，时聚时散。

四、艺术团立即筹备，办演出许可证。

五、艺术团计划：

1、先创编大型历史京剧《铁肩道义》（杨继盛），1996年完成剧本定稿。

2、1996年3—5月调查、申报、组建，争取7月1日建成。

3、星辰集团在1996年7月1日投款10万元做筹备及活动经费，以50万元为注册资金。

4、《铁肩道义》1997年1月1日投入排演，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正式公演。投入排演前，星辰集团投入30万元，争取国家及多方支持60万元。

5、1997年完成第一部戏之后投入《贺子珍》的创作。

美丽的五彩缤纷的光圈呵，在前面吸引我把全部身心投入进去，忘记了一切。

书呆子完全被这光圈套进去了。

八、“那女人是你老同学的小老婆”

3月13日下午二点半，接到陈总的电话，说五点来接我们去廊坊，并告诉我，准备好一百本《追踪劫机犯》，好给军分区的朋友带去。

在军分区工作的我的中学校友很称赞这部书，说：“目前正搞‘鱼水工程’，恢复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你这本为百姓说话。

反映百姓心声的书，让我们永远不忘百姓，是能起到好效果的。

下次多带一些，我让大家买吧。”

晚八点，小高把车开到我家门口，陈总又进到我的小屋，没有地方坐，他便说：“带上‘劫机犯’走吧。”

把一百本书放到车屁股里，我们坐车去廊坊。

陈总的话从我写书说起：

“方兄，你还是应该多写书呀！就像写‘劫机犯’这样的书，老百姓受欢迎的书，针砭时弊的书。人生在世，总要留下些什么，写书是最有意思的。当年，我在北京市委，不断给《前线》写文章……珊月，更是难得的人才。你们从现在起，什么心思都不要有了，应该专心干事业，要发疯着迷执着自己的事业。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可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最愿意支持热心干事业的人，何况像夫人有这样好的条件，一辈子没得到发展，这点，方兄应该负责哪。”

珊月说：“那我今后就靠陈总帮我了。”

“没问题！我一定把你们的事业帮起来，几年之内，就要有一个大的起色。”

“那我可就全靠你了，你可别光拿漂亮话甜活人。”

“你对我还有什么怀疑吗？去年春节，我在廊坊搞了星星杯文艺演出，请来许多著名演员，全由我投资赞助，十几万元哩。

我们把艺术团搞起来，一点问题没有哇！”

陈总再次提出他支持我们事业的计划，我们受到感动，忘记了一切。我感觉这是真实的即将成为现实梦想，便开始考虑要写东西了，从商下海赚钱，本不是我之所愿所长呵，那全是为生存所迫，我应该把这一二年从事传销的体验记录下来，算是一个告别，一个结束。我想这部书就叫《为了生存》，副题为：“一个传销商的手记”……“方兄！”陈总的叫声让我从遐想中回来，“你干脆就到我这儿写作吧，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你在北京那么一间房子，吃喝拉撒睡，哪有写的地方？我这儿也静，没人打扰；珊月呢，在我这儿练功吊嗓，准备将来重返舞台。怎么样？”

这倒真是个好办法！我不假思索他说：“那太好了！不过，这次来什么也没有带呀。下次，我把要写的素材日记带来吧。”

从这天起，我们决定不再和日宝来福公司签约，不再从事那名为批发制，其骨子里还是传销的事业，我们从国家工商局的朋友哪里知道：国家没有批准一家公司在北京搞传销活动，当然更没有批准日宝来福公司搞传销，我曾向中日合资的日宝来福公司的日方总经理中林先生说，现在搞成批发专卖制，而实质仍是原来传销的路子，这就像是猴子要装成人，而还有那猴子尾巴一样，这总是个问题呀！让人心里不安宁的事，可不能做，不论这里有多大利益在驱使……现在好了，我可以认真回忆总结一下，写一部书了。

我们不想再做日宝来福事业，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朋友之间绝不可以做生意。生意的利益会破坏友谊。生意场上，似乎只讲“唯利是图”，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哪里还讲什么友情？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堕落？看到过去的朋友为了一点点“利”而争吵，而决裂，我感到伤心；而一年多的“传销”，我们也有几个过去的朋友失去了，这不是很可悲吗？也许这是对朋友“友情”的真正检验？过去的所谓“友谊”，本身就是由掩遮的利益为基础的。一位过去的“朋友”说：“世上就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一切以利益为转移，你看大到国与国，小到人和人之间，还不全一样？”

我为失去朋友而伤心，不想再与朋友做生意了，何必要让今日的朋友变成明天的仇敌呢？

我想：老陈是借我们的钱，他不会那种翻脸不认账的人，他毕竟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高素质的人哪！

我想着心事，妻子和陈总对话：

“……陈总，你夫人在家干什么呀？她不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吗？她该是你最得力的助手了。”

“……”陈总似乎有难言之隐，不知如何回答，停顿一会儿才说，“她能让我在外边活动，就是对我的支持了。吃、喝、玩、乐，随她的便。”

“她这一辈子可真有福，什么也不做，只享清福了。你问问你的老同学，我过过一天这样的日子吗？”

陈总笑了，扭过头对我说：“珊月跟我，也过那样的好日子，方兄你同意吗？”

我讨厌开这种玩笑，没有吭声。

车到廊坊“星星酒家”，这里已重新装修成高档餐厅。陈总从广东请来了特级厨师，要让廊坊人吃上正宗粤菜。楼上有新风景，楼下仍是原来星星酒家的菜肴。

看来，陈总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了。陈总领我们参观了楼上楼下，说：“我请你们来，是准备让你们参加我们星星酒家新的开业庆典，我已经请了电视台，录像宣传。到开业那天，珊月你得唱一段……”3月21日，陈总又来车把我们接到廊坊，到这时候，我们才想到：交给陈总6万元现金，又花3万元给他买了套磁疗寝具，却一直没让他给开个收据。他许诺的事，也全是口头的。我们此时对他还是信任的，可总应该让他写个收条才对，也免得过后忘掉。

陈总在我给他的白纸上写下收条，写完了，交给珊月。当我们看到写的不是借款（以前他已口头说过算借给他的）而是投资入股，就不能不提如何办好龙迪饺子苑了。

这时，陈曾马上说：“你们别管了。我这么大的家业，怎么也不会亏你们俩这10万元哪！还是那句话，年底保证给你们连本带利15万元。饺子苑亏了，我从家里给你出。”

珊月说：“我们是不想管，我也不懂，不过，你星星酒家搞这么火，你也得把龙迪饺子苑管管，你为什么不让它赚而让它亏了呢？不能把钱投给孟花，让她打了水漂吧？”

一提孟花，陈曾似乎有些烦躁，把手一挥说：“我有安排，有安排。都得让它火起来，没问题！东方农场那儿形势很好，一万五千亩地就要播种了，急需化肥，珊月，你妹妹不在黑龙江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吗？我想请你去哈尔滨，帮咱们农场弄些化肥哩……”“妹妹现在是星河大厦的老总了，你们去哈尔滨，可以住我妹的大厦。她们刚分了新房，挨着松花江，三室一厅。我们现在还没有安身之处哩。”

陈曾说：“你去哈尔滨吧，咱们在哈尔滨建个办事处。”

“那我算干什么的呀？”

“你是办事处主任。我也给你弄套好房，不能比你妹的差！”

“陈总，你操心的事太多了，这么多事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我看你照旧吃得多，睡得着，你可真有一套……”陈曾得意地眯起眼睛，只剩下了一条细缝。

“你们知道，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要上天了，还差一个小时，他照常是躺下便睡着了，直到上天前十分钟叫起他来。看人家这心理状态，多健康呵！干事业，就要拿得起，放得下。说放下，倒头就睡；不然，你光愁，还不愁死？”

“你别说我靠两个儿子，他们离开我谁也支不起来。大虎倒能干，可文化素质差，缺谋略，愣头青；二虎更不行，当断不断，胆小怕事，支不起个，干不成事。”

他文化程度比大虎高，可还不如大虎。知子莫若父，我知道我这两儿子……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呵！”

他表面的笑容里，掩着他内心的忧虑。他时时以加加林来镇定自己的

心。

这两天为星星酒家的重新开业，陈总早早就起来了，他还把人们都早早叫起来，人说，他像高玉宝写的小说《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七点刚过，我见人影在我们夫妻住的房间窗前晃动，这是陈总。我起来开门，他进来说：“星星酒家在3月29日开业，报纸也登出去了，那天珊月可要准备唱哟！你跟管音响的刘国辉去北京买些好唱盘来吧。”

珊月愿意为星星酒家的开业贡献力量，她吃了饭便去陈总的办公室去找刘国辉。刘国辉在外间屋，用手指指里屋，让她不要进去。这时，陈总正和北京通电话：“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我这儿要开业，处处都用钱，你告诉他们，我马上把钱投过去……过了这几天我去，一定去……你别急嘛！”

听出来他是和孟花说话，看来说了一个时辰了。

放下电话，陈总从里屋出来，见我和珊月都在外屋，便说：“今天，我要给北京地质局打过10万元去，交房租呀！”说着把一张写好的支票在珊月面前晃了一下。

珊月说：“让我们去买光盘，是小高开车呀？那你给国辉支钱哪。”

陈总笑呵呵他说：“国辉，你去从会计那儿支钱吧。下午，小高送你们去。”

可这天下午，陈总也去北京，令人奇怪的是，不让珊月、国辉去龙迪饺子苑，而是让他们买了激光唱盘以后等车来接。原来，孟花和装修队弄僵了，让陈总去处理，其中内情不愿让我们知道。

3月29日星星酒家开业，几串红灯笼从房顶挂下来，服务员全换上了新做的描龙绘凤的旗袍，背上绶带，上写：“星星酒家欢迎您”。兄弟单位祝贺的花篮、明镜也都摆好了，请来的军乐队乘上大卡车，开上廊坊街头……就像办大喜事一般热闹、喜幸，我们也为陈总高兴，仿佛这酒家也有我们的股份，和我们自己的一样。

陈总领我们上了二楼，电视台正准备录像，我和珊月便扮演从北京来的顾客，特来星星酒家就餐的。电视台的主持小姐，拿话筒到我们跟前，我们说了几句祝贺的话，还说了一句：“这星星酒家的正宗粤菜，我们吃了，真是味美价廉啊！”老陈在一边不住地笑，说我们讲得真好。

每个餐桌都摆得很好。餐巾折成了各种花朵：牡丹、玉兰、马蹄莲……以花的高低，定下主客陪客的位置。这知识，还是从这里知道的。

下午一点，已退下去的张希正副市长来了。陈总请我们作陪吃粤菜，妻唱了京剧，把所有宾客全震动了。陈总向张副市长介绍：“这可是个人才！我们想搞个影视文化公司。”老副市长说：“有困难说话。我虽退下来了，可说句话还多少管点用哩。”饭间，大家谈得融洽如一家，谁知下午，陈总便和珊月谈僵了。

这是在陈总接到北京孟花的电话之后。

我们以龙迪饺子苑的名义在和平门中国银行开了个账户，投入了一万元，留下珊月的印鉴。没有饺子苑的财务章和珊月的印鉴，这款便不能龞现在陈总要珊月把这一万元划入孟花那里去，珊月说：“我们已投进九万了，你说投三十万，怎么总不到位呢？龙迪饺子苑，你不找人管理承包，没有正式会计，又没有出纳，有钱就入了孟花的腰包。她也不报账，你再给她划钱，不也是打水漂吗？你总说有办法，你那办法是什么呀？”陈曾急了，脸红脖

子粗地叫起来：“我当然有办法，你就不用管了！我这儿实在周转不开，没有现金哪。”国辉听到陈总和珊月发火了，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进到里屋，见陈曾脸沉着，布满乌云。我好像第一次见他这样失态。

陈曾坐在那旋转的老板椅上，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黑漆桌面，那是他思考的声音。我听他说过他去美国，见美国一家大企业总经理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巨大的油画立在办公桌后面：大海掀起巨浪，海天相接，一望无际。那总经理说，这就是他每天生活的写照。我想，陈曾此刻也许像那个美国总经理一样，头脑里正翻江倒海！

是啊，商海波涛汹涌，必须是勇敢的船员才敢于搏击海浪，不然会被大海吞没，葬身鱼腹。

陈曾想的是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对付那个女人孟花？怎么让龙迪饺子苑能够赚钱不赔？有什么人能去与孟花合作？资金如何来？现在又把珊月的10万元套进来了，怎样把她安抚住呢？

……孟花来电话让他去，他怎样从这儿脱身呢？

陈曾沉思半天说了：“我派星星酒家的经理刘苇去北京，好好把饺子苑搞好，让刘苇去承包，保证每年的利润……这下行了吧？”

珊月说：“那你星星酒家呢？”

陈曾说：“这儿好办，我另找人吧。”

我们听了他的办法觉得可行。刘苇原来是大虎的朋友，当年一起在油田当工人，后来大虎自己先辞职下海，便鼓动刘苇也离开了油田，来到大虎当董事长的星星酒家，当时说好每月二千元工资，可一直没有兑现。刘苇碍于朋友情面，不好意思要，他当经理的心里明白：这饭店架子支得很大，其实里边空了，这两年并没赚大钱，欠人家银行的利息都难以支应。对老董事长让他去北京独立承包一摊，他自然高兴，并夸下海口，说那摊交给他没问题，用不了两个月，便扭亏为盈！

刘苇当天便去了北京。

1996年4月8日。

这天，我到陈曾的办公室来，陈曾不在，说起早便让小高开车走了，没有说到哪儿去。我奇怪：每次他出门总要和我们打招呼的，为何这次例外？他上哪儿去了呢？

电话铃响，我接了，是陈曾的老婆汪荣的声音：“方燕哪，你给我找找陈曾，让他来接电话……不在，他上哪儿去了？你和陈曾是北大老同学，我得跟你说说你们这个老同学啦。北京有个龙迪饺子馆，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还投资了呢，可想起陈曾叮嘱不要跟任何人说，便只做了简单回答）。”

“那个饺子馆有个女人叫孟花，你见过吗？”

我说：“见过她。”

汪荣说：“我告诉你呀，那个孟花是你同学陈曾的小老婆！”

我告诉你，你的老同学陈曾可是个大流氓，他瞒着我，跟那女人鬼混好几年了！他现在又拿钱结他小老婆开了个饺子馆……他哪儿也对不起我呀！好啦，不在电话里跟你说啦，回头你到我家来，我好好跟你说说这个大流氓。”

放下电话，我愣了。

看来，以前人们的传说，在他老婆这儿得到了证实：孟花真是陈曾的

情妇，是老陈真的欠下了孟花还不清的感情债，他要千方百计用金钱去还。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辛苦得来的 10 万元便成了替他还债的钱了，这不危险了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没想到，汪荣竟和我骂她丈夫是大流氓。他们夫妻矛盾已相当尖锐了，可老陈真有肚量，竟不露声色，让外人看不出来。

听人们说，昨晚在他那高级别墅里老夫妻俩吵翻了天，小夫妻俩打滚了地，父子俩嚷得房顶要掀，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惊得养着的那条狗不知出了什么事，也跟着凑热闹汪汪乱叫起来看来住在如此高级的房子里，如果夫妻不合，父子吵架，全家不宁，也没有幸福啊！

据说吵架是老太太汪荣从二小子口里得知让经理刘苇去北京引起的。

汪荣问陈曾：“这些天不见刘苇了，他上哪儿去了？”

陈曾对妻子不敢说真话，瞎话随口便说：“他老婆不是神经不好吗？捎来信，让他回家看看。”

汪荣又问：“那刘苇什么时候回来？”

陈曾说：“过些天吧。”

汪荣盯着老陈的脸追问：“他真的回家去了？怎么有人说在北京那个臭婊子那儿见到刘苇了呢？”

陈曾嘴硬：“胡说，这怎么可能呢！”

汪荣说：“你不要让我扇你嘴巴！你现在还瞒着老娘，你当我不知道你和孟花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呀，你是派刘苇去伺候那婊子了吧？告诉你，你老实说真的……”陈曾也急了，他不能忍受老婆这样说他，大交：“你纯粹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汪荣毫不退让：“你把二虎叫过来，问问他！”

他们在这儿吵闹，却不知道二小子那屋里也着了火，这是房子太多太大的坏处；谁也听不见谁吵，也是屋子太大的好处。

二虎的媳妇此时哭得泪人一般，“告诉你二虎，我当初嫁你是你找的我……你见我老了不漂亮了，就想甩我，好跟你那小妖精一块儿过，没门儿……我死也死在你这儿我就是不离婚……你若再让我看见你和那小精搂抱，另说我不给你留面子……”二虎干脆说：“我就是要和她好，我爱她，我不爱你。你这样，多没意思呀！”

”

媳妇说：“你把这话跟你妈说去……你去呀！”

二虎正心烦，听陈曾大声叫他，便把门一摔出去了，留在屋里的是妻子的哭泣……陈曾厉声问儿子是想掩盖自己，他说：“你怎么和你妈胡说八道，说没影儿的事，叫你妈生气！”

儿子却不服，也不知老爹的心思：“我什么时候胡说了？我说什么了？”

陈曾说：“刘苇回老家了嘛，你胡说他上北京干什么！”

二虎生气了，干脆大嚷道：“哎呀！老爸时到今日，你还掖着藏着干嘛，多没意思呀！不是派刘苇去北京帮孟花开饭店了嘛，你还让人家别人投了钱。我告诉你，我根本不同意你去搞那个饭店，那孟花干不了，你搭上个刘苇……到时候，搞个乱七八糟，你怎么跟人家方燕夫妇交代！…”儿子把陈曾的秘密全端出来了。

陈曾气得脸铁青，他已不好再狡辩什么。以下就该汪荣数落他，骂他了。

全家乱成一团，是因为没有大儿子大虎在常如果有大虎在，他一发火，老二就不敢言语了。大虎站在母亲一边，陈曾也不敢说话，最终全家都会把矛头对准陈曾，让陈曾没有话可说。

这是他自己找的，脚上的泡自己走的，谁叫他和那个孟花有那种在儿女老婆面前说不出口的事儿呢！

老大此时到东北忙那东方农场的大事去了。他走时，也带走一个女人，是他的助手，也为了解除不和妻子在一起的心闷。这种事儿对如今大款来说已是平平常常。有一首民谣这样描绘当今大款的形象：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

身边带“小蜜”，
出门坐奥迪。
长住宾馆里，
苦了家中妻。

一点不假，最苦的是老大的妻子，一人带着儿子在石家庄上班，起早贪黑，含辛茹苦，接送儿子上幼儿园……这儿虽有高级别墅，她却不能来住，她也不愿来看这一家人的冷战。

以上是我听人讲述的。我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和陈曾的老伴好好唠叨。我告诉老二，老二倒不回避家中的矛盾，他说，那我告诉我妈，让她准备一下再说，没人跟她说话，她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哩。

九、向情妇许诺：换谁也不换你！

这天早上八点，陈曾又来到我们住的房间，讲起哲学问题，好像他家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不知道，他老婆已经向我讲了他的“流氓行径”，他大谈哲学，我竟感到有滑稽之感。我望着他侃侃而谈的样子，想像着那天他被老婆骂时的表情。人在公共场合和他背后的样子差别多大！就像某官僚在公共场合，在大会主席台上，在电视讲话时，是多么正人君子，仪态非凡；你怎么也想不到他在小情人那里，会因小情人的恼怒而跪在石榴裙下求她原谅呢。

我对老同学原来并不了解。

昨天，我才知道了一些，印证了一些。

他“文革”前是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他在学生时代便是党员，一开始自然受到重用。他在邓拓主编的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工作，对邓拓的才学钦佩，对邓拓写的毛笔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便学习邓拓的书法，练起毛笔字来，而此时，吸引他的不只是邓拓的字迹，还有邓拓身边的一位漂亮的女秘书，他想法接近她……不久，风言风语传出他和女秘书的关系。他老婆见他总不回家，总说在市委值班，便起了疑心，一日偷偷来到市委。

夜晚的大楼很安静，他老婆在那个办公室外，听到了他和女秘书的说笑声，于是火气十足地把门推开，上去便抽了陈曾两个大嘴巴，这一下惊动

了所有值夜班的人们。汪荣大吵大闹，要让陈曾说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段传闻，我后来从市委贾秘书长那儿也听说过。

“文革”以后，陈曾调离了北京市委来到河北，人们说和他老婆那两个大嘴巴也有关系。

陈曾后来在省供销社北方大厦被免职，说是也和他老婆揭发他这方面的问题有关：陈看上了电视台的一位走红的女节目主持人，用公款为那主持人做了一身高档服装，还答应给那女人买地盖房。是他老婆首先发现他和那女人关系不正常，提供的线索现在，陈曾又和这个叫孟花的女人勾搭在一起，老婆能容吗！

陈曾还在摆划他的过五关斩六将，讲说他要学船王包玉刚的打算，用以安定我们的心。珊月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说：“别说了，你说这么大，我不爱听。陈总，你讲点实际的吧，那北京的饭店有了什么具体办法？你可别拿我们的血汗钱让孟花胡糟践啦！”

“不会，刘苇去整顿了，很有效，这几天每天都翻桌盈利过千呢。”

我们听了很高兴。

陈曾正要下去，办公室的小常来叫他，说来了一帮妇女找他哩，都是扫大街的……陈曾过去便说：“环卫，环保……我们早交给街道办事处费用了，怎么还要？”那帮妇女七嘴八舌他说：“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我们负责你这饭店的街道清扫，这又一年了，你们总该交点钱吧！”

陈曾皱着眉头说：“我们交那么多钱给环保，可这臭沟也没清理呀，用环保的钱发工资了吧。执法部门也来……都来吃企业，我们还能活吗！我这就要向政府提意见了。”

那些妇女不愿听他说这些，只说：“我们是环卫，怎么也得给我们钱哪，不然，星星酒家这一片你们自己清扫吧！”

“哎呀，我现在实在困难，没有钱哪。不信，你们找我们会计去问。你们再等几天，我家大虎从东北回来再给你们想办法好说歹说，把这一群妇女打发走了。”

他打发她们，就像打发一群要饭花子；他轰走他们，就似轰走一群嗡嗡叫的令人讨厌的苍蝇……他那像旧社会地主的神态，让我有一点不舒服。

陈曾真的没有可以支给她们的几百块钱吗？

真的没钱！陈曾的二儿子在他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对我说：“如今这企业特难搞，我跟我爸、我哥的想法不一样。我爸是光想大的，飞机、大炮、火箭、卫星，他都想干，想一下挣它个几百万，可他什么也干不了。他们俩都要搞农场，我坚决反对，那是靠天吃饭，有那贷的一二百万，干什么都赚，比那快得多！这不，我哥又去跑贷款了，现在什么时候了，贷款还没下来呢！我爸瞒着我妈在北京搞了个饭店，那孟花根本不行，准赔！你们就不该听我爸的，把钱投到那儿去，哼！你就瞧热闹吧。”

我说：“你爸说好了，算借我们的钱，不让我们管，到年底除去还本以外，至少还3万元的利息。”

二虎没有吭声。

呆了会儿，他诉说起他的苦恼：原来端铁饭碗，见人家都下海挣钱，眼红人家，不服气，自己也便扔了铁饭碗下海了，可现在还是苦恼。干富了怕，不干也怕，商海无情。想起来有什么意思？这时候又想，还不如端铁饭碗时候呢！你说，我们这一代人该怎么过呢？什么都觉得没劲！没意思！挣

钱没意思，不挣也不行……他的两眼迷惘，表露出心灵的空虚和苦闷。

听他妈说，二虎两口子从那天吵架后，已经好几天不说话了。他喜欢上的路小姐，是个活泼漂亮的女孩，眉眼含情脉脉，见我们谈话，她便倒一杯水放到我面前，叫声“老师请”，笑望一眼二虎，便离去了，二虎要把女孩调到他的办公室来，做他的助手，可爸爸却不同意，他让我在他爸的面前美言几句，说他和路小姐几句好话。

那天，老太太带着小孙女岩岩过来了，小孙女非常乖，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要什么给什么。老太太说：“你给这个爷爷跳个舞，奶奶给你买个手表。”女孩跳了两步，马上说：“我的表呢？”老太太赶紧拿出来给小孙女带上，这小女孩才4岁。

妈妈了解儿子的心，但绝不会让小孙女失去妈妈。她对我说：“二虎是个性格活泼、好交际的人，媳妇性格孤僻，家里是老闺女，娇惯。她父亲是廊坊邮电局局长。二虎原来是和我那同学的女儿恋爱，那女孩变了心走了，二虎很痛苦，说什么也不找了。后来，我们到了这儿，遇上了小红，只处了两个月就结婚了。小红内向、文静，和那头一个女孩的外向、活泼正好相反。

一开始，两人感情不坏，吃饭都让二虎喂哩，每天起早二虎就下厨房了。后来小红得了病，肺结核，生下一胎，活了三十天死了，这岩岩是第二胎，我们特细心照顾……后来，二虎和媳妇感情越来越淡，距离越来越大了。他们闹了多少回离婚，都没离成。二虎在外，又有别的女孩吸引他……因为感情有了隔阂，遇事便不能容忍、宽容了。这样，碰上一个小小的矛盾也会吵起来的。

“二虎这孩子，外人都喜欢他，他能说会道，上了党校，大本毕业，学了经济管理。他大哥却是个初中生。我们最疼老二，娇他，可现在他最不听话，还跟我顶。越娇越不好哩。俺们老大干活最多，这酒家是大虎创下来的。哥儿俩的路子也越来分歧越大。说好，干脆各人干各人的，省得总吵！两人说好，这酒家贷款300万，二虎要承担100万的利息，固定资产按比例分，大虎也够意思了。二虎说自己搞试试……”陈曾总说老二不行，胆小不得将军做，成不了大事。二虎却说：“我爸加上我哥，合在一起也没有我有风险意识，他们就知道冒险、胆大！”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把钱投到孟花那儿算是瞎了，你以后瞧热闹吧！”会有什么热闹？我们不解，可这几句话总在头脑里转，闹得夜里做噩梦：我们被孟花涮了。

早晨，陈曾没有过来，我们便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正在接电话，是孟花从北京打来的，时间是八点。好像他们约定此时通电话的。

我们有了担心，总想和陈曾好好谈谈，而他却总用别的话把我们要谈的内容岔过去：如打听儿子大学毕业分配找到没找到合适地方呀，说如果需要到地质局，他可以找局长说话呀……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长途电话，是孟花在告刘苇的状，说他来了不干事，光捣乱；他到现在还没起哩，昨天夜里他们喝酒喝到半夜。受他的影响，别人都不听她的了……陈曾一边嗯嗯地听着，时不时劝说对方几句，引出对方又一串更长的话来。

我听着老陈劝导的话，像对自己的孩子。语气是充满感情的，也许因我们在一边听，妨碍了他的情感的直接表达。

好像是孟花说她的十五岁的儿子得了肾炎，儿子是她生的，虽说离婚时判给了男方，可她心疼，她要管哪！她要让老陈给她想办法……她说：刘

苇去了，是不是要夺她的权，为什么不听她的，什么都要限制她……说到这儿，电话里传出了哭泣声……老陈便一个劲儿说：“不要这样，听我的，不要这样嘛……不会的。我告诉你，是你的……换谁也不换你！”

有了这几句话，对方吃了定心丸，哭泣声渐停了。

每天一上班，孟花便来长途，一说便是半个小时以上，光这长途电话费就得多少？这钱还不是从饺子苑出吗！妻在想：就这长话费花销，也不能再让孟花干下去！现在，孟花又向陈曾告状了。这些活若让汪荣听到会是什么样子？孟花哪知道陈曾的后院着火了呢！

陈曾放下电话。我们说：“看来，孟花和刘苇弄不到一块儿，是吧？那就外承包吧，把饭店租给外人，这么下去不行呵，电话费也花不起。”

陈曾说：“你们也找合适的人吧。”又说，“我有事出去。”他对新来的星星酒家经理王通叮了一句：“有人找我，就说我上永清了……”我：“回永清老家吗？”

他说：“有个合作项目，永清县长让我去谈。”

他没有心思听我们的建议，便召唤刚送孙女上幼儿园回来的司机小高，匆匆忙忙坐车走了。

我从他的神态上判断：他没有回老家永清，是去北京安慰孟花去了。王通说：“听说刘苇病了。我说不是身病是心病，你想，他去整顿，想承包，那孟花能愿意把权交出去吗？刘苇虽说是陈曾派出的，他也想把饭店整顿好，可孟花和陈曾又是这种关系，陈曾能让她不痛快吗？这一告状，刘苇还能干？也不知谁管谁，谁听谁的，与其受窝囊气，不如不问了。这样，刘苇便说病了我同意王通的分析，看来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这样矛盾下去，那龙迪饺子苑将如何办下去？

开饭店是做买卖，商海无情，你若用刘苇，就得照做买卖说；可孟花又是情妇，不能无情。这无情和有情碰在了一起，要你陈曾做出抉择：到底要谁？

这天下午，汪荣在天津的中学同学开车来到星星酒家，有六位，是举行婚礼来了。那位老同学已六十来岁，找了一位刚三十多岁的女士。汪荣邀请他们来这儿，一切费用都由汪荣负责，也显示一下她家的气魄。

汪荣让儿子给老同学们开了房间，问老陈上哪儿去了。

王通忙说：“上永清去了。”

“干啥去了？他知道我的老同学来这儿呀！”

“说是谈合作的事儿，快回来了吧。”

汪荣说：“今晚他们在咱这儿举行婚礼，开两桌，把咱最好的东西都端上来。”

“她亲自布置给经理。”

傍晚，陈曾才赶回来，见院里停放的天津牌子的汽车，知道客人到了，便匆匆进了他的办公室。

老婆脸色不好：“你咋这时候才回来，上哪儿去了？”

陈曾老实说：“永清要搞胡萝卜素，让我去谈合作的事了。”

“你不知我的同学今天来吗？”

“他们留我，我都没答应，谈完便赶回来了。”

“那好好安排一下吧。”

陈曾忙去亲自布置了。

我见到司机小高，问他：“刘苇怎样？和孟花的矛盾怎么解决的呀？”

小高守口如瓶，回答：“他们三人谈什么，我没有听。”

司机的回答证实了我的判断。

结婚宴会在晚上举行，两大桌，菜肴十分丰富，是我们到这儿来见到的最丰盛的宴会了，使那位一生坎坷晚年结婚的男同学非常感动，十分感激这个中学女同学的情谊。这一桌酒席如在外面也要几千元吧。光河鲜一类的菜肴就有：油焖鲜肘虾、宫保鲜贝、腰果虾仁、清蒸桂鱼、红烧黄花鱼，清炖元鱼，还有我从没吃过的一品佛跳墙……吃完便是唱卡拉 OK。陈曾又介绍珊月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要她唱京剧，珊月唱完一段“醉酒”，便叫陈曾唱。陈曾没有那大的情绪，在老婆面前显得十分老实，连连摆手拒绝。

那新娘倒十分大方，自己报名唱情歌献给她的丈夫，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二虎的妻子坐不住，她走出去了。

我也跟着出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红，她是个老实内向的女子。

在院里，我问：“你怎么出来了，不唱一段？”

她说：“我受不了，闷。”

我问何故？

她说：“她陈家就糟践吧。老太太就是虚荣，显摆她家有钱。

是富家，不知底细的老同学，还真以为她家多富呢！这个家都是自己管自己，谁也不管谁。老太太根本不知家里的日子，只想自己痛快。……唉，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我是化工学院的毕业生，为了他陈家，我把专业都丢了……我们说离开吧，离也离不了，好也好不了，走也走不开；说过吧，也过不安宁……这一辈子呀，瞎混吧，听天由命，到哪儿说哪儿吧……”说着她流了泪。

我怕她在这样的日子伤心，不好多问，劝她回去唱唱，想开一点。

她擦着眼泪，不回宴会厅。

我回来，正听见她的小女儿唱，老太太笑得合不上嘴，然后让小岩岩给献花……每个人都对新人说几句祝福的话，我也说了美好的祝愿：“人生相逢便有缘。在茫茫人海里，知音难求，知心难遇，有缘相遇，当万分珍惜！”我有感于在宴会厅外边那哭泣的女子，说了些感想。

二虎举起酒杯要敬我一杯，说：“今天我拜你为老师，你收不收我这个学生？”

我说：“那你可得听我的话。”

“没问题，老师！”他一饮而荆

不知是特邀还是主动上门，这一天，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廊坊，他叫吕先，是省人大常委会一个处长。吕先原是某工业部一个航测站的头头，由张德泉介绍与陈曾相识，吕先又介绍陈曾认识地质局局长章星。章局长通过陈曾找人，把一片树木砍倒盖上了楼，答应把一层和地下室租给陈曾开饭店，这才有了这些故事这天晚上，我与吕先相识，我赠他一本写反腐败的书《追踪动机犯》，算见面礼。他让我签名留念，随后便大讲起当今的腐败来。

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他说：“省里有个大官的儿子拉来外地的建筑公司，把河北的大项目全包了，这下可赚了大钱。就说按规定提 3% 的中介费吧，一个上亿的工程就是 300 万哪。人家依靠权力赚钱，可不像你这爬格子的作家！因为有权，你

还动不了人家！你敢说个不字，给你个小鞋穿便受不了。”

陈曾用筷子给吕先夹着菜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早把共产党的官场合看透了。大官的子弟们有什么本事？他们不是成了富家，便是当了大官，一是抓钱，二是抓权，靠什么？还不是靠老子的权势！你还别生气。我为什么跳出来，不给共产党干了呢？”

我不服气，凭我老陈的本事，我要和他们比量比量！我不跳出来自己干，不发展自己的事业，早晚还不得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陈曾的话让我心惊！

我说：“叫你这么说，腐败就没法治了？”

陈说：“我看没法治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我们不必管那些了。老吕，我现在缺资金，你给想想办法吧。”

吕说：“我们人大在曲阳有60万元款，县长说还我们，一直没还。你能有办法要出来，可以投给你。这恐怕要让市领导说话。”

陈曾问我：“方兄，你市领导有认识的吗？找我市委领导。”

我说：“我不认识市委书记，倒有位人大副主任是我中学校友。”

陈曾说：“那好哇！麻烦方兄去一趟保定。”

第二天，小高开车送我和妻子同吕先一块去保定。因为到处都在修路，不住堵车。绕任丘、高阳……很不顺利，本想上午可达，一直到下午二点才到保定。

路上，吕先不住他讲陈曾的故事。

陈曾在石家庄不是和电视台的主持人有那种关系吗？那女主持人还在吗？早离开电视台去美国了！那女人也贱，6万元便自己卖了自己。

怎么回事？咱省有一个暴发户叫孙明。那几年海南岛的土地便宜，孙明得到信息，便从银行贷出500万，跑到海南买了一大片土地。不久，土地升值，外国的老板们也着中了海南，那孙明待价而沽，等来了美国一家公司，他以2亿元价格转卖给了美国，一下子赚了一亿多元！他看上了那个女主持人，便向人们夸海口：你们看她漂亮可爱吧？一个星期以后，她就要和我睡一个被窝，你们信不信？不信？打赌！一星期之后，人们到他开的房间去找他，打开门，果然见那女主持人和他在一个被窝睡呢！老孙自己原来的老婆和别人绞在一起，他要雇杀手杀死那男人，以解心头之恨。这正应了人们说的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哪！

陈曾当时看上了女主持人，可他只给做了身高档衣服，动用了公款便挨查了，他哪有钱把女主持人弄到手玩呢？其实价码并不高，据说，她只向孙明要了6万元，便跟了孙明。孙明又把她送到了美国……一个很不错的节目主持人，就这样完了！

陈曾和孟花是在这以后……

“说实在的，老陈也没法甩掉孟花：她离婚了，又没有了工作，孩子又得了肾炎，她不靠老陈又靠谁呢？她也够惨的了……可有孟花管那龙迪饺子苑不亏才怪呢。我跟老陈说，要经营好，非换孟花不可，哪怕给她笔钱，让她白吃白喝呢，也比她掺和好。”

吕先的意见和我们想的一模一样。

我问吕先：“老陈投了多少钱在这个饭店？”

吕先说：“他能投多少，哪儿有钱投呀！”

我大惊：“那里外装修他不是花了20多万吗？”

吕先说：“饺子苑的装修，改造卫生间，连锅灶都是人家地质局投资，这我清楚。”

这就完全不对了，陈曾与我们签合同，白纸黑字写明他投了 30 万哪！我们当时就有怀疑，听吕先一讲，果然如此。

如果他没有投资，完全靠我们投资，就更要按我们的意见换下孟花了。

吕先说：“只要换下孟花，在北京开饭店还是可以赚钱的，你们必须这么办！”

”

到了保定，我找的人大副主任去涿州了，到傍晚才回来，我向他说明来意，请他帮助和曲阳县长说说，把欠账归还了，他答应了。我赠他一本《追踪劫机犯》，他说：“我的秘书小锦到你们县当县长了，你回老家吧，会受欢迎的。哪有老百姓欢迎，我们共产党的县委反而不欢迎的道理呢！”

我的这位中学校友是正直的人。

当天赶回廊坊已八点多，陈曾还在等我们吃饭。吕先说：“看来还得找别的领导。缺资金问题，我再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吧。”

就因为吕先要为陈曾想办法，便引出后边几个被陈曾骗了的可怜虫。倒霉蛋儿，闹得吕先本人也择不清楚了……

十、面对癌症：奇人议生死存亡之道

完全是一种偶然机会，改变了我生命的日程表。我在廊坊正以每天八千字的速度，写我的一部长篇：《一个传销商的手记》，突然接到北大同学王成珍的电话，说他爱人是大夫，组织本单位的人检查身体，让我和夫人一块赶到北京，接受专家医疗队的检查，不用我们花费用。我们剧院穷，已有两年多不普查了，可我自觉良好，查不查呢？珊月不想检查是怕查出疾病反而有负担，稀里糊涂过吧。她这么一说，我倒决定去检查了，因为矛盾总是暴露出来好。我鼓动妻同我一起回京检查，有病早治才好。

一项一项的关口过去了，除去高血压，心室有点早搏，问题不大，我很高兴。

看来这几年为了生存和受到马仁的打击折腾，竟没有落下大病，真是幸运。

到最后一项做 B 超，我躺上去，大夫查得很细，问：“你有什么感觉吗？哪儿不舒服？”我说：“自我感觉良好。”大夫说：“你这右肾已严重积水了，应该早做检查呀！马上去医院吧！”

真的有了问题！我咋一点感觉没有呢？

第二天起早，便去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挂号，再次做 B 超，结果相同。老大夫见了报告，说：“你是严重肾积水，需要住院。”

我给你写个诊断，你去联系住院吧！”

真糟糕！看来我的长篇要半途而废了。我已经写了几部这种完成一半的书稿了。

大夫说，到我这把年纪，要经常检查身体，应该半年一次。

年轻时人找病，年老了病找人哪！如果不是老王召唤我，我怕还不会

检查呢。

公家没钱，个人怎花得起？我感谢北大老同学的关心，又想起许多埋头事业，不注意身体的老同学、老朋友们。我给他们通了电话，赠送了我吟出的一首诗：患病方知学养生，遍查医书解病情。

嘱告友人多珍重，
自觉良好恐无凭。
B超CT显原影，
验血查尿报真形。
人到花甲勤查体，
劝君莫当耳旁风。

我在电话中告诉关心我的同学好友冉淮舟、张炯、谢冕，赖林嵩、赵日成、高鸿鹄……我给刘绍棠打电话，方知他因肝腹水住进了宣武医院。我们互相祝福：早日康复吧。

陈曾给我打电话，说：“不要紧张，咱活60岁了，还活60岁吗？我认识医大的杜校长，我给你走后门，让医院尽早给你安排床位住院；让珊月去哈尔滨找找她妹妹，看能不能找到承包咱们饺子苑的人……”我说：“你们去吧。”

他没有告诉我，他让珊月去哈尔滨是帮他的农场找种子。化肥……妻头走对我说：“人家老陈为你的病找人，挺费心的，我们也得帮帮他。地该种了，大虎也向我说好的：‘姨呀，你不能看着大侄子这样不管吧，我求求姨啦’……说得怪可怜的。”

她坐飞机去了哈尔滨。

我住院这天，陈曾和珊月从哈尔滨回来了，说找来了厨师长，带来了厨师，要在饺子苑搞特色菜，看来有好转的希望了。

我这天晚上住院，是陈曾让小高开车送来的。七人一个大房间，中间又加了我这个病床，病友如战友，大家很快便熟悉了。

一提这个住院日子，我心里一颤：5月16日。

“5·16”，这是给我带来灾难的数字，我因为被打成“5·16”，差一点家破人亡，怎么会赶在“5·16”这天住进医院，是吉兆还是凶兆？去它的吧！

五月十六日，
住院进病房。
七人共一室，
我来又加床。
左邻切除肾，
右邻割膀胱。
病室如战场，
共对病魔王。
同病共相怜，
有事大家帮。
忽忆5·16，
心中暗神伤。
由此遭大难，
几致家破亡。
又是此一日，

心头满阳光。

排去杂思绪，
一夜睡得香。

住院后又仔细检查肾严重积水的原因，B超、CT造影，加上查尿有无癌细胞……造影报告说是输尿管结石，我非常高兴，只要不是瘤子，便可免除一刀。

结石位置在输尿管下部最狭窄处，病友让我蹦跳，这样结石可往下移，如能掉进膀胱，随尿排出，岂不省事了！于是我每天起早便蹦跳……奇怪：别人结石都疼痛，我的结石咋没感觉呢？

有个病友说，那造影也不准确，我的病也是先定结石，后来看是肿瘤，这不把肾也摘除了吗！

大夫做出了手术方案：通过膀胱镜取石，定下周一做手术。

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妻子，珊月此时还在廊坊，我跑到街上打的长途，是司机小高接的，我让他务必转告。

妻从廊坊赶到医院去为手术方案签字，听有出几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便口来和我研究。我说：“无别的路可走，就听大夫的吧。”妻签了同意手术。回到我病床边她流泪了，说：“我就是这个命了！开头是女儿有病，后来我有病，我刚好，你又病了……”我说不出话。

住在医院，面对死神病魔，病友们互相宽慰，这环境容易使人把人生的苦恼看淡。我们常在半夜听到家属的哭声，那是一个人生命的终结，望着推进太平间去的人，会让人想到人生如此短促，何必让苦恼缠身？在住院部的门口，还有一个妇产科报喜牌，那牌子上每天都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出生的时间、体重、顺产还是剖腹产……而另一个门口与此牌相对，却是太平间的大门，生命在这儿结束。生与死好像很遥远，又如此地接近，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中间便是人生的旅程！每从医院外边走进来，看看这两个门口，便让人思悟人生。往前走，从中门进入各个病房，便是在人生路上与各种病魔和死神搏斗的人们！

我为这些病友的坚强、乐观所感染……

我认识了老红军张作武。我住院的第二天便认识他了，他住在小单间，那儿有一部唯一通向外面的电话。老人已77岁，割前列腺已开了三次刀，他说：“我不想住这小单间，大夫说没人住也是空着，你应该住这儿。什么叫应该？我在这儿开刀已经三天了，再过一两天，我还要撤回大屋去，那儿人多，不憋闷哪！”

老人是山西大同一个军工厂的老厂长。

老红军是四川人，14岁跟上长征的红军队伍，走到了延安，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他说，我在延安就搞军工，几十年了，没遇到今天这么大的压力和困难。我们厂的设备是50年代苏联最先进的发动机……当时合1亿元吧，到如今成了落后的了，要更新还得10个亿。从哪儿来这笔钱？可军工生产国家不搞不行，这靠乡镇企业不行啊！怎样才是出路？国有大中企业都碰上了难题。我们军工厂的工人都要吃不上饭了，工人见我就问：“老厂长，怎么办哪？”我这心里难受哇……大夫说你是老红军，应该住这儿，可我想：我这一宿得多花厂子多少钱哪，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一想到那些工人，我在这儿待不下去呀！

护理老人的是他的小儿子，也是616军工厂的工人。

听着老红军的话，我眼里含泪，因为我想到那些挥霍人民血汗的官僚们，他们贪婪地吸着人民的血汗，住着豪华的宾馆，每天都要几千元，而出生入死为人民打天下负过3次伤的老红军张作武，却因重病住个护理间而心不安宁！

果真第二天，他听说大屋有了床位，便搬回来了。

我告诉老红军明天我上手术台了。他说：“没事儿！疼一点咬咬牙就过来了。”

我已经挨了三次刀了，这对我这刀岁的老头子，是意志和体质的双重考验哪！”

我从老人身上得到了勇气和力量。

早晨，手术室来车子推我，我躺了上去，同室的病友全都送出门外，像送战士出征上战常我看着老红军向我招手，竟生出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感来。

进到手术室，上了手术台，安上心脏监视机，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早搏、间歇、三联率、负责麻醉的大夫说不能麻醉，怕心脏有危险。手术不能做了，做个膀胱镜检查吧。从尿道插进了管子，想窥视那输尿管的结石，也看不见，只好带着管子再去造影……不到11点，便又把我推回病房，没有做成手术，白白受了罪。因为把管子留在膀胱输尿管里，一有尿便钻心地疼，女儿在我身边，我咬牙不叫出声来。

这次造影结果却否定了结石。

老教授来了，把我叫到大夫值班室，把片子放在荧光灯下说：“你是作家，我们没必要瞒你，告诉你病情是为了共同配合。”

你看这是病灶，不是结石便是输尿管肿瘤，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像你这么大年纪，恶性的可能性较大，当然，最后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切开之后做切片检查才能最后判定。你应有思想准备，如果是恶性的，为防止癌转移，必须同时将右肾摘除……这是个很复杂的工程，就像人体的三峡工程呵！”

我说：“生死由天定，安危靠医生，你们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话虽这么说，可心里确实不想挨这一刀！

为了使手术安全，需要先养心脏，使心脏能承受麻醉。

老友赵日成来看我，他就是因肿瘤切除一个肾的。他建议我去气功医院，说那儿不少癌症都用气功化了。他送来了一本厚书，全是京华肿瘤医院用气功治疗好癌的病例，叫《生命在这里延伸》，这事例给我以幻想，如果能用气功治好而不开刀，是最叫人盼望的了。

星期天，我去了那个医院院长的家，是赵日成介绍我去的。

她问了我的情况后肯定他说，我的肾积水，她们用气功疗法可以排走……京华肿瘤医院在密云水库附近，是乡级小诊所，设备条件很差，这儿的大夫就是从肿瘤医院来的。看了我的病历，大夫却主张我还是先做手术，可减轻心理负担，不然，总觉着有定时炸弹似的……气功可以做辅助治疗……看来想不挨刀是不可能了，谁叫你得了这该挨刀的病呢！

我回到病房，和老红军一说，他主张我下决心做手术切除，别留隐患。听说他要出院，很留恋，他给我留下地址，让我去大同找他。我写了一首小诗赠之，做临别辞：长征胜利六十春，病房结识老红军。

万难千险等闲渡，

九死一生庆幸存。
医生护士细照料，
刀伤病痛咬牙根。
意志体质双考验，
红军本色是平民。

老红军走了，他的病床换了教育局的老于，他是位离休的老领导。他来治病，却提了一兜子书来。病友说：“走了个长征老红军，来了个抗日八路军，继续长征吧。”

老于一笑：“真能把老红军的传统继承下来，我们国家就好了！如今却兴的是‘新长征’呀！”大家都知道这首流传民间的新长征打油诗：当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

麻辣火锅腾细浪，
生猛海鲜走鱼丸。
桑拿按摩周身暖，
麻将打罢五更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

由此做话头，大家怒斥当今的腐败现象，讲起王宝森，说起陈希同来……
“哎，你在市里可听到什么消息，陈希同这案子咋没动静呢？”

听说陈希同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就是死不承认！还有人要保他呢……”“王宝森若不自杀，陈希同恐怕现在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呢。

也活该他倒霉，王宝森一死，什么也包不住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你们信不信？你们就瞧着吧。”

“老百姓心里急呀！就像咱这病人，有了病就想干脆开刀，把病瘤切了算啦，早晚是那么回子事，早切早松心，晚了还怕转移呢。”

“那也得把病查清楚，不能乱开刀，中央派尉健行来，就是要彻底查清陈希同等人的问题。看来江泽民决心很大，不论是谁，一查到底……”医生在行动。

今日白大夫通知我：下周二，六月十一日做手术。

我去那老红军住过的小单间打电话，通知家属。

推开门，吓我一跳，连说“对不起”。屋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抱着一个年轻女人，见我推开门，他们放开了，那女人说：“这是我们经理包的病房呀！”我说：“对不起，想用一下电话。”那女人不过二十多岁，她冷冷他说：“你到外边打去嘛！”

我只好下楼去找电话了，心里好不痛快，一打听方知，这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到医院还带“小蜜”，真可是“宁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后来得知他是膀胱癌，要切除，就是说以后要在体外带个尿袋，那时不知还能玩女人否？

近几日，夜夜有噩梦，梦中呼喊，惊动同屋病友。第二天，大家都说我夜里梦中呼叫的情况：一次喊叫鬼子来了，让大家快跑；一次喊叫救命……然而我梦醒后，竟全然不记得噩梦的情景了。怎么会毫无印象呢？人生如梦，难道在人生梦醒之后，也不会记得自己的所为吗？正是：夜半呼叫病友惊，黎明纷纷问梦情：一觉醒来全不晓，人生之梦与此同。

我这一生中有过多少噩梦？

十年动乱，我几乎家破人亡，如今也恍如做梦……到河北，那场经历 3 年之久的房子官司，似梦……到北京，我曾跑到陈希同家门口想死，如梦……今天，此时此刻，我是否也在梦中……我是真的患了重病，还是在做一场噩梦呢？

病房来了一位奇人探望老于，这是个星期天。

奇人一进屋，似带光明进来，病房阳光也格外明亮。此人仙风道骨，不同常人，见老于便道：“我正在南方周游，一日心中一惊，遥测，知老友住院，便从几千里外赶到北京。我的同伴曾不信我的话，待给你家打电话，知你真的住院，他才信服了。”

老于说：“你有真功，我信。”奇人说：“下周一出院后，我们再细说这次南方之行……。”老于说：“我正做全面检查，还不知结果。”奇人说：“下周一出结果，便知没事了，一场虚惊罢了！”

他们的谈话把众病友吸引了。

我凑到身边，问：“你是气功大师？”

奇人笑答：“气功只是一种本领。”

老于说：“他可是个奇人，他懂周易八卦，能预测未来，会几国语言，学贯中西，是气功大师，也是祖传中医，是经济学家，也是战略学家……。”奇人道：“徒有虚名吧。”

众病友都凑到奇人身边问：“气功真能化癌吗？”

奇人打量那人，目光如电，说：“有的可化解，有的则难，比方您这膀胱癌，就必须手术，那瘤子太大了。”

大家好奇，他怎么会知是膀胱癌？一点不错，他下周就要把膀胱切除了！

奇人说：“如今气功师也有真假，假的败坏了气功的声誉。”

鱼龙混杂，需要打假，你们看我这手指吧……。”他把手指伸出来，上下一动，便从手指上腾出白色的气雾来，有五条气如烟，随手指上下流动。我可真是亲眼所见，我相信他是真功夫。他去过西藏，曾经活佛指点，开了天目，能透视人体，我也相信了。

我要他给我看看。

他让我伸出手来，看了一会儿说：“没有大玻”这是真的吗？可我下周二就要做手术，开膛破肚了，我让他细说。

“你肯定不是癌，放心吧。医生既让你做手术，就做嘛，做了心净，也有好处，你的肾积水便可以解决了。”

我没有告诉他，他也未看我的病历，怎知我是肾积水？真是大奇了！

我说：“我如果真不是癌，出院后我定去拜访你，我要为你写一部书！”

他连连摇手说：“不可！人怕出名猪怕壮。普通平民，值不得写，有那精力写几部反腐败的书，倒更有意义。”

人们从自身之病，想到国家之病，便问：“你是预测家，你能测出国家的前途吗？”

奇人回答：“我们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人问：“邓小平还能活多久，他死后中国会不会乱？”

他答：“邓大人生死天机不可泄露。可以肯定的是，邓之后，中国绝不会乱，政策也不会变，只能越变越好。”

我问：“依先生之见，腐败之病如何治呢？”

他反问我：“你的病是如何治呢？你的病怎么治，党和国家的病便如何治。”

我们不解，愿听先生详谈。

我拿出笔记本来，那人摆手说：“值不得记，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党和国家亦是一机体，如同你我，不过比个人伟人而已，然患病治病道理相同。

“党和你一样，希望健康，人吃五谷杂粮，又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就会有病毒侵入；也可能是因自身抵抗力弱，抵不住病菌、癌细胞，微循环障碍，不能把毒素排除，便必然患病，党亦如此，十年动乱，体质虚弱，改革开放，环境大变，外部病毒侵入，内部土壤滋生病菌，均属自然，不必吃惊。

“你早让病毒侵入身体了……此时怕什么，怕你有病不知病，自我感觉良好，那就要耽误及早诊断。

“党也怕失去警惕，没有忧患意识，对自己的病没有认识，缺乏清醒头脑。

“你知道有病，就来医院找医生了。党也有医生，这就是人民、老百姓。只有人民才是一个政党的伟大的医生，他能指出病在何处。你是病人要和医生一致配合，推断，治疗。党也要和人民一致配合……“你住院了，做了各种检查，你是不是不愿动大手术呢？你的心脏不好，不能麻醉，便只好先养好心脏，使心脏先健康起来，才能承受手术哩！不然，一行手术，便有危险，这手术就要慎之又慎了！你不是去找过气功师，到过气功医院吗？你多么希望能用气功的办法，通过你自身的气而使病灶消除！党何尝不希望用自身的气去消除疾病，走向健康呢？

“可是当气功不能化解病灶时，便只能让医生治疗了。服药要中西药均用，治疗也要中西医结合，迷信西医、西药不行，反之，迷信中医、中药也不可。如何对症下药，辨症诊治十分重要。如果你真是恶性肿瘤，就必须动大手术，把肿瘤毫不留情地切除，不然，它要转移、侵害健康的肌体细胞，会使你丧命死亡。要开刀，可需要你的勇气埃“治党治国同理，无非也是三种办法：一是加强营养法。你住院了，要加强营养，要有物质基础，你住院也要花钱。咱们国家这十二亿人口要穿衣吃饭，必须搞好经济，让百姓吃饭生存，不然会生病，病会重的。当前，国家面临的大问题便是国有大中企业问题，千百万下岗职工失业问题，搞好经济就是国病的营养治疗法。二是气功疗法。一个国家或民族需要有气，民气就是精神。要提倡正气，使风气变好，这便是气功了。可光是‘气’不行，只迷信‘气功’，‘气朝，以为提倡学焦裕禄、孔繁森，那干部就不会贪污腐败，便是误会和夸大了‘气’的作用。三便是动大手术切除癌瘤了！为了党的生存，必须严惩腐败，切除癌瘤。不然，党必让腐败治死。前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就在于有病而未用此三种治疗之法也。”

我听他讲生死存亡之理，顿开茅塞，称赞他说得精辟。他却说：“十分普通的道理，你进医院使用此法，普通百姓都明白，有啥精辟可言？”

他说：“对每个人来说，最要紧者是接受患病的教训。如何在今后防病，那恐怕就要改变过去的不良习惯，改变一些生活方式，从制度上保证健康了……”我建议他给中央写信，他说，我这便是从江泽民的讲话中学来的，

不过化成另一种说法罢了。所以我说，前途无限光明……“为何这样讲？有一重要依据便是你们刚才的话。所有中国老百姓，包括你我之辈皆对腐败深恶痛绝，都在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最好的医生。人民是根，民心是根，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党，对个人来说，可称为母亲，有如歌中唱的：‘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可对人民来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儿子，人民是党的母亲；共产党员不能是人民的父母官，而人民才是共产党的父母啊！”

听完奇人所说，我在日记本上记下这儿句诗：我本党之子，人民是爹娘。

自身患重病，
更为国忧伤。
切盼惩腐败，
决心勿彷徨。
重新得民心，
再造党形象。
狠心切毒瘤，
肌体得健康。

周一，大夫们查房查到老子，说：“你可以出院了，所有检查结果全出来了，没有什么问题。”病友们为奇人预测之准而惊奇！

查到我这儿，教授说：“明天我和白大夫为你做手术，是良性恶性，切开便清楚了。精神上做切肾的准备，也不要紧张。”

我笑说：“视病瘤为仇敌，我们一同对敌，是大快人心之事，紧张什么呢？”

女儿来看我，又拿来一束康乃馨插入小瓶。女儿是我心，女儿知我心，女儿又送康乃馨，愿我健康且温馨。红花女儿心，抚我心伤痕，还如团团火，点我返青春。

师傅叫我去“备皮”。为了明日的手术，把皮上的毛全刮净，仿佛返老还童，变成了十来岁的童子。青春归心，我沐浴之后，在病床头写下一篇《讨病魔檄文》，文曰：“白色病床头，红色康乃馨，明日做手术，今夜写檄文……“病魔可恨，人之大敌。欺我老弱，未加注意。乘虚而入，潜进肌体。现代文明，千方百计。侦察顽敌，何方隐蔽。B超CT，造影寻觅。顽敌狡猾，面不清晰。令人气恼，令人性急。

为查仇敌，医护尽力。为我安宁，为我长远。开放切除，侦察不息！

“明天再上手术台，我心如同上战常战友叮嘱我不忘，胆子要壮勿心慌。仇敌在我肌体藏，潜伏越久越遭殃。除恶务尽不彷徨，顽敌必在手下亡！是石取出，是瘤切除。人生要和病魔斗，扫尽魔鬼是坦途。”

晚九点，护士唤我洗肠。一夜睡好，起早便来插胃管、尿管，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算完成，受罪自不待言。又是那辆车子，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后证实了奇人的预测，我不禁大欢喜。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感到腰腹部插着管子时，我心里乐了，说明肾保留着，说明并不是癌。大夫向我祝贺说：“手术成功了，不是肿瘤，是输尿管结节造成的肾积水。这下好了，把结节切了，缝好了。为防止伤口愈合时堵住输尿管，里边还放了一个管子，一个多月后抽出来就没事了……”半月后，我写了记录那次手术时的感觉——《跨越死亡》：“总要进入这一天，生命通过鬼门关！昨日家属已签字，签证过关

可要钱？心已有准备，炼狱进坦然。人生之罪不受完，岂能轻上八宝山？

“清早六点半，护士小赵插胃管。鼻孔强难进，恶心往上翻。

通过喉头强下咽，如同小蛇胃里钻。胃管插进一身汗，咬牙尿道进尿管。此刻亲人全赶到，伴车推入手术间。此门隔断亲人面，生死如隔万重山。

“二次又进此房间，再望顶灯笑灿然。身体再躺手术台，如一肥猪上案板。手再轻摸白肚皮，但愿早开早缝连。唯盼肿瘤为良性，留下右肾保平安。

“跨越死亡回人间，人生在世更坦然。珍惜生命分分秒，快快乐乐度晚年：名不求，利不贪，万事看透顺自然！君不见王宝森，贪吸人民血和汗，下场可悲早玩完；又不见陈希同，官居高位滥用权，贪图荣华人牢监，哪如咱普通老百姓，吃得饱来睡得甜！

“君若想不开，请望太平间。人生一世做好事，百姓心灵做花圈……”

我时时想起那奇人的预测，为何真的灵验了呢？

由自身不是癌症想到人们议论的腐败问题。

我祈祷：但愿我们的党没有患癌症，就像我这个肌体一样……

十一、陈曾父子和孟花掀起一场风波

在我住院的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外边发生了什么？陈曾坐着小高开的车来病房看我两次，只劝我好好养病，什么也没有说，仿佛龙迪饺子苑也形势大好，前途光明。

这些事是我后来知道的：

1996年4月中旬，我和吕先分手。记得他曾向陈曾说：“关于投资的事儿，我再给你想办法吧！”他果然为陈曾想办法了。

1996年4月的某一日，某工业总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看仓库的职工蔡松停薪留职了。他到石家庄找省人大财经办的副主任吕先，吕原来在航测遥感中心时与蔡松同属一个系统，两人认识，并无深交，此刻找吕帮忙，是想在河北西部投资小煤窑，说那个来钱。吕先说：“投小煤窑干吗，国家并不提倡个人开采，还有危险，我给你介绍个好的投资项目吧。就在北京和平里，那儿有个饭店正找合伙人投资，干饭店有50%以上的利润，只赚不赔！

蔡松听来钱便眉开眼笑，他是见钱眼开。听钱眼笑的那种人。他说：“好哇！

我若真赚了钱，绝忘不了吕大哥的帮助。”吕先写一个条子，让他去廊坊找陈曾谈。

陈曾此时正为龙迪饺子苑的资金发愁：原来珊月拿来的6万元现金，已让孟花花得差不多了，她不断来长途电话告急，让陈曾管管。陈曾家里的钱都控制在大儿子手里，老婆把得又严，拿不出来。蔡松带吕先的条子来，正像往饿狼嘴里送来一块肥肉，乐个眉开眼笑，当即用车送蔡松去与孟花见了面。

陈曾说：“你的合作伙伴来了！”

孟花见了蔡松紧紧握手，快把蔡松的全身都摇麻酥了：“蔡大哥呀！我欢迎你合作，你还能找朋友来吗？”

蔡松答应再找人来一块投资。

孟花向蔡松介绍：“我们这是地质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我们已投入 30 万把房屋装修差不多了，只需要给地下室再买些音响。卡拉 OK 设备、电视机了……投饭店最上算，风险小，回报高，我们有地质局做后盾，回报就更高了。我们和地质局订了 5 年合同呢……”孟花一口一个蔡大哥，把这饭店的高回报的账一算，蔡松觉得合适；待孟花给他安排吃了饺子，给他敬了酒，他便晕乎乎的了。他向孟花保证，找合伙者投进十万二十万的没问题。

蔡松从此便以有最好的项目向他认识的赵华、黄菊、孙镜宣传，让这三位动了心。他说：“你们先别说别的，哪天我领你们去看看那地方。”

这三个女人全是退休职工，都有些积蓄，此刻被蔡松领到了龙迪饺子苑。

孟花见蔡大哥领来了三个妇女，知道是向她口袋里送钱的傻瓜，心里乐开了花，热情接待：“蔡大哥，来了……是先尝尝咱的饺子，还是先到办公室坐？”

蔡松说：“就在这儿，先吃饺子吧，我请客。”

孟花马上端上茶，把菜单拿来，说：“吃饺子，咱有 18 种薄皮大馅。名声打出去了，净回头客。你们一样点一些，都尝尝。”

他们吃着饺子商量，都认为投这儿肯定赚钱。

黄菊是湖南邵阳人，学工的，60 年代初大学毕业，是北京塑料研究所的退休职工。她首先表态：“投吧！我积蓄了三万元，全拿出来算了，有啥商量的哟！”

黄菊的老伴也是工程师，退休在家；一个女儿在美国，和丈夫在一起；儿子自己有公司，也用不着向爹妈伸手要钱。她不用和丈夫商量，也不用和儿子说。

赵华却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和女儿商量。

赵华的家庭有不幸的历史。她今年 56 岁，本来是北京市人，老了却因在冶金部西北地勘局退休，户口留在了西安。她父亲是中国大学学生，为事业，1946 年去了台湾。不久国共内战火起，设想到回不来了，苦了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生活。母亲刚解放时在公安部队幼儿园当教师。1958 年下放到外地，说两年后回来，可两年后有北京幼儿园要她，档案却丢失了！妈妈受此打击精神几乎失常，从此她也不能回京了！赵华 1965 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到了勘探队，到了大西北，因为父亲在台湾，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她性格也变孤僻了。她不想结婚，想抱独身主义。可一次勘探时从山上掉下来受了伤，一个工人救了她，她感激工人的关心，便和这个工人结婚了。

丈夫也有自己的辛酸史，他父亲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解放战争时由于接触了地下党，他投诚起义了。本应照起义人员对待，却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杀，到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长期的受压抑的日子，使丈夫觉得落实政策也没多少意思了。

年轻时，他从初中被挑上了空军，一心想报效国家，可一政治审查，便被刷下来了，他便进了地质勘探队当了工人；为了多得一些补贴，他成年在野外生活，患下了一身疾玻赵华为了女儿在西安上学便先到了西安，大女儿从翻译学院毕业，来到北京，她便跟来了。

她在北京租了两间住房，为了承担那房租费用，她找了个打工的地方。她前些年和远隔空间和时间的台湾老父联系上了，父亲给她寄钱她不花，因

为父母还没有团圆。家分了四处，她想让父母老了在北京团聚，便在顺义买了套房，交了几万元，然而却受了骗。仅存的3万元再也不敢动了！那是老父亲的血和生命的积蓄，是他对远方妻子、女儿的思念……她怎能轻易动用呢？

另一个妇女孙镜年轻些，48岁，“文革”前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当过班长，本可以上大学的，“文革”风暴刮来了，折断理想的翅膀，落到现实的土地，当了公汽的售票员。她精明过人，二十多年的卖票生涯，使她明白钱是一分一角积少成多的。

她退休了，积下了三四万元，一下子拿出去，她得好好思量。

蔡松问这三位能投资多少，大家说也就是三万吧；可赵华、孙镜还要回去商量了再定，有点让蔡松失望。

吃完饭要结账了，说好请客的老蔡掏口袋，半天也掏不出钱来，赵华看他不想“出血”，便从自己口袋里拿钱交了，蔡松还一个劲说：“别别……这多不带劲，让你拿……”过了两天，他们约定一同去廊坊与陈曾订协议书。

1996年6月26日，珊月在廊坊偶然遇到这四位不认识的一男三女，只听陈曾说了一句“这是来给龙迪饺子苑投资的”，便领他们去星星酒家吃饭去了，并不叫珊月同去就餐。陈曾对这四人介绍说：“那个女士叫珊月，也是咱们龙迪饺子苑的股东。”

珊月在办公室吃的便饭，她对谁来投资并不感兴趣，她多次听陈曾说：“饺子苑的事你不用管了，算我借你的钱，到年底还你，至少要有3万的利息。”既然算借钱，便更不操心了。她想帮陈曾把农场办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在他困难时帮了他，他总不会亏人吧。

虽没让珊月一同就餐，可在陈曾与这四位签订的协议书上却写上珊月的名字，算是和陈曾、孟花一起的“甲方”，蔡松、赵华、黄菊、孙镜四人算是“乙方”。

这份协议是我后来见到的，上写：甲方投资30万元，乙方投资12万元，按股分成，风险共担，合同期5年，从1996年6月26日至2001年6月26日。

合同要双方签字，陈曾叫来珊月，说写了合作协议书，你也签个字吧。

珊月说：“我签什么字，都听你陈曾的算了。”

回到北京，四人约好去龙迪饺子苑交款。这天，赵华有事让女儿张芳去了，别人有的拿来现金，有的拿来存折。临交钱时，孙镜心犯嘀咕，便少交了5000元。张芳不想交钱，她有种感觉，看孟花不像是正经八百的好人，这是从那双眼睛里感觉到的。可黄菊心急火燎，催她：“你妈都签了字的，别人都交了，你就也交吧！”她终于拿出了那仅存的3万元。

孟花给开了收条：“今收到××交款叁万元，收款人孟花”，并加盖上龙迪饺子苑的公章。

这四位中两位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另两位也算是精得可以的人物，竟都没发现这个收条的问题！

甲方、乙方都在兴奋之中。

甲方的孟花终于又把11万5千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任自己花用了，能不高兴吗？她最近便想飞一趟香港，正愁没有路费呢。

乙方也兴奋：自己的钱不用在银行贬值，钱能生钱，到年根儿，将会有一个丰盛的回报了……1996年7月13日，星期六。我刚吃完中饭，妻带

着陈曾和他儿子大虎来医院了。陈曾说：“今天商议饺子苑的事，开个股东会，方兄也去吧。”

我换下医院的衣服同去。我住院有两个月了，已做完了手术，肾积水也排除了，只等把存在里边的管子拔出便完事大吉。

不知饺子苑可有了什么变化？

到了孟花的办公室，这儿已有我不认识的四位了。那个脸黑、小眼睛、胡子拉碴、样子像没有洗脸的男人坐在沙发上，人叫他小蔡；其他三位女的全坐在椅子上；珊月和我也坐在沙发上。从没见过面的女会计王秀琴坐在桌子旁，陈曾坐在她对面桌子的旁边。孟花坐在长沙发的另一头边上的椅子上，正和陈曾面对面。

陈曾说：“今天各位股东全到了，咱们开一个股东会。”

话音刚落，孟花便插言了：“现在我没法干了。从东北来的厨师长小沈，根本不听我的，也不下灶，这些天毛利才 27%，还不到 40%呢，一天营业额还不到 800 元，过去每天有 50%的盈利哩，这还怎么干？...陈曾说：“怎么会只有 27%的利？把小沈叫过来。”

小沈来了坐在一边，他说：“我心里有数，每个菜的成本多少，售价多少，都在 50%的利上，不可能 27%。”

孟花说：“你让会计说呀！”

会计王秀琴拿起一堆条子说：“按给我的条子算账，是不到 40%.....”这是咋回事呢？小沈坚持说不可能.....只好先让小沈退下。

珊月清楚，小沈是她从哈尔滨请来的厨师长，找小沈的毛病，实际是对着珊月来的。

珊月说：“原来说每月会计报账，我们投资半年多了，也该把以前的账报一下，这样，也好在新的合作伙伴来时心里有个数.....”一听说要报账，孟花便急了，她马上说：“陈总，我辞职，我干不了！有人不干事光找事，闹得厨师都说没法干。我是坚决不干了！”

陈曾劝她：“你先别说不干，我问会计几天能把表做好，给大家报报。”

会计支吾，说：“我跟孟经理商量吧。”

孟花大叫：“别找我，我马上辞职不干了！”

珊月知她以攻为守，怕不让她干，便说：“你不干可以让别人嘛，小蔡干吧！”

”

本来小蔡给珊月说过他可以当经理把饭店办好，而此时他却推辞摆手：“别，别，我不行，没经验.....还是让孟花当经理孟花却来了劲：“有人就是想捣乱，有这样的人，没有好！”

珊月说：“你跟谁都合不来，人们都叫你炮团团长，跟谁都打炮吵架，倒说别人捣乱了！”

孟花呼地站起来：“就是你捣乱！你这破鞋！你给我出去！”

她像一只母老虎，向珊月扑过来，手拿着卷起的杂志向珊月的脸上扔去。

“我为什么出去？我有说话的权利！”珊月还没动，便被孟花抓住衣服狠劲一扯，撕烂了。她一边骂着“你是破鞋，勾搭男人！石家庄有名.....”，一边厮打珊月。

我气得身上发抖。她明明是破鞋，是人家的小老婆，怎么会血口喷人，

把污水泼给别人。她简直是疯了！

我刚刚做完手术，没有力气去把她拉开，却让这母老虎把我的手指扭了。

这时陈曾坐在一边，并不拉架，只说：“孟花，你怎么这样那几位新来的女人上去把孟花拉开，一个劲儿说：“有话好好说，大家凑在一块不易，想办法把饭店搞好要紧。”

大家站在中间抹稀泥：“咱们都是朋友，别这样……”大虎在门口说话了：“我爸爸事多，也管不过来，我想让我爸爸退出来，把股份让给孟花。孟花当董事长，然后由董事长聘经理，这才合适。”

此时，才露出陈曾父子开会的本意，他们想金蝉脱壳，溜走孟花还在叫嚷：“你珊月不就是拿了6万元吗！给你！你走！”

正好！珊月马上说：“好吧，给我6万元，我走！”

陈曾对孟花小声说：“你喊什么！你有钱给她吗？”

孟花却没听进去，对大虎叫：“大虎！你知道，我给你们陈家挣了多少钱哪！

你们这样待我呀……”她哭起来了。

这样还怎么开会？我对陈曾不拉架不说孟花很不理解，便对陈曾说：“我住院已把家中的钱花光了，你把钱还给我们吧。”

陈曾说：“好吧，我还给你们。”

大家都感到没法再呆下去，便去了餐厅，直到这时大家还没有吃午饭呢。

我们再不能和这泼妇打交道了。

大虎留在孟花的办公室，说是劝孟花，实际是为她出主意，商量下一步的谋划……一会儿，只见孟花上到餐厅来已是满面喜色，好像并没有发生刚才的一幕闹剧。

这时，我感到了是陈氏父子和孟花共同策划了一场风波，一出闹剧：把珊月赶走，杀鸡给猴看。于是，那四位新来的人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十二、唱红脸，唱黑脸，陈曾父子不再露面

在医院里，我揉着被那泼妇扭伤的手指想：她为什么这么疯狂呢？陈曾为什么会任她撒泼而不制止？

是因为珊月从哈尔滨找来了厨师长，知道了她的底细，她不能独霸而引起她的不满，所以在这一天把心头的怒火发泄出来吗？

听说她的儿子肾炎严重，住进了北京的医院，是她的心情烦躁才发火的吗？

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前些日子她因和厨师长闹矛盾，找陈曾，长途打到廊坊陈的办公室，没有人接；连打几次都说陈曾不在，干什么去了？有人告诉她：“去哈尔滨了，是带珊月一同去的……”孟花一时浑身发凉，愣了，心里骂陈曾这个没良心的，又找上珊月，便把我甩了！走也不用电话告诉我一声，还是坐飞机

走的！她的醋劲越来越大，夜里睡不着觉，便把电话拨到了陈曾的家里。

是汪荣接了电话，一听是陈曾小老婆的声音，没好气他说了一句：“不在！”便把电话挂上了。

一会儿，电话铃响，又是孟花打来的，听筒里边带着哀求的声调：“大姐，我求你不要放下电话，我要告诉你老陈的情况，你听了也不要生气……”汪荣说：“你说吧！”她不知道老陈出了什么事，要听下去。

孟花说：“我知道老陈上哪儿去了，他让珊月勾引走了。他们现在哈尔滨的宾馆里，正寻欢作乐呢。那个珊月可是石家庄有名的……你想想吧，她丈夫住在医院里她都不管，要跟老陈走，还不是图上你家的钱了，老陈已经给她六七万了，以她的名义在我这儿投资……我把这事告诉你了。”

孟花随口胡编后把电话挂了。

打完电话，她疯狂大笑，跑出她的住所，到夜总会跳舞去了她知道，汪荣不会饶他陈曾，让老太太为我报复吧。

果然如孟花所料，陈氏父子一进家，便受到汪荣的盘问：“你们去东北办农场，让珊月去干什么？是珊月把你老不要脸的勾去了吧？”

陈曾慌忙解释：“是让她带我们弄化肥、种子……她在那儿熟。”

“有大虎呢，你去干什么？”

“她为咱家借了钱，我得去还人家呀！”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给她钱了？北京饺子苑她投资了？她哪儿来的钱投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北京瞒着我搞那个饭店想干吗？你是想和你的小老婆们鬼混，你……太坏了，你这个大流氓！”

大虎上来说：“妈！你想多了。我知道，饺子苑那钱是珊月拿出来的，她还给咱家买个双人床垫，不是在咱家吗？咱们一分钱也没投呀！我爸都是为咱这个家……”汪荣说：“往后不能再掺和那个饺子苑的事儿。大虎你去，把那个饺子苑交给孟花，也让我心净！”

就这样，他们父子来到北京，是想巧妙地逃脱，没想到孟花却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见陈曾又把珊月带来了，她觉得自己失宠的痛苦，必须在陈曾面前发泄出来。

这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心地善良，一心想帮别人的珊月，是不知道有人在背后干的这一切的。她不管丈夫住院去为陈曾在东北跑化肥、借款，让他家把地种上，花了那么多力气，得到的竟是这个结果。

她第二天给陈曾打电话，说：“什么也别说了，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了，你快把钱还给我吧。不要利息，只要把钱还了就行了。”

陈曾回答：“我和大虎商量了个意见，一是下周便把你的9万元还给你；一是如果不还你，便决定把孟花清除，她太不像话了！你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这是陈曾的又一次承诺。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方案，把钱还给我们了事。可过了两天再也找不到陈曾了，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有人接时却说没见陈总来。

电话找到大虎，他说：“我们家乱套了，我妈把我爸软禁起来了，不许他再出来，不让他再去北京；哈尔滨的办事处也不建了……”珊月这时有了受骗的感觉。

必须找到陈曾，让他兑现承诺，把事说清楚。

这天中午，我到邮局给陈曾打长途，打到他的家，是汪荣接的，她问我是谁？我在哪儿？

她说：“你住医院里，可珊月一直在廊坊。她又和陈一块去了哈尔滨，还住在一块儿，影响很坏。这儿的人都嚷嚷，你就没有听到吗？我们都是育儿的了，你可要管住珊月，我在这儿看着老陈，不能让他们有接触了。闹出事来，对儿女们也不好。你也告诉珊月，她若再来廊坊，我也要把她赶出去！过去我就跟你说过，你的老同学是个大流氓，他的本性难改！”

我脑子闪出她第一次说老陈是大流氓的情形，可那是说的跟孟花呀，怎么又和我妻子扯到一起了呢？

我说：“老陈不是和孟花有事吗？”

她说：“现在他和珊月比跟孟花更严重了……”我不想再听，浪费我的电话费，便挂上了电话。

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呢？我相信妻子绝不会有那种事儿，也怀疑起这女人说的陈曾和孟花的那些话，那是不是也是这女人多心吃醋呢？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了。她是真的把陈曾软禁起来，还是耍个花招，以此因由不让陈曾还账，也不让珊月再去廊坊要账了呢？

那就等大虎来北京还账吧。

等过一个星期，不见大虎的影子。

给他家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妻有不祥预感：看来他家要赖账，不想还了，那汪荣的电话，不过是个花招罢了。

我设身处地帮陈曾想：也许他目前确有难处。他的生活并不幸福，那是一个互相欺骗，没有真情实话的家庭。他和妻子没有感情可言，也就没有了信任。现在妻子把他看得很严，他失去了个人的自由，才不和我们联系的。我想，作为从北京大学校门走出来的人，应该有良知……只要有办法，我便给陈曾打电话，可从办公室到他的别墅，全没有人接……我在7月下旬出院，共花住院费29800元，剧院没有钱支付。为了照顾老干部，古平院长特批：每月报销300元。自从马仁离开剧院，夏主任也调离开行处，剧院对我已非常照顾。剧院穷，有什么办法？我算了算，我这2万多元要报8年多才能报完哪！

我必须把陈曾拿去的钱要回来。

8月31日，星期六，晚上我要通了陈曾的电话，他接了，冷冷的声音，老婆似在旁边。我说：“老同学你失踪了？别说啥了，你快把钱还给我们吧！”他说：“一定，一定，放心，没问题。”我问：“说个时间，什么时候？”他说：“不好说时间，我尽快吧。”他放下了电话。

总算和他通了一次话。

此后，又没有了音讯！

9月3日，我又去邮局给陈曾打电话，又找不着了。打通了二虎的办公室，人说陈总和他老婆回石家庄了，什么时候回廊坊，不知道。

看来，说想办法是应付。他想什么办法？如真想还账，还会这么拖时间吗？

9月11日，我去市文化局，听说新楼已完工，询问何时能分配？管分房的何处长说：“在三间房那儿，我们要了一百套安居工程住房，房子不错。你们要的话，就准备款吧，局里给补贴1/3，一平米合1300元。你要三居

室一厅的，有 10 万元就够了。

不过，你要快登记，晚了可就没有了！”

陈曾拿走的钱正好是这个数！

时间紧迫，我需要快让陈曾还账，不然，这次机会便失去了，都说那儿的房子不错。

9 月 17 日这天又在电话里找到了陈曾，他说确实去了石家庄，参加了老干部组织的什么活动，我向他恳求：“快把 9 万元还我们，我们要买房啊！”

他回答得干脆：“这一两天，我就给你们结账，还你们的钱，你在北京等我吧。”

我高兴地告诉妻子：“这回可有希望了！陈总说一两天来北京送钱。咱们去三间房看看新房吧？”

妻说：“急什么，陈总送来钱再去不迟。”

一两天过去了，不见送钱的人影……

又一两天过去了，听不见陈曾的声音……怎么回事？他遇到什么意外之事不能动身？他是患了重病还是出了车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定是有了特殊原因，因为上次电话里，他回答得那么干脆，肯定。

9 月 21 日，星期六，我带儿子到廊坊去看陈曾，以探个究竟。起了个大早，换两次车，到了木犀园长途汽车站。在附近一家小吃店，想喝碗粥吃个包子，却吃了一顿气：小米粥米粒可数，放下就让你交 5 角钱；两个菜包子没有多少馅，愣要 1 元。

太宰人了！我说：“吃完了给钱不行？”服务员说：“不行，吃了你要走了，我上哪儿找你？”“哎，你这服务员咋这么说话？喝碗稀粥，怎么会跑，你这不是侮辱人吗！”服务员说：“骗吃骗喝的诈骗犯多啦，谁知你是不是？”我气得站起来：“你们老板是谁？”

我要看看你们的营业执照……”。屋里吃饭的人劝道：“你就挨回宰吧，别较真儿啦！在这儿吃饭的，都是平头百姓，好欺负。”

我非要看看营业执照不可，我要在晚报上曝光，我拿出个小本本来。这两间大棚，烟熏火燎，又黑又脏的墙壁，看遍了也没看到营业执照。一个中年人过来说：“对不起老同志，俺们老板不在，我向你道歉。这些服务员全是临时工，总说他们也不行，态度是不好……”见人家道歉，我也气消了。儿子说：“快走吧，咱 10 万都叫人骗走了，人家宰你几块钱还较什么真儿呢。”

儿子说得在理。

我们赶上去廊坊的汽车。出门便生气，我想今天办事不会顺汽车走了两个半小时才到廊坊。我们在星星酒家门口下车，时间是十一点一刻，饭店很冷清，我们去陈曾的办公室，门紧闭，打听人，说不知陈总上哪儿去了。我们不能死等，便步行到他的“仁德斋”别墅找他。

院里，没有停放小高开的公爵王，肯定不在家了。养肥的狗见生人进来，叫了几声，一个看家的老头出来，说陈总不在，他老婆也出去了。

我和儿子进到屋里等他回来。

陈曾的桌子上摆着一份复印材料，令我一惊！

那是一份毛主席纪念堂向司法部门提供的揭发陈曾盗用他们的名义制作“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的复印材料。材料上说：“1994 年，陈曾，孟花找过我们，说只要我们同意用‘毛主席纪念堂监制’的名义，对大

家都有好处。我们没有同意，他们竟擅自制作了，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们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我们的损失……”原来，陈曾说的要为他们制作“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打官司是这么回事！他说这场官司若打赢，便可得到 600 万元的收益，看来他赢的希望没有了。

他可真是胆大的“将军”！

等到十二点还不见回来，我和儿子要去吃饭，便离开别墅，又回到星星酒家，见到陈的二儿子二虎，他还叫我“老师”，我说找他爸爸，他说呼他吧。

我们等来的不是陈曾，而是汪荣。

我问：“陈曾呢？”

她说：“不知道。”（瞎话！他们刚才在一起，听说我来，陈不露面，让她出面应付。）我说：“我是专程找陈总来了。”

她说：“找他有啥事？”（装糊涂！）

我说：“不是说好还我们钱吗？”

她说：“还什么钱哪，你们那钱在北京饺子苑哩，别找老陈要啦！”（她自食其言，忘记她说过的活了！）我说：“这事老陈清楚，我得见他。”

她说：“你们没吃饭吧，先吃饭吧。”

她领我们进了酒家一层。

坐在饭桌旁，汪荣又说起珊月的坏话：“我告诉你，你可得要看住珊月……”儿子听不下去：“别扯没用的了，你家快还钱吧！”

她一瞪眼：“大人说话，你小孩子家别掺和！”

我说：“今天我怎么也要和老陈见一面。”

看来，陈曾藏不住，躲不过去了。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诉说了遇到的难处：“你到我家去过，我们在那儿已住了快七年了，最近文化局的新房下来了，要我们准备钱购买，这是我们盼了六七年的大事，你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也得帮我们一把，别说你欠我们的钱，就是我来向你借，你在这个时候也得伸出援助之手吧？”

陈曾说，“不是我不想还老兄的钱，是这一段钱太紧张，我实在周转不开。（他什么时候钱不紧呢？）你说，那房什么时候让交钱哪？”

我说：“通知说国庆节前交款登记，不然便耽误了。这回，没多有少，你先给我们一两万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一两万也没有。这样吧，过了国庆节，我一定把钱送了去。”

我说：“你说个准日子，过了国庆节哪一天哪？”

陈说：“过节一上班，我便送去。”

我不放心，怕他空口无凭，便说：“那我怎么和文化局说呢？”

陈说：“我给文化局写个条还不行吗？”

我说：“只能这样了，过了国庆节，你可一定去，别再给空头支票，支应我们了。”

陈又说：“一定，一定，老兄放心。”

他拿出一张纸写了这样的信——

北京市文化局：

方燕。珊月在我处有九万元，因节前确有困难，国庆节后十大一定把款付清，在分房问题上不要为此拖延。

特此陈曾

（过了节上班后，五号一定去）

96.9.20

我知道他给文化局的这个条子是没有用的，但我毕竟得到了他陈曾的一个字据，第一次写明他陈曾是拿了我家九万元。这是我这书呆子跑来的唯一收获。过后，律师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你这个条子可有用，这就是物证。

过节后上班了，说一定来的陈曾根本没有人影！看来，他当时写那个条子就是应付……这样的人还能让人相信吗？

可我们那时仍对他抱着希望，仍用好心猜测他不能来送钱的原因，并仍然原谅了他。

十三、赖账打人，富豪露出穷凶本相

那个总说“一定”的陈曾，总没有“一定”。

国庆节后不见陈曾的影子，便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长途电话，又是不在，没人接，偶尔通了，接电话的人也是回答不知陈总上哪儿去了。他又失踪了！

妻说：“把电话费收据都留起来，到时候好跟陈曾算账。”我心想，还算什么电话费，它耗的是我们的生命，这是能用金钱计算的吗？只要能还回钱来，别的就不用说了。

我们一直找到12月份，仍找不到陈曾。

12月14日，星期六，蔡松、赵华来我家，告诉我他们知道的消息：听龙迪饺子苑的服务员递出的话，孟花要走人，也要把他们打发走，说要宣布破产啦……看来，这个陈曾要玩咱们。得想办法，找律师咨询，咱们该怎么办？

蔡松说：“我看哪，这里边有鬼，一开头就是欺诈。陈曾肯定没有30万投资，孟花要破产，是陈曾的主意……我们合起来，投资就是20多万，占大头。咱们一起商量好，做个决议，把饺子苑管起来，不能让她宣布破产哪！”

珊月说：“那天开会我就说让你干，你那么推辞干什么？现在想干可不那么容易了。”

赵华说：“咱们的血汗钱就这么白扔了？咱找找律师，看怎么告他们吧。”

我们是该想想办法了。蔡松、赵华他们去找律师了，我们也该找律师问问。可我不想打官司。我们毕竟是北大同学，是同在博雅塔下走过的人哪！我跑到邮局，排队打长途电话，这次真找到了陈曾。

我问：“怎么办哪？又几个月过去了，什么时候还账啊？”

他说：“一定还，一定……”

我说：“你别说一定了，说具体的吧，若不我找你面谈……”他说：“我想办法吧。你不要来，来也没用。”

他把电话放下了，纯粹是应付人！他还不耐烦了。难怪有人说：如今你若想当大爷，让别人求你，你就想法借钱贷款吧。你借了钱不还，你就是大爷，那借给你钱的人反而成了孙子。他要求你还账，你不还他，他也没有办法。你设法贷出银行的款来也不还贷，银行也不敢惹你，你便成了银行的大爷……也许这类现象太普遍了，逼得戏剧家出了一个小品：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钱不还，让黄世仁也没了办法。这小品让我极不舒服，怎么把赖账不还的人说成是善良的农民杨白劳呢？那些赖账的才是那要坑人害人吸别人血汗的黄世仁式的人物。

我的北大同学怎么会成了这种人？

我托朋友找到中央司法部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郭律师，他说到我家里来。我们这个小窝，实不敢请人到家，没有办法，只好坐在新街口麦当劳餐厅说话。我们只要了杯咖啡，就算做接待。

我拿出 1995 年年底订的合同给郭律师看。

郭律师说：“你这个老同学很狡猾，他是懂法律的。如果你要打官司，按这个合同说比较麻烦，他千方百计把你绕成投资，你投资了，就要共担风险。他说企业亏损了，破产了，便把你的钱全坑进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妻说：“你说得太对了！当初写合同时，大虎就说过这话：‘饭店赚了钱大家都乐，要是赔了，也是大家承担。你可不能光想赚哪！若是欠下账，还得还账呢。’

一开头，他家就想坑人郭律师说：“他不是说过算他借钱吗？为什么不让他写个借款的合同？”

妻说：“我们太信他说的话了，哪知他说话不算数呢。他说我这儿有一千万的家业，还怕还不了你这 10 万元吗？是呀！我们便不好意思让他把说的话写成文字了。”

郭律师建议说：“你们是北大老同学的关系，他实在不该坑你们。你还是以同学之谊找他好好谈谈，做到仁至义尽，求他给你们写个借款合同。他如果真写成借款，那就好办多了……”我决定明天便去廊坊找陈曾。

妻回家对我说：“我想跟你去廊坊，亲自质问陈曾，就说你家在东北办农场，我帮了你多少？你说在哈尔滨建办事处，你说给我什么待遇，我都没有要，就连飞机票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到今天你就这样坑我们，让我们把那一批房子耽误了，你还有良心吗？你的良心喂狗了吗？可左想右想不能去，他老婆见我去准闹腾搅和，正事就办不成了。我看，他家就是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用男女关系搅，为的是不出钱。在哈尔滨，他老婆给我打电话，我说了她一句：你真可悲！那纯粹是爬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虫！这次你跟儿子去，一定让儿子耐住性子，跟陈曾好好说话，千万别吵，别急，只要求他给改写成借钱合同，就算目的达到了。你可千万别激动生气，你的心脏也受不了。想开点，顶多咱那 10 万元不要了，咱个还照样活吗？只要不伤身体……记住，好好说，别生气……”妻嘱咐个周到，她提着心送我们走，又叮嘱有情况随时来电话，今儿个一天开着手机……第二天，我和儿子起早“打的”，直奔海户屯，赶八点的去廊坊的班车。

星星酒家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热闹，门口冷冷清清。

我找到管客房的小孔，问他：“陈总在不在？”他说：“没在这儿。你看这冷天不生火，暖气全停了，旅馆也没有客人，他那办公室也整天关着……”我说：“打个电话吧。”

小孔说：“这儿所有电话都停机了，因为交不起电话费。旅馆服务员也都回家了。你若打电话，我领你到外边打公用电话去吧。”

他领我们转到一家小饭馆给陈曾家里打电话，但总有占线的声音。小孔说：“那可能是他把电话机摘了。要账的人多，他不接电话了。”

我带儿子只好去他的仁德斋别墅找他了。

陈曾的司机小高开门，公爵王专车在院里，肯定陈曾在家。

我们直奔他的书房。

陈曾正低头写什么，见我们到来，大为惊愕，沉着脸说：“我不让你来你还来，来了我也解决不了……”我用温和的低调说：“唉！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珊月也急病了，只有亲自来找你。上次来，你说过了国庆节便去送钱，我们一直等呵，结果那拨房子也分了，没我们的；这就要过年了，新房又要分了。你可一定给我们解决，把钱还给我们吧。”

他把要写的东西推到一边，把身子扭过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困难，可我比你们还困难哪！”

我说：“可你当初说过，你家趁一千万家业，怎么也不会亏了我们呀！”

陈曾说：“我没想到今年东北一万亩庄稼全让大水泡了，颗粒未收，光东北农业，我就亏了300多万！我再有家业，也搁不住哇。”

我说：“你有高级别墅，我可是还没有房住呢！”

他说：“我实话说给你吧，我还不比你哩，我这别墅是我贷了银行300万元盖起来的；我又用它做抵押贷了300万，这别墅早就抵押出去了，我这是600万的贷款，利息就够我受的！我现在也真没法贷款了，银行也不贷给了。如果能贷款，你这10万元不成问题，我现在贷出来，马上还你，可眼下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说：“你有几个饭店，每天都有十几万的流水呀！”

他叹口气说：“现在饭店也不景气，勉强维持，有钱也不敢往银行里打了，打进去便被划走了，我欠下银行的利息都没有还哩，外面欠星星酒家的钱也有五六十万，要不回来呀！”

我说：“这样吧，我给你要账去，要出来还我们不行吗？”

他说：“可是政府机关各关系单位欠的账，也没法去要。”

他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我内心有些上火，说来说去就是不想还我们的钱呗！

当初你吹嘘说你是千万富翁，今天你哭穷说还不如我们好过，到底哪个是真的？

我说：“珊月说无论多少，你得让我们拿回点钱去，不然我们没法回去了。”

我和儿子做个不想走的表示。

他要想法把我们支应走，便说：“今天组织部长要找我，我要出去了，这回我是实在没法解决了，若不你们先回星星酒家休息。”

他要穿衣出门，给我们下了逐客令。我和儿子只好再回星星酒家，并告诉他：“你先办事，回头再说吧。”

我和儿子又回到冷清的旅馆，见挂着中云公司牌子的门开着，便进去了。这是他的二虎当经理的公司，有陈曾的外甥燕生和一个叫不出名的小伙子在这儿算账，对我们很冷淡。

没有暖气，只有个红外线炉点着，我去烤烤手脚，想打个电话给廊坊

的朋友。

拿起电话，里边说没有交费停止使用，便只好放下。

暖和了一会儿，我和儿子出屋，商量办法。

我说：“看样子陈曾说的话是真的，他眼下真是困难，原来我以为是他自己的豪华别墅，现在知道，全是用国家的钱盖的，又用它做抵押了，看来他够呛……”儿子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够呛啥呀？他一贯说谎话骗人，你怎么还信他说的话呀？他说东北的庄稼淹了，他亏了300多万，明明是胡说！他不是贷的国家的款去办的农场啊？他贷款没买机器呀？就是亏了，也不过是种子化肥和土地租金，那也不会是300万，撑死了100万，还是国家贷的，他个人损失什么了？”

这些人全是坑国家的主儿！我听他说，当时就想反驳他，只是我记住你叮嘱的话，没有言声。他不是没钱还，是不想还，是赖账！”

我想儿子说得有理，我为何这样轻信，总不汲取教训呢？

那么下面怎么办呢？

儿子说：“咱就说不走了，想法让他还钱。实在不行，也让他给咱写个欠钱的证明。”

到中午，我们等到陈曾回来，他在院子里说：“你先回去吧，这次你是一分钱也拿不走了，我实在没办法。”他想马上支应我们走。我拉他进办公室，他勉强跟我进来。

我说：“我们这样空手回去，没法跟珊月交代，你要不给珊月写个条子，说什么时候还钱……”“好吧，我给她写个条。”他想把我们支走，答应写个条子。

办公室里竟找不到一张纸。我从书包里抽出一张稿纸交给他。

他站立着，拿笔飞快写了一个条子——

珊月：九六年一月份这笔借款，我知道共九万元。预计年底（阴历）可以解决好，全部可以解决，请放心。

陈曾 96.12.15

我看了很不满意，是你陈曾向我们借款，怎么是你知道？应该写还账，却写可以解决好，也不明确。我说，你再写明确一点才好。

我又拿出一张稿纸。这时从门外闯进一个人来，拦住了陈曾：“你又瞎写什么呀？不能随便写！”

我说：“你是什么人？你掺和什么，你知道怎么回事？”

那人说：“我是陈曾的亲戚，我知道，他不能瞎写条子！”看来那人很有警惕性。

那人提醒了陈曾，陈曾在我的第二张纸上写道：“这是一笔投资款……”然后以强硬口气说：“你们那是投资，应该到龙迪饺子苑要去！”

他的本相露出来了！他和他老婆上次说的是一样的话。陈曾被那个亲戚拉走了。

儿子气愤了，说：“这是什么条子？纯粹是骗小孩呢！”

他说阴历年底前解决，百分之百的骗人！我们不能这么回去，这不是白跑一趟吗？上次来，说国庆节后十天一定把款付清，他还了吗？这回又来一个阴历年底，又骗我们一场呵！他骗过两年，过了民事诉讼期，你打官司都不行了。他就是耍赖！

他就是不给你，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我和儿子吃了午饭，却不想马上回北京。心里窝囊，我让小孔给我找一张纸，我要留给陈曾一封信，我只有这支笔，只有写字的办法。

我把一大张洁白的纸铺在小孔的吧台上，心里一阵难受，泪水从眼里涌出来，滴到白纸上。

“陈曾，我们是北大同学，你为何如此心狠地坑你的同学？”

你知道我们这点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权没关系，我们不是用国家的贷款换来的，那是我们的血和汗，那是我们要购房生存的钱哪！你难道会把自己说过的漂亮话全忘记吗？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不想告诉你，虽然我们知道，你从开头就是一种诈骗，你根本没有投资，却诈骗我们去投资给你的情妇，还你的感情债……但我们总以好心去想你，而你却一次又一次他说谎，欺骗我们……“我是书呆子，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张嘴一支笔……如果你真的赖账不还，我只有用笔向朋友，向北大同学校友讲述我被你骗的故事了……”我写了很长的信，想交给小孔转交陈总，又一想，还是亲自给他吧。

于是，我和儿子又向“仁德斋”去了。

我想，他看了我含泪写的信，一定也会动心的，我在信里恳求他去北京看看我的有病的妻子，说说他的真正难处，拿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也让我们对他有一点信任。我要求他在 20 号以后，新年以前到北京去一趟……仁德斋的大门没锁，他们家不会以为我们还会回来，陈曾正在睡觉。

我直奔他的屋里把他叫起来：“老陈，你还睡得着？你也得想想还钱的办法呀！”

他起来，擦擦眼，又坐在那个转椅上：“我不是说了嘛，阴历年前，我给你解决好。”

我把写的那封信交给他，请他看看。

他拿过去，扫看了一眼，便推给我：“我不看了，不就是那点事嘛！你们回去吧。”

儿子这时忍不住说话了：“我们一趟趟来找你，你就这么打发我们回去呀？今儿我们不能回去。”

我接着说：“我们今天回去，你 20 号去北京怎么样？我们在北京好好谈谈。”

突然，从大玻璃的隔壁、汪荣的卧室里传过来疯了似的喊声：“让老陈上北京，没门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原来那老婆子隔着玻璃一直在注意听我们的交谈。她叫喊着：“我们不欠你家的钱！你们上饺子苑要钱去吧！以后别再来我家！”

儿子急了：“你家欠钱不还，我们就要来！”

汪荣叫道：“你个小鸡巴孩子掺和什么，我跟你爸爸说话！”

“我什么小孩子，是我家的钱，我就要说话，你又不知道情况，你瞎掺和什么呀”汪荣还喊：“我什么都清楚，你们告去吧，我家就是不欠你家的钱！”

她说话已不知耻了，你家躺着的那个双人磁疗床垫和你盖的磁疗被共合 31100 元，你家拿钱了吗？

儿子气得脸色发白，只说：“反正你家不还钱我就不走！”

陈曾站立起来，在老婆子嘶叫无力时做声援，以在老婆面前显示他和她一致对外。他竟也手指着我儿子失态地大叫：“你给我出去！”

儿子也不示弱：“我为什么出去？你还我家钱，我马上出去！”

陈曾无理，只是叫道：“你不出去，我叫警察把你弄出去。”

见他失态，我只有冷笑。

儿子却指着陈曾：“你去叫吧。你叫公安局来人正好！你叫去吧！”

我说：“陈曾，你可不要激化矛盾，你冷静点吧。”

陈曾气急败坏，说：“好吧，你们呆着，我们走！”

陈曾和他老婆全出去了。

我说：“好，你们走，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们。”

我坐在了陈曾的转椅上。

我怎么也想不到陈曾会这般气急败坏，和他那平时穿得西服革履，一派大富翁的做派判若两人，无论如何联系不到一起。

汪荣公开叫号：“你们告去吧！”这种声音我咋这么熟悉？当年在河北省为那场房子风波，我听到过搞不正之风的人向我叫号：我们就这么分了，你有能耐去告吧！向我叫号，是显示他们不怕。到北京之后有剧院办公室主任小夏叫号：你告我去吧！同样是显示他的威风，使我当晚去到陈希同家门口静坐……今儿又听到狂荣的叫号：你告去吧！她必定是觉得自己强大，什么也不怕了。世上怎么净这些向他们觉着是软弱可欺的人叫号的无赖呢！他们真的不怕告吗？不是！他们不过是用这叫号表示他们的威不可犯，去吓唬弱者而已。如果弱者也真横下一条心去告了他们，他们便会老实了。叫号让人告的，十有八九是无理耍赖之人。

“你给我出去！”陈曾这样叫，和那天孟花叫珊月出去一样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要出去？我们有理，我们要在这儿说理。

陈曾两口子出去便对小高说了些什么。

小高进屋来，要我们走：“主人走了，你们就不要在这儿啦，少了什么东西，不好说……”这简直是污辱人！我们还会偷你家主人的东西吗？

小高见我们不动，便招呼看家的老头一起来硬拉我们出去：“你们必须出去！”

我们是负责看家的，你们不出去，我们没法向主人交代！”

旧社会的奴才形象，我只在影视中见过，现在，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说小高，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奴才的样子。为了主人给的一点臭钱，你便没有一点正义感了吗？

你清楚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谁是谁非！为什么要这样，是他陈曾让我在这儿的，与你们没有关系。是他欠下我们的钱耍赖躲走的，不是我们要赖在他家，你明白吗？

我们就是不出去，并告诉他们：“怕少东西，你们进屋来看看吧！”

看家的老头是陈家远房亲戚，他说：“你别生气。端谁的碗，听谁的管不是，让我看家，我得看着。刚才主人交代给小高，让你们出去，他能不听吗？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

听老头说得可怜，我便和儿子出去了，随后，他立即把这屋的门锁上了。我们坐在大客厅里。

小高自觉刚才举动不好，这时说：“你们在这客厅坐多好哇，想看电视还可以看电视。”

我和儿子商量，在这儿等也不是回事，还是回星星酒家吧，便和小高说：“你送我们回星星酒家，我们在那儿L等老陈！”

小高说：“这样最好，我开车送你们过去，给你们开一个房间，也休息

休息。

”

我这次坐上陈曾的公爵王小车，已经和以前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以前，我以为这是他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汽车，坐上也感到心安；现在我知道，他的这些财富，别墅呀，高级轿车呀，全是骗的国家的贷款，是用掠夺欺骗得来的不义之财！我坐上它，撇坐在小偷窃来的赃物上，我不是羡慕而是鄙视！靠套骗国家的钱财，靠坑蒙拐骗发财起家，算什么本事？它比那些以权谋私用公款购高级轿车的人还可恶，这种事和那些贪污国家财富的贪官的高级轿车属于同类，难怪愤怒的百姓对陈曾这类人坐轿车编出这样的歌谣：十年改革回头看，豪华轿车一大片。

拉开车门往里看，

坐的全是诈骗犯！

我们坐着诈骗犯的轿车进到星星酒家大院。

小高让小孔开一个房间，让我们休息。

我想应该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二虎，他不称我为“老师”吗？他曾多次说过我们不该把钱交给他爸，让他交给孟花还不是白扔了吗？我认为他脑子清楚，毕竟上过党校，还被市的什么部门给了一个“优秀青年企业家”的铜牌，他是应该有正义感的。

我带儿子进到了二虎的办公室，没想到是进入了虎口：他的父母早用电话通知了他，说我们到他家闹去了，要他带人把我们赶出来。二虎已经把他的表弟李燕生和王佳祥叫来，正准备到仁德斋别墅去……我们却自己投来了。

我进到屋，还没有发现气氛不对。

我想和二虎说话，想让二虎劝劝他爹……还没有开口，二虎已用手指上了我儿子：“你刚才跑到我家干什么去了，你小子竟敢骂我父母……”儿子说：“我什么时候骂人了？”

二虎并不听分辩，他坐在椅子上，目视我儿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还没有反应，以为二虎是在开玩笑哩。没想到，他竟一挥手叫了一句：“动手，教训教训这小弟弟！”

李燕生、王佳祥，就像听从主人的恶狗，一齐向我儿子身上扑过去，拧住我儿的胳膊，推搡出大门外，然后按倒在地上，一拳把儿子的眼镜打飞了……他们竟真的动手打人了！

我气得一拍桌子大喝：“二虎！你想干什么？”

我奔出去，见两人像恶狗一样压在我儿子身上，拳打脚踢不停……我愤怒已极：“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便无法无天！”

二虎叫道：“你在廊坊市打听打听，谁敢到我家去闹，谁敢惹我们陈家？今天让你知道陈家的厉害！放了他吧。”他下了命令，那两只狗才住了手。

我拉起了儿子，说：“我不信共产党的天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让你们横行霸道？”

我拉着没有眼镜，脸被打得青肿的儿子往外走去。

二虎让李燕生把我拦回来。我哪能还回到虎口？

听说这儿发生了打人事件，听到我老头的呼叫，院子里聚满了观看的人。我喊道：“看你家坑蒙拐骗，坑国害民能到什么时候吧！”

我扶着受伤的儿子在街上走，见到了巡警支队的牌子，便进去报案。这时，儿子因为被打，胸部疼痛，胃里难受，呕吐起来，把中午吃下的饭菜全吐在巡警支队的痰盂里。几位巡警来搀扶我们上了楼，一位负责人边询问边做着记录。我讲述了儿子挨打的经过，巡警都十分气愤，说：“这星星酒家是这儿一霸，有了名的！”负责人说：“我们是巡警支队，不好处理这种打人的事，你们去派出所报案吧！”他们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和巡警支队相反，一听说是告星星酒家，这儿的人都十分冷淡，不想管。巡警支队的同志说：“这位同志被星星酒家的人打伤了，找你们值班的报案——值班人呢？”一个警察说：“找老王吧，还没来呢，你们等着吧。”另一个警察说：“老王也管不了，你们应该先到医院找法医呀！”我问：“上哪儿找法医？”警察说：“不知道，你们去医院打听吧。”

好不容易等来了值班的老王，他好像是个小头头。他说：“你们打架了吧？”儿子说：“没有打架，是挨打了。”那老王见顶了他，很不高兴：“打架了，你挨打了，不是一样吗？”儿子说：“不一样！”老王说：“你这青年人怎么这么说话？你说说经过，是咋回事？”我向他讲了过程，他却不做笔录，只是说：“你们等着吧，我去看看。”便走了。

我看表，此时已快七点了。

我上街头一个商店要了长途，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妻子。

我说：“现在正等派出所处理，我们今晚怕回不去了，现在汽车已经没有了……”妻说：“你们一定回来，那儿是人家的地盘，不是廊坊，是狼窝。没有汽车，坐火车也要回北京！那10万元咱不要了，命要紧哪！”

我不知他说的可是真话，但我已从周围群众的口中得知：星星酒家早把这个派出所喂熟了，你让他们给你办事，不应付你才怪了。

结果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

我找了个三轮，拉我们到安次区公安分局去。

公安分局值班室，灯光明亮。

两位同志，一男一女，分坐在对面的两张桌子旁。儿子头晕趴在桌子上；我向值班人员述说儿子挨打的经过，他们认真地听，认真地做笔录。

“把人打成这样，你们应该找法医鉴定！”女同志说着便拨起了市医院的电话：“你们那儿还有法医吗？”对方说下班走了。女值班员叫了一声糟糕，很遗憾他说：“这怎么办？你必须有法医鉴定，确定伤的程度，才好做处置。这样吧，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了，你们找地方先住下，明天一上班我就给你联系法医，你伤成这样，也需要抓紧治疗呀！另一方面，我们派人到星星酒家调查，你们举报如属实，先把打人的拘留起来！”

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说，我们人地生疏，害怕在这儿。他家二虎就说在廊坊没人敢碰他陈家呢。

我们和家里通话了，他妈妈说无论多晚也得回北京去。

女值班员说：“我们可不管他是谁，只要是犯了法，触犯刑律，我们公安局就管！你放心，明天我们便去调查，你留下电话，我们再联系吧。”

我们是应该留下找法医的，可是我想到妻子的叮嘱，为防意外，还是回去吧。

我和儿子乘坐夜里的310次列车回到北京。到北京家里已过半夜，珊月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安危，还没有睡。看到儿子眼镜没了，被打得鼻青脸肿，

做妈妈的心疼得流出眼泪：“他老陈真不是人哪！”

明天先去治病配眼镜吧。

从此我认定：陈曾是要坑骗我们到底了。不然，不会指使儿子下这种毒手，“教训”我儿子，是要告诉我，从今往后不能再来他家要账，就像上次纵容孟花打我妻子一样，让我们再也不去饺子苑，这样，他们便可以“平安无事”了……既然你家已经叫号要我们去告，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也只能这样做了。这是一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我们要看看，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那坑国害民者会不会永远猖狂下去……

一、主人公方燕对他受骗原因的思考——防骗必读

方燕的黑皮日记《受骗记》就记到1996年12月15日，陈曾赖账指令打人，便没有写下去。

为何不接着写呢？

他说：“下面请你动笔吧。我把为追被骗款的过程告诉你，请你把《告状记》完成吧！你的同学已经感觉太累了！”

我对方燕说了我的想法：

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它必将把中国人民带到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界。大潮涌动，也必然会搅得沉渣泛起；社会上各种人物都要在大潮巨浪中经受检验，勇敢者冲浪可称弄潮儿，怯懦者也可能被海浪卷没；狂潮会引起泥沙俱下，鱼鳖横游，茫茫人海中，各式各样的骗子也便纷纷登场了……这位陈曾，我们北大哲学系的校友，算是一个典型。他骗了你们之后，又骗了四个人；他骗了国家又骗个人。揭露这形形色色的骗子，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因为就在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还在继续受骗，不知还有多少骗子仍在继续骗人！我建议你把这部《受骗记》交给出版社出版。我刚收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写王海打假的纪实文学，很有意思；你这是一本防骗的书，也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不过，你还要在最后加上一章：想想你为什么会被骗，解剖一下骗子，他为什么要骗人，用了什么手段骗人……方燕点头，接受了我的建议，他说：“那我先跟出版社总编辑讲讲我的故事，如果出版社感兴趣，我便交给他们出版，正好解决一下我打官司的费用……”我说：“对呀！这不是堤外损失堤内补吗？！其实你如果不陷入这种没有休止的没有结果的没完没了的官司中，你把精力用于写作，多写几本书，你被陈曾坑骗的10万元也收回来了。”

方燕笑了。他说：“这是两回事。我和妻珊月早就想开了：陈曾骗走的钱，我们也早不想要了，只是想起这事来心里难以平衡。

我开头没给你说吗，我现在的心态已完全变了。我把这告状过程当做体验生活，就像看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看这剧情怎么发展……你看看这一包材料，这就是1997年我告状的文字记载，如写小说，也够一部长篇了。可到今天还没有结果。

我全部交给你，连同我1997年的日记，你看了会觉得这书呆子《告状记》比他的《受骗记》还值得人思考：中国今天怎么会这样？”

方燕把一大包材料推到我手上，要我仔细看看。这沉甸甸的一大包，

压得我心很沉：一个作家、诗人，没有把他的才华用于他的创作，却用来写这些举报、控告、申诉、揭发上，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这是作家、诗人的幸运呢，还是他的悲哀？

他说，陈曾对我们的坑害，主要还不在金钱的损失上，虽然我们需要用那钱买房。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购好房的良机，使我们至今还不得不住在这 10 多米的小窝里。可我们毕竟还有地方住，并没有睡在露天。我们并不看重那 10 万元的损失，尽管它是我们夫妇的血汗！重要的是，他把珊月对人的信任感，对事业的执著心破坏了，伤害了。破坏得这么厉害，伤害得这么惨！

起初，我们对陈曾多么信任啊！我们信赖他，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不会骗我们、坑我们。

直到陈曾开车到我家取钱的时候，妻子还说：“因为我信任你，才把这钱交给你，你可不要坑了我们哪。”他笑笑说：“哪能呢，你要连我都不信，这世界上你就没有可信的人了！”

我们信任他，当时连个条子也没有让他写。

陈曾真的骗了我们，正像他自己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能相信谁呢？

从此，妻变成了另一种人。他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她对所有人的承诺、许愿、说的好话，全怀疑背后的目的会不会和陈曾一样是在欺骗。与其再让人骗，不如我不去和他们打交道，她说：“我承认自己弱智，没有能力和人玩心眼。这世界上骗子太多，我不适合在这世上生活了！”

她是多么执著自己的艺术事业呀！为了她热爱的京剧，从少年上戏校时便勤学苦练，她想一生为京剧事业献身……她说，就是因为自己执著事业，才一次又一次受骗。如果不是听到陈曾想扶植我的事业的美好许诺，又怎么会那么放心地把钱交给他，以致一直不管不问，只是想：只要他能帮助我真正演一出自己的戏，那 10 万元不还我也值了！

是执著事业的心让她受骗，从此她再也不说演戏了，再也不说搞事业了。

这是陈曾的坑害、欺骗对人心灵的残杀，对信念理想的残杀！

妻刚 50 岁便向京剧院办了提前退休。

朋友们来我家，问珊月干什么呢，她说：“我什么也不干了。”朋友吃惊：“你一向事业心强，又很能干，现在正是干事业发挥才能的时候，怎么会什么也不干哩？市场经济了，讲究竞争，不像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人才捆得死死的。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正是你实现自身价值的大好时机呀！连那些过去惰性的人，都有了活力添加了劲头，你这么能干的人怎么反而不干了？”

妻还是那句话：“不干了，什么也不想干了！”

朋友说：哈哈！你是前几年搞磁疗床垫传销，挣够钱了吧？

咱不能小富即安，不求发展哪！

“不要觉着招个十万二十万的够花了拉倒，那可不行！南方有个歌谣叫：‘一万两万不算数，十万二十万才起步，百万千万才叫富’……我们可差远啦。你不干事业，你整天干啥呢？”

妻说：“玩。想怎么痛快就怎么玩，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

你玩不？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

朋友是事业型的工作狂，他对珊月的反常实在不理解，走出屋来，朋

友问我：“珊月怎么啦？她真的什么都不干了？”

我说：“是真的。她受刺激太深了……”我知道，在妻说什么也不干只想玩的时候，她的心在滴血，在流泪……这就是他陈曾给我们的苦果！

妻从这年春节学会了打麻将。那是 1992 年，我在白沟市场买的麻将牌，觉得便宜，便买回来一直放着没有动。凑翻腾了半天，才从破烂堆里把它找了出来，让儿子教她，并且让我跟她一块学，不要学复杂的，就学简单的“推倒胡”，只要能玩就行。

可妻却找不到打麻将的人。不是没有人，是没人和她玩。她不来钱，人家觉着没意思，谁愿白陪着你玩？可一说到来钱，她心里反感，便来不成。只是在春节那天，儿子、女儿回了家，一家四口玩了一次。后来，便找我跟她玩。两个人把东西南北风全挑出去，把牌减少，在一个小吃饭桌上对玩，没意思也便不玩了。

不打麻将，她便去找人打扑克，腰里掖副牌，谁打跟谁来，打百分，捉黑尖……玩起来没有够，便把什么全忘记了，这是对痛苦的麻醉。

看到妻子变成这样，我心里难过。

我必须告状，必须打官司。我必须对陈曾有所行动，不是为了索回那 10 万元，而是通过“行动”求个公道，讨个说法，以召唤回妻子原来的那颗心，治愈她那受伤的心……妻自己也说：如果陈曾能来一次北京找我们，以真诚的心说出当初是因为什么要诈骗我们，真心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句真心道歉的话，那么，他现在如确实有难处，我们那 10 万元完全可以不要了！金钱比起人心来轻如鸿毛，算个什么！

可他不这样办，还继续欺骗我们，应付我们，没有丝毫的真诚，这就让人伤透心了！

我这一年的奔波行动的目的，是治疗妻的心灵的伤痛，只有这种行动，她才会好些，我自己的心也才能够求得平衡。

你以为我打官司是为索回那 10 万元吗？刚开始，还有那种渺茫的愿望，但我越行动，那愿望便越远，直到它彻底消失。不想索还骗款，却要不停地行动，只是为了心灵：为妻子，也为自己。只有行动本身是愉快的。正像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一样，也是一种心灵痛苦的释放，只有记下来，心里才觉得轻松！

方燕这次从石家庄回来，为什么那么轻松超脱，对这事抱着旁观者看戏的无所谓的态度呢？是他在太多的磨难中看透了人生，也在办事的艰难中更看清了现实的缘故吧。

方燕这样总结了他在 1997 年告状行动的体会：回头你细细看看我一年多告状的经历吧，你看要伸张正义，讨个公道，惩治诈骗……是何等的困难，便知道今天做个好人太难；反之，办坏事、坑蒙拐骗的人活得太容易了。他只要坑了国家骗了你个人，要想惩罚他，太难太难了。国家无耐，法律无耐……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还能像过去那样认真吗？你认真便要生气，生气就要伤身劳神，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郑板桥先生要写“难得糊涂”，为什么今天不少人都要购此条幅挂在墙上不断提醒自己了。

这才是：人生难得糊涂，贵在糊涂，乐在糊涂，成在糊涂！不糊涂则难以在纷繁人世中保持宁静之心，不糊涂则难以在芸芸众生中保持超群脱凡之态；大糊涂，大聪明；小糊涂，小聪明；不糊涂，不聪明啊！

好人活得太难太累，就在于认真。你说过，人老了，要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我以为，首要的是糊涂一点，只有糊涂一点，才能潇洒一点。

再就是你对什么事都不要抱多大希望、不要想能办成，你才会永远没有失望的痛苦。

不要认真就是不要讲“应该不应该”、“是与不是”的理儿！这世界不让你讲，你讲就要生气了。正常便成了反常，反常便是正常，就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所唱的“是与不是”歌：“不是也是，是也不是，说是便是，说不是便不是；说是便是不是也是，说不是便不是是也不是。”当今不是有这样的说官场用人之道的对联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照此可仿写一副对联：“说应该就应该不该也该；说不该就不该该也不该”。想通这些，便真正轻松超脱不急不气了。

方燕总结了他人的人生体会之后，话题便转到他受骗的原因及陈曾如何诈骗的手法上去。

我们受骗就如同在战场上打仗失败，战场上打败仗并不说明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而是或因敌方的力量强大，或因我方的力量弱小所致。我们受骗一方面是因为骗子老谋深算，狡猾奸诈，另一方面也因我们太简单愚蠢呆傻善良。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骗子的高明，而在于我们的愚蠢……古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我们天性善良，总没有防人之心，没有一点警惕，总以自己这颗善良的心去想别人，就在陈曾露出欺骗的破绽时，也还用自已的善良去做弥补，为他解释。

我们受骗也是被他豪爽、大方的表面行为和诚恳的承诺言辞所迷惑。我们一到廊坊，他便招待我们吃饭，说：“方兄你随便点菜，今天吃这儿，明天咱去吃别的饭店，你在我这儿住下去，一年365天，我不能让你吃重样的！”当时我们真为他的豪爽、大方所感动，但正是在他领我们吃饭店，大讲饭店如何赚钱时，他已暗中引我们上钩了！这几顿饭不过是他的诱饵。他的看似诚恳的承诺，是最能骗人的，直到他无数次地失信，才让我们明白了。

如果我们能够想想，骗子早已有所暴露，就应该及早识别出来。

陈曾和所有骗子一样，要利用人的心理，他利用了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

一是我们的趋利心理。1995年11月，我们还没有完全停止推销日宝来福的磁性健康寝具，听陈曾邀我们去廊坊，又知他已发了大财，便想让他也买套床垫，这也不白跑一趟呀！我们如实地向他讲了，是希望他购买一套，他一眼看出我们的心理，马上爽快地答应：“我买！没问题！不仅我买，我让大虎二虎都买一套！”我很高兴，因为我从动员别人购买此床垫以来，对方总是猜疑不决，有的交了钱还要退呢，还没见一人有陈曾如此爽快的！

因为他爽快答应购买，然后再提出让我们去投资饺子苑，便容易引我们上钩。

二是利用了我们对他的敬慕、信赖的心理。他一见我们便讲了她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功绩”。我们虽为北大校友，因不是同系，在学校并不认识，是我们到了石家庄，才知他是北大校友，后来他到省供销社北方大厦当总经理，曾用公款招待我们一次。他怎么被撤职不干了？我们不了解其实际情。他在廊坊见到我们首先讲他为什么离开北方大厦，说他不是被免职，而是他不想再给共产党干了！并且说：“北方大厦的头头梅风嫉贤妒能，查我个六够，屁大的事没有查出来！我为他们创造了千万元的业绩呀！”他讲的，

我相信，并且消除了对他的怀疑，从而对他亲近了，放心了，因之，对陈曾便有了信赖。他说：“你们不是搞商业做买卖的人，你们挣点钱不易，不能放在银行让它贬值，应该在滚动中升值！你们把钱交给我，保证让你 10 万元一年滚成 15 万，至少给你 3 万利息。”

对这种有能耐人的话，我深信不疑。

这时，他讲起自己的宏伟目标，说要使其发展速度超过香港的包玉刚、李嘉诚。我们说：“老陈你准行！你真了不起！”

他炫耀他有钱要做福利事业，他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德为本”、“以诚相待”的儒商。他不能做“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好商。他宣扬他是何等地重友谊，多么乐善好施，愿意助人，而对我们的困难遭遇，是何等同情。

对这样的老同学，真诚的朋友，能不信赖吗？

三是利用了我们执著的事业心，用帮助我和妻子发展事业的美丽的光环套住了我们。

从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我们便觉出一些什么，好像当时陈曾、孟花的诈骗行为的蛛丝马迹刺激了我们的直觉，但我们未抓住此疑点进行深入思索，反而被陈曾的骗术蒙混过去。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真诚，让人不能不信。既然陈曾如此关心帮助我们的事业，我们把钱交给他就专心搞事业吧——这便正好入了他设计好的圈套。……以上便是方燕对他为何受骗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从方燕思考了他们受骗的原因之后，他每隔一个月，便给陈曾写一封信，他要陈曾给他回信。陈曾肯定收到了这些信，却没有回信。没回音，他也照常每月寄一封信给这个骗子。

“你这是为啥呢？”连妻子珊月都说没有用，别白费精神和邮票了。而书呆子却还是不断地写信。他曾把他想好的以上这一段内容写给了陈曾，还征求他的意见：“你的诈骗手段是不是像我写的这样？你是不是利用了我们的这几种心理？我冤枉你了吗？你还是看了我写的这些，发出一阵冷笑，笑我远远没有认清老谋深算的你？你有没有勇气剖析一下自己？我愿得到你的回信，尽管我知道你不会有回信的胆量，但我还要说这些多余的话……”自然不会有回信。

过了一个月，方燕又寄给廊坊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的老同学：又一个月过去了，你还能像加加林那样临登飞船前半个小时还能睡一觉吗？我想你不会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婪，为了坑害老同学，你机关算尽，你不会睡得安宁！你可以不看我写的信，因为你怕，怕这每个字会像针刺你的眼，每句话像尖刀扎你的心！

你做了亏心事，坑了别人，你永不会安宁，你自称儒商，你讲得何等漂亮，不愧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你在用骗来的国家银行贷款建起的别墅门口写上“仁德斋”三字，你有何仁何德？

实话告诉老同学，你骗了我们，又骗了别人，那是他人的血汗，人家都不会与你善罢甘休！

我们已咨询了中国的十佳律师之一，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你这是地地道道的合同诈骗！

今天，你正用什么花招对付这让你不能安宁的世界？

请你回信！ ？

方燕直到今天仍然一个月给陈曾去一封信。他说：“不为别的，只是让他自己知道，坑人骗人，别人不会忘的。”

方燕在 1997 年 11 月接到北大校友联络部的来函后又给陈曾一封信，信中说——1998 年 5 月 4 日，母校北大百年华诞，邀请校友回母校庆祝。

你是否收到了通知？你可准备回北大参加百年庆典？我们能在北大校园见面否？

我想问问诈骗老同学的你：你有何面目会见北大师友？你为北大带去的是莫大的耻辱，我为你羞愧！你可有勇气跳进未名湖里洗濯一下自己的灵魂，回到你的青年时代？——只有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奉献的人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无愧北大人的称号！

陈曾，你对此信有何感受，能回信吗？……方燕就这样一封封地给陈曾写信，这不纯粹是书呆子的行为吗！

他是为了吐出心中的闷气。这实在也是他的无奈。

陈曾接到他的信便知道：这样做是你奈何不了我。我就是骗了你，你能有什么办法？

方燕还真是没有办法！

我打开他给我的这一袋厚厚的材料和他的日记，这便是那曲曲折折的书呆子告状路……在这条路上，他遇到了那么多好人，都对他给予同情，支持，帮助。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在这条路上，他找到了那么多有权的人：有中央纪委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公安局局长，刑警队队长；有省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省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还找到了那么多律师，记者，新闻界人士；还有那么多北大同学，中学同学，新朋好友的支持，出主意想办法……然而至今仍然无奈！

对坑蒙拐骗者，法律无奈，有权人无奈，好人无奈……难怪骗子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

这是咋回事？

让我们看看书呆子告状的无奈路吧！

二、找律师和走黑道

方燕带儿子去向陈曾要账，钱没要来，儿子被打个鼻青脸肿，眼镜飞落。父子俩不敢在廊坊住宿，匆匆赶回北京。方燕一夜未睡，起早便让儿子去医院看病，去街头配眼镜。儿子因没眼镜不好走路，便把方燕的近视镜戴上走了。这一次检查治疗花了 300 多元。

方燕去街头给廊坊公安局打电话，却总占线，无法打进去；他给河北省人大的吕先通了话。吕先说：“你们和蔡松他们联合起来告陈曾吧！除去起诉，我看没别的办法，小蔡他们找我，我也说了这个意见。”

方燕没有想好。

给法制日报的朋友通了话，这朋友是几年前在新华社相识的，今天已是报社的负责人。方燕把情况向他扼要作了介绍，请他派个记者，把赖账不

还并且打人的事情了解一下，给予报道。朋友倒很热情，他说和下边的记者商量一下。后来他告诉方燕，记者们全有事抽不出人来，只好抱遗憾了。

后来，方燕才明白当今请记者不易：谁出车？在哪儿吃饭？谁花钱？不是你说有事便可让记者来的。你主动求的，你要出费用的，书呆子不懂。

打官司起诉要请律师，他想到了北大法律系的同学。让北大同学帮助北大同学去起诉北大同学吧。

他给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同学黄景钧通了电话。老黄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当面谈谈。我们好多年不见了，也叙叙旧吧。”并告诉了他怎么走。

方燕和妻子一同到翠花胡同民盟中央见到了黄景钧。

“你调北京，我还是从晚报上见到你的文章才知道的。你当初来，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单位，现在单位之间的条件、待遇差别太大啦！你是北大同学中的名人，我还记得你在学校朗诵诗呢。”

方燕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我是北大同学中混得最惨的了，可还被咱北大同学坑骗了。”他讲述了一下受骗经过，把原来的合同书交给黄看了。

“这个陈曾我不认识。他若是民盟成员，我可以在我们刊物上揭露他。可他是共产党员，我就不好说话了。”

方燕说：“他若是民盟的，怕不会这么坏了。咱们不是要互相监督吗？”

老黄笑笑，说：“这样吧，我介绍你找咱北大同学谢甲林吧，他是法律系毕业的，肯定知道你，他现在天宁律师事务所。”他马上给老谢打电话，介绍了方燕。

黄景钧送方燕出门说：“有什么困难再联系。”

方燕和珊月打车找到了老谢的家，那是一个大杂院。

老谢说话有很浓的山东口音，也有山东大汉的热情豪爽。珊月认做老乡，说她父亲是从山东平度下关东的，与老谢家是一个地区，便更亲切了。

老谢说：“先要否定他订的这合同无效，然后打他还债加息。”

珊月问：“你看这场官司能打赢吗？”

老谢说：“咱们有理，怎么会打不赢呢？可你们还要花钱呀！”

方燕问：“要交多少？”

老谢说：“按照规定，交律师事务所的是5%，你打10万元的官司交5000元，加上法院的诉讼费用一共要一万元吧。你们若去廊坊打官司，就更不利：律师的食宿旅差的费用都要管。当然，官司打赢，法院的诉讼费由输了的被告支付。”

一讲费用，这两口子全不说话了。

回来时，方燕对珊月说：“咱们现在没有钱打官司，我中学同学颜大会，原来不是保定地区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吗，如今离休当了他们法院办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明天去保定再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请他帮助，把10万元打回来再给他钱。”

珊月说：“只要是在困难时帮助咱们的都记上，把钱要回来都打点谢承人家。”

方燕第二天便去了保定。

“哈哈，小方，大作家，又有什么大作呀？”大会见面满脸喜色，还叫他在中学时叫惯的小方，他们是 1948 年在一所专为解放区培养干部的冀中第一中学的同学，小方最小，才十一岁，颜大会当时已是党员，当班长，吹哨集合跑步，小方在队尾巴跟不上，大会便喊：“小方，跟上跟上！”方燕今又听他叫小方，可时间已过去近 50 年了！

方燕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不打官司不找你。”

大会说话干脆：“什么官司，你说，有材料没有？”

方燕把当时与陈曾的合同、协议给了大会。

当了多年法院副院长，判了无数个案子的大会，头脑清晰，一看便把问题实质抓住了，并说出办法，小方对大会心中佩服。他的说法与大学同学老谢讲的一样。

“告他借款不还比较简单，他这不有给文化局的信吗，这就是物证。”

“可他写的信不明确，没有说他借款啊！”

“他很狡猾，故意写含混不清的词，但有‘在我处有 9 万元’一句就可以了，我处就是你陈曾处嘛！你告他赖账不还，他必然说你这是投资，这时再否定其合同无效。实在说，这是一种诈骗行为。

你们的协议本身就可验证，你这个老同学可太坏了！你是作家，大笔杆子写文章么，揭露这种骗局，你用文章配合法院打官司，就更好了，没问题，肯定能胜！

”

方燕乐了，忙说：“那我请你做律师吧，只是有一条，打出钱来再付给律师费。”

大会拍拍小方肩膀：“老同学，我白尽义务，说什么钱？不过我不在北京，你在北京找律师，我帮助，一同商量，北京法院我也有熟人，可以和他們联系一下，……”方燕带着满心喜悦回到北京，和妻子讲了。珊月说：“就找大会帮忙吧！那在北京找谁当咱们的律师呢？最好是先不收费的。

人不干什么不注意什么。在方燕住处附近有个羊肉胡同，他走过多少趟，没有注意到这儿便有个“京盟法律事务所”，这次他进去了。这是民盟北京市委的所在地，律师全是民盟成员。他一进律师所，有人便问：“要咨询吗？”方燕便说是想问问……一人介绍那年纪大的先生说：“这是焦律师，请和他谈吧。”

焦律师递过一张名片，方燕问：“你认识黄景钧吗？”

焦说：“那是我们中央的宣传部长，我们也是同学。”

“那您也是北大法律系的，我们是同学了。”

老焦站起来，把方燕让到长沙发上坐下，倒了茶，也坐在那儿。

这儿一圈沙发围一茶几，是为来咨询的人预备的。

方燕向焦律师讲了情况，提供了材料。

焦律师说：“你怎么就这么相信北大同学？实际上你并不了解陈曾，你被表象蒙蔽了，可以肯定他不会给你这钱了，因为他从开始便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你这事只有依靠法律了。

可是他个人有什么财产能偿还你呢？”

方燕说：“他住着高级别墅，坐着公爵王轿车哩。”

焦律师问：“你知道这是陈曾的？如果是，可以先申请‘保全’。”

“‘保全’就是把车先扣住，不过你得先交保全费，这样，官司胜，可以

有东西，不然，他说没有钱，法院判决了，也是一纸空文，你的钱还回不来，这种无赖会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方燕问：“若请你帮打官司，得交多少钱？”

焦律师不说，旁边一先生说：“你们是北大同学，自然优惠，收最低费用，也就3000—4000元吧。”

焦律师说：“他欠下公家那么多钱，你要赶在公家起诉以前告他，这样，他的财产可以先偿还你，不然，便全归国家了。”

看来官司迫在眉睫，焦律师让方燕有了紧迫感。

谈了半天，方燕道谢，要起身，焦律师拿出本子来登记一下姓名，笑说道：“不得交点咨询费呀？”“怎么，还要收费呀？”方燕没有准备，掏不出钱来，焦只好说算了。按规定要交50元。这是在事务所不是在家里，方燕又明白了一点。

方燕给民盟的黄景钧打电话，说了情况，黄说：“你还是找老谢吧，他是有名的律师，他所在的天宁律师事务所也是很好的，就是多交点费用也值！”

给老谢打电话，却没有人接。

这天，蔡松、赵华、孙竟、黄菊一同来找珊月，把那间屋子挤得满满的。他们已找到了一个律师，说官司能打胜，不过要找找关系，才好立案，没有关系，你该赢的官司也不一定立案。你不要看那大檐帽上都有国徽，有的人也很黑。人家陈曾家有钱，如果咱们找到硬关系主持公道，便不怕了。

方燕便想起司法部门、法院系统的所有关系来，他翻了几盒子名片。

司法部的一位副部长，原来是保定地委书记，方燕与他认识，可这么点事，求不上人家副部长埃法院系统有自己的一远房侄儿在高法的报社，看他可有什么办法好想。

好不容易打通了侄儿的电话，侄儿说，很难有所帮助，因为报社有纪律，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不让记者介入，以免妨碍正常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判决；北京市的法院也没有认识人。没戏了。

算了吧，找什么人！咱们既然有理，为什么非要找熟人？方燕心烦，也对此类走后门事不以为然。大家一致说他：你不能照书本办事，这就是咱国的国情，中国特色。

方燕想起老同学颜大会的话，要和这四位受骗者联合行动，要自己找自己的律师分头立案为好。

照律师建议，每个人都要写材料，做证言，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轮的股东会孟花搅了的情况，大家都要写。这时刻，那四位全认清了，那是杀鸡给猴看，打了珊月，我们也不敢再找孟花了……他们约好，及时联系，沟通情况，团结起来，共同对付陈曾、孟花，不信就治不了这个骗子！

还是要找到名律师谢甲林！

老谢家里的电话总没人接。方燕夫妇便到天宁律师事务所去打听、去寻找老谢。

这是事务所租的一层高楼，看来很有气魄，是个大律师事务所。找谢甲林不在，原来老谢去美国看儿女去了，什么时候回国还不一定，人问有什么事情，方燕只好说了：“我们是北大老同学，想问问打官司的事儿。”人家很热情，有个姓马的小姐说：“我们都是律师，找我们谈也可以解答。”

方燕有点犹豫，是想到咨询收费，他没有钱。

珊月见小姐热情，便说：“那就请教您吧。”这儿有一位40多岁的女士，是个头儿，她对马小姐说：“你就去听听情况吧。”这位女士好面熟，她递过一张名片，这让珊月记起来了，她是那位在中央电视台做法律咨询的郝律师。

方燕不再犹豫，跟马小姐进到了那间咨询接待室。

方燕把所有的材料拿出来，摊在大条案上，推给马小姐看。这位小姐不过二十四、五岁，是政法大学的硕士生。

年轻的小姐看了材料，竟提出了与以前找的几位律师完全不同的问题，他是站在对方请的律师的角度看这些证据的。

“你们这证据不足，难以认定。它并不能证明你们向龙迪饺子苑投资了。”

这几句让方燕夫妇大惊！我们明明白白把钱交给陈曾了，怎么会没投资？

马小姐笑笑：“你们别急，听我说，先说这第一个合同。这甲方签字的是孟花，并不是陈曾。”

珊月说：“那上面不是有陈曾亲笔写的董事长陈曾嘛！”

“可这些字都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这儿没有法人章，这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是说，这个企业法人代表是孟花，在法律上，陈曾与龙迪饺子苑没有任何关系。”

珊月说：“我们还有个补充协议，那是和陈曾签的。”

“这个补充协议，并没有龙迪饺子苑的法人章，你们也没有公证，这是陈曾以自然人身份和你签的协议，在法律上与龙迪没有关系。”

这些分析，说得方燕傻眼，说得珊月身上发冷。

珊月说：“那怎么办哪？我们亲眼见陈曾把5万元现金交给孟花了，我交给孟花1万元现金，她给我打了收条。”马小姐找到了那个收条，立即否定：“这条子并没有写收到你珊月1万元哪！没写你的名字，只写收到1万元，我说这是你从马路上拾到的，你管我孟花要什么钱呢？再说，写收到了你的钱，那是你过去欠我的，现在是你来还账，你有何话说？很清楚，这陈曾很高明，这孟花也很狡猾呀！在收款条上应写明是什么款，谁的款，可她这条子什么都不写，你当时怎么就收下呢？”

珊月叹口气：“他们太坏了……我没想到会有今日……”马小姐拿起张德泉开的证明来说：“他能证明从孟花那儿拿了5万元搞装修，却不能证实这5万元就是你交来的；不过，这可以想办法找出证据来，你们可以去找龙迪的会计，还可以查账，一追资金来源，就可以找出你这6万元来……”说到这里，方燕才觉透出一丝光明来。

马小姐说：“你们记住这教训吧，要在办事前想到未来打官司，要先备好证据，要让对方写清楚，法律是重证据的，不要被漂亮的承诺迷惑……”

珊月说：“如今的人办事……太可怕了。”

马小姐笑了：“要懂法，便不觉可怕，要适应市场经济。”

然后，马小姐又拿出陈曾给珊月写的条子和给市文化局的信，看了之后说：“这和龙迪饺子苑是两回事了。这条子写得含混，也是对方写时想到的，不过，这可以认定他拿了你们9万元，你们不妨分两次打官司，一打龙迪饺子苑，找好你投资的6万元的证据，打这6万元；再打陈曾欠款9万不还……”他们正谈论，那位郝律师进来了，也一同给出主意，她最后说：“你交给我们操作，我们可以取证……保证你的钱能要回来。”

这时，方燕才知，原来自己以为懂法律，其实是个法盲，他很愿听马

小姐的分析，真长见识。一开始见她如此年轻，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还不大信任；待听马小姐讲完，便非常佩服了。

临了，马小姐并不收咨询费，说：“你不是找老同学来了吗？我代谢老师接待了。”

这马小姐和天宁律师事务所给方燕夫妇留下很好的印象。但要不要让他们做律师，因为想到交费而拿不定主意。

回家时，方燕路过西四新华书店，购买了《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书，他要认真学习一下了，不然，他觉着没法生存了。

为了证实珊月向孟花交了 5 万元现金，需找在场的人证明，那天晚上有北大同学王成璞来安装电器音响，方燕、珊月便去他的公司找他。

“老王说：“这老陈怎么这样！怎能骗老实人呢！我早看出来他没有钱，他让我先把音响、电视机买了来，然后他再给钱，我哪能先垫这些钱哩？我说你不拿钱来我不能办，结果他没有钱，也便没有安装。”

方燕奇怪：“可陈曾说他又投入了 10 多万元，买电视机音响了。”

“胡扯！”老王说，“他一分钱也没交给我。那地下餐厅装修全是花的你们交给孟花那 5 万元！”

方燕想：人家老王有经验哪，不然也上当了。方燕请他把那天见珊月给钱的情况写个证明，他却不想动笔落成文字：“我不写了吧，我证明不了啥，我当时听陈曾说，这是你们的钱，我可没见到是你们拿出来的。”

珊月说：“你就把那天听陈曾说的话写个材料吧。”

他说：“我看你们不要走打官司的路，那可麻烦，没完没了，判决了，还不一定能执行，执行庭不给你用劲，追不回来。”

方燕问：“不用法律手段，还有什么好办法让他把钱还给我们呢？”

老王问：“你和派出所所长铁不铁？有派出所的铁关系便可以办！怎么办？想办法找人把他陈曾给抓起来，不给钱不放他，就解决了。有派出所警察就可以。我有个朋友，在内蒙一家公司，他被广州一人骗走了几十万元，他便找了派出所警察，开车直下深圳，找到那骗子，一块去吃饭，向他要钱，他不给，把他灌醉，出门把他驾到车上，一口气开到内蒙，做了人质。他便给家里打电话，叫人把钱带来了，非常干脆，比法院审理快多了！”

老朋友又给指了一条新的办法。

可方燕只在上户口时去过派出所，认识一个民警又调走了，他丢过身份证重新办理，找了户籍民警，所长却不认识。

不过这给他们开拓了思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要只盯法院一个大门。

他刚刚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渔人悲欢录》，是写白洋淀一个渔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脱贫致富成了水产大王的故事，这小子叫王清和，这些年在北京闯荡，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不断和警察打交道，说不定认识派出所所长……方燕给清和打了电话，电话说不清楚，见面说吧。

方燕把受骗的情况一说，这个白洋淀渔民气得骂起来：“这陈曾真不是玩艺儿。你们这钱是好挣来的吗？他连你们的钱都坑！”

大叔，你别管了，我找人想办法，用不着警察。我最恨这种人，你听我的信儿吧。”

他有什么法？也不告诉方燕。

方燕不认识派出所所长，却认识中央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们是同乡，这位副部长正直、清廉，给方燕留下的印象很好。1992年方燕到白洋淀挂职深入生活，想为繁荣白洋淀经济尽一点力量，他听说公安部有个京安公司资金雄厚，便想让老乡古副部长带上总经理去白洋淀看看。古副部长同意，便带车去了白洋淀。中间路过方燕的家乡县，他对古副部长说：“咱不回老家看看？到家门口了。要不在咱县停一下吧。”古副部长说：“别麻烦人家了。”便直去白洋淀了。古副部长说了不能在县停留的道理，怕家里同乡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影响不好。他处处时时想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在今天实在难得。这两年他退居二线，却当了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

由于想找派出所所长，便想到何不去见见古副部长？方燕赶个星期天，直奔老古的家，正巧老乡在家。

“又写什么大作啦？”老古见面就问。

方燕开门见山：“顾不上写作了，我叫老同学坑了！”

“咋回事？”老古关切地问。方燕便把被骗过程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去年12月15日去要账儿子挨打……“太不像话了！”老古气愤了，“这种人还是共产党员？没有一点党员气味！这种人根本没有共产党的信念，连做人的道德也没有！这就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方燕说：“对呀！他自身腐败，却骂共产党腐败比谁骂得都厉害哩。老乡，你认识派出所所长吗？”

老古一时不明白：“找派出所所长做什么？”

方燕说了朋友出的主意。

老古说：“不要找所长，你去找北京市公安局吧。有个石副局长，也是咱县人，我把你介绍一下，你去找他想想办法。”

方燕想，这下子可有希望了。

老古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没有通，便说：“你去找他吧，这人不错，会帮你想办法的。”

还没有找到公安局副局长，珊月却接到了石家庄的朋友兰英打来的长途，要方燕夫妇马上去石家庄。

兰英是个热心肠，对朋友的事比自己的事还急，她听说珊月的10万元让陈曾骗走不还，去要账还挨了打，忿忿不平，一直想怎么帮他们一把。她终于找到可以帮他们的人了，便打电话叫他们来石家庄她家，与那人见面。

方燕立即赶到北京西客站，从绿色通道直接上了去石家庄的列车。这个兰英，不知为我们找了什么人？方燕夫妇想了一路。

到了兰英家，她已煮好面等他们。兰英一边拾掇碗筷，一边不停地说：“我找的人叫老三，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人。他是银行行长的儿子，因为她媳妇和别人睡觉，被他碰上，他抄起了刀子就向那人刺去，差一点刺死，他便被判了刑。他到了劳改队正巧遇上管他们的是他父亲的老部下，便想办法花钱把他赎了出来。

在劳改队他结识的朋友，放出来便成了铁哥儿们。这老三想改邪归正，浪子回头，便想为被欺负的人两肋插刀。我认识了老三，把你们的事对他一说，他拍胸脯说没问题，这个忙他帮了。”

吃完饭，老三来了，他管兰英叫姐，看上去比兰英大，满脸风霜痕迹，身后跟来一个年轻女孩，说是他们公司会计，女孩坐下不吭声。听方燕讲了情况，老三说：“我的办法就是找不怕死的哥儿们一起，把陈曾的车劫了拍

卖顶账！你们知道车号吗？”

方燕、珊月都坐过陈曾的“公爵王”，却都没留心车号。

老三说：“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找个车跟踪，或蹲坑等他的车开出来，上去拦截，把他的司机弄下来，我们的司机上去开就是了，很简单！搞不到车便截陈曾，问他还不还钱，不还，就先把他一条腿卸下来！”

老三说得血淋淋，让书呆子方燕听了心惊胆战，就像看一部惊险片。

珊月问：“这么干，你们有危险吗？”

老三一笑：“不怕！其实并不真的割他的腿，他见我一比划，就得吓得尿了裤子，敢不老实？你们想想，我们这么帮你们，要比打官司省事。你们有理打官司就准赢？也不一定！贪赃枉法的官儿很多，如今是有钱人的世界，你们没钱，就别打官司，我算看透了。”

老三见方燕夫妇不表态，便告辞离去，兰英送老三出门。

方燕夫妇商量一下说：“这么干不是犯法了吗？咱们不能用这种办法，不能因为咱们的事，让人家犯法，那样咱心里就承受不了啦。”

兰英回来说：“老三讲你们若同意，给几个哥儿们出点饭费，他们找个车，花点油钱，马上就可以行动。”

方燕说：“谢谢老三吧，这种事咱们不能让他去做。”

兰英说：“他我的人全是黑道上的朋友。”

就是再没法，也不能走黑道。书呆子觉着此路也许能行，可他心里通不过。

方燕夫妇回到北京，看BP机记录着清和几次呼他们，方燕便去打电话。

清和说：“大叔，我呼你几次咋不回话，可把我急死了！我给你把事办了，你去到三环路上一家汽修厂和叫大江的朋友会面，一提我的名字就可，大叔你马上去吧。”

方燕跟妻子一学说，夫妇俩立刻行动。

在汽修厂见到了两位师傅，一个师傅叫于大江。大江说：“我们跟清和的关系没说的，我们一定帮忙。你家的情况清和大哥也说了，我已让廊坊的朋友了解了，那老头子原本在省政府当秘书，他有两个儿子……现在需要你们把他写给你们们的欠款条子给复印一份，我好交给朋友，我们好给你要回钱来！”

方燕问大江：“你们用什么办法要钱呢？”

于大江说：“用什么方法，大叔你就不用管了。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能要回账来为目的！”

见大江说得神秘兮兮，方燕、珊月心里没底。

“就这样吧，你们快把复印件交来，我好送给廊坊的朋友。说给你一个底，他陈家是廊坊一霸，我们这回就要学一下《水浒传》中的鲁达，要除除这一霸！”

方燕夫妇向大江道谢。

回来的路上，方燕说：“这也是黑道上的人物，不行，咱就让他们办办？”

珊月说：“咱交给他们借款条，陈曾家还不知道是为咱要账么！”

咱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万一出了事……人家还不报复咱们？咱们不怕，我怕咱一儿一女受害，咱惹不起人家呀，我一听大江说，我心里直抖……”方燕没有把那欠账的条子复樱几天没有音讯。

这天方燕接到了清和的电话，他火气很大地说方燕：“大叔！我好不容易给你找好的人，人家准能把你的钱要回来，你咋不把那欠钱条子交给人家？人家是给你要账，你不给凭据，让人家咋办呢？要不说我不愿跟你们这读书多的人办事，遇事前思量后掂量，前怕狼后怕虎，啥事也办不成！你去打官司告状，大叔你得花钱！”

明里花，你暗里也得花，倒末了给你判赢了，你也不一定要回那钱来。若不为什么说轻易别打官司呢。大叔，你再想想，你再不下决心，我可不帮你了，你就叫人家坑你吧，骗你吧！

方燕再想想，也没有走那可行的黑道。

如果这两次朋友的帮忙，他听从了一次，也许事情将是另一种结果，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了……这一天，在方燕走投无路之时，他的呼机叫了，是市公安局副局长老石呼他。他想：这回有救了，还是得靠公安局这条路！

不知公安局有啥助方燕之法……

三、公安局和地质局

是公安部古副部长找到市公安局石副局长，讲了方燕的情况，告诉他方燕的呼机，请他有空时呼方燕，让方燕与他面谈。方燕给石副局长回电话后，便和珊月立即打车去了公安局。

公安局大门口早有人来等方燕夫妇，是石副局长派下来的。

方燕夫妇被直领上楼，进了石副局长的办公室。

方燕夫妇一进屋就感受到首都公安系统的紧张，副局长的忙碌。桌上电话几部，刚接完这个，那个又响。方燕和珊月小声说：“局长太忙，咱们抓紧说。”放下电话，老石过来和方燕夫妇握手，连叫“老乡”，说古部长已把情况说了，我也想了个办法。如果在今年1月1号以前，我就可以根据他的诈骗行为先把 he 抓起来拘留嘛；从今年1月1号起，公安部门不能那样抓人了；要有十足的把握证明属于刑事犯罪，我们才能抓他。抓了就要判刑，不能抓错了再放，那样公安部门要承担抓错的法律风险。你们这案子，我看还不好确认他是诈骗犯罪：你们是老同学，早就认识，他又给你写了字据；他跟你签的合同，倒有诈骗行为，不过由公安部门送检察机关，也要有检察院的认定，这就麻烦多了。

珊月心里想到什么便脱口说了出来：“这么捆住公安部门的手脚，犯罪的人还不更胆大？受害的百姓更不好受了。咱不能照抄外国一套光跟外国接轨，不适合中国国情呵！那我们这事怎么办呢？”

石副局长不好妄加评论，也不好跟老乡解释。他是个讲实际的人，就像他那纯朴的老农民的脸庞一样，让人一看便知实实在在：没有一点虚浮，叫人信赖。他说：“我有个具体办法，你们回去写一封控告信，就写你们去向他要账，他赖账不给还暗中指使儿子打人，具体写清楚，时间地点……你带儿子找法医了吗？”

方燕说：“当天晚上，我们便去廊坊安次区公安分局报了案，他们做了笔录，可没有找到法医，我就带儿子回北京了，在北京天坛医院看了……”

石副局长说：“你们应该找法医。你们的控告信要附上医院的诊断复印件。写完交给我。从他家打人的角度先把凶手抓起来。

这时，你们再造舆论给他点压力，让他把钱还了，不然就不放人！

这样，也许他能把钱还给你们。只能试试看。因为廊坊不属北京管辖，还有点麻烦。若是在北京地区出的这事，就好办了。我想办法吧，看要不要通过河北省公安厅……因为你们当时已报过案，这次把它拾起来就是。”

走出公安局，珊月问：“你说石副局长这法好使吗？”

方燕说：“我看行，若真把打人凶手一抓，他家就急了，那李燕生是他外甥，他姐姐就不干了。”

珊月说：“陈曾可是钟鼓楼的家雀受过大惊吓的，他怕你拘留？！他家大虎都蹲过监狱……他也知道你不能拘留多久，到日子就得放出来，他家把钱看得比命还要紧，能还咱的钱吗？”

方燕听妻分析得有理，便说：“试试看吧，不然，又有什么别的好法呢？”

回到家里，方燕立即把控告信写了，连同诊断书一起到街里复樱复印的小姐见他，问：“你那住房的官司还没完哪？你可有些日子不来了。”方燕苦笑：“住房官司没完，新的官司又来，我找你的活儿又多了。”小姐说：“我欢迎，就怕你花钱复印材料一大罗也不解决问题，我这儿复印告状材料的多啦，打胜的不多哩。”

复印完了，方燕立即将材料送到公安局门卫，让他们交石副局长亲收。

1997年1月27日，阴历腊月十九。方燕按照老乡石副局长出的主意，到街头邮局给陈曾家打电话，想警告陈曾，也明言告诉已控告了他，让他把钱还了。接电话的是汪荣。还没等方燕说话，对方就说：“你不是上公安局告我们诈骗了吗？你去告吧！”把电话挂上了。

晚上10点，陈曾却呼方燕的BP机，让打开手机。

陈曾说：“我已经告诉大虎，让他在近一二日内给你们送一部分钱去，该过年了。然后我会全部解决的。”

说话的口气又是那么实在，真实可信。珊月说：“看来咱还不能跟他闹僵了，他若有点良心呢？往后咱也跟他家学，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你来硬的，我来软的。”

方燕说行，看他这回是不是真的吧。

1月28日一大早，蔡松、赵华、黄菊（人们习惯叫她黄工，她是个工程师）便来到方燕家，快嘴性急的黄工一进门便叫：“咱们又受骗了，孟花带钱跑了！”

珊月问详情，赵华说，他们按照律师意见去找孟花，见龙迪饺子苑大门不开，找到了看门的小伙子，才知孟花已经在12月离开未回，她临走时留下话：让看门人再看一个月便把门锁好走人。赵华他们说进去看看，看门人不让，隔着窗户一瞧，那电视机、电冰箱呀，贵重一点的东西全不见了！

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人走楼空还怎么办？

龙迪饺子苑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呀！不是属于地质局的吗？咱们找地质局去。他们只能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说法去找地质局了，可蔡松却迟疑：这有用吗？人家能理我们吗？咱和那纪主任也没有交往，那些头头咱也不认识呀。

黄工眼睛瞪大：“他们不见行吗，咱们的钱在他们的企业里呀，不让见

和他们没完！”

蔡松说：“除非咱找个报社记者跟着采访，他们就不能不和咱们谈了。”

大家说这是个好主意，便问方燕能否请个记者来。

方燕说，我就是一家大报的特约记者。他拿出《中华纵横报》的记者证。

大家商量先去了解情况做一侦察，只让黄工领方燕去。黄工以前找过地质局。

一个小时后，黄工和方燕到了地质局的机关服务中心，纪主任不在，副主任老佟接待了他们。

下面便是由黄工做的记录。

走访地质局实录

时间：1997年1月28日上午

地点：和平里

单位：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

被访问者：服务中心副主任佟强

访问者：《中华纵横报》特约记者方燕

记录者：黄菊

方燕：我是《中华纵横报》的记者（拿出记者证），因为有群众举报龙迪饺子苑的事情涉及到地质局，今天我来核实几个问题。请问允许录音吧？

佟：（连连摆手）别录，别录，你作为记者，核实材料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见报吗？

方：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准备曝光……

佟：要见报可要真实，等我把老纪找来，让他来谈吧，龙迪的事儿都是他一手办的，我刚接手。事情越搞越大了，我不好表态。我们和龙迪饺子苑孟花的问题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边说边拿出一份打印的要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通知交给方）他走出去找老纪。

方燕把此通知录下。要点是：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限你方于本月18日前将拖欠租金348679.50元人民币交于我方，否则即视为同意解除租赁合同，我方收回出租用房；请于本月25日前来办理解除合同手续。

（佟强进来了）

佟：今天老纪不在，以后约个时间，我俩一起接待你。我们的问题不会久拖不决的。

方：孟花说，她给了你们局领导好处了，所以你们不敢向她要钱，有没有这回事？这关系到反腐败的问题。陈曾说你们欠他的钱，等你们还清所欠的钱才能交房钱给你们。

佟：自我接管后没有这回事儿，我们要是欠他们的钱，他们怎么不来要呀？是他们欠我们的，才老躲着我们。这孟花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找不到了。我们找她一个多月了。

方燕拿出以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名义由孟花签字的与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问：这合同是真的是假的？

佟看了后说：是真的。

方：合同中说，你们提供一个中高档餐厅用房，是这样吗？

佟：餐厅是我们花钱装修的，之后我们还提供了6万元资金。

我们交时餐厅已初具规模，吊了顶。他们用我们的钱购了桌椅碗筷，

可设备清单没见到，什么东西算 6 万元内，什么不算，不清楚。

方：陈曾、孟花说是他们投资 30 万装修，买设备，你们却说是你们花的钱，谁说的是真的？

佟：我说的是真的，我有单据。

方：孟花说她是地质局办公室人员，是不是？

佟：笑话！一点边儿也沾不着，别说办公室了，她连本系统一般人员都不是，她纯粹是个无业游民。

方：你们是不是把这个餐厅承包给她了？有承包合同吗？

佟：不是承包关系，没有承包合同。

方：龙迪饺子苑是怎么注册成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他是不是属地质局的企业呢？

佟支吾不好回答，似有难言之隐，停了会儿才说话。

佟：这有点麻烦了……若从法律上说，它是属于我们地质局的，怎么给它办成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这得问纪主任。他清楚……我只知道，实际上它不是我们的企业。这就叫我不好说清了，难办也难办在这儿了……方：孟花的经营活动，如搞了集资、入股，你们清楚吗？

佟：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方：孟花欠了你们三十多万元，你们打算怎么办？就说解除租赁合同便完事了吗？你们找谁要？

佟：我们……我们肯定得要，找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要。

方：龙迪饺子苑的法定代表人是孟花，她出了问题谁负责？

佟：她是我们认定的法人代表，若从法律上讲，我们应该负责，可实际上，我们又不能负责、没法负责。

方：你们通知上写 1 月 18 日交房租来，没来；25 号让孟花来，她早跑了，今天是 1 月 28 日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佟：我不好说，我要跟领导汇报，听领导安排。我个人认为，从感觉上看，陈曾、孟花就是骗子！是地地道道的骗子！（说着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工作证交给方燕看）我们局里的人都有这个工作证，孟花她有吗？咱们怎么联系呀？

方燕把 BP 机呼号写给佟强，采访结束，握手告辞。

方燕、黄工到离地质局不远的龙迪饺子苑去。从去年方燕住院期间被叫来开会，妻子被打离开这儿再也没有来过。这正门旁有了个大霓虹灯标牌：“龙迪酒楼”。什么时候改名字了？方燕一点不知道。更换名字需要清理以前的债权债务，这样才可使原公章作废，可他知珊月还以龙迪饺子苑之名在中国银行存了一万元，这便不好取了。原来出入的餐厅大门已关闭，转到后面，门也锁了，那看门的小伙子也不在了。他们隔着后面窗户往里看，只见厨房里剩下的饭菜已发黑变霉，一片破败残象。黄工领方燕去孟花的住所，门也上锁紧闭了，气得黄工狠狠地砸了几下铁门。才走上来，又遇到一人向黄工打听孟花上哪儿去了。黄工说我们也找她哩，那人说，她欠下暖气费还没交呢。

方燕、黄工便去和平里派出所报案了。值班人说：“找她的不只一家两家啦！

她坑骗的人可不少啦！”你们是怎么回事？”黄工、方燕把情况说了，问派出所能不能帮我们把她抓了来。值班人说：“派出所上哪儿去抓？如果

她回来，你们发现了，可以来报信。我看你们去法院起诉吧。”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这天是 1 月 31 日，离陈曾说过的日子已过去了四天，哪儿有大虎的影子？

1997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晚上大虎给珊月来电话，说他现在天津。他讲：“地质局给我爸爸打电话，要告我爸爸。孟花已逃了，其实，那企业和我爸没关系。就说借钱吧，也是我爸借的，和我没有关系。你爸爸欠下了账你能还吗？”珊月说：“我还。”大虎说：“我不能还，我也没有钱还。”珊月说：“你来北京当面谈谈吧。”大虎说：“过了正月十五我一定去。”

晚上，陈曾来电话对珊月说：“我告诉大虎给你送钱去了。”

珊月说：“你别再骗我们了，大虎说你欠的账他不还。陈总，你不要再拖了，不然，对你没有好处。告诉你吧，方燕可整天跑这事呢，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如果真动了你，你那时可就太惨了！”

陈曾在电话里连说：“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方燕在一旁气愤地说：“快别浪费电话费了！他总在想办法骗人，还没被骗够呀！”

珊月关上电话，对方燕火了：“我正打电话，你别插嘴好不好？”

你怎么也得听他说什么，也好了解对方，咱还不能跟他闹僵。他万一能给咱解决一点呢？”

方燕倔劲上来和妻子顶嘴：“我就相信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你不斗争，他是不会拿出钱来的！”

珊月说：“那你斗去吧！”她不再吭声。

斗争！就是要和这些坑国害民的骗子们斗！就是要和与骗子勾结，搞权钱交易的人斗！方燕想：为什么他们这样猖狂，还不是因为人人都顾自己不愿去斗的结果，到头来还不是老实的百姓吃亏。这一天，方燕看报，见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的当前重点查办的案件，这鼓起了他的勇气，增强了他必胜的信心。

当夜他不睡觉了，给中央纪委并某工业总公司纪委写了一封信，把他已知道的和听到的情况全写进去了。

中央纪委并某工业总公司纪委：

根据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关于重点查办“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肆意挥霍和侵吞国家财产的案件，以及法人违法违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的精神，今揭发举报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及和迪公司领导章局长、尤局长、纪主任等有关领导的问题。

一、地质局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建了一座楼，局领导决定，把由局里外装修好设备齐全的中高档次的餐饮房连同居室共 421.5 平方米，在 1995 年 8 月 1 日出租给石家庄龙雨工贸有限公司，年租金 320757.38 元。龙雨公司是皮包公司，董事长陈曾原为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北方大厦总经理，1992 年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免职。

陈曾与其情妇孟素花（又名孟花，无业人员）在 1994 年因盗用毛主席纪念堂名义在广州制作“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手表被揭露而使河北省粮食厅损失 150 万元未被追回。1995 年，由于陈曾、孟花与章局长拉上关系，局长等领导才决定租给陈曾、孟花这两个骗子。此事在局内当时就有反映，感到奇怪。尤令群众惊奇的是，和迪公司竟为承租者办了个“全民所有制”的“龙迪饺子苑”，而法人代表竟是和迪公司所根本不了解的无业人员

孟花。孟花从此便自称是地质局办公室人员，进行诈骗活动。

二、租赁合同规定“全年房屋租金分4次收缺，而由于局领导经常在“龙迪饺子苑”吃喝，孟花说：“他们不能来收租，因为章局长、尤局长都让我喂熟了，他们个人有好处”，所以一直不按时收租，致使到今天欠下局叁拾肆万捌仟陆佰壹拾玖元房租现款。到1996年年底，法人代表孟花把地质局投资的贵重物资处理后逃走。

三、孟花、陈曾以地质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名义骗取私人向“龙迪饺子苑”投资入股。1995年12月，陈曾、孟花把地质局投资装修谎称是他们投资30万搞装修，骗珊月投资10万，称按此比例分红，风险共担。陈、孟与地质局租赁期是3年，却与珊月签了5年期协议。1996年6月，陈曾、孟花又以同样手段诱骗蔡松、黄菊、赵华、孙镜四人投入12万元。陈、孟把钱骗到手之后即入私人腰包和搞行贿勾当。不久，“龙迪饺子苑”在根本不告知投资人的情况下，又擅自改换营业执照，成了“龙迪酒楼”。这种违法违背合同的行为竟得到地质局领导的支持，就更令群众怀疑局长等与骗子孟花、陈曾是什么关系，得到多少好处了。现孟花已逃，人去楼空，欠债谁还？受坑骗的人们四方呼冤，已引起舆论界注意，这也给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人们说，和迪公司是和骗子一伙诈骗人投资的！

这是作为法人的地质局和迪公司违法违纪造成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也已给受骗人造成巨大损失，地质局职工反映强烈，要求纪委迅速查处，并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赔偿。

此致

敬礼

知情举报职工

1997年1月30日

第二天起早，方燕便把这封信打字复印寄了出去，他想：过不了10天，就会有反应了，他胜利在握，心里高兴！只要查一定会查出大问题来。他对妻子乐呵呵他说：“你等好消息吧！”

好消息不断传来，他在复印时便有石副局长呼他回电话。石副局长告诉他：“已把情况告诉大兴县公安局，由他们具体办理你的控告，你明天上午去大兴找罗局长吧。”

第二天，方燕和妻子兵分两路：方燕去大兴，珊月跟那四位受骗的一块去找纪主任谈。

方燕见到罗局长，一见便知是老公安，圆脸庞，憨厚爽快，50多岁。他说：“石局长昨天和我亲自谈了，我们和河北省廊坊市为邻，常互相配合联合办案，他让我去办。你再详细讲讲情况。”方燕讲了有关情况并听了罗局长的意见。

方燕办完了事便赶回家来，珊月也回来了，说：“那个纪主任态度很不好，什么也不说，也不承认受陈曾、孟花骗了，可见他们之间有名堂。他甚至说：‘你们还找来记者，是花钱雇的吧！我们不在乎，不就是几十万元吗？你们想向我们要钱，没门儿！’你瞧他这劲儿！把大家气坏了，我们商定明天去找他们局长。”

珊月还告诉方燕一个新动态：从你们采访的第二天，地质局保卫处便把龙迪饺子苑的餐厅、办公室的门全贴上了封条。

这是纪主任听说投资人带记者来调查，有些慌神，怕这些人把门打开，

便用了此招。谁知想封别人，却封了自己，使地质局从此陷入了被动局面！

四、“八路军骗共产党”

第二天，珊月、方燕带着照像机把那封条拍照下来，准备打官司用。时到春节，一切都要等过了旧历年再说了。

春节期间，方燕一家只在大年三十团聚在一起，看了中央电视台的联欢节目，听了钟声 108 响。一间 10 多米小屋怎么睡？把木板放在地上便占满了全部空地，让女儿在这儿睡了；儿子一直在看电视节目，但到下两点也困得支撑不住，便和爸爸挤在一个床上睡了。方燕想：明年此刻全家肯定不会这样了。

大年初三，方燕的妹夫从河南来了，他是开封法院经济庭的庭长，正好请他出主意看下一步怎么打官司。他听了情况却说很难。

一是告陈曾借款不还吧，他那借条不明确；二是告和迪公司吧，实际他们也冤，也损失不校龙迪酒楼是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逃走，是告他主管单位的依据，但也不易；三是你们投入龙迪的钱没有盖龙迪章的证据；四是应告陈曾儿子大虎一同参预诈骗活动，这样才可以用大虎名下的钱偿还，不然，陈曾是穷光蛋，所有财产都写的儿子的名字，你们赢了也没法执行。最后妹夫建议还要多找证据，把陈曾、孟花以及龙迪、和迪的情况全搞清楚才好。

吃了破五饺子，方燕、珊月便去北京西客站。

乘坐 21 路，是李素丽的那个车号。上车便是售票员热情的面容，热情的声音。

车上的扶手也包上了红绒布，是怕冰了乘客的手……方燕以为那满面笑容的售票员便是李素丽，可她却笑说：“素丽姐是下午的班。”车上的乘客也受了气氛的感染，争相给方燕让座，这在别的公共汽车上很少见。方燕坐下，见窗旁挂的“意见本”，便取来写下一首诗，大意是他上车以为遇到了李素丽，却又不是李素丽，足见售票员都成了李素丽……车到了西客站，97 次车已过去，他们上了 75 次特快。

方燕想记点什么，珊月却拿出扑克牌并叫来两人玩牌，一气儿打到了保定站。

先去法院宿舍找方燕的老同学颜大会。

方燕说又有了新的情况。大会头脑清晰，一下便抓住了要害：“地质局保卫处有什么资格封龙迪酒楼的门哪？人家是独立法人呀！地质局这是自找！第一被告便告主管单位地质局的和迪公司，孟花逃跑了，就找任命她做法人代表的主管部门！

和迪公司有钱，也不愁打赢了没钱！”

理得清楚，说得明确，方燕、珊月心里亮堂！

大会也建议把证据搞充分。谈了两个多小时，方燕夫妇告辞，直奔火车站，买了去石家庄的车票。

出了石家庄火车站，便直去陈曾的所在单位——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

方燕以记者的身份了解情况，以使他们介绍的客观些。从人事处、监察室同志那里知道了一些也证实了一些有关陈曾的情况。

陈曾今年 61 岁了，还没有办退休手续。他去年便要求办了，为什么没办？就是因为他当总经理时的一些经济问题、经济纠纷还没处理完。本来组织决定他免职以后去为国家追回几百万的损失，每月只给他 70 元生活费，没有工资，把这些烂摊子处理完再正式按级别发工资。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未经组织允许，组织上也不知道，便去廊坊下海了。按政策说，是不许在职干部下海经商的。

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完全属他个人行为，组织上不知道。

陈曾在北方大厦期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到大厦的电视机全被人搬走了。管理非常混乱，群众反映很大。监察室主任带上五个人去查，在大厦蹲了八个月，因为没有经验，很多问题都查不清楚。加上陈曾有两下子，左掩右遮，竟没把问题落到他个人头上。

群众说，他快把北方大厦的大楼丢了，咋就查不出他个人的问题？

他当总经理，拿供销社的工资干自己的事情，损公肥私，咋会没事？

按照今天看，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他起码是犯了渎职罪！但却只是免了他的总经理职务，便不了了之。听说他制作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又让省粮食厅亏了几百万！他又重演了北方大厦事件……查处陈曾的问题有专卷，现已封存。

离开省供销合作总社，方燕马不停蹄，立即去省粮油贸易公司了解陈曾参预制作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之事。从电话中得知：此事让这个公司损失 400 多万元，使人心惊！这是粮油贸易公司财务说的。方燕、珊月想问个究竟。

方燕夫妇见到了去年 3 月才上任的总经理。他说：“那是上任的事，他不太清楚，算是留给他这一任的麻烦。这是 1994 年陈曾牵线，以他个人别墅担保，与广东珠海一家单位合作的。没想到金表制成，我们投进一千万，却卖不出去。为什么？据说是因为陈曾用了毛主席纪念堂监制的名义被告发了。因为有一家单位制作了同样的纪念金表，那是毛岸青、邵华同意的唯一的一家。损失几百万，只有尽量把没卖的金表收回来，以减少一些损失吧。陈曾也参预了销售，我们从他那儿收回一些金表，每块金表都有编号。这倒是馈赠的贵重礼品。陈曾是否用金表赠人，我不敢说。金表的两家经销单位也是陈曾找的。……”方燕听了总经理的介绍，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家损失四百万元，却没有人过问？那编号的一块块金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不能问这位总经理，问也问不出答案的。

方燕夫妇赶到省人大去找吕先，请他告诉孟花家的住址、电话。吕先翻找半天，竟没有找出来。他说：“没别的办法，你们只有起诉陈曾了！他现在成了滚刀肉，什么也不在乎。你再有难处，也得把私人的钱还了哇！他把人家地质局章局长也坑了！”

方燕夫妇想了解与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签合同的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是不是陈曾的公司，吕先说不知道，他们便去市工商局查电脑，竟查不出来。这真叫人奇怪：怎么会没有这个名字呢？他想到中学老同学程志杰的老伴曾在市工商局工作，现在退休在家，干脆找她去吧。

天已黑了，好不容易摸到了程志杰的家里。一到便说起受骗了，想要打官司，需要了解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的情况。老程离休前是省司法学校的

副校长，为人刚正不阿，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而他自己也不断遇上挨欺受骗之事。他说：“现如今坑人骗人的事太多了。你写清楚了解什么内容，我亲自去找人查。你大嫂早退了，她办不了啦。”

方燕写上要查的内容，交给老同学。

老程一定要留吃晚饭，方燕夫妇说要急忙赶回北京，便离开了老同学家。

当晚，他们坐夜里 12 点的火车回北京。到家已是清晨六点，一夜疲乏，倒头便睡。

方燕从噩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了。他想起要抓紧办的事，恨不得马上办成。

可他头年就找了罗局长，春节过后已一周了，为什么还不见动静？他给中央纪委的信早发走半个月了，为什么还没有音讯？起床！去打电话！

他先给市公安局石副局长通了话，请他催促一下罗局长，抓紧去一的廊坊，如果需要一块去，请呼他。老乡让他放心，一定催促紧办。

他又给中央纪委打电话，总机问找哪个部门，方燕说是问检举信的处理之事，总机便转到信访室了。电话里回答说：“你的举报信有属名吗，是哪个单位？”方燕说没有写举报人的姓名。对方说：“匿名的不给查。一般来信三天便可以处理。

我们就在东四十二条，你有问题可以到这里来。”

方燕刚打完电话便接到蔡松来的电话：“今天我突然接到孟花打来的电话，说她在 301 医院看她住院的儿子哩，说她想过春节后开业哩，可见地质局把门封了，她也进不去了！我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哪？’她支支吾吾不说。我怕她有录音，想探听咱们的动向，我没有多说。”

小蔡有他自己的心眼儿。他分析：是吕先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陈曾，陈曾告诉孟花来探风的。

蔡松说：“咱们要快行动。肯定陈曾、孟花一会儿也没停地对付我们呢，咱们要马上去到门头沟审计事务所去找会计王秀琴了解孟花的内情，免得孟花走在前头……”方燕觉得这小蔡鬼道多，便约定明天起早就去门头沟，在 336 路的最后一站碰面。

方燕早起八点乘上 103 路电车到阜成门转 336 路公汽。车行 30 站才到大峪。

他们找到了孟花雇的会计王秀琴所在的审计事务所。王秀琴不在，同事说，她父亲病危回东北了。打听所长在哪儿，都说不知道。一位年长的人说，所长去哪儿是人家的事儿，我们也不打听。

看来这次他们白跑一趟，既来到这儿，便去区审计局了解一点情况吧。到审计局向一位要出门的中年人打听：“我们来打听审计局可知道审计所刘所长上哪儿去了？”那人说：“我就是！”太巧了，我们就是找你呀！

刘所长把他们领进会客室，倒茶接待，十分热情。

原来所长根本不知道王秀琴在外边做会计的事儿。他说，按照审计事务所的规定，审计人员是不允许兼任会计的，她是瞒着所里干的私活，这本身便违规了。

蔡松说：“据我所知，孟花雇她，并不是要她每天都上班，只是在周六周日去一下。她作账都在家里。”

所长说：“在自己家弄账也不对，她拿多少钱？”

蔡松说：“孟花每月给她 2000 元吧。”

所长说：“我们审计人员在外边做事，都要经所里批准，还要签协议。我们是审计工作，负责审别人，自己就要经得起审。这个企业，只有会计没有正式出纳是非法的；随意让人投资入股，又是全民所有制，这种投资也是非法的。”

他们听了恍然大悟：原来陈曾、孟花干的这一切全是非法的事儿，他们这一趟可没有白来！

什么事情不调查不明白。从石家庄到门头沟，方燕觉得颇有收获。他越来越有信心，这场官司肯定能打赢了！还要继续调查龙迪饺子苑的注册情况。一般人到工商局查问某企业的注册档案很难，还要花不少钱，只有由律师事务所证明是律师或者是法院调查，才可以调档，拿记者证也不好使。这怎么办？方燕想到了在国家工商局的朋友，想求他帮忙。

电话打过去，那工商局的朋友不在，等下午吧。

下午，方燕干脆跑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去了。他在那儿很熟，那朋友是珊月的战友，珊月在部队宣传队演阿庆嫂时，这位战友在宣传部门，曾报过幕。现在战友转到地方成了厅局级干部，但也时常怀念那过去的日子，所以见“阿庆嫂”仍如以往一般热情。

那年珊月做磁疗床垫传销才找到了战友，并且是听了老战友的话才不再干的。

老战友说：“这传销不规范，不大适合我国国情，不要再做了。”这位战友局长非要招待珊月不可。珊月知他清廉，请客要花自己的钱，便让他免了，笑说：“你这位大局长请客要自己掏腰包，在当今可是少见，还是我来请你吃一顿吧。”从此方燕与他便不断联系了。他的下属有个处长叫小伟，又是方燕在长影时的老厂长的儿子，见方燕叫叔叔，于是找不见局长便找处长。

局长不在，说是研究“3·15”消费者权益保障日的打假问题去了，方燕便进到处长小伟的办公室。

小伟见方燕便让座倒水，问：“还搞磁疗床垫吗？”

“早不搞了。我们挣的钱又全让老同学给坑骗了。”方燕讲了经过，小伟非常气愤，问：“这个饭店注册资金多少？”

方燕回答：“5 万。”

“那麻烦了！”小伟说，“它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 5 万，顶多也就赔你 5 万。”

“可它是假全民哪！”方燕说，“实际是个体，打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幌子骗人！”

小伟说：“当前假全民、假集体太多了！那你也得有证据证明是谁给它办成假全民所有制的，才可以去找那办的单位要账。”

方燕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帮我查查龙迪酒楼的底档。”

小伟说：“我给叔找东城区工商局的朋友，让他帮你看看。”他立即给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的朋友打电话，让查一下龙迪酒楼的情况。不一会儿朋友回电话，说了酒楼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企业性质……。可这不能说明是谁给注册的呀？小伟说：“那需要查底档。这样吧，叔去一下东城区，直接跟这位朋友说吧。”

小伟便又给朋友通了电话，介绍方燕去东城工商局。

方燕回家带上妻子一同奔向东城。

朋友初识便这样帮忙，按照当今常规应该带点见面礼品吧？

可方燕夫妇却为此为难，真不知该拿点什么。方燕还是那句话：“什么也不带了，就送朋友一本我写的书吧。”

一本书成了见面礼，朋友却拿出饮料招待。

朋友把有关底档调上来，就在办公室里翻看，但是不能记录，只有法院来调档方可复制。

厚厚的一袋。方燕、珊月一页一页翻看，原来全是地质局纪主任干的欺骗工商局的事儿呀！真相大白，鬼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一页是《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组建单位：北京和迪商贸公司；组建负责人签字：纪凡；申请日期：1995年7月1日；企业法定名称：北京龙迪饺子苑；法定代表人：孟素花；经济性质：全民；注册资金：5万……一页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姓名：孟素花；性别：女；文化程度：大专；出生年月：1954年6月7日；政治面目：群众；家庭住址：西城区和平门东中胡同33号；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北京和迪商贸公司。

兹证明孟素花同志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正式任命拟出任企业总经理职务，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任命单位：北京和迪商贸公司，1995年7月1日，（章）。

一页是《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产权单位证明，本房产权归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所有，同意将376 m²以无偿方式提供给地质局和迪公司企业使用，期限为叁年……一页是《北京龙迪饺子苑章程》，其中第1条第1款便是：北京龙迪饺子苑是北京和迪商贸公司直属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6年9月6日，又有企业更改名称登记表，将龙迪饺子苑更名为“龙迪酒楼”，隶属单位：某工业部地质局，已办理公告手续。

方燕看着这厚厚的各种登记表，大开眼界，他在读一部从未读过的社会大书。

原来那些手持圆圆的公章的人在国家制定的表格中就这样写着谎言，欺骗着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老百姓传言的“共产党欺骗八路军”或“八路军欺骗共产党”的自己骗自己人的故事。

方燕怒气填膺：就凭这一点，我也要揭露你们！太可恶了！

就说这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吧，编了多少谎话！她是个无业游民，却证明是和迪商贸公司的职工；她不过是个中学生，却写成大专；根本就没有她的履历，怎么会说对履历进行了审查？

其中一条写有孟花在北京的家庭住址，这引起了珊月的注意：地质局的佟主任说孟花找不到了，她不是有北京的家庭住址吗，为何不去那儿找她？

第二天赵华来到方燕家，珊月告诉赵华一个发现：“孟花在北京的家庭地址我们找到了，咱们去找找她吧。”

赵华说好，她们便要去，并拉上了方燕：“那是个泼妇，我们去有点风险，不要让她再打了我们。你也跟我们去，多个人手。”

他们记住了那地址：和平门东中胡同33号。

乘7路汽车到和平门下车，打听东中胡同。他们听孟花讲过，她舅舅是总参的，给邓小平当过秘书，这肯定是瞎吹！不过可能是军队的干部，孟花可能是住在她舅舅家吧。

东中胡同是一个很宽的胡同，就在 7 路车终点站的对面，倒挺好找。这儿没有高楼，净是很整齐的四合院，倒像是高级干部的住所。查门牌号，见前面那个有台阶的高大门楼便是 33 号，看来是个高级干部住所无疑了。他们三人互视一眼，说肯定是她舅舅家了。

走到 33 号门口，却让他们吃惊了，中式门楼旁挂着一个铜牌，写的是“中国科协机关招待所”。

他们上台阶进门，向传达室打听：“这旁边有住家吗？”答：“我们是招待所，哪有住户？”问：“有长期住的客人叫孟花或孟素花的吗？”答：“没有长时间的住客，没有什么花……不可能。这是科协机关的客人办事来往的地方。”他们让值班女士写了个证明。走出大门，三人禁不住大笑，他们还以为会见到孟花，准备打仗哩！

其实和迪公司知道这是假地址，所以不来找她。

珊月说万燕：“你还上哪儿找材料体验生活呀？这生活多有戏呀，是绝好的电视剧题材！”

2 月 24 日，星期一，方燕和蔡松等四人昨天约定，今天在地质局门口会面，一同去找局领导谈。必须找到局长，才能解决问题呀！八点半，方燕两口子 and 蔡松、赵华、孙镜、黄菊全到，便要一起进地质局的大门，被门卫拦住了。

“你们找谁呀？不说话就往里走！”态度很严厉。

“我们找章局长……”

“章局长不在，尤副局长也不在。”

方燕便说：“我们到你们单位纪委反映问题。”

纪委走那边，门卫不得不指给他们上北边楼梯。蔡松说：“可能局长早有话不让咱们见，肯定在这楼里。”

他们从北边上楼。上到二层，遇到一位手提暖壶的妇女，便问：“章局长在吗？”那妇女说了真话：“章局长在，他在那南边的办公室。”

这是不想见咱们，还说谎话。方燕很生气，咱们非见他不可！

他们便不去纪委了，又从二楼向南边奔去，正巧碰上那门口拦挡的门卫：“哎！你们不是上纪委吗？怎么又过来了呢？怎么说瞎话骗人呢？”

方燕到那人面前：“同志，你怎么这个态度？”

“对你们我这是好态度，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来找局长，他明明在，你为什么说不在，还说我们说瞎话？”

方燕和门卫在走廊里吵起来，有人过来缓解：“局长们很忙，你们找局长应该提前预约时间。当前不是小平同志逝世，各单位都要加强保卫安全措施嘛，你们也要理解。”

他们便又折返回去，到了局纪委办公室。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女同志。方燕讲了他给中央纪委及某工业总公司纪委那封信的内容：引起女同志的注意，她拿出本子把要点记了，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儿，只知道与龙迪饺子苑是房子出租的关系，我要把这些向领导反映。”

蔡松接上女同志的话说：“孟花欠下你们局几十万，为什么不去追究呀？这里边怕有原因吧。我听孟花对我说过，地质局不敢管我要账，我给局的头头每人送了一块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这金表一块就值 9000 元。”

蔡松在这儿竟抛出这么一颗炸弹，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

这小蔡真有绝的，怎么早先他都没有把这炸弹露出来呢？纪委的那个女同志把这话记上了，这可是关系受贿的要害问题。

这时佟主任推门进来说：“你们不要找局长，局长已交待了，有什么事找我，我看咱们的事儿最终还得通过法律解决，我们要找陈曾、孟花，你们也要找他们，因为你们是把钱给他们啦，我们没有见到，别的也别说了，还是通过法院解决最好。”

佟主任讲完便出去了。纪委女同志说：“我和领导汇报一下，你们还是和领导直接谈谈，分管纪委的是王副局长。”她出去了，很清楚，纪委很重视他们反映的问题。

一会儿女同志回来说：“你们周三来吧。”

他们离开地质局大楼便又奔龙迪酒楼来，那封条还在。黄菊、赵华到地下室孟花的卧室去察看，只见封条已被撕开了，显然有人开了门。黄菊贴着门一听：呀！

屋里竟有说话声，孟花回来了！

黄菊叫起来：“快来呀，屋里有人说话，可能是孟花回来了。”蔡松、孙镜也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好似一男一女，莫非是陈曾和孟花来这儿幽会了，这要活该他们倒霉了。

方燕下楼去听，果然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听不出是男人的声音，倒像是两个女人说话。

大家都来听了，判断如果是两个女人，那肯定是孟花约来了会计在这几倒账呢。

不论是谁吧，应该马上通知地质局。方燕跑到居委会打公用电话，让佟主任马上过来，我们要我的孟花送上门来了。

佟主任说他有事，先派一个姓任的马上过来。小任耳朵贴门一听，是有人在屋内，便敲门叫喊开门。半天竟无人开门，那声音也停止了。

大家说：“报警吧！”黄菊说：“派出所说只要孟花回来，马上报告他们。”可是谁也不去派出所报告，都在这儿等别人去。方燕便又跑进居委会打电话报警了。

对方问什么事？方燕说：“是一个携款逃走的女人又回来了，以前报过案的，她现时在屋里，叫门不开，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求助。”

对方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在什么地方？”

方燕告诉了，对方说：“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行动。”

不到 10 分钟，便来了一车巡警，全副武装，风风火火地在龙迪酒楼门口停下。

方燕指给他们那屋子，一个头儿便到楼下叫门：“开门！我们是警察！”

屋里没有回答。

“打开门！”头儿命令，几位巡警便找打开门的东西……大院里聚满了围观的人们，都议论着这饭店女经理坑骗人的故事。

方燕被警车带走了。

方燕奇怪：这是拉我到哪儿去呀？

警车在和平里派出所的门前停下，这就是他和黄菊第一次来报案的地方。他跟警察上了二楼所长办公室，那警察拿出本子来，让他讲为什么报警及他们受害的事实。那警察写完，让方燕看一遍。他要拿笔改那记录不准确

的地方，警察制止了：“不要改我写的，哪儿不对，你写在后边。”最后留下地址、电话，签上方燕的名字。

派出所所长进屋，说：“门打开了，没有人。”

方燕大为惊愕，真是怪事，几个人都听到说话声了嘛！

所长说：“我想她是不敢回来的。在我这儿报案找她的人很多，她早不知躲在哪儿去了，她还敢露面？也许是你们心里急切想找她回来而产生的幻听吧！”

珊月、黄菊、赵华、孙镜、蔡松都赶到派出所来迎方燕，方燕下楼同他们一块走了。就从这儿开始，这几个共同为一个目的的人出现了分歧的裂痕。蔡松说：“我根本不同意报警，震动这么大，给咱自己找麻烦。”黄工急火火他说：“小蔡，你当时有屁不早放，事出了说这话有啥用，让咱们赔砸坏的门我赔。”赵华沉稳他说：“有啥大不了的呀，看把你吓的，这比你揭发孟花行贿、局长受贿的事小多啦！”孙镜小心地说：“那得让咱赔多少钱，咱们不是告诉他们了，为什么佟主任不来呢？”珊月说：“也许佟主任早就知道这里不会有孟花。那屋里有营业执照，咱进屋一趟咋忘了拿出来了呢，该年检了呀！”赵华也很后悔。珊月又说：“最后是地质局的小任锁的门，我们也应该加把锁，不然他们可以随便进去拿东西，赖我们开门丢的，到时怎么说？”

这一帮人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都有不同的后悔。

当方燕向我讲述这一段时，我眼前像看了一部惊险片。他说中国巡警的迅速出动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令人佩服。

按照约定时间，隔了一天便是周三，他们想这次肯定能见到局长章星了。谁知道他们又被领进了局机关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仍是纪凡和佟强与他们谈。

“为什么不让我们见章局长，尤局长呢？没有局长，这问题不好解决！给孟花办成全民所有制企业，让她进行诈骗活动，没有局头头指使怕你纪主任也不会给办吧。我们有许多问题，只能直接和局长谈。”

“我们局长事情很多，他下边要管多少万人。这机关三产是一件小事，他已让我俩处理了。”

“你们怕做不了主。陈曾多次说，龙迪饺子苑属地质局的全民所有制，房子是地质局提供的，可以不交房租，我们若投资保证赚。

咱们分了钱，剩下的给地质局点儿没事儿，人家是为了吃饭方便。

章局长说了算，我和章星铁关系。我们是听了这话才投资的。孟花说她是章局长调过来的，我们要知道章局长和陈、孟到底是什么关系？”

纪主任听到这儿忍不住了：“那也不能听他陈曾胡说，上次你们谁说的局领导一人收了一块金表，这是谁说的呀？”

蔡松说：“我听孟花说的，我没见到……”纪主任瞪着眼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也是某工业总公司系统的人，怎么能随便胡说？你这要负责任的！这是受贿问题呀，能信口开河诬蔑我们局长嘛？！”

蔡松低着头，脸色发白，不敢反驳。

纪主任说：“我们也是叫陈曾给骗的，他把我们章局长也给卖了（这是大变化，上次他还不承认自己受骗呢）。我们也很同情你们几位，那钱不是好挣来的呀，就这么交给陈曾、孟花让他们骗走了，扔到大河里还有个响哩！咱们都受教育吧。

我们受教育是前一段，给她办了全民执照；你们受教育是后段，不该把钱投给她……你们当初投资应该打听一下，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一定不让你投，我们早就看这个孟花不行哩……说实话，我很恼火，我本来办退休了，可还得处理这摊子事，很难哪！陈曾很狡猾，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告他都很难。只是前些日子，大约在去年 12 月中吧，他打过一个电传来，说宣布龙迪酒楼倒闭，章局长也急了……”佟主任接着说：“我们见孟花走了，去石家庄找她，她就是不开门。我们开车去廊坊找陈曾，他老婆好厉害哟，就是不放陈曾出来，电话不接，人不见面，怎么解决？我们无奈才发了那个通知，我是通过邮局挂号寄的，好有根据。我们和他签了三年的租赁合同，他们怎么和你们签 5 年的合同？这事不能拖下去，对广大职工也不好交代，一天不开门就损失一千多元哪……前天，你们让警察把门砸坏了，按理说应该找你们，也就算了，你们也是为了找孟花。

我知道她是不会来的，我们找她她都不见，能来吗（怪不得那天他不露面）！

你们往后也别找我们来了，咱们都找陈曾、孟花，我们告他们，你们也告他们吧。

”

说到这里，才说出本意。

方燕他们刚进来时，纪凡还不让他这个记者来采访，说事先没通知他们，闹得有些僵，说到最后，竟很融洽了。纪主任说：“你需要什么情况要先来电话，你要看陈曾的电传，下次来给你看。”方燕对纪主任的印象也变了，他也是被陈曾坑了的可怜老头。

下一步怎么办？是告陈曾、孟花，还是告地质局和迪公司？

珊月说：“咱们还是找律师给拿主意吧。”

那四位领头的是蔡松，是他把三个女士引到骗局中来的，可他却低头不语。他在想他自己的事儿。

黄工说：“看来他们最怕的是小蔡揭发的金表一事，老纪发那么大的火，肯定是有鬼。小蔡，你肚子有什么材料可要端出来呀！”

你跟孟花接触多，知道的也多。我看孟花叫你蔡大哥可甜呢，她没有把你勾引上吧？”

蔡松火了：“你别胡说！”见蔡松真的急眼，大家也便不言语了。

哪知蔡松正为他突然在纪委说出金表之事后悔莫及。他说：“我是工业总公司系统职工，跟你们不一样啊！”

他们都决定先找律师，再决定下一步告谁……

五、电视台助受害人

方燕接到石家庄老同学程志杰的来信，说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查出了石家庄龙雨工贸公司的底档。这个公司从 1995 年后没有年检，实际上已不存在，法人代表是孟素花，有四个股份，根本没有陈曾。

原来陈曾是用孟花的实不存在的皮包公司与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签的租赁合同。这个公司已不存在，佟强难道不知道吗？看来，地质局也不想让

龙雨公司还他三十多万元欠款，只是做个样子，留个字据，把房子收回而已。损失的是公家，个人又不掏腰包，他们还会真找陈曾、孟花打官司？方燕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出是陈曾与地质局在暗中联手对付这些受害人。

要打官司总要请律师，为请律师方燕两口子又恼起气来。是和张德泉一起办公司的小马为他们介绍的律师朋友叫王大明，说这律师和别人不同，仗义，为他打赢了一场官司。还说没有钱，可以先不收费，这倒是方燕夫妇所希望找的律师。可邀在哪儿见面，怎么接待？到饭店得花钱，现在是月末，工资已花个差不多了，方燕拿不出钱来。到底在哪儿见律师呢？小马劝说：“别为这事犯愁，邀他到南城，郭林家常菜饭馆吧，我请客，都是朋友，没说的！”

郭林家常菜饭馆很火，小马介绍方燕与王律师相识。为了能够说话，便找了个旁边靠墙的桌子，小马让方燕点菜。方燕说，什么都行，不要贵的，你点吧，他只想快向律师介绍情况，听律师指点。方燕介绍完，律师听清楚了说：“方老师，你不是用的法言法语。”方燕说，对法律我真不懂，是法盲，越来越知自己无知。律师说：“不能那么说，你是作家，什么都知道的，不能说不懂，当然，你也不能全懂，不然还要律师何用？”天明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回城来因受欺而学法律，自学考试得大学本科文凭，得律师资格证书，现在天坛法律事务所供职，知百姓受欺压之苦，常为平民免费咨询、诉讼，甚至还自己搭上钱财为受害者奔波取证。这是小马给方燕介绍的，使方燕内心佩服。

王天明对此案的分析，更让方燕深感惭愧。

王天明说：“我虽是律师，却不主张你打官司，我做了八年律师深有体会。说句我不该说的自家人才说的话吧，法律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根据地质总局两位主任的话，是鼓动你去告陈曾、孟花从而使他们逃脱。既然孟花欠下他们30万元的房租，他们为何不告？说告是假的，他们不能告，不敢告，一告就告到自己头上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有根据。这龙迪酒楼是他们自己任命的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存档中明写着是无偿提供的经营场地，并没有写着收取租金，怎么说龙迪酒楼欠你的？他不敢说！这收的租金，实际上是入他们自己的小金库，是违法行为，他敢告吗？他们告石家庄龙雨公司也不行，因为那龙雨早已不存在了，就算承担法律责任，也是孟花一人承担，而他们早在为孟花开具的负责人资格证明中就写清她并没有债权债务，怎让这个孟花去为那龙雨的孟花还账呢？孟花一点也不怕他们告，你不是说地质局的头头不断到龙迪去吃饺子而孟花都给记上账了吗？就这一点，孟花说出来也会使当官的不好受的。他们想的是保自己的乌纱帽，国有资产流失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肤之痛，况且，如果孟花真的给头头们送过价值近万元的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你想，这头头们能引火烧身，捅孟花这个马蜂窝吗？不会！不信你瞧，地质局绝不会去告陈曾、孟花的。

“他不敢告，倒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还是要见章局长，要单独找他，给他点点利害关系，告诉他如果真打起官司来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不如他批个条子把钱还给你，他便可以平安无事地当他的官了！”

“你是作家，又认识电视台的朋友，为什么不把这种事曝光呢？”

这对局长更是巨大压力，当官的如果有腐败问题，他们最怕曝光，这是舆论监督，要用这个手段。你不妨把稿子写好，给章局长看，如果他答应

还钱，你便当场把稿子撕掉，如果他心里有鬼，真有问题，他便会和平解决，十万二十万的，对他来说不算啥，从哪儿都能拿出来，为了他的官位，他可能这样办。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这叫兵临城下，和平谈判。

“你还要去找那个会计，这个人物很重要，可了解纪主任从她那儿拿走了多少钱。你们说给了地质总局 13 万，好，让会计证明从龙迪饺子苑拿走钱就可以了。是石家庄龙雨公司欠你的房租，你为什么要从我们龙迪饺子苑拿钱？你拿走钱入账了没有？肯定是进小金库了。这样，方老师你可以到人民检察院举报他纪主任有贪污嫌疑。”

王律师给指了道儿，方燕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回来跟妻学说一遍，便邀蔡松、赵华第二天再去门头沟。

前几天，门头沟审计事务所的刘所长便给方燕来了电话，告知会计王秀琴已从东北回来，你要找她可头一天来个电话，我好把她留住，不让她外出了。听完律师建议后，方燕便借用饭店的电话告诉了刘所长，说他要来找王秀琴，因此今天肯定不会扑空。

方燕起个大早，八点半便到了大峪。等蔡松、赵华的时候，他记下了准备了解的问题共 18 条，包括：自然状况，何时当会计，与孟花的关系，我们的投资是否入账，何时变成酒楼，陈曾、孟花投资多少，交了多少租金，地质局可给开了正式收据，是否交税，每月交多少，孟花与你何时分手，有何交待，每月给你多少工资，地质总局的人吃过多少次饭，可有账等等，刚记完，蔡松、赵华到了。

他们直奔所长办公室。刘所长把王秀琴叫来了，一见面，她显得很紧张。方燕拿出采访录音机来，她不让录，只好收起。方燕尽量把谈话变轻松，但事实难以清除她心理的紧张。方燕做了谈话笔录，抄记如下：我是南开大学学经济的，研究生毕业，1995 年 12 月由朋友介绍认识孟花的。朋友是男的，和孟花不错。叫什么？那没必要说吧，是以我妹妹的名义给孟花弄账，我帮助妹妹，只负责记账、报表，出纳是孟花。她给我一大把条子，让我怎么记就怎么记，钱都在孟花的口袋里，没有数，叫我记多少便是多少。你们投入的钱，我记得珊月好像是 7.8 万，我记不大清了，账本上有。蔡松他们四人是 11.5 万，支出的钱大部分是用于装修，装修的票据也没收齐，总数也不知道。我最后一次报表是去年 11 月份，也是我最后去饺子苑，之后孟花走了。陈曾、孟花投入了多少不清楚，总数让我记了 47 万吧。龙迪饺子苑改名没有登公告，听服务员说变了账号，改交通银行开户了。每月按开发票的营业额，5%交税，大约 600 元吧，给东城税务所，负责收税的姓郑，和孟花关系很好。孟花说她原在河北省审计厅，后调国家工商局和地质局的。我只管她的一个账，她还有别的账，听服务员讲，她有 14 个账号，是服务员李伟、李娜跑银行。她说，没人敢惹她，她二舅是邓小平的二秘，她说回家就去老舅那儿。她说和陈曾在河北认识的，她是陈曾的秘书，调地质局办公室也是秘书。……我跟孟花去过章局长家，只去过一次。章局长的爱人是南开大学的校友，是物理系的毕业生。找她是为我个人私事，就不必说了。地质局纪主任向孟花要钱，我记得交过几次：一次一万三，又一次一万三，还有一次一万九，全是交的现金，交过十三、四万吧。纪主任把钱拿走，给打的白条，我要求他给开正式发票，他不给，说以后凑齐了再一块给开发票，到了儿也没见发票，白条子在账上呢，所以我没法下账，到现在也没下账。我下账的条子有不少是请客吃饭的，地质总局的尤局长和别人吃饭，孟花也

都记着账，说他们要钱就把这账加上。再就是礼品单子不少，至少有七八千元，她给谁送礼，我不清楚。一次，她拿到 10 万元，让我开票，我说入谁的账，是谁给谁开票呀？他说是一个人的投资款。

孟花后来在饺子苑搞传销，在餐厅开会，认识了香港一个叫阿维的年轻人，他来讲传销课，孟花说这是她亲弟弟的香港朋友，她弟弟在香港开赌常孟花为找阿维去过香港，来回的机票费用都是从我这儿报销的。

孟花在走以前告诉我，这龙迪饺子苑董事长是陈曾，他出钱，她经营。12 月份陈曾打过一个传真说要破产，我没见到。我只要她每月给我工资，一开始一千五，后来增到每月两千，别的我也不问了。

腊月二十六这天，孟花给我来过电话，好像是用她买的手机打来的，说她见酒楼被封了。为此她想起诉龙迪公司，说按合同还没有到期。

王秀琴说了不少，时间也不早了，方燕他们向王秀琴表示感谢。王秀琴见所长不在，埋怨说：“你们怎么叫我在这儿说呢，让我多被动，这不把我也牵扯进去了吗？”

方燕忙解释说：“上次来找你，你不在，这才找到刘所长的。”既然做了违纪的事，早晚也会让人知道。王秀琴感到被动，也算是一个教训吧。

路上他们议论：会计提供了他们从未听说的情况。这个孟花还去了香港，给人送礼，请客吃饭……都是咱们挣的那血汗钱哪！

她的账本应该封起来！现在地质局拿着开门的钥匙，他们会不会把账拿走，涂改，销毁，这可说不定。如果有鬼，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应该加快行动！

大家都说最后要见章局长一面。他们让方燕找舆论界朋友给地质局加压力，纪主任从咱龙迪饺子苑拿走 13 万不是个人贪了，便是入小金库私分了！大家越说越有气。

方燕回到城里便给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组打电话，向他们介绍情况：“3·15”打假日快到了，我给你们介绍个新闻线索，假全民所有制坑国害民的事实。

对方说：你讲慢点我记下来，向领导汇报。方燕向对方说了具体问题。对方热情道：“谢谢您，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曝光，很有意义。不过，我做不了主，我要跟领导汇报，我马上汇报。怎么和你们联系呀？”

方燕告诉了自己的呼机号。他心里好高兴！如果真能上了“今日话题”，这问题便一定能解决了。他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其他四位患难受害人，一同分享这愉快。

方燕开始为电视台准备有关材料，理一下头绪，设想从什么地方切入主题，采访时会遇到什么问题……一边整理材料一边想，这些日子奔波，学到的东西太多了，终于找到了希望，问题解决有望了。

第二天九点，方燕的呼机响了，是北京电视台在呼他。他跑去回电话，进一个屋，有人正用，又进一个办公室，人家在开会，不好意思用。他只得跑下楼去到了行政处。有位女士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大记者，你用俺们电话得交费呀！你家发了，咋不买个大哥大呀？交钱再用。”方燕笑道：“我有急事，让我用一下吧，我交费还不行吗！”那女士把手放开了，方燕连说谢谢。

方燕照号码拨通了电视台“今日话题”组，又是那个年轻记者接的，对方说话调子低沉：“方老师，你说的情况我向领导汇报了，因为这是中央

系统单位的问题，咱北京电视台不好曝光。问题比较麻烦，实在遗憾，情况就这样。”

方燕慢慢地放下电话，没有向那女士道谢便出去了。女士还开玩笑：“大记者，大作家，给我们电话费呀。”方燕没有答茬儿。

希望变成了失望。

但方燕却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这性格也许是遗传——随他父亲。他没见过父亲，却记得那为烈士写的碑文，说他父亲生前常自语：“一心所向，百折不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方燕也要“一心所向，百折不回”。此刻他想，北京电视台说不适合他们曝光，那我就找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它该不会受地区、单位级别限制了。正好，中央电视台曝光影响更大呀！

方燕有朋友负责新闻评论部“焦点访谈”栏目，正好找他。

方燕在公共电话亭拨通了电话，不巧，他的朋友去美国了。他放下电话，又一想，自己真呆！他不在不会找别人？这又用不着朋友走后门。他又一次拨通“焦点访谈”的电话。

“他不在，我就找您说吧！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访谈线索，题目我想叫《假‘全民’坑国害民，受害人诉告无门》。”

对方听了题目便十分感兴趣：“好题目，你说说是什么事呀？”

方燕便简单地说了。

对方说：“你谈的很好，这个内容很重要，这种事也有普遍意义。你知道，我们的记者很忙，要采访的线索很多，你能否把你知道的真情写出来，电传给我们？我们有文字材料也好上报。”

方燕满口答应：“我立即写材料，明天就电传过去。”

对方告诉了传真号码。

更大的希望在闪光，仿佛太阳也明亮了。他要走，被人叫回：“你还没付电话费呢。”

“对不起，”方燕连连道歉，问多少钱，回答二元六角。好家伙，竟说了那么长时间！他付了钱，便回家写材料去了。

写什么材料，干脆给他们把拍摄脚本写出来算了！方燕本人写过电影、电视剧，照此法写成，岂不更让电视台省劲儿？

他一直写到深夜，第二天起床便又去那家复印店。

他想去邮局电传，又一想，干脆亲自送去算了，还可以见见这位热情的记者朋友。下面是这个脚本：假“全民”坑国害民，受害人诉告无门（选题送审稿）主持人导语：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利欲熏心者制造假货，坑国害民。你一定听说过假烟、假酒、假农药、假化肥……于是有了“打假”，有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的活动，深得民心！你可知道还有假全民所有制，假营业执照，假法定代表人，假会计做假账这一系列的“假”吗？

在北京东城和平里七区七号楼，有一个“全民所有制”的“龙迪饺子苑”，它就是这样一个假企业。让我们来看看它怎样坑害国家，使国有资产流失，又怎样坑害了被它诈骗的投资者！

“龙迪饺子苑”大门关闭。

大门旁的另一个竖立的标牌：“龙迪酒楼”。

近镜头：酒楼后门有一个封条：“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封”。红章（特写）：“中国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保卫处”。

画外解说：这个饺子苑，已在 1996 年年底关门停业。而给饺子苑贴封条的却是：中国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保卫处。令人奇怪：这个饺子苑和地质局是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去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画面：七号楼四单元，地下室 002 室，门是防盗门，一把大锁。

这是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记者找到家委会负责人。

家委会负责人说：这饺子苑的经理叫孟素花，女的，早就去向不明……

记者：据说，饺子苑的企业经理、法定代表人孟素花早就去向不明，投资者来这儿也不知有多少回了，一直找不到拿走他们一生血汗钱的经理……画面：受害人珊月、黄菊、赵华等人坐在那贴着封条的门口，无望地等待。她们满脸愁苦，向记者含泪述说她们受骗的过程。

记者来采访，她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要等拿走我们钱的孟素花，只要她回来，我们就报警。我们在 1 月 28 日就去和平里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的人说，好多被骗的人都在找她呢！”

记者问：你们投了多少钱？

大家：我们一共投了 22 万元。

记者问：你们不认识孟素花，怎么会把钱交给她呢？

大家述说受骗的事实。

画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记者的话：我们去东城区工商局查看了原龙迪饺子苑的营业执照，投资受害者的倾诉是真实的。因为法定代表人孟素花及那位自称董事长的陈曾去向不明，久寻不见，受害者自然要找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了。受害者说：“她们曾多次找到地质局，局长一直不见；主管单位、地质局的北京和迪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纪凡却说：“你们投资与我们无关，你们去法院告吧！”受害人一生所有的积蓄全被坑走，她们没有钱去交那笔律师费和诉讼费。为此事，记者找到工业总公司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负责人，也就是龙迪饺子苑的主管单位和迪商贸公司法人代表纪凡和佟强。

（采访时实录）

画面：记者去向地质局局长章星了解情况，听他谈如何答应办假全民企业的原因和过程……（采访实况记录，此处从略）记者的话：事实已很清楚：由于陈曾和章局长的“特殊关系”，章局长同意给陈曾、孟素花个人办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这就给他们欺骗善良的人提供了条件。因为是陈曾说的“铁关系”，所以石家庄龙雨工贸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是否具有法人能力？孟花是不是孟素花？她是什么人？就都不关紧要了。

为了弄清楚孟素花是否真由地质局机关服务中心即和迪商贸公司委任成法定代表人，求得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支持，我们找到了申请开办“龙迪饺子苑”企业的“底档”。

画面：一份份盖着“北京和迪商贸公司”红章的登记表……记者的话：这是地质局和迪商贸公司欺骗工商局的作假的证明。事实说明：孟素花根本不是和迪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任命她的和迪商贸公司连她的家庭住址是否在北京都不清楚，更谈不到审查她的履历了！

画面：北京西城区和平门东中胡同 33 号，一个十分讲究的中式门楼，旁边挂有铜牌：“中国科协机关招待所”。

记者的话：这就是孟素花在表上填写的“家庭住址”。这里是中国科协

机关招待所，根本没有住家！调查知道：孟素花自己说原在国家工商局后调到地质局也全是骗人的谎言。骗子本人说谎不奇怪，怪的是一个地质局的国有企业竟用红色图章证明她谎言是真，从而帮助骗子去骗更多的人。

假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假的“法定代表人孟素花”，假的董事长陈曾又找了一个非法的假会计做假账，以此欺骗国家和百姓。

到今日，孟素花去向不明，地质局却不报案，不迫回其赃款，任凭国有资产流失，不管老百姓受害，不是很令人深思吗？

事情没有完结，受害人正四方呼救，寻找解决的办法……主持人结语：有人说在我国，“假全民”、“假集体”的企业并不是只此一家，弄虚作假，坑国害民，该到了认真清理的时候了！

而与孟素花合伙行骗、自称“董事长”的陈曾，是河北省供销总社的处级干部，共产党员。他惯于欺骗，有一套骗的哲学。他说：“除去行骗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这也正是骗子自己的画像。

北京龙迪饺子苑“假全民所有制”一事，我们将跟踪报道。

方燕带着那复印的送审稿到了中央电视台，一进门口的接待室他就傻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找“焦点访谈”？传达室让方燕打电话，让人下来会客，那要打电话的人都排成了一队，三台电话都占着，他只好在一旁等待。

他和一位农民交谈，他是从辽宁省农村来的，手里拿着全村一百多人签名的信，要诉说他们购买了假种子使他们一年颗粒无收的痛苦遭遇。那是村干部和卖种子的勾结一块，干部从中吃了回扣，强迫农民去购买假种子……结果种到地里没有发芽。去找村干部，干部却说：“我们有啥办法。”找谁谁也不管，老百姓急了，便派人找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来了……方燕听了很气愤，说：“斗争，肯定能胜利！联合起来告那些害人虫！我想中央电视台会支持农民兄弟的！”

听到方燕说话，有几十人凑过来，以为他就是电视台的人，便插嘴询问：“同志，你看我们这冤枉事找谁呀？俺们的承包责任田叫村干部给卖了，叫俺一家吃什么呀！俺想问问，不是说多少年不变吗，怎么邓小平一死就变呢！”

方燕又解释道：“中央政策不会变，你放心，那是下头一些人瞎胡搞！你这事肯定能解决，你有理，就谁也不要怕，有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咱做主……”“同志，你看我们厂子这事咋办哪？你们中央电视台能不能派个记者……”方燕连连声明：“对不起，我不是电视台的，我也和你们一样，是来找‘焦点访谈’的呀！”

”

他站立起来去拨打电话去了。他给所有的人以鼓励以希望，却不知他的事可有希望；他看到有这么多受害的普通百姓诉告无门，而他要比这些百姓好多了。

不知道他的送审稿结果如何？

六、一场幻梦破灭

方燕打通了电话，等来了“焦点访谈”的记者，他把那个打印的送审

稿交给记者。年轻的记者见是如此清楚的稿子非常高兴，说：“你都把镜头分好了，这下可省劲了。”他从头看了一遍，当即表态：“我看可以，是个焦点问题，值得反映。”

不过这里边有局长的问题，若找他采访，需要他本人配合，怕有难度。我拿给领导审查吧，有结果再和你联系，谢谢你对电视台的支持！”

方燕连说：“我应该谢谢电视台对百姓的支持，你看多少人苦诉无门，希望你们为百姓代言哪！”

“我们也有难点，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曝光的，这你明白：新闻导向问题嘛！”

方燕说：“为什么老百姓最喜欢看你们的栏目？因为你们反映老百姓关心的事儿，能说出百姓心里的话！如果你们也光说拜年的话，根本不是焦点问题，老百姓就不看了。老百姓是从你们的栏目中看到国家希望的。”

记者忙，就此告辞，方燕觉得希望在前。

方燕回想王天明律师的指点，觉得这正是大好时机，把电视台要曝光的信儿告诉章局长，也许有利。他回家便把这消息告诉给蔡松、黄工，让他们告诉赵华、孙镜等人。黄工听了大叫：“太好了！”

我有个大学的同班同学叫徐达举，也在工业系统，他跟章局长是铁哥们儿，要不要见见他？”

方燕说：“黄工，你咋不早说呢！咱们应该见见他。”

后来才知黄工没有早露出这个同学的原因是，她想通过徐达举找到章局长，让局里把她自个儿的钱还了，如果和大家搅在一块，数目太大，还钱的希望不大，故没有露这层关系。后来，徐达举告诉她，单独还你一个，局长不好说，让别人知道了更会使局长被动。要给就要都给，合在一块儿力量大，所以黄工此刻才想到让方燕见见这个老同学。

方燕、珊月等黄工到来，一同乘 13 路汽车去了三里河科技咨询中心。

黄工的老同学现在是这个单位的纪委书记，他很热情地把他们领到会议室，给每人倒了一杯水。

方燕向徐达举介绍了受害经过后说：“我们已找好了律师，我有充分的把握：如果与地质局打官司我们肯定赢，他们肯定输，但我们目前不想对簿公堂，希望能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我们为什么不能？但章局长不见我们，去了几趟，都没见到他。我们想：如果打起官司来，对章局长非常不利，因为这个假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他说了话让纪主任给办的，一切问题都会推到他身上去。

我们不希望他辛苦干了半辈子，为这个事栽了筋斗。这太不值了，你说呢？”

徐达举说：“你们这情况我早听老同学说过，章局长也跟我发过牢骚，说因为这事闹得他不好工作，局里群众也有不少反映，他自己也觉着冤。他说过：‘我们跟陈曾订了三年租赁合同，他怎么和别人又订五年的合同，简直不可思议！’我知道一点法律，我儿子也是学法律的，肯定地质局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我想，要想解决这问题，一可以找部里监察局反映，你们写个简单情况，我也可以帮你们转。再就是和章局长谈谈，共同携手解决这个问题。

“我比较了解章局长，我不相信他本人会有什么问题。他是 1963 年南京

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先在地质研究所，1976 年做了部长的秘书，后来做地质局科研处处长，副局长，局长。不管下面千头万绪，他都亲自接待体贴下情。从秘书处到各局都对他反映不错。他到地质局当局长四五年的历史，这个局搞得不错，你们给他写情况写明要害，他会重视。”

方燕这时拿出了给电视台的送审稿：“这是一个电视稿，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我们不忍心给他曝光了。你看看吧！”

徐达举接过来，看得非常认真，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然后说：“这里说章局长和陈曾是‘铁关系’，应该有根据，不能随便听陈曾说便由主持人说出来。这涉及对一个同志的评价，恐怕还要经过部里看才好。你们等等，我给章局长通个话，让他找个时间和你们见见面，直接谈吧。”

徐达举出去了。

看来这份新闻稿在徐达举这儿引起了重视。

电话谈了老半天，徐达举才回到会客室来。

徐达举说了与章局长通话的内容。章局长已经和陈曾见面了，说第一次来的是陈曾的夫人和儿子，章局长说老陈不来谈不清楚，解决不了问题，他总躲着也不是事儿。第二天，陈曾来和章局长谈了话，答应他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在电话里告诉章局长：人家已经找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了，因为知道你的为人，又不忍心把这事儿闹大。他答应找时间见你们，回头他告诉我，我再告诉黄菊吧。

为了商量如何与章局长交谈，黄工第二天邀请方燕夫妇到她家去，这是个星期天。

黄菊的老公、大儿子全都在家。儿子人高马大，是个顶门立户的汉子，珊月一见便说：“黄工，你有这么个大儿子，怕什么啊？”儿子说：我妈投资瞒着我，我若知道，不能让她投资。早先我妈不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惹事！”

儿子给方燕夫妇倒水、热情招待。小伙子自我介绍：“我现在自己搞个公司，没啥事，我要帮我妈把这口气出了！我就是骗子，他们还骗我妈？”

方燕为黄工儿子的率直吃惊。儿子说：“我从 18 岁就做买卖，就学骗人！我进公安局多少次了，进去一次学一些东西，最后这次是打群架，其实我没动手，可因为在一起，也就把我拉进去了，丫挺的！妈妈真为我担心，其实我理智多了。这事我想了，他陈曾不是有个高级轿车吗，我想找几个哥儿们，把他的车劫了算啦！卖了够咱们分的了，就是不知道车号……”黄工和珊月、方燕研究该怎样和章局长谈判，他儿子却不以为然，说：“白费吐沫，他不会听你们一说就把钱拿出来的，倒可以利用他把陈曾叫了来，说一块谈谈。陈曾的车一来，我们上前把车劫了，倒是好计划……”快到中午，黄工的儿子要请方燕夫妇去吃烤鸭，便一同下楼。

要了一桌菜。黄工儿子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伙北京人的遭遇。

这伙北京人集资 30 多万到河北遵化县租山采金，出了金沙，半截儿跑回家过春节。当地人见出了金子，说不租了，北京人回去不干，便发生了械斗。可结果却把北京人抓起来了！人家抢了金矿的反而有理了。……他的故事竟给方燕开了思路：哎，这倒是个办法！我们何不把这房子抢过来，咱们自己经营，让地质局去告我们呢？

好！大家一致说此计妙，这是解决的最佳方案，比劫汽车的法子好。况且即使和地质局打官司，让他们拿出钱来给你是不可能的，顶好是让我们

按合同期继续经营。

黄工是急性子，说：“马上给小蔡、孙镜打电话，让他们过来一块商量，赵华不好找就不用找了。”

就在这餐厅里拨通了蔡松的电话，向他讲了这个方法，请他过来共同商议。小蔡先说：“我有事过不去呀！”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儿子病了，发高烧，离不开人。”黄工急了：“你不会让他妈妈看着他，这事很重要哇。”小蔡说：“没法子，他妈妈不在家呀！”

给孙镜一打电话，她便说来。

吃完饭大家便回到黄工家。孙镜这时也到了。

方燕说：“我们这方法是否可行，我找找律师，让他给拿主意想办法。”他给王天明拨通了电话。

王天明说：“你们的思路可以。你们不能打被动仗，要变被动为主动；也不能不干事，要一边挣钱一边打官司。你们把门打开，自己经营，自己把损失找回来，路子对头，可你们在行动前要想周密，需要用个广告之类的东西通知地质局、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免得你们砸开门，人家马上通知公安部门，你们就被动了。”

方燕佩服这位知青出身的律师思维敏捷，考虑周到，便说：“如果我们营业，我们聘请你做我们常年律师可以吗？你要多少钱哪？”

王天明笑着说：“那是以后的事儿，你们营业不盈利就不用给，我甘愿白尽义务；你们盈利了再说，当前先想好怎么打开门吧。”

方燕把律师的原话一学说，孙镜说：“我得找我们请的律师问问。”他们四位由孙镜负责请了一位男律师，此人原来在法院当书记员，和法院熟悉。

孙镜打完电话说：“我们律师不同意这么做，他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最终还得用法律的手段通过法院解决。因为你们硬开门，他们便会报警，说你们强占房屋，人家有房屋租赁合同，你们却拿不出来……。我看下周一我们见了律师再说吧。”

黄工的儿子却说可行：“我多找些人，咱二三十号人都去，派出所能怎么样？咱们有合同嘛！”

孙镜说：“若从心眼里讲，我也同意把餐厅夺回来，咱们自己干，珊月你当经理，我当出纳。”

珊月说：“你当出纳，别把钱先装进自己的口袋，我们还得跟你打官司！”珊月凭她的直觉，孙镜这人只会算计如何自己合算。她想到什么便直筒筒地端出来了，闹得孙镜脸红不再吭声。

方燕不言不语坐在书桌前起草开业公告了，他说：“我们行动前把这公告送给派出所、和迪公司并贴在大门前；开业前我们几个人一定要有合伙经营协议书；我们还要找公证人把原来留下的财产进行登记；再就是一定要请个律师，免得做出不合法的事儿，即使出了事，也有人替咱说理。”

黄工和她老公全表示赞成，让方燕快念念那“公告”。

公告：含泪的倾诉

我们是和平里七区七号楼北侧北京龙迪饺子苑的投资者，从1996年1月以来先后将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投入龙迪饺子苑，一直分文未得。法定代表人、经理孟花久寻不见，饺子苑长期关门停业，使我们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和巨大精神痛苦。我们曾多次去本企业的主管单位要求找回其法人代表孟花。

主管部门称他们曾多次寻找不见。为使本企业不致继续蒙受损失，为使我们一生积蓄的血汗钱不致付之东流，为使我们能有诉诸法律的费用，我们受害人决定从 1997 年 3 月 5 日起恢复开业。

本企业已特聘法律顾问，现郑重宣布：

本企业在 1997 年 3 月 5 日重开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审计部门依法进行审理，在法定代表人孟花寻到后进行处理。一切责任由孟花承担。

我们有权对一切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坑害百姓、诈骗钱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诈骗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此事已在公安部门备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讨回公道。

在这特殊时期，我们恳求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以全力维护稳定大局，切切！

投资受害人（签名）1997 年 3 月 4 日

方燕读了，大家叫好，又提出一些修改补充。这天已是 3 月 1 日，人人都说要快速行动，并立即通知赵华和蔡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决定国家大事之时，他们开会决定了他们的大事：用行动夺回被人非法掠夺的血汗钱！

3 月 2 日，赵华起早便赶到方燕的住所，珊月把昨大的意见告诉她，她完全同意，剩下的就要看蔡松的想法了。她说：“蔡松在酒楼开业的时候和孟花有一段接触，孟花任命他当副经理。孟花这寡妇，没有男人在身边怕受不了。听蔡松自己露过，说孟花把自己的衣襟掀起来让蔡大哥看脊背是不是起了小疖子哩。蔡松说这话还很得意，好像占了孟花多少便宜。可上回蔡松在地质局纪委露出孟花送金表的事以后，那纪主任一吓唬，他有点害怕，后悔说出来了。……”珊月说：“那天他说出金表的事儿，吓了我一跳，应该让蔡松把这材料写出来。还有那天我挨孟花的打，你们四位都亲眼所见，也给我写个证明，若真打起官司来有用。”

赵华说：“那天会计也在，应该让她写证言，只我们一方的证言不如会计的好。”

说办就办，珊月、赵华叫上方燕又去门头沟找会计去了，这是个周日，她肯定在家。

他们推开了王秀琴的家门，她愣了，不想让他们进来，冷冷地说：“有什么事？”并不往里请。

珊月笑说：“没有事就不让我们进屋看看你呀？”

王秀琴只好让他们进屋了。珊月拿出女儿十岁出版的一本诗文集，递给王秀琴的可爱的女儿，情绪缓和了。

王秀琴把他们让进一间小屋说话。

珊月说：“我们来是想请你把那天我挨孟花打的情形写个材料。”

王秀琴反问：“这有什么必要吗？”

珊月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写了。”

王秀琴说：“那你把别人写的拿给我看看。”

珊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印象写，不一定一样。”

王秀琴的丈夫过来了，关心妻子别惹事吧。方燕不想让她丈夫参预，便把她丈夫引出来。

这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家庭，都有老人，负担很重。丈夫在社会科学院搞东欧研究，工资不高。王秀琴在外找个活计，以给家庭增加点收入。

这时，王秀琴已把材料写好交给珊月，感情也融洽好多，说话也不那么紧张了。

人和人之间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王秀琴此时说出她的担心，怕因为抓起孟花把她也牵进去。

她说：“你们应该找地质局，把饺子苑收归你们经营。你们就是把孟花抓回来，判了刑，她没有钱给，也没意义。不如找章局长，协商解决。”

她的建议又和他们想的不谋而合。

从王秀琴家出来，他们想到了蔡松，他的儿子病了，也应该去看看病得怎样，同时让蔡松把那孟花送金表的材料写出来，把那天打人的情景写出来。

赵华知道蔡家的宿舍，便领方燕夫妇去了。珊月问：“该给他家孩子买点什么东西？”赵华说：“不用，他不一定在家里。”

到了蔡松住的宿舍楼，门紧闭，果然没有人。

赵华敲敲，里边却传出男孩的声音：“谁呀？我爸不在。”

赵华说：“你把门开开，我们进屋等你爸爸。”

男孩说：“我爸爸告诉我了，不给外人开门。”

珊月问男孩子：“你是发烧了吗？”

男孩答：“我没有呀！”

珊月又问：“你们昨天下午你上哪儿啦？”

男孩说：“我昨天下午踢球去啦！”

男孩天真，把鬼道的爸爸说谎给暴露了。

在门口等了会儿，蔡松回来了，见到方燕夫妇显得很尴尬，不自然地那不速之客领进他的卧室。他傻愣着，像掉了魂儿。方燕不客气地让他给沏水喝，说渴坏了，他才动身找水壶去。

蔡松解释道：“我昨天没去，是我不能参加夺饺子馆，因为我是本系统的人哪。”

珊月说：“你该把孟花送金表的事儿写个材料，不然会说你造谣诬陷，我们大家都可以为你当证人。”

蔡松沉一会儿说：“到该用的时候我会写的。”他不敢写。珊月让他写7月13日孟花打人的情况，他写了，很勉强。

话说不下去，方燕夫妇不想干坐，难受，便告辞出来。

晚七点，王天明律师和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方燕的小屋，珊月拿出会计写的证言，王律师说很好。王律师是来为方燕夫妇出主意的，昨天在电话里只谈了个思路，他知道方燕是作家，珊月是演员，只能在写文章、登舞台上施展才能，真正做事怕要出漏子，自己虽尚未聘为法律顾问，出于正义也该尽顾问的责任。

王天明从小便热爱文学，然而他丰富的知青生活没让他步入知青作家行列，却走进了律师队伍。在天明看来，当今国民更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人说现代青年人要有三种才能：一要会开车，二要会外语，三要会电脑。王天明则说当今作家必须一懂经济，二懂法律，而方燕却全不懂，于是成了只会看书写字的书呆子。

王天明说，你们的开门营业，要尽力求得合法保护。情理和法是两回事，而作家却往往认为合乎情理的事便是合法，这是误解。

你们是投资者，且投资额最大，理应是董事长，可召开董事会下达通

知，也请地质局主管人参加，选在附近的一个饭店吧。余下时间，把通知发出去，要为打开门找出法律根据……当晚，珊月便通知黄工、赵华等第二天来她家一块商议重要问题。

倒在床上时已十一点，方燕夫妇奔跑一天，此刻才觉浑身像散了架子。方燕想：就是把门打开，谁来经营？我们还有那精气神吗？

起早，方燕便觉心脏难受，可想起自己草写了公告，也不好打退堂鼓。吃了早饭，方燕说：“咱们去公证处打听一下如何办公证的事。”便和妻子一同去了西城区一家公证处。这一来给他俩浇了一盆冷水！

公证处的人说：“必须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我们才能去公证，你们私人是不能找公证处去公证法人企业的。打开门也只有企业法人有权。”

完了！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动也不能动了。方燕禁不住骂道：“陈曾、孟花真是可恶之极！”

回到家，方燕两口子坐在床上发呆。

赵华的女儿小芳来了，说她妈晚一会儿来，怕阿姨等着急，就先来报个信。这姑娘自己来北京闯天下，很懂事，珊月很喜欢她。

小芳说：“今儿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蔡叔叔就到我家找我妈了。我听他说：咱们不要和珊月在一起了，珊月是想利用咱们，拿咱们当枪使，这是昨晚孙镜打电话说的。孙镜也跟黄工说了：咱们不要让珊月拿咱们当枪使呀！黄工也听了孙镜的话。这个孙镜呀，怪不得我妈说她比孙猴子还精哩。”

听了小芳的话，珊月浑身发冷，怎么是让我当枪使？这么说我不是叫你们当枪使吗？这不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吗？

小芳又说：“黄工这个人性子直，可看不清好歹人，就像打飞机，瞄了半天，一放枪却打到自己的头上了。蔡松这人心眼不好。

到末了坏不了别人，也得坏到自己身上。”

这姑娘看问题好准，她说完就去旅行社上班去了。

临近中午，赵华才赶到方燕家，她说她想同黄工一块到这儿来的，可黄工说，打开门的事，她儿子不干了，等咱们打开门之后，她可以找人经营承包。

珊月一听就笑了，说：“让咱们打开门，是你能打开呀，还是我能打开呀？说得轻巧！那天在黄工家，是她儿子说可以找几十个哥儿们把门打开的，可能家里一思量这事有风险，便退缩不干了，你们打开门，我也可以找人经营呀！把危险给了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谁又比谁傻呢？”

赵华说：“咳，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方燕说：“陈曾有眼光，把我们这些人看透了，不骗我们还骗谁？活该挨坑！”

”

珊月对赵华说：“你跟我在一块，不怕我拿你当枪使呀？”赵华笑了：“我不怕，我这枪还不如你的枪好使哩。”

看来风风火火议论了一通，想把餐厅门打开自己经营的梦到此已宣告破灭。

只有想办法和章局长谈判这条路了。

方燕去给徐达举打电话，问和章局长联系的情况。

徐达举说：“这个事我不大想管了！本来已经疏通好，章星也愿意和你们谈了……我把这事也告诉我那老同学了，并且告诉给她章星的电话，说你

们可以直接联系，定个时间。谁知这位老同学昨天给章星打了电话，说要带电视台记者去，还要跟踪报道，用这话威胁人嘛！章局长说可以呀，你们记者带介绍信来可以。章星给我打来电话，心里很恼火，怨我给他找了麻烦。这不是把我也给装进去了嘛！章局长说这个星期他有会，没有时间，下周再联系吧。你们若去说，最好不要让黄工去，她胡乱放炮，会把好事办糟。”

方燕对徐达举的帮助深深感谢，并为黄工做些解释。他心里已感到会谈的茫然。

夜里，珊月睡不着了，她越想越难过，伤心地流了泪。她忘不了孙镜说的“别让珊月拿你当枪使”这句话，人心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自己一心与他们合作，想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们，却落个自己要拿他们当枪使？她再次感觉自己心太傻太直，在这社会上真不好和人打交道了。

方燕说：“别难过了，以后咱自己打自己的官司就是，咱也省不少罗嗦。孙镜说出这话来可能是因为你那天说她了？”

珊月奇怪：“我说她什么啦？”

方燕说：“你说她要当出纳，把钱装进自己腰包还得跟她打官司，这不戳了她的肺管子吗？”

珊月说：“我早忘了呢！唉，我想咱们若不联合吧，他们那四个人也会四分五裂，都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说来，他们叫人坑了也怪可怜的，尤其是赵华，那是台湾老爹寄来的钱呀！咱还得帮她。

方燕说：“你的心太软，那就还联合他们。”

两口子说到夜深才睡。

到了徐达举说的下周了，还没有音讯，方燕便又给他打电话，他说：“章星已把情况向上级汇报，电视台要采访，需要通过一下某工业总公司。总公司的法律处，章局长也找过了。上级已决定章星到南方去，离开地质局，你们的事儿，可以找尤副局长。章星已全部交待给尤副局长了。”

看来找章局长谈判之事也宣布告吹！

电视台还要不要来呢？主要人物已不能采访，关键时刻他已离去：这是上级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措施，还是真的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去？是有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

方燕面对复杂的现实，感到无力判断。

还是应该把章星的离去告诉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那位热情的记者，免得让人家白准备一场，带摄像去，却没有拍的对象。

方燕给“焦点访谈”拨通了电话。

那位记者说，那篇“‘假全民’坑国害民”的稿子，大家认为写得不错，我们送审了。领导意见是：揭露局级领导问题需要慎重，这个局长的问题也不算严重，比这事儿严重的太多了，我们的排不上，只有等等再说了。

方燕听了，觉得没有必要告知章局长已离去的消息了，即使他不离去，不也是一场空吗？

此刻，方燕倒想起那一群购买了假种子颗粒无收的农民，不知他们的事可否排上号，在电视上曝光？

老百姓心中的焦点问题也真是太多了！

方燕下一步还怎么办呢？

七、呆诗人与名记者

找章局长谈判的路子断了；找电视台曝光的希望灭了；只有靠自己去奔波寻找救援了。夜，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方燕夫妇想着应该如何走下一步。照律师的分析，纪凡从龙迪饺子苑拿走 13 万元，给打的白条，王秀琴会计不能下账，这里边肯定有鬼。13 万元有可能入了他私人的腰包，那就是贪污；或者入了他们单位的小金库，这也违法。陈曾、孟花是以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诈骗，这是属于刑事犯罪。这样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公安局，然后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我们也不用花一大笔诉讼费、律师费了。可公安局石副局长安排的让大兴罗局长去处理此事为什么没有音讯？前两天方燕好不容易给石副局长打通了电话，老石让方燕直接和罗局长联系，说已交待了，不好总说。

这时珊月就有怀疑了，她对方燕说：“你这个老乡到底真给咱们办不办事呀？咱可别听他答应得好，咱们和他又没有深交，他也不过是看古副部长的面子。可古副部长已经退居二线了，他对古副部长拜托的事还那么认真吗？你求人家一点礼也不送，谁还白给你操心？”方燕说：“凭直觉，我这个乡亲是真心扶正祛邪为民办事的，咱也没礼可送，有也不能送，人家也不缺咱这东西。如果真把钱要回来，一定要重谢人家，可现在不能说。”珊月说：“那就还去找他！”

清晨六点半，方燕、珊月起来了。方燕说：“公安局八点准时上班，咱们要在八点前把老石堵住，不然他一外出就又找不到了。咱们赶快走吧。”

没有顾上洗脸、吃早点，他们便匆匆赶到了 103 路无轨电车车站，挤上了车，到了台基厂，直奔市公安局。差十分八点，传达接待室也刚开门。方燕让传达通报找石副局长。打了电话，说没有人接，方燕夫妇便在椅子上坐等，八点到了，又打了一次电话，石副局长还没有到。怎么会不在呢？再次拜托传达问问他到哪儿去了。传达很热情，又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是谁找他，对方回答仍是不在。方燕说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找找他？传达摇了摇头：“这是公安机关，进门严格，不能进去。”

方燕夫妇碰了钉子，只好离开。

这儿不远便有一个邮电局。方燕也犯起怀疑：是老石真的不在，还是因为知道我们来找而不想见呢？这类事他碰过不少，不想见，你又没有到他那儿亲自去看，怎知他说的是不是假话？又一想：老石他会这样应付吗？如果是应付，那美好形象全打碎了。他进到邮电局，要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看他在不在，探个真假。

这儿是投币电话，他换了硬币扔进去，办公室铃响，半天没有人接。这证实了人家没有骗他，他心踏实了些。

还上哪儿去？干脆直接去东城区公安局。

方燕夫妇打听好，东城公安局的地址在交道口南大街，倒了两次车到了门口，问是什么事，说是来报案，他们便被引进办公室去。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科长。方燕说了情况，科长表示义愤，问：“你们在派出所报案了吗？”

“早报案了，发现孟花逃走，我们就在和平里报了案。”

科长说：“我们刑警大队和派出所属于同级，你上派出所报了，就不要重复报了。给你老同志说句实话，我们没有力量去抓人哪！”

办案经费很紧张，那人跑到石家庄了，我们去石家庄要多少费用？

所以很不好办！这样的案子太多，也抓不过来，从今年一月一号新刑法公布，限制也多了，这都是我们的难处，请你理解。”

理解，我们怎会不理解呢？不在公安部门的百姓，以为公安部门多么有钱多么有权，你真去了解，并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方燕早就听过老百姓形容公安局大檐帽的歌谣：“大檐帽，中间凹，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它是批评公安部门对罪犯抓了以罚代法的问题，今天方燕倒对这种罚款惩治有了一些理解和谅解。

经费紧张，从罪犯身上取之再用之去惩治罪犯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只要它花在公事上不装入公安人员自己的口袋就可以了。他倒希望把孟花抓了，让她把吞吃的几十万交给公安部门用它抓罪犯呢！

从刑警队出来，方燕夫妇便去东四十条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举报。这儿挂了一个大牌子，叫“举报中心”。

接待他们的是个中年人，他拿出了一个大登记：举报人的姓名、住址、单位、联系电话……然后便开始记录举报的内容。

因为早已报过案了，身为作家、诗人的方燕知道用极精炼的语言叙述，以便于记录。

中年同志听了记了，抬起头来又摇摇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这犯罪嫌疑人逃跑了，必须把她抓回来才能立案，也只有找到孟花，才能证明纪凡是不是贪污。关键是你们把孟花找到，抓到北京……”珊月说：“我们一个老百姓怎么去抓呀？”

那人回答：“这就要依靠公安部门了，照刑事犯罪，公安部门可以侦查抓捕的。”

“可我们刚从公安局刑警大队过来，他们说没有力量去抓”那人说：“我也知道他们经费不够，你这又不是杀人犯，非抓不可。这孟花不是也坑了地质局吗？这单位有力量呀，让他们配合公安局一起抓，不就可以了吗？”

方燕说：“地质局头头可能和孟花有牵连，他们不想抓她回来呢。”

那人摇摇头，叹口气：“这可就没办法了。”

方燕原想把写好的一袋材料拿给那人看，并给他留下一份，可那人说：“你写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没有办法。这个陈曾、纪凡不全是共产党员吗？你们去中央纪委说说看……”检察院举报中心的同志把方燕夫妇支到中央纪委信访接待室去了。

珊月说：“算了吧，去也没用！你不是写过检举信吗？还不是石沉大海了嘛！”

咱们先吃饭去吧，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哩。”

方燕说：“都中午了，怎么没觉饿哩！先吃饭吧，信访室也该下班了，下午再去。”

他们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最简单的饭菜，两人花了不到20元。

吃完饭还是去了府学胡同2号中央纪委的信访接待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门，可铁门关闭着，门口聚了不少人，都是外地来上访的。人们在喊，在拍打铁门：“你们规定1点上班，现在都1点20分了，开门吧！”

大家终于敲开了大门。

方燕夫妇第一次到这儿，不懂规矩，那些来过多少次的人有经验，告

诉他先去领一张表格填写，填完了交上去，然后就是等着和你谈话了。

方燕照人说的去领来一张表格，找到一张桌子，便认真填写。

开头是姓名、住址、电话、工作单位，大部分篇幅是填写举报揭发的问题。珊月坐在他身边，还在怀疑：“有什么用啊？趁早回家！我这头都晕起来了。”

方燕说：“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写吧。这也叫有病乱投医，说不定这次找到治病的好大夫了呢！”

珊月催促：“那就快写。”

两页白纸，需要用精炼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如同面临一次作文考试。方燕怕人看不清楚，字迹也写得十分工整。写完，他念给珊月听了一遍。珊月说还可以，而方燕认为岂止还可以，如发表出来简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方燕把写好的“文章”双手捧着从那窗口递进去，带着书呆子的严肃庄重。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窗口，仿佛面对的是他心目中神圣的共产党。他企盼从这里看到党的关怀和支持的面容，听到党的怒斥腐败的声音……然而他面前却立了个让他心不愉快的铁栏杆。

方燕夫妇坐在一边耐心地等待着呼唤他们，这时却见到窗口发生了争吵。

一个男子汉的东北口音：“你们是咋搞的？我来过多少次了，状告了好几年，你们这儿换了好几班接待的了，你们是一班不如一班了！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事呀？……”他吵了半天，方燕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吵的人一会儿被人拉走了。

四周的桌子上坐满了填写表格的上访者，都是一张张严肃愁苦或无奈或充满希望的百姓的脸庞。看着这些脸庞，方燕都似曾相识，那是他父老兄弟的脸，是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曾用生命掩护过我们的八路军战士，用血和汗支援了革命，用那粗壮的臂膀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这些脸上记录着多少风霜……他们从各地来到北京，到这间屋子里，用手写下的是对党的信赖，对党的期望……窗口呼叫方燕的名字，方燕走到窗口。

窗口有一张中年人的脸，听说是个处级干部。他问：“你反映的是什么事呀？”

方燕好奇怪这句问话，那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你还没有看？方燕说：“你看看我写的材料吧。”

“我看了，”窗口里的人说，“你这是个大问题呀，这里边揭发那个贪污10万元以上的领导，你应该去人民检察院举报他。我们纪委只管党员干部贪污受贿2000元以下的，再大的数额就不管了。”

方燕大吃一惊，这可是闻所未闻！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便问道：“你们是不是中央纪委的信访室？中央纪委不是要查大案要案吗？贪污受贿2000元以下，在今天还叫问题？还用查吗？”

窗口里的人却正经地说：“这是规定，只受理2000元以下的党员干部问题……你还是去人民检察院吧！”

方燕急了，说：“我就是刚从检察院过来的，他们说没有办法！”

窗口里的人说：“他们怎么会没办法？”

方燕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这材料转给检察院或能管这件事情的部门处理？”

窗口里的人说：“我们不转，没有人管这事儿，转也没有用。”

方燕的气已充满了肚子，堵在了胸口：“既然没有用，把我写的材料还给我！”

窗口内另一个同志已把材料收起来了，他递过话来：“你交上来的材料，我们不退。”

方燕说：“既然不解决问题，你们留那个材料有啥用？”

窗口的人回答：“这是我们的规定，填了多少表要收回多少！”

方燕的火开始往外喷了：“用这些没有用的废纸来证明你们接待了多少人？你把它退给我！”

方燕简直是在下命令，不容对方说话：“我写的，你退给我！你必须退给我！”

”

可是窗口里并不给他送出来。

方燕说：“那你不退我，你给我撕了！给我马上撕了它！”

窗口里另一位无奈，把方燕写的材料撕毁了！

纸片子扔到垃圾筐里。

方燕用手指着窗口说：“你知道你撕的是什么？那是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对中央纪委的信任！你们在这儿，不是你们个人，你们代表中央纪委、代表党在面对广大党员、群众，可你们自己把这种希望信赖撕碎了！我告诉你们：我马上给江泽民同志写信，我不相信，中央纪委会只管党员干部贪污 2000 元以下的问题！”

说完，他转身走出那间宽大的信访室。

他走出来，走到喧闹的北京街头。他眼前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只有那一句话：“我们只管 2000 元以下的问题。”他的心里如江河奔腾，冲击得他心里难受！也许那个同志说的是真话、真情，是自己误认为中纪委可以管大问题？不然为什么早已寄去的检举信也会扔到一边没人管呢？

他走到大街上，不知道往哪儿走。

珊月一直跟在他身边，没有说话，只望着丈夫那眼里滚出的泪水流了他满脸也没有擦，让春风把泪吹干了。

珊月说：“咱们无路可走了，我看也只有找黑社会的人，让黑道的人给办了。

以前我不同意，人家找咱们来还推出去，看来只有这样，这是把老百姓逼的呀！我们给石家庄兰英打电话，让她找找老三吧。”

方燕却一直不说话，不表态。

方燕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今年 1 月 30 日，他在上次给中央纪委写信时看过的那张《人民日报》上面看到有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他记得的是，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锲而不舍！

方燕回到家里，拿出信纸便给江泽民同志写信。

江泽民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诸同志：

我是一名作家、记者，是 1946 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共产党员。今天我以对党的真诚给您写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中一阅。

1997 年 3 月 12 日下午，我去中央纪委接待室举报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

局长章星、原办公室主任纪凡与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处级党员干部陈曾合伙，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工商局办假全民所有制企业，委任无业人员孟花为法定代表人，合谋诈骗善良的人向其投资几十万元。1996 年底，法定代表人携款逃走，去向不明。受害人多次找到地质局，局长拒不见面又不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听任国有资产流失。

据反映，陈曾、孟花向有关领导行贿价值近万元的金表，纪凡又从孟花处多次拿走共计 10 多万元现金，全是给打的白条，有贪污的重大嫌疑。受害者全是离退休职工，一生积蓄全被诈骗，他们八方呼号，四处奔走。我作为人民的作家、共产党员，为受害人代言揭露腐败，义不容辞！

然而，中央纪委接待室的同志见我的举报材料，对我回答说：“中央纪委只管贪污受贿 2000 元以下的党员干部，你揭发的问题重大，中央纪委不管，你到人民检察院举报吧！”我问可否将我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接待人回答说：“转也没用，没人管。”我说：“既然没用，请把材料退给我。”接待人答：“不退本人。”

“我说：“那就撕掉！”接待人当即撕掉了——他撕掉的是一个党员对中央纪委的信赖和希望！

我也曾去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接待人的回答是：必须把逃走的法定代表人抓到才能立案，让我去找公安局。

我也曾去过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接待人说：国家机关法人不举报，不配合，公安局办案资金短缺，难以行动。像这种犯罪，肯定背后有人撑腰，他们怕抓回逃走的人把他们自己暴露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

真是没办法了吗？我只有找总书记了。

我和受害人均是普通百姓，眼见腐败犯罪行为揭发无路、诉告无门、无人支持、无人办理，为此现象我万分痛心！痛感必须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否则必然党毁国亡！

我写信给您，是坚信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决心惩治腐败的。

我希望秘书同志能把此信交您过目，不致石沉大海。

共产党员方燕

1997 年 3 月 12 日

第二天，方燕到白塔寺邮政支局发信，邮局人见是给江总书记的信，惊奇地望着这个秃顶的老头。那小姐问同伴：“这信能发吗？”同伴便给西四分局打电话：“这儿有一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能从邮局发吗？”对方回答说可以，方燕便贴上邮票，投进了信筒。

这一天是 1997 年 3 月 13 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下午，我给方燕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老同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了，他听了半天说不出后来……3 月 15 日，周六上午，我和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一同去绍棠住处吊唁，见到了方燕，他含着泪，用颤抖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他的悼诗：青枝绿叶儒林村，春雨纷纷哭逝君。

未名湖畔青春树，
大运河滩乡土根。
严寒难封地火涌，
苦狱百炼赤子心。
瓜棚柳巷音容在，

等身著作留诗魂。

我知道，方燕与绍棠是少年便相识的朋友，又曾是北大同班同学，他对逝去的绍棠有许多话要说。那天他含泪走出灵堂，在走廊对我说：“绍棠兄对我帮助不少，我眼下碰上麻烦事想找他出主意，想不到他撒手人间，先走了……”直到这年年底，我才知道他当时说的麻烦事的详细内容，便是我以上所记录的方燕提供给我的一切……方燕说，那天吊唁了绍棠兄出来，他的心空落落的。他想：就在那天夜里，他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关心党的生死存亡之时，他的老同学绍棠兄停止了呼吸，他再也不用管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兴亡，对于死者已没了意义，他已千古不归永不回来了，然而他留下的精神却仍关注着未来。方燕知道绍棠是那么关心党的兴衰成败。1989年初方燕调来北京（绍棠也帮了忙），那时他不时来看绍棠。在那年夏天，他和绍棠一见面便谈论党内的腐败问题。他还讲，那年6月的一天，老文化局局长跑到他那儿说出的撕心裂肺的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虽然绍棠总是以心直口快著称，但他毕竟不是1957年的青年了，他在正式会议上率直大胆的批评，比之他在家里和友人的交谈要有分寸得多，收敛得多了。

人间大概不存在绝对的真诚，诗人方燕曾追求过这种真诚，实际是他的愚蠢。

他告诉我，他将来要写一本书，就叫《愚蠢的真诚》，记述他因绝对真诚的愚蠢而造成的悲剧故事。我们的北大同学专门研究绍棠，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绍棠的书，也无法写出绍棠在这些年深刻思索的痛苦，人是多么的复杂啊！

方燕那天一边思索着，一边无目的地往前走。他想着那场官司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再也无法听绍棠兄的意见了……他走到了新华社的宿舍，他去找他的朋友，向一位著名的记者求教。

这位名记者也是作家、著名诗人。此刻，当我记述方燕的告状过程时，名记者已回到他的农村老家住，无法和他联系，征得他的同意，方燕转述他的言论，也只凭记忆，肯定不会准确，因此我只好隐去名字，只称呼他为名记者了。

名记者正看《论语》，见方燕突然造访，甚为惊讶！

方燕直抒胸臆：“心里苦闷，自难解脱，特来找名记者指点迷津名记者笑道：“生活今世，有何苦闷难以解脱？大概是你仍未摆脱诗人气质所致吧？赠你四句话：宇宙何其大，个人何渺小，念此心胸宽，乐多苦恼少。当年郭小川写了《望星空》，如果你有苦恼之时请望星空自解：看茫茫宇宙，耿耿星河，空间无限，时间无限。

个人一生如白驹过隙实太短促，比之茫茫宇宙我们大小大小，微不足道！想到此还有何苦恼？看我未听你讲，便议论起来了，打住！

听你讲讲……”

名记者一段开场白，已使方燕愁眉放开，讲起来调子就有了变化。他说了自己被陈曾坑骗的经过和他近几个月告状的历程。

名记者听完却说：“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受骗实在没有奇怪的；告状之艰苦也很正常。你是诗人嘛，你不受骗谁受骗？什么是诗人？民众和社会怎样看诗人，你知道吗？无非是两个称号：现实主义诗人可称呆子，浪漫主义诗人可叫疯子。你怕属呆子一类！

当今社会，呆子还不处处被骗？怕你这一生都在被骗哩！你在1996年

被诈骗，就更不为奇。1996年，英国的牛疯了；1996年中国人疯了！有权的一些人疯了似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出了多少大案？就拿北京市说吧，王宝森、陈希同1995年被揭露出来之后，这一年开始就有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铁英接受港商高额贿赂，也包括送金表在内的经济问题，触犯了刑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通报了北京市法院对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因受贿900多万港币等被判死缓；同案牵进多少厅局级官僚！到年底，中央纪委又决定开除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的党籍，也是因为收受巨额贿赂……那没有查出来的比查出来的不知道多多少！而那些像陈曾之类的坑蒙拐骗、诈骗财物的就更多如牛毛……我在新华社多年，知道的太多了！所以讲你受骗必然！骗子不骗你这种傻子他又去骗谁？老同学，老朋友？

有人就是专找熟人，因为你对他没有警惕！人疯了，人性、灵魂全扭曲了！牛疯了，那疯牛肉可以不吃；人疯了，疯狂地坑国害民，把国家财富、别人的钱物抢掠为己有……道德沦丧，谎话成风！你一个呆诗人岂能不苦闷？我们的精神文明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需从根上治理才行，你我又能尽多大力量呢？

“其实，钱和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无节制的钱欲便是贪婪，无节制的权欲便是残酷，都是人性的异化。没钱比有钱更愉快，无权比有权更坦然。我已经退了，厅局级待遇。过去出入坐车，连北京的胡同都不知道。退了，才真正脚踏大地了，才觉得实实在在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土地上了。过去太忙太累，没有时间看书；现在什么也不问了，什么也不管了，有了读书的时间，觉得比过去更充实！”

自己想写点自己体会到的人生，我想过些天便搬回农村老家，种地，栽树，写书。离开名利尝是非地，才会体验人生之乐趣……”方燕听着老朋友、名记者纵谈人生，他的心里开阔了许多。他问道：“老兄，你看我下一步还继续告状吗？此事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名记者说：“依我看，你这场官司将不了了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请以此种心态对之：你们的10万元不能要回来了。为何这么判断？因为一，在中国人疯了的状况下，你这种事不会有人认真过问，没有有权人去管，谁能解决？那有权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会有精力管你的事吗？你自认倒霉吧，谁教你相信北大老同学呢？”

二是你的问题太小，比你问题大得多的事儿都办不过来呢，就是有人过问也一时安排不上。三是陈曾诈骗你们，包括骗国家贷款，在目前的中国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儿。比他严重多少倍的人还弄不过来谁去弄他？更重要的是，动他对当官的有什么好处？有利趋之，有害避之，已成社会普遍心理！你只有让当官的感到处理陈曾对他们有利，不处理会有害之时，他们才可能行动。否则，即使你再找到中央纪委，甚至找了省里的领导，也不会办的。人家也不说不办，只用一个‘拖’字就可以了，最终还不是不了了之？”

“认清此点，这叫形势分析，下面才可决定你的行动态度。我意是以游戏之心对之！你是剧作家，要把人生看做一场戏。现在你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观众。把你这场官司的剧本编下去吧，自己参加演出，然后又以旁观者去看，看别人如何表演，剧情将如何发展……有了此种心态，这事件便不会让你苦恼，而成了一种享受了。君以为我的建议如何？”

“太好了！”方燕心中乌云尽扫，兴奋地叫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感谢老兄指点迷津，使我顿开茅塞！”

此后，书呆子方燕变了！他对妻说：“让我们一同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吧，且看陈曾、孟花下场如何！”

八、刑警无奈，律师无能

当方燕听名记者指点迷津时，妻子珊月在家坐卧不安：她开始想找黑道上的人帮忙，就是要不回钱来也可以出出这口窝囊气，他陈家太欺人了！她想问问石家庄的朋友兰英，打听一下那个老三，便打开了那个因交不起手机费用早已不开机的大哥大。为何有这种巧事？她刚刚打开手机，就有人给她来电话了。

对方恰恰是她要找的兰英！你相信心灵的呼应吗？

兰英惦记的也是珊月的那场官司，她要询问有没有结果？珊月说：“路走到了，没有结果，我又想起你给介绍的那个老三了兰英说：“别提了！那老三是个骗子，你们亏了没让他干！我原来把他当成仗义的好汉，以为他浪子回头了，可是他恶习不改，本性难移，竟把我的一万多元骗走了！什么也没干，他便没影儿了！你用大哥大费用高，我不细说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石家庄再说吧。我说你们官司打赢了也帮帮我，我也让北京一家搞建筑的骗走好几万哪！别说了！”兰英放下电话，珊月更加茫然：太可怕了，这世上为何好人都受骗了？

珊月心里憋上一团火。

这时方燕回来了，珊月说：“你不是吊唁刘绍棠去了？这么半天不回来，我以为你跟绍棠一块走了呢！”

“我是想跟他走，可他不让，说你在阳间的官司还没结果呢！”

方燕用玩笑口吻轻松地说，“从绍棠家出来，我去新华社老朋友家走了一趟……”“他有什么好办法吗？”妻子关切地问。

方燕把名记者的话学说一遍后说：“咱们的官司要打，就算我体验生活！咱的10万元也别想要回来了。”

珊月说：“我多少年前就这么说过你，我的活你要早听就不是今天了！你上哪儿体验生活？咱家，咱自己的事就够你写的了。

那年北影拍的电影《邻居》，不就是咱家的事；你没有写让别人写了。别写别人，你只要把我写出来……我敢保证是一本世界名著，写我这一辈子的辛酸苦辣，写你怎么骗我跟你做了夫妻，跟你受的那些苦难……你呀写不出来！我跟你快一辈子，你还不了解我，理解我……你要写我就要把你好好解剖解剖，把你一辈子对不起我的事全写出来，你还得有那个勇气。我跟你这一辈子算瞎了！

我的事业跟你没发展，我算白来一世……”说到伤心处，珊月哭了。

听着妻子数落，方燕沉默不语，此刻因受了名记者指点，心态平静。如他心态不好，便会发火顶撞，那便会爆发一场战争！过后他又后悔自责，妻是刀子嘴豆腐心，数落是把心里的痛苦宣泄出来，不然会闷出病来，宣泄过后就没事了。他们吵架愠气但又谁也离不开谁，方燕想，在这世界上只有珊月是不坑自己的人哪！她跟你一辈子真不容易，你不写就太不该了。他观

察自己的身边，真正一辈子不吵架的幸福美满夫妻，只有在诗歌中寻找。如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眼下，方燕一边听妻子数落，一边想还是找律师想想下一步怎么“编剧”、“演出”吧。

他去给王天明律师打电话，天明邀方燕夫妇明天到他们律师事务所去，所长说一同和他们研究方案。

天坛法律事务所在街道办事处的大院内，是属于北京市最低档的法律事务单位吧，故不称“律师事务所”。然而方燕夫妇却在这儿感受到最高尚的扶正法邪的正义感和无私助人的情操。所长带全所的主要律师都到场，在这休息日义务为方燕夫妇的官司出主意想办法，伸张正义！

小小的办公室坐满了人，墙上满是那些弱者、受害人赠送给律师们的锦旗，一面锦旗便是一篇他们帮弱者打赢了官司、伸张了正义的动人故事。

全部材料摊在了桌子上。

几位律师早看过了材料，一共 24 份，包括：合作协议书，珊月在中国银行的开户证明、印鉴，负责装修的张德泉的证明，龙迪饺子苑 1995 年 1 月 3 日收到壹万元后孟花给开的收条，陈曾的收投资款的白条，珊月被陈曾情妇所打的证明，孟花的龙雨工贸有限公司底档，龙迪饺子苑会计王秀琴证言，地质局与石家庄龙雨工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东城区工商局底档抄录，还有一份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送审新闻稿。

方燕、珊月听着律师们的分析，那般仔细、认真，站在对方角度的反驳、辩护，对证词的否定……都像是自家的事儿一样，夫妇俩心里非常感动！

所长在大家认真分析、辩论之后，让大家提出如何打这场官司的建议，韩律师认为证据不充分，还需要继续取证，所长便要王天明开介绍信正式去取证。一位律师说：为了少花诉讼费，可以打“排除妨碍”，即由珊月起诉继续营业，让地质局打开封条，因为那封条是非法的！如能立案，此“排除妨碍”只需交法院几十元即可。

这是迂回战术，即先想法把餐厅门打开，然后拿照办理年检，更换法定代表人。原告的主体资格，在账上能证明投了多少钱，通过法院查证，便可成为合法的投资人。上级主管单位无权封门！这需要让当时的会计写证言。……从下午三点一直研究到六点多，方燕夫妇过意不去，一定要请律师们吃晚饭，强拉几个律师到了附近一家酒楼。所长却怎么喊也不来。律师们知道这夫妇俩的难处，让他们点菜，却光拣价格便宜的要。

王天明在饭桌上说：“你们不要光盯着官司，还是要一边挣钱一边打官司，用别的办法减少损失。再就是不要走一条路：公安那条路要抓紧。如果真把那打人凶手抓起来，让陈曾还账放人，要比诉讼法律省事；再就是用舆论揭露这种高级骗子，你们出口气，对全社会也有益。”

当晚约定：明天上午，王天明开信，方燕夫妇与门头沟联系好，下午一点在西单地铁碰面，一块去找会计王秀琴正式取证。

方燕夫妇和王天明律师一同去门头沟。方燕现已是第四次去那里了。王秀琴做了证明，加盖了公章。她证明在账上记载有珊月的 6 万元；她还说出纪凡取走 13 万多元给开白条之事，最后让审计事务所写了证明王秀琴的几句话。

回来路上，律师又一次对方燕说：“我身为律师，但仍劝你还是采取非

诉讼形式好，理由我不多说，你们能体会到。要想想别的路子……”方燕还有什么路子？他给大兴县公安局罗局长通了话，罗局长说此事已交给刑警队长队长杨子去办了。他本来要去廊坊，昨晚突然出了一个人命大案，他正全力投入侦破，估计过几天会完事。

罗局长告诉了杨子的电话，让方燕直接联系。事情总算在往前进展。

1997年4月1日，从早起就下起蒙蒙细雨。方燕去大兴县公安局刑警队去找队长。

坐在公共汽车上，望着细雨，他随口吟出：春雨蒙蒙去大兴，路多曲折道不平！

百姓受害谁来助？

为讨公道献余生。

后两句诗包含了方燕夫妇商定的一个计划：如果被蒙骗的10万元能够要回来，他们将用它去注册一个“讨公道抱不平事务所”，专门义务为弱者，为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为像他一样的书呆子讨公道。他们在这次打官司过程结识的各方人士都将被聘为事务所的顾问。社会上大需要这种事务所帮助弱者了！

他在蒙蒙细雨中想着，车到了大兴。

方燕见到了杨子。他为破那个人命案昨天一宿未睡。听说方燕来，他专在这儿等候。方燕为杨队长的真诚热心所感动，也有点不安。

方燕向杨子细讲了情况，又在这儿给老乡石副局长通了话。

老石说他的想法是把打人的凶手抓起来，目的是吓唬，让他还钱！

你没给他压力、他当然猖狂。方燕又让杨队长和石副局长说话。

谈了半天，杨子答应说：“放心吧，一定办好！”

然后商量具体办法。杨子看了医院对受害人的诊断书，说：“这要换成法医的鉴定才有效。只要断为轻微伤害，便可以拘留。

我们这儿有法医。最好是当地的法医。”二人商定后天上午方燕再来大兴，然后一同去廊坊市。……方燕从大兴口来，对珊月说：“这下可盼出头来了，要采取行动了！”

官司要打到廊坊了，如果真的抓了陈曾的儿子、外甥，廊坊市领导会不会为陈曾说情？那里不少人都是陈曾“星星酒家”的顾问呀！方燕有这个担心，于是他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那些顾问写了一封信，并上街复印了。

他又给河北省委书记写了信……

4月3日，方燕夫妇起大早赶往大兴，到公安局刚八点。杨子昨夜又一宿未睡，见方燕夫妇到来，立刻从床上起来，抹抹脸说：“我找好车了，咱们马上去廊坊。

”

到了廊坊市安次区公安局，就是那天晚上方燕领儿子报案的地方，那天是上的二楼，这次来直奔一楼的刑警大队。杨子向方燕夫妇介绍：“这位是刑警队的队长。”

他也姓杨，也是刑警队队长，人长得胖壮，脸庞黑红，像是浑身有武功。珊月说：“你们全姓杨，俺们就靠杨家为民做主了！”杨子把控告及诊断交给杨队长，他看完立即叫一女刑警过来：“你去到医院找法医，搞个法医鉴定书来。”

方燕夫妇尾随女刑警出来，女刑警叫陈英。

他们跟陈英到了市医院二楼的法医室。

陈英说：“这是被‘星星酒家’打伤的诊断，杨队长说请你们做个法医鉴定。”

”

旁边的法医说：“廊坊谁不知‘星星酒家’的陈曾，他家有两只虎，怎么去惹他呀？如今这些人有点臭钱就为非作歹！”

这位法医说：“被打的人呢？”

珊月说：“那是我儿子，他上班了，已经过去好久，伤也好了，这是当时的治疗记录和诊断。”

法医拿过一张法医鉴定书来填写，照诊断判定写了“轻微伤害”，盖上了法医的印章。方燕付了费，便出了医院。

珊月小声对方燕说：“如果没有人领，咱们自己可开不出来呀！”他们满怀胜利的希望进了公安局。

他们的希望到了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便破灭了。

打人事件发生在1996年12月15日，这天已是1997年4月3日。

杨队长叹口气说：“按照刑法已超过三个月的控告期，如果你们20天以前来还有效，现在没办法了！”

杨子看看方燕夫妇，做出无奈的表情。

杨队长沉了会儿说：“和孟局长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按诈骗抓……你们把材料留给我们一份，我们研究了再告诉你们。不过我看这事情不太好办，这陈曾是省里下来的干部，他跟市的领导们都很熟……”方燕说：“我们想到这点了。我们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不要干涉你们办案。”他打开信便念起来——中共河北廊坊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张成起、王高鹏、周士毅、张树藩、吴志忠、商振林、刘培基、左宝印诸位同志，张希正老同志钧鉴：你们好！

廊坊市星辰商贸开发总公司（即星星酒家）老董事长陈曾，是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处级党员干部，1992年在北方大厦任总经理期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免职，令他追回国家经济损失，只给其生活费。然而他不思悔改，欺骗组织，非法下海经商，依靠他曾给洪毅副省长当过秘书的种种“关系”，骗取国家贷款，为自己修建高级别墅享受，以种种诈骗方法，坑国害民，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理应受到惩处和谴责。

陈曾以“振兴家乡”的旗号掩其害国肥私、坑国害民之本质，用谎言骗领导，拉大旗做虎皮，把诸位均聘请为他的公司“顾问”，以便招摇撞骗。

陈曾及其同伙的一切严重问题，必将受到有关部门的依法处理，切望得到诸位领导的支持，扶正法邪。勿再听信其花言巧语，受其蒙骗，勿再去应请吃饭，勿接受他及其子女等人任何形式的礼品。

此致

敬礼

记者：钟严 1997年4月

当方燕一读出开头的几位人名时，珊月就发现这里的刑警便睁开惊异的眼睛：天哪，这不是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市里的高权力层的人吗？当读到陈曾把他们全聘成顾问时，这些人惊异中便带些恐惧了。珊月拍拍方燕，让他不要读，可方燕却不理解妻拍他的含义，仍一意孤行读完。他以为这样便给办案人打了气儿，哪知人家更害怕动陈曾一家了。

“这可不好办了，陈曾家有这么硬的关系呀！”陈英说，“现在是靠关系的年月呀！”

杨队长说：“他儿子是青年优秀企业家，要办他，就得慎重。公安局也要请示市领导，他若有后台就不好办。”

一个小伙子插言：“你提到的这些领导都比俺们局长大。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一个人说句话就不好办了。”

方燕这时才明白妻子暗拍他的意思，但已悔之莫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收不回来了！唉，想想名记者说的，又有啥后悔可言。

反正已把揭露陈曾诈骗的举报留在这里，随它能办不能办！

在回大兴的路上，杨子说：“当今腐败恐怕已到了极点，只要是当官的犯罪，就是刑事犯罪也不好抓，说道很多。我们抓老百姓犯罪最容易；如果他已被指定当选成‘人民代表’，那要抓捕就难多了。再就是对有钱人……有钱可以把该判的不判，能用钱把人赎出去，司法部门腐败也严重哩！何时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就行了。”

这位刑警队长有很多感慨。

车到大兴已过中午，方燕夫妇要请杨子吃顿便饭，说我们饭店不熟，你找地方吧。

杨子说他们大兴有一家饭店很红火，菜做得好，实惠。方燕说就去那儿，车便直接开向那个饭店。方燕让杨子点菜。吃完饭，杨子却掏钱结账了，说到城里你们再掏钱，我没给你们办成事，心里也觉对不祝其实，石副局长早告诉罗局长了，若不是刑事案子多，我们也早办了……杨子的话，让方燕夫妇很感动。方燕很喜欢杨子，说咱们在这饭店前照个像留念吧。

方燕对没有办成却不觉遗憾：如编剧理论所说，故事总要多几番曲折才有戏，才让观众爱看。我不是在看戏吗？

戏中另一个人物此时出场了：陈女士呼方燕，让给她回电话。

这陈女士原来是蔡松他们四人请的律师。陈律师说话十分客气：“我从他们的材料中了解到，你们也是让陈曾、孟花骗了，我非常同情你们。你知道他们四人怎么投资被骗的吗？”

方燕说：“我不清楚，我夫人可能知道一点，那天我们还跟赵华说呢，我们那儿刚刚叫陈曾骗走了10万，眼下又来了四个傻冒，拿着钱给人家送来了。”

陈律师说：“我的意见是，你们受害人应该联合起来。我想找你们谈谈……”按照陈律师的安排，赵华来找珊月，说4月8日请她和陈律师见面，到4月8日下午，黄菊又来电话告诉珊月、方燕，六点准时到阜城门肯德基餐厅门口会面。

没赶上吃晚饭，珊月、方燕便按时来到会面地点。赵华向方燕夫妇介绍陈律师，陈律师握住珊月的手：“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大为惊讶。珊月说：“年轻什么呀，老了。”陈律师说：“你有40岁吗？”珊月笑了：“我一儿一女都大学毕业了，我这辈子没有40岁了！”

这位女律师也不到60岁，曾是年轻女兵，后转业到地方法院工作多年，退休后当了律师。

餐厅里人都坐满了，没有说话地方，他们便往西走，到华联商厦营业厅去，那儿有为顾客提供的坐椅，可以交谈。

方燕问律师：“你们去门头沟找王秀琴取证了吗？”

陈律师支吾：“噢……会计那儿？我打电话问了。”

方燕又问：“东城区工商局有龙迪饺子苑的底档，你去复制了吗？”

陈律师答：“我看了一下底档。”

方燕说：“律师有信函，工商局才让复印呢，你为什么不复印一套呢？”

陈律师没有回答，便进了华联商厦。二楼有几把铁椅和一个小桌，正好说话、写字，大家就坐下了。

陈律师拿出纸笔开始做调查。

陈律师问方燕：“你在电话上对我说，你们受骗了，见他们四人来，就知道他们是受骗来了，对吗？”

方燕很惊讶：“陈律师你听错了！他们来投资，我们又不知道，怎么会知是受骗呢？”

陈律师又问珊月。珊月说：“我当时在廊坊是见了他们四个，陈曾特请他们吃饭，也没叫我。那时陈曾已说是算借我的钱，不让我参预饺子苑的事，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孙镜插言：“我记得你说过陈曾就代表你了。”

珊月和大家一同回忆当时的真实情况，之后律师便仔细询问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股东会的情形。珊月告诉孙镜：“就你还没有给我写证明材料呢。”

华联商厦要关门了，把他们赶出来了。陈律师笔录没有完，又转移到对面麦当劳餐厅。

不在这儿购货，人家不让坐。孙镜这才去买了点东西。

珊月想：你们请我们来向你们提供材料，却都舍不得多买个面包让我们吃，也够小气的了。

珊月对陈律师的笔录觉得不准确，便让方燕看了一遍。

陈律师催促说：“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珊月凭直觉，感到有些不对劲：为何这么急促地让我签字？我上当受骗太多了，可要多想想了。

陈律师说：“这是一种互证，你签字对你将来起诉也有好处，给他们打完，我就帮你打官司呀！”

根据多次被骗的经验，凡是对方总说对你有好处的事儿，就要多想想！她多少次都是在别人说帮助自己的情况下受骗的。

孙镜说：“珊月你考虑太多了，你还怕受骗哪？”

珊月很直率地说：“我是受骗太多了，遇事就要多想想。这样吧，回头我们自己写个材料给律师吧，时间急促，记录得不会准。

我们还要去看女儿，今天就到这儿吧。”

陈律师没有得到珊月的签字，大失所望，认为今天的会面，是她的失败。

珊月早早醒了，她是被噩梦吓醒的。

她对方燕说：“这个梦提醒我了，这个陈律师心术不正，是骗我来了，她见了那张写了我名字的协议，便想把我和陈曾、孟花打成一伙。他们找不到陈曾、孟花，就想告我是和陈曾、孟花合谋骗走了他们四人的钱……口口声声说我和他们四个是一回事，事受害者，其实是转弯抹角打我。他们想让我还他们四个人的钱，你说她心多坏！我亏了没有给她签字，当时我说不清楚，但我凭直感，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签字，往后我再也不怀疑我当时的

感觉了。”

方燕说：“这个律师不是想法研究害人的陈曾、孟花，想怎么告他们，却走歪道找捷径，想告我们，这不是胡闹瞎掰吗！我昨天给门头沟审计事务所所长打了电话，证实陈律师人不真诚，向我们说谎：她说没有去找会计取证，只打了个电话，这是假话，所长说她去门头沟取证了；她说只到东城区工商局看了一下底档，却不知道赵华早透露了：她们已经复印回来了……她一问便说我在电话上告诉她她知道他们四人受骗来的，这就是要把我们打成有意骗他们的。人心太可怕！真是天可度，海可量，唯有人心最难防！她身为律师，说瞎话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真不可理解！”

赵华来我方燕夫妇，是陈律师派她来取写的材料。珊月说，我们还没有顾上写，先把孙镜给我的材料拿来，再来给律师写材料吧。

赵华说，听黄工讲，佟强给她打电话说孟花现在海淀，孟花告诉佟强要先还我们的账，再还地质局的账……律师说要快进行，早早立案。

珊月问：“你们把工商局有关龙迪饺子苑底档复制了吗？”

赵华不知律师说了谎话：“律师早复制了，说一张花多少钱，我忘记了。”

珊月说：“我们原来有什么材料是全提供给你们了。请你转告陈律师吧：把孙镜的材料和工商局的底档复印给我们，不给这个，我们也不给写材料。”

方燕揭了陈律师说的假话。

赵华说：“我也觉得这个律师不对劲，搞什么也神秘兮兮的，就像当年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要来整人似的。”

赵华没有拿走材料，陈律师急了，这天连呼方燕两次，方燕本不想再理她，最后还是回话了。

陈律师说：“我们先把第一步材料弄好，算是互证，对你们也是有利的呀！”

方燕说：“孙镜给我们写的材料呢？”

陈律师说：“我告诉她们全给你写，我也得要一份。”

方燕说：“据我所知，你已从工商局复印了龙迪饺子苑的底档，那就复印一份给我们吧。”

陈律师说：“那是要花钱的呀！”

方燕说：“可以前我们提供给他们那么多材料，也是花钱取来的呀！复印费我们可以出呀！”

陈律师说：“你们还是找律师去取证吧。”

方燕说：“好了，既然你们不给我们，也别想要我们的！”

方燕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陈律师又几次呼，方燕又与她对话。

方燕说：“我看没什么可说的了。人和人不以诚相见，便没有团结合作的基础；给我复印三张材料，也要收费，你们也只认识钱了，还有什么友谊可言？既然不给我们写材料，我们也不写了。”

陈律师说：“你们误会太深了，他们交给你们的证言材料我看了，要修改，不然在法庭上提供可对你们不利……”方燕说：“无所谓，他们怎么写的没关系，因为以事实为根据，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方燕又先放下了电话。

方燕、珊月去了天坛法律事务所。

王天明说：“你们不签字算对了，没有入陈律师设下的圈套，她是想把你珊月和和迪公司作为被告。你不要给他们提供任何材料了！如果要写材料，要先让我看看再说。如果她把你绕进来，在你签字的材料上做文章，说你与陈曾、孟花是一伙，而陈、孟不到，便由你赔偿。你与孟花签合同用的是你原来的保健品经营部的图章，那可以追究‘无限责任’，他们可以把你的家产变卖抵账的。”

珊月说：“这不是不讲理了吗？”

王天明说：“法律不讲理，只讲法，只看证据！陈律师是他们请的，一切为他们把钱要回来，也可理解吧。”

这几天，珊月都没有睡好。这天早醒后说：“我原来以为律师是非常高尚的，原来为了赚钱，也可以不按理说。像陈律师这种人为了想让我们去赔偿，不是也想把我们绕进来再坑我们吗？这不是法律流氓吗？”

有陈女士这种无能还想走斜道的人为他们当律师，看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吧。

九、将军斥无赖，省长助平民

读者诸君：还记得方燕写的《受骗记》的前叙吗？他回家乡见到他在书中写过的反贪科长、现任博野县副检察长的陈铁利，向其讲了他被陈曾诈骗的事，陈铁利建议他还是找能和陈曾说上话的人去劝说陈曾把钱还了，这比打官司上法院要省事。方燕接受了陈铁利的意见，回到北京和妻珊月说了。可谁能和陈曾说上话，他又听谁的呢？

第一个想到的是洪毅，陈曾当过他的秘书，在“星辰”小报上，陈曾又把洪毅聘为“顾问”，请他顾问一下吧。

方燕给洪毅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受骗经过，请求洪毅劝告陈曾还账。

方燕只知洪毅同志离休前是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便把信寄河北省人大转交。

1997年4月17日，方燕去了石家庄。

到红军大街5号院，方燕说找刘秉彦伯伯，门口传达室老头一通电话，方燕夫妇便向大院里走去，这里住着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省政协主席等省里的首脑人物，有离休的，有还在职的，这从每座小楼前停放的汽车多少，便可分辨出来。离位的大多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每到过年过节便格外明显。方燕对这个大院太熟悉了！当年他为房子打官司，第一次来找刚调来的省委副书记刘秉彦，第一次进这个大院是1982年。刘伯伯家在中间的一幢楼的楼下。那年栽下的小树，今天已很粗了。他每走进这个大院，便想起1946年秋他跑进冀中十分区所在地——河北固安牛驼镇的那个逃亡地主家的破院，那是十地委和军分区首长住的和办公的地方。小方燕是十来岁的孩子，穿着到膝盖的灰色的八路军服，从这个首长屋跑到那个首长屋去送信。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仿佛还有那个岁月保留下的深刻的印记和习惯：不论你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的家，他还是推门就进；这就与现实距离太大，为此，

他常因保卫人员的阻拦而大不愉快！然而，他进老司令员刘秉彦的家，却仍和当年当小鬼进他的办公室一样随意。

刘秉彦将军是他心目中最钦佩的老前辈中的一位。

刘秉彦是抗战前的北大英语系学生，是方燕的老校友。他“七七事变”后回冀中家乡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后为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方燕钦佩秉彦前辈文武全才，在最艰苦的岁月坚持在平津保三角地带，解放了方燕的家乡土地。那年月家乡百姓一听说刘司令员都肃然起敬，他带队伍一来便有了依靠，在百姓中威望极高。

那年，刘秉彦听说方燕到河北后只有一间住房，不能写作，便叫方燕到他的住处来，特意为他安排出一个房间。方燕怎好打扰省领导？不想来。刘秉彦批评说：“你这小鬼呀，也变了。是不是不好意思到我省委书记家来往？明明你这作家没房间写作，而我这儿有房间怎就不来？我们这些官做大了的人本来就得了不少‘特权’，可有人还不满足哟！还要向人民伸手要待遇要特殊，忘了老百姓了！你没有当官，不了解今天的官常应该写一本新的《官场现形记》！”

1986年，方燕的中学同学、作家冉淮舟主编一套《冀中文丛》，是战争年代冀中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刘秉彦的传记交给方燕去写，他听刘秉彦断续讲述了当年的斗争生活，使方燕非常感动的是老将军对家乡父老的那片真情。可惜因为出版社不想赔钱，这套丛书只出版几本便编不下去了。写刘秉彦的传记未能出来，使方燕感觉欠下一笔账。刘秉彦说：“你没欠下我的账，是我们欠下冀中百姓的账了！”说到这儿，将军是那么动情：“战争年月，没有老百姓用血肉生命支持我们，一天也呆不了，哪有革命的胜利？我的命都是老百姓掩护下来的。可胜利后这么多年，老百姓的日子还那么穷，是咱共产党欠下老百姓的债啊！”

将军是带着对人民群众负债的心去工作的。他退下来以后比过去更忙，他要尽自己的力量让他战斗过的土地的百姓富裕起来，他说这是他见马克思前的最大愿望。

刘将军的这席谈话，给方燕极深的印象。

现在，方燕夫妇坐在刘将军的办公室里，向这位82岁的老人讲他们受陈曾诈骗的经过，如同受委屈的孩子回家向自己的亲人倾诉。

刘秉彦老人把两手放在耳朵旁，细细地听。老人的耳朵有点背，方燕的声音加大了。

听完后，刘将军把桌子一拍，站立起来：“我早看这个陈曾不正派！他这还是共产党员吗？”老人非常气愤，珊月上前按住老人：“伯伯，我们都不生气了，你还生这么大气！”刘将军这才又坐在椅子上。

老人向方燕夫妇说：“我早就不和他打交道了。那年我去廊坊，他把我请到星星酒家，还有市里几位，让我们在他那儿吃饭。

他把笔和纸准备好了，让我给他题字。我听说他招来俄罗斯小姐在他那儿卖淫，被公安局查了。我当场便警告他搞企业要走正道，我给他写了四个字：身正影直，他是身子不正，影子不直！他还想骗我，我这儿有个远大公司，是国务院下属的扶贫公司，他想用远大的名义贷款，在廊坊搞个分公司，我没有同意，没有上他的当方燕拿出陈曾的名片说：“他已经用了远大的名字了！”

刘将军说他惯用这种遮人耳目的骗人术。他觉着远大名字好，鱼目混

珠，好招摇撞骗。

方燕拿出陈曾办的“星辰”小报告告诉刘将军：“这上边把你写成他的顾问了。”

”

刘秉彦拿过小报，看到顾问名单，说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

方燕夫妇要刘伯伯给陈曾写封信劝劝他把钱还了。刘秉彦说：“他是无赖了，还能听我的？”

珊月说：“您老德高望重，他也许听呢。”

老人说：“不会起什么作用。我给廊坊市委书记张成起、市长王高鹏写封信，让市里查他！”

老人拿起毛笔，在信笺上写了，用的是河北远大总公司的信笺。

一封是写给陈曾的——

陈曾同志：

你借珊月同志的九万元人民币请早还清，她要用以买房，你应当理解。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要随波逐流，变无赖。

秉彦 四月

老人又愤然写道——

成起、高鹏同志：

请派专门人查查陈曾的问题，他是星星酒家的老板，生活已经腐化，骗钱不还。珊月同志辛辛苦苦挣来的九万元被他骗走赖着不还，还贷了大量公款不还。查实后作为典型进行批评斗争，依法清理他的债务。

致

敬礼 秉彦 四月十八日

放下毛笔，刘将军说：“如果这样办，还要不回你们的钱来，就别想要了。”

刘将军的老伴提着药盒到办公室来，要给老人打胰岛素，方燕和伯伯告辞，走出门去。

他对这个地方，这个家有一种依恋，那是一种对过去战争岁月的怀恋，对往日党和人民血肉相联的关系的怀恋，对那革命大家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怀恋……他在河北省不少农村的墙上见到“鱼水工程”这个词，那是要恢复党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一项工程，他曾为此工程激动不已。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工程要比三峡工程艰难复杂得多，这是一项全面治理的工程，是关系执政党命运的伟大工程啊！

方燕夫妇已打听到洪毅家的住址，他们便去拜访。

这是副省级领导住的宿舍楼。一进洪毅同志家，便想到他的秘书陈曾家那豪华别墅，反差是那么大！这屋里没有装修，家具也十分简朴。洪毅老人也像老农民一样的忠厚纯朴，实实在在，难以把老人和秘书陈曾联系在一起。

方燕寄到省人大去的信，洪毅还没有见到。

听了方燕的叙述，老人气愤但并不惊讶。老伴说：“他一退下来，人走茶凉，别人就更不听他的了。他有两个秘书都姓陈，陈曾坑了你们，那第二个陈秘书把我们家和女儿从国外寄来的钱全坑走了，也是10多万！那是女儿在法国打工的血汗钱哪！他拿到海南去搞了房地产。人家也不说不给，还

说加倍偿还，可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

洪毅说，陈曾在石家庄东明桥还开了一个“能人居火锅城”……老人问方燕：“我能给你们做些什么？我也好久不见他了。见了他我要说他，怎么能这样做人？”

方燕说：“您给他写封信，我带给他；您再给他打电话帮我们催催……”
“这好办，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老人去打电话，却不通。

他回来便给陈曾写信——

陈曾同志：

生意如何？借朋友的钱，应当讲信用，及时归还。你缺钱的时候，人家支持你，现在人家急用钱，你不及时归还，这说不过去。当然你也有困难，这个困难你能设法解决。所欠珊月的钱为数不多，望你能尽快归还，因为他买房急用。

顺致

敬礼

洪毅 4月18日

洪毅把信交给方燕，说：“还要依靠组织，你们找找他所在单位领导，他还是共产党员嘛！”

多么正直、善良的老人，他以为他的秘书心里还有党。

方燕拿出“星辰”小报给老人看，说：“他聘你做他的顾问了？”

洪毅看到他的名字在星星酒家顾问名单里，生气地说：“我什么时候成了他公司的顾问了？他这么做太不像话，起码应该告诉我一声埃”方燕夫妇按照洪毅的建议去找省供销社的老领导梅风同志，步行十多里路才找到那个富强小区。见到梅风，这一家都为方燕夫妇抱不平。梅风让方燕给纪委写个材料，还说，就在这附近，有陈曾新购卖的商品房，可不知是哪栋？方燕拜托梅风为他了解打听。梅风说：“你写下电话，我们可以联系。”

离开梅风家，方燕夫妇去到省安全厅找副厅长郭恩志。老郭原在白洋淀当县委书记，和挂职去的作家方燕关系甚好，方燕要让老郭给他拿主意。

老郭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听方燕讲了情况，他说：“这些离职的老同志说话不大灵了。你们得想法找到在职的领导，才好办事。

能找到叶省长最好。作家应该把这经过写成一部书。你看办个事多难哪！现在社会风气太坏，没有人管哪！我相信你有这么大力量，有这么多人支持你，结果一定是：钱要回来了，气也出了，身体也好了；最后还会出一本书。”

方燕说：“但愿你的祝福成真！”

老郭说：“你还缺什么不？你这大事我帮不了忙，小忙还可以帮帮。”

方燕说想去东明桥看看陈曾的“能人居火锅城”。老郭说：“这好说，我也去桥东，找车送你。你别看我现在是副厅长，可不如当县委书记用车方便哩。”

车到了东明桥，方燕他俩下了车，果然在石油液化气公司旁边找到了“能人居火锅城”。

进去，看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是何鲁。打听服务员：老板是何人？是朱小伟。

陈曾又没有露，真是狡猾的老狐狸。

珊月说：“这朱小伟就是陈曾派到石家庄为他炒期货的那个人，去年 6

月我在廊坊亲眼见陈曾给朱小伟拨走 150 万。”

一周以后方燕夫妇又进了红军大街 5 号院，又来到刘秉彦伯伯的书房。

方燕如实讲了还没去廊坊，说根据朋友建议，让叶省长出面说说，也许能起作用。不知叶省长会不会管平民百姓的这种事儿？

刘秉彦说：“他应该管。不管平民百姓的事还叫公仆？我给你们写封信，你们夫妇俩直接跟他说说。”

刘秉彦提笔给叶连松写信，用的是河北省委信笺——连松同志：介绍方燕夫妇来，请予接见。

陈曾借了他们的钱，约 10 万元，方燕夫妇多次索要，他赖着不还，请你写一封信给张成起、王高鹏同志，请他们催陈曾还账为妥。

专此

顺问近佳

秉彦 四月二十六日

方燕拿上信便离开了，他去街头把信复印留做纪念——纪念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八十二岁高龄的将军为他花的心血。

叶省长没有搬进 5 号院来，他住省领导宿舍楼，在师范街。

方燕夫妇进门，到传达室。传达室询问了半天，听说是找叶省长便格外认真。

方燕只好拿出刘秉彦给叶省长的信来。那人端详半天却说：“没在家。”

没在家自然不能进去，有什么办法？但方燕判断：这是周六下午六点半，叶连松肯定在家。

他们回到朋友兰英家，立即按照刘秉彦提供的号码拨打电话。

果然不错，叶连松接了电话。

叶连松在电话里说，他明天一天有会，只能在明天 8 点 20 分以前在省府大楼匆匆一见，因为 8 点 30 分便开会了。

4 月 27 日，星期天，省领导们也不休息，可省府传达室却没有一个人。站岗的不让进门，他们只好在门口等。方燕见 8 点 20 分已到，便又向站岗的战士说明是叶省长让来的。但站岗的不听，说：“我们知道叶省长的车，去接了，还没来嘛。”方燕征得岗哨同意，进警卫室打电话……叶省长的秘书杨慧出来迎方燕夫妇。

杨慧：“你们找省长什么事呀？”

方燕把刘秉彦的信递上，秘书看过，说：“你们个人要账的事儿也找省长，让省长给你们要账？”他有些惊异。

方燕忙做解释：“是请叶连松同志和张成起同志说说。”

秘书说：“正好，张成起、王高鹏都来省开会，我找他说说，联系上你们直接和成起谈吧。”

方燕说：“请连松同志一定过问。”

秘书说：“刘老都给你写信了，他德高望重，叶省长能不管吗？

我们马上就要开会了，就不用见叶省长了吧！”

傍晚，方燕在兰英家给叶连松的秘书打电话，是另一个叫董云鹏的秘书接的，告诉说：“叶连松同志已批示，请成起、高鹏同志按秉彦同志的意见处理。我让廊坊市委的秘书取走的。你们可直接和成起联系，他住白楼宾馆 3802 房间。”

吃了晚饭，方燕夫妇便去了白楼宾馆。

没有门岗，他们直上八楼。

3802 房间里有人说话，好像人还不少。方燕夫妇不好进去打扰，便在门外椅子上坐等。问服务小姐，说有俩年轻人找张成起，刚进去不久。小姐为他们端了茶来。

喝完一杯茶，还不见人出来，方燕说：“咱们进去吧。”珊月说：“求人办事，别让人家讨厌，再等等。”又等了会儿，仍不见人出来，方燕便敲门而进。

方燕进屋，见有一男一女坐在一边沙发上，听对面沙发上的 50 来岁的人说话。

秘书在里间屋写什么。

方燕、珊月做了自我介绍。那对面坐沙发的人愣眼望着喷出话来：“你不是为那 10 万元的事吗？你让我这市委书记给你要账去，你看我这书记也太不值钱了吧？”

方燕没想到此人这般说话，想他就是市委书记了，心里非常反感。进来找他，一不让座，二不说句礼节性的话，开板就捅出这几句来，伤了他那北大学子的傲气。他当即想顶他一句：你这共产党的书记是用钱买的吗？你书记值多少钱？可他是求人，便压住了火气，忙着解释：“不是找你书记要账，是求张成起同志帮帮我们这无助的知识分子！”

张成起把脖子一梗，说：“那我不是书记，你也不会找我。”

方燕说：“那倒也是，求你，求叶连松同志帮助嘛！”

张成起说：“叶连松也没批示让我必须办。”

方燕说：“那我看看叶连松怎么批的吧。”

张成起说：“批示我不让你看。让你说，我怎么管陈曾要你的钱？我又不是中间担保人，你给我找个切入点，让我咋说？”

珊月直立门口，方燕站在屋里，见没人让座，他自己坐在了张成起旁边的沙发上。“咋说还用我说，你会有办法，不少老同志都关心帮助我了。刘秉彦同志、洪毅同志也都为我给陈曾写了信，那就看你帮不帮了？”

这时，秘书从里屋出来，站在一边，连连说：“我们张书记说能办就办，说不办就不办，你也就别说了！”

方燕听了非常反感：一副对上溜须拍马的声调，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

方燕一定要听张成起说出个所以然来，他坐在沙发上没有走的意思。

张成起说：“刘秉彦同志也和星星酒家很熟，让他写信就可以了。陈曾若不听他的，我的话更不听了。”

方燕说：“那可不同。你是在位的书记，你不是还给陈曾题过词吗？我在他陈曾的办公室见过。”

张成起语调缓和了：“我可以给你问问，陈曾他个给你钱，我可也没有办法。

”

珊月说：“只要您真给我们说，一定会起作用的。”

方燕、珊月告辞，那秘书送出门来，说：“张书记确实有难处。”

第二天上午方燕夫妇，在回北京前，又跑到 5 号院，把见张成起的情况如实报告了。刘秉彦认真地听后说：“你再问问秘书，问叶连松怎么批的，就说我们的。

”

方燕拨通了电话，找到董云鹏，问批示原文。

董云鹏说：“原文是‘请廊坊成起、高鹏批处。叶连松’”。

刘秉彦说：“他没有批示照我的意见办嘛！那你们拿我的信去廊坊，看王高鹏怎么说。这个张成起我不熟，听说高鹏是办事的人，一个党员在外边坑骗，就没有党的组织管他？他人在你廊坊，廊坊市委就不能管？他说我跟‘星星酒家’熟，我是吃过一次饭，还是你们市领导陪我去的！如开党代会，我要在大会上讲！我怕什么？”

我以党籍担保：如果公安局把陈曾抓起来，准能查出他的严重问题！他在廊坊为何成霸？必有人吃了他的好处，为他撑腰！你们先去廊坊，把我的信交给高鹏，也交给陈曾，看他们如何反应？”

方燕回到北京，便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韩立成通话，说了叶连松的批示及张成起的态度。

韩立成说：“叶连松批的可以，张成起就是那么个人，他倔拉巴吉，人倒不坏，他也许能给你办。”

不管办不办，道路都走遍。方燕这天又去了廊坊。他找了个三轮，直接拉他到了市政府，进了市政府办公室。

办公室的孙林东热情接待了他。

他拿出领导们、老同志们为陈曾骗钱一事写的信函。孙林东一一看了，那些毛笔字就像书法。他说：“就凭这些字也值10万元哪！”他去找了王高鹏的秘书，才知道王高鹏去北京了。交臂而过，无缘相见，方燕只叹遗憾。

秘书说：“你的事我知道。成起、高鹏同志具体做了安排，让商秘书长具体办理此事。不过商秘书长去三峡了，一周后回来。我再催催他，请他抓紧办。”

方燕听说张成起真办了此事，觉得韩立成判断得很对，便给张成起拨通了电话。

张成起知是方燕，便说：“你的事儿，我们让商秘书长去找陈曾，还没跟我们汇报，你可以直接找老商。”

方燕说：“成起同志，我谢谢您了！说实话，那天见你，我对你印象很不好。”

觉得你官气十足，不为民办事。回北京我跟韩立成讲了，他说：那小子就是这样，别看他倔拉巴吉的，人倒不坏，说不定他会给你办的。果然，立成说对了。”

张成起笑了，说：“我不能说好听的先应你呀！怎么样？你见到陈曾了吗？你也去找找他，他还能吃了你？商秘书长去三峡了，他回来，我催他办，争取办成！”

”

这个张成起说话很直爽、痛快。方燕想：这比那些光顺你说好话实际不办事的人强多了。他从对张成起反感变成了感激。

方燕从市政府出来想：张成起、秘书都让我去见陈曾，我要不要去？他有些怵，上回儿子挨打的情景，又在他眼前出现。

他的脚步又向公安局走去，心想，如果群狼吃人也好有公安局保护。他见到杨队长。

杨队长把他领进办公室，问：“有了什么高招吗？”

方燕拿出省长的信给他看。

杨队长兴奋地说：“你有了这么多尚方宝剑就好办了。最近星星酒家搞走私汽车，我们想法弄他也没弄成，他有后台呀！这件事和你们案子无关。你这案子，只要市里有指示，我们去干，他再猖狂也不行！咱公安总是为老百姓的，你去他那儿闯闯，看陈曾老实不？他若再敢行凶，我们立即抓他！”

方燕索要了上次办的“法医临床学检验鉴定书”(97第307号)，留下儿子挨打的证据。他告别杨队长，要杨的名片。杨队长说：“我们小人物没名片。”方燕说：“正是小人物才为百姓办大事呢。”

方燕决定去星星酒家见陈曾。他往那里去，真有一种当年杨子荣去闯威虎山的心态：狼窝虎穴他也要闯了。

方燕又走进了星星酒家的门口。

饭店冷清，也没有人问他，他直奔陈曾的办公室。

他推开门。陈曾和那打人的虎都在，见方燕闯进来都愣住了，说不出话来。

还是年轻人脑子快些。二虎叫声“老师”，说：“上回对不住我那小兄弟，我向他道歉……”方燕不说话。

陈曾这才接着二虎的话说：“我是一点不知道。（他想推脱暗中指使的责任！

）后来听说了，我把二虎说了一顿！怎么能打人呢？”（又把自己扮成正面角色！

）方燕不接那茬儿，只冷冷地问道：“你借的那九万元，什么时候还吧？”

陈曾说：“我已经和大虎说好了，今年贷款下来一定解决，不成问题！”（又是一定解决，不成问题！）二虎见不理他，自己走出去了。

方燕感到这是见陈曾的唯一收获：他们果真给地质局的领导贿赂了价值近万元的金表！给纪主任送了，怪不得那天他恼羞成怒，对蔡松的揭发进行威吓呢！

方燕理直气壮他说：“我告诉你，坑骗了谁的钱谁也不会善罢甘休！蔡松他们已找好律师，正准备起诉你！”

陈曾冷笑一声，说：“他们起诉不着我！他们的钱又没有交到我手上，我不能管他们的事儿！我只是个介绍人。就像婚姻，我介绍两人结婚了，婚后两口子打架了还能让介绍人负责吗？看在我们是老同学份上，你们的钱我负责还……”方燕说：“你可真对得住孟花哟！”

陈曾说：“我谁都对得起。你放心，欠你们的账我一定还。”

方燕这时才拿出了洪毅给陈曾的信，递给他。他看着信，脸色发生着急速的变化。

陈曾半天才从信纸上移开眼睛：“珊月去找洪毅了？”

“是我找的洪毅同志。”

“你们谁也不用找了。你放心，我一定解决。”

“我们怕大虎不知你的难处，是帮你做做大虎的工作。因为你还要在世上做人！”

“你放心，这工作我已经做好了。”

见陈曾说得如此肯定有把握，方燕便没有把刘秉彦给他的信拿出来，那封信对他太刺激了。方燕也没有告诉他，为了让他还账，已惊动叶连松省

长和廊坊市委书记、市长……也许用不了几天，此事便会揭晓：如果你陈曾不像吕先说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该真的把事“解决”，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十、中纪委批办，省城……

方燕读完了柯云路的长篇小说《超级圈套》，这是写一个高级骗子如何行骗的故事。他想：这部书早出两年让我读到，也许就不会受陈曾骗了。（那可不一定！

你会以为那是小说，那和你身边的人不同呢！）这陈曾不和书中的骗子用的是同样骗术吗？他想把自己的受骗事实记下来。于是开始了他的《受骗记》的写作。家里没有地方，他便到北海旁的北京图书馆期刊室去写，那里很安静。

他对我说过他当时的想法：这部纪实作品就是为打官司而给法院、律师提供一个详细的事件过程，作为“我向法庭的诉状”吧。

方燕边写“受骗记”，边等待着商秘书长从南方归来。

两个星期后，方燕给廊坊市政府拨通了电话，说是商秘书长回来了。

方燕的心竟怦怦响起来，仿佛他期盼的结果即将揭晓。他不知这 10 万元是否有了眉目？

他的电话拨到了商秘书长的办公室。

商秘书长说：“我正要和你联系呢。市委、市政府委托我的事已经办了。你们的钱我没有要回来。我亲自找到了陈曾，告诉他：‘省长有批示，让我们和你说，把借珊月的九万元还给人家。’他一听便说：‘我哪儿欠她的钱，那是她向北京一家企业的投资！’他还说那家企业已经破产了，他只是介绍人，不能向他要钱，因为我不知具体情况，不好多说。他还说，因为和你是同学关系，你有难处，他可以帮助你一点钱。我告诉他：”因为省长交办下来的事儿，我们要向省里汇报，你要写个材料。’这样过了一天，他把写的情况交来了。我们已电传给省人民政府督查办公室了。你可以到省政府督查办公室去看；你若看原件，可以到我们这儿。他写的内容就是他说的那些。”

方燕气愤地告诉秘书长：“陈曾是在说谎！他简直是无赖！我这儿有他写的欠我们九万元的条子！他在我上次去廊坊时，还亲口说他要还账。他又一次欺骗人！”

他现在属于省里的干部，我们市里不好管哪。实在对不起你，没给你办成。”

方燕只有连连感谢，感谢商秘书长并请他向市委、市政府领导表示谢意。

看来是要想别的办法了！

这天下午，王天明律师来方燕家，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说：“这叫做和平方式谈判无望。他不可能明智，是利令智昏。他这人也太缺德了！他死猪不怕开水烫，还就要烫他！他和儿子用什么钱盖了自己享受的高级别墅？他这是‘非法所得罪’！”

银行贷款绝不是让他盖别墅的，这也是非法挪用！应该把他的问题做全面揭发，告到中央纪委，然后再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他！看情况再把咱们的官司挤进去。

你不能只说自己被骗走 10 万元。那这事大小，你若到南方，不是诈骗百万元以上，就立不上案，排不上号！如果谈判不成，他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得用非谈判形式了。”

按照律师指点，方燕开始考虑新的方式斗争了。

方燕已经给中央纪委写过一封揭发地质局问题的信，如石沉大海。说心里话，此刻他对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能否进行到底，有点信心不足了。虽然经名记者指点后，他已有点超脱；尽管用旁观者看剧的心态对待此事，以求心理平衡；但他毕竟又是剧中人，他的诗人气质决定他不能不动感情，以致使他的心动过速。

他又想到一位北大同学，当年曾在北大中文系，后来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华博，他是资深记者，对中央精神吃得透。方燕想找他谈谈。

华博已经离休，很热情地接待老同学，愿意为老同学尽绵薄之力。方燕详谈了陈曾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为索还款的曲折经历。

方燕对老同学毫无保留他说了他的思想：“腐败是如此严重，不知中央是否清楚？是否有决心彻底反腐败？我担心，也有点信心不足了。”

华博听完笑了：“连老兄你这烈士后代，对党一片赤诚心的人，都信心不足，可见问题的严重了！担心而又缺乏信心，是较普遍的心态。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同志不应该有这种心态。老兄，我这可不是批评你哟！因为你是从自己切身感受产生的想法，可以理解。

因为反腐败的艰巨性，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

华博表示愿意尽义务帮助老同学方燕。这可算是北大人帮北大人和骗子做较量，也是两个共产党员为反腐败尽的一点职责！

华博准备以记者身份，根据方燕提供的线索做一个初步调查，然后把调查材料交中央纪委。

方燕与华博分手时，他已信心十足。

方燕想：这次再给中央纪委递材料，一定不要从邮局寄，上次寄的材料，说不定是邮局给丢了；这回要亲自送到中纪委去，还要找到熟人……突然，他眼前一亮：“哎呀！怎么才想起他来呢？”

方燕想起了王光同志。

王光，现在不是中央纪委的负责人吗？他具体什么职务，方燕并不清楚。他原来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分管文教。方燕刚调北京，就听老友浩然、绍棠向他说过王光，说他是作家的朋人，有这样的领导分管文艺，是北京市作家的幸福。又听说是他为改善作家的生活写作条件呼吁，这才批准盖起了北京市的作家宿舍楼。这很让外地的作家们羡慕。

方燕初次见到王光是在文化局举办的剧本创作讨论会上。

方燕 1989 年初调到北京市的戏曲剧院，作为国家一级编剧，他应该为剧院提供好剧本。这一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决定，对腐败深恶痛绝的方燕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流泪了，一夜难眠。他想到最近在家乡听到的老百姓的传闻……越想越激动：这老百姓的传说反映了人民强烈反腐败的愿望！这不正和党中央的要求一致吗？方燕便改变了他想写白洋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的计划，用一周时间写成戏曲剧本《阴阳宅》。

剧本写出，立即引起关注。

文化局在密云水库旁的一处招待所举办了剧本讨论会，市委副书记王光到会参加了《阴阳宅》剧本的讨论，方燕在这个小组会上认识了王光。他那么认真地听大家发言，对一些情节如何改得更合理，他还出了主意。他平易，看不出他是市委领导，这给方燕留下深刻的印象。

讨论会结束，由于有尖锐的分歧，剧院领导担心排演此剧有风险，怕有政治问题，方燕心里不服。《新剧本》杂志极力推崇，说这是近几年来他们见到的北京市最有特色的本子，便发表出来了。

方燕把剧本寄给了王光。请市委书记把关，看是否有政治方面的问题。

很快，王光便给文化局局长周述曾写了一封信，周局长转告方燕，说王光同志说：我认真读了《阴阳宅》，觉得剧本主题是好的，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决定精神，我看是不存在政治问题的，至于是不是排演此剧，要由剧院决定，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

这个剧本最终也没有立在舞台上。

方燕此时想马上和王光同志联系上，可从哪儿找到他的电话和住址呢？他想起来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有王光写的悼绍棠的诗，便给晚报副总编朋友打电话。

朋友说，那首诗是文联副书记马玉田转来的，可问马玉田。方燕又给马玉田拨了电话。马玉田告诉了王光的家庭电话和住址。

方燕给王光家里打电话，王光老伴说：“老王出差了，你告诉我电话，让他回来给你打电话。”

方燕说：“不用，过几天我再联系。”

怎么能让王光给我回电话呢？但从这句普通的话语里，方燕感到实在亲切，她不是那种凡人不理，以丈夫的官位自傲的官太太。

王光同志从外地回京，方燕和他通了话。王光仍是那般亲切热情：“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吧？我回来就听夫人告诉我了，可你没有留下电话，我不好找你呀！”

方燕说：“是有事，是揭发腐败问题……”王光说：“好！那你要写材料，写好以后就寄给我。”

方燕说：“好久不见了，我想见见你。”

王光说：“那你留下电话，我有时间找你。最近中央指示惩治腐败要加大力度，我这儿会多呀！你可别急。”

方燕笑了，告诉了他的BP机呼号。

方燕抓紧时间写材料，以备王光呼他时当面交上。

赵华倒是写好送来了。她说：“我告诉黄工他们了，他们听律师说，给中纪委写信没用，便没有写，我不管他们了。”

赵华在写给中央纪委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愤慨：为什么身为地质局的领导，眼见地质局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制止不追查不想一点办法，还拒绝接见揭发控告骗子的人呢？种种不可理喻的问题，叫我如何向老父交代诉说？三万元钱在很多人眼里是小数，但却凝聚着我家两代人一辈子的辛苦，寄托着老年人晚年最后的希望！

三万元钱虽少却反映了骗子丧尽天良，贪婪无度。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不维护社会的光明正义，却为这点小钱出卖名誉、出卖良心、出卖灵魂，给党给国家给社会抹黑……我要求中纪委严肃查处。

后来，方燕向我叙述了那天他和妻子去见王光的情景。

那是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天。那些天，北京出现历史上少有的高温天气。

王光呼了方燕，约他明天上午到中央纪委他的办公室一叙，这天他有空闲。方燕告诉妻子珊月，这下可找到管事的人了。

方燕把有关材料都准备好，又把自己近几年来出版的几部作品拿上，因为王光是关心他的创作的。第二天，他们去中央纪委时来了一场暴风雨。人们多么盼望这场暴风雨呀！

方燕夫妇是顶着风雨走进中央纪委的大门的。

他们把记者华博的调查报告及他们给中纪委的信全部交给了王光。王光一一认真地看了。

陈曾问题的初步调查

根据群众揭发、受害者倾诉，记者初步调查了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处级党员干部陈曾的严重问题，特向监察部门报告，请予认真查处。调查共十一个问题（内容略去）。

一、“党员干部坑蒙拐骗为非作歹，谁来管？”

二、骗取银行贷款，为自己修建豪华别墅三、“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纪念金表事件”四、金表链——行贿受贿链……五、砍倒树林建楼房——一笔交易六、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工商局六、诈骗之一：骗走珊月 10 万元八、诈骗之二：陈曾又诈骗 12 万元九不还国家贷款，转移资金去炒期货十、办农场，套贷款，损公肥私十一、顾问名单：拉大旗做虎皮的暴露十二、受害人呼吁：党要管党以上是陈曾问题的。一部分初步调查，原河上省副省长洪毅同志说：“陈曾还把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岳宗泰的女婿的钱借了不还，也坑了人家多少万哩！他太不象话，可又有谁管他呢？我已离职，我给他写信要他做人，也不一定听我的，小会起什么作用……”我们党就不能管这样的党员吗？广大群众及受害人呼吁党要管党，要求河北省委纪委及河北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对陈曾几年来的坑骗国家及个人的行为以及陈氏父子的经济犯罪进行严肃查处。

记者从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

1 陈曾没有停薪留职，属在职党员干部，他未经组织同意擅自从事经济活动，是非法的。

2. 陈曾已到退休年龄，因为地没有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欠款，故未给他办理退休。

3. 陈曾从 1993 年离开机关，四年来自己在外的活动，一直未向组织谈过，对他的活动，组织一概不知。

建议河北省监察部门及河北省供销社党组织将陈曾召回原机关，令其交代自己的问题，并派出专人对以上重要问题进行查处。

有结果之后，记者将做详细报道，以利惩治腐败，端正党风。

记者：华博

1997. 7

王光同志看完了全部材料后说：“这里涉及了河北省和某工业总公司的党员干部。陈曾是河北管的干部，我马上批给河北省纪委查处；这不有刘秉彦同志对此事的关注吗？这是很有利的条件。

你们可和刘秉彦同志取得联系，请他督促解决。”

王光把办公厅的秘书李洋同志叫进来，做了交待，又对方燕夫妇说：“以后可和李洋联系。十五大就要召开了，十五大以后我也该退了，年龄到了。”

一周以后，方燕给李洋打电话，李洋告诉他：“你们反映问题的材料，王光同志当天便写了批示意见，中纪委办公厅已于7月25日转给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吴野渡同志。”

方燕很兴奋，他不知道吴野渡，问名字如何写。

李洋说：“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野渡。”

方燕记下了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

整整过去两个月之后。

1997年9月25日，方燕到了石家庄，从《河北日报》副总编、他的北大校友那里知道了吴野渡的电话号码。

电话是秘书接的，说：“中纪委批转下来的关于陈曾问题的举报材料，吴书记已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方燕问：“为什么两个月了，还没见动静？”

秘书回答：“可能正在运转之中吧。我再了解一下。”

既然正在运转，估计不会很久便会有行动了，于是方燕给省供销社领导梅风同志通了电话，说了情况，并说：“你知道有什么动静，请及时告诉我。”

方燕给刘秉彦同志去电话，说明了此情况，刘秉彦要方燕把中央纪委批转的复印件寄他，以便了解、催促。

方燕回北京后立即把那个初步调查报告寄给了刘秉彦。

又过去了两个月零3天。

1997年11月28日，方燕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刘秉彦同志。

刘秉彦说：“我已把你寄来的材料转给了省政法委书记徐永跃了，说要行动，但尚无动静。我把具体意见都写了，只要是抓住一、二条查处，就可以办他。”

又过了半个月。

方燕给梅风同志打长途电话，回答是：“没有动静。”

又过了半个月。

1997年12月25日，方燕到保定去找他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颜大会。这天是圣诞节，方燕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拖得太久的官司，我起程了。陈曾这个无赖没有一点音讯了；中央纪委批转到河北省纪委的材料，也没有一点动静；那记者辛苦调查写成的报告现在也不知压在哪里。秘书说正在运转中，真在运转吗？是一架多么古老的机器，为何运转得这么迟缓？这就是中国特色？那10万元被诈骗的钱，我们是不想要了，但我们还必须行动，不能容忍这种无赖这样自在。如果善良的人们对这种诈骗宽容，便会使他们更加猖狂，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这次他的计划是先请教一下大会，然后马上去石家庄。他从中国作家协会开了一封给河北省检察院的介绍信，是介绍作家方燕到河北了解反贪情况准备创作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纪实文学。而实际上他要把举报材料递给检察院。

从保定下车便给大会打电话，说好在方园律师事务所见面。

大会给方燕出主意，叫三管齐下：一、去省纪委催促他们抓紧去办，同时去人民检察院举报。如果省纪委真抓此事，就好办了；二、陈曾、孟花

属于合同诈骗行为，你可以去省公安厅举报，只要公安部门一抓就更好办。你可以去找老郭，让他这个安全厅副厅长帮助找公安厅领导；三、写民事起诉状，打民事官司，按借款不还打。

方燕第二天便登车去了石家庄。

方燕按合同诈骗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

起早，方燕在石家庄街头打印了举报陈曾、孟花诈骗的材料后，便去省供销社见梅风同志。

梅风对陈曾的诈骗行为气愤，对省里没有动静不理解。

方燕在这儿给省纪委书记吴野渡办公室打电话。

秘书说：“你去找××同志问问吧，早批转给她处理了。”

又给××打电话，告诉吴野渡的秘书叫我问你的。××回答说：“你说的陈曾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再说你在电话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带正式介绍信来吧！”

方燕放下电话，他不想去××处耽误时间，反正是没有动静。

为什么会没有动静？这事还奇怪吗？

方燕立即去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方燕几年前便与她相识。

方燕把作家协会的介绍信给她看了，便不是私人拜访。

方燕把那复印的“陈曾问题的初步调查”及珊月的举报全交给了她。

“这个报告，中央纪委在7月25日就批到河北省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动静呢？”

女局长笑笑，感到方燕不该问这愚蠢的问题：“这很正常，压半年一年不处理的事太多了，这就是中国特色呀！”她拍拍案头，接着说：“能办的案子是揭发的一小部分。人力物力短缺，没有力量去办，查哪个案子不得组织个班子，不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反贪局一共才多少人？检察院一共才多少人？忙死也办不过来，何况比你揭发的严重得多的问题也太多了……”听反贪局长一讲，方燕便忽然记起那位名记者的分析判断。

名记者真是太了解中国特色了！

反贪局长问：“要不要见见主管反贪的副检察长？”

方燕当然愿意。

反贪局长便拿着介绍信和举报材料到副检察长的办公室。

方燕和这位副检察长握手。

“方燕，你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还用带介绍信？”副检察长热爱文学，读过方燕的作品，他说：“我早知道你，可无缘相识呀！我们太欢迎你来写我们检察人员的生活了。”

方燕一见面，就觉得这检察长很亲切。

副检察长的名字？我管他叫牛迟吧。

牛迟是我写到此段时给他起的名字。方燕曾通过颜大会给副检察长通了电话，问他：“方燕的北大同学正在写纪实文学《告状记》，要不要写你的真名实姓？”副检察长说：“对陈曾的问题我一直记着这事儿呢。最近反贪局长换人了，加上陈曾当过副省长的秘书……要动他也要慎重，所以至今没有行动。在没有行动前，转告作家不要写我的真名，让他随便编个名字吧。我想再过十天半月，肯定要有行动的。”颜大会把电话内容转告方燕，方燕马上告诉我，故我暂时叫他牛迟。

女局长把那些材料交给了牛迟。

牛迟对反贪局长说：“你就去办吧！咱们回头给检察长汇报一下，我们俩批字，行吧？”他在征求局长的意见，看来配合很默契。

方燕说：“此事总算有人抓了，不会再拖时间了吧？对此事刘秉彦同志很关心。”

牛迟说：“刘省长（因刘任过河北省省长）老人非常好，我很钦佩他，你如见到老人，代我问好。这陈曾我也熟，他曾在北方大厦当总经理，我们去过。他对我说：‘别看我是处级干部，比省级、局级的还实惠哩。’我当时就说过他：‘你小子可小心点，别在经济上出漏子。’看来他发展到今天，也不是偶然的。”

到中午了，反贪局长要请方燕吃饭，他们进了附近一家饭馆，吃了馅饼。吃完饭，局长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结账，方燕笑说：“如今请客，很少有人从自己口袋掏钱哪！”

红军大街5号院，刘秉彦会客室。

刘秉彦对方燕说：“不少老同志都劝我不要管你们这事，说这事又和我没关系，我老催问省的领导，人家烦；我若批评，人家更反感。他们都是中央管的干部，何必我来过问？我跟他们说：这事和我没关系我才要管呢！”

听到这儿，方燕心寒：今天能像刘伯伯这样为百姓办事的人还有多少？多少人都因与自己利益无关而听任百姓受害！

方燕讲了见牛迟的情况。

刘秉彦说：“牛迟原在省法院，是为加强人民检察院才把他调过来的。”

方燕说：“我告诉牛迟，伯伯跟她说句话吧。”

方燕拨通了电话：“我现在刘秉彦同志处。秉彦同志要和你说句话。”

刘秉彦在电话里说：“你不用来看我，你们很忙。等到把陈曾问题的事办完，你再来看我。”

牛迟在电话里说：“我就是费九牛二虎的力气，也要办！”

刘秉彦问方燕：“你还有那记者的调查材料吗？再给我两份，我再转政法委书记一份，检察长一份。”

方燕给了刘秉彦两份复印件，刘秉彦立即给检察长写了一封信，具体建议：先从省供销社的国有资产流失查起，然后再查一、二件就可以把陈曾抓来审查，查到哪儿都会有阻力，建议检察院、法院和省纪委联合，团结一致，一查到底！

写完信，刘秉彦说：“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动，必有原因。一是案子多无暇顾及，这不是主要的；二是阻力大。陈曾这人活动能量不小，他有价值万元的金表可送，你能送什么？”

方燕苦笑：“我到哪儿都是空手啊！”

方燕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刘秉彦伯伯。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人仍是战争年代那与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刘司令员的模样，还是那颗为老百姓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刚正不阿，浩然正气，无私无畏，清廉为民，实在让人感动。见到老人，我便把半个世纪党的一贯传统连起来了。如果牛迟这一代共产党人也能把老一代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的党是任何力量也打不垮的。我想起了熟识的朋友焦裕禄，想起了老乡对我说的话：今天真共产党到哪儿去了？有的死了，有的离休了……”离开刘秉彦的家，方燕在路上巧遇到他 1947 年在冀中一中时的老

同学刘姐，她是老政协主席的夫人，早已离休。方燕请刘姐向她丈夫问好。刘姐指着一些门口的小车，感叹说：老尹退了，也没人来看了，家里清静；你看那在职的领导，一过年有多少送礼的呀！”

在 1997 年的最后一天，方燕离开石家庄，回到了北京。

就在方燕去石家庄的那天，珊月、赵华一同拜访了中国十佳律师之一岳成先生。他是黑龙江人，与珊月为老乡。他在北京创办了“岳成律师事务所”，这是珊月从几家报纸介绍岳成的事迹中知道的，这是允许外地律师到北京办律师事务所的唯一的一家。

珊月把材料给岳成。

岳成看了，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这是合同诈骗，你们不用打民事官司，找公安局抓他！公安局有没有人？有人就能办！”

方燕回来，珊月便告诉他岳成说的话。

方燕说：“颜大会也说是合同诈骗，定性一样，让我去找省公安厅。可省公安厅咱没有人，谁会理你？我给郭恩志打电话，他说安全厅和公安厅分开了，也有矛盾，他说不上话，这事如果有省政法委书记批给省公安厅就能办。可刘秉彦早把材料转给政法委书记了，也还没有动静。”

他们一同想到了公安部古副部长。

他们立即去了已退下来的古副部长的家里。

古副部长又看到珊月的举报材料，说：“你这才 10 万元，数字大小，怕公安部门不愿给你办哪！”

“那还有他骗国家几百万的事实呢，”方燕说。

“那你马上把那些材料给我寄来，我让秘书交给五局批转给河北省公安厅，试试吧！”

方燕回家立即把记者调查报告邮寄给古副部长。

老古当即批转给公安部有关部门处理。

不知今日进展如何？

春节期间；方燕给牛迟家打电话拜年，知道检察院也没有动。

牛迟说：“最近省里忙于调整班子，顾不上吧，春节后肯定要行动。

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也都批了，能不动吗？”

我这部《告状记》就先写到这儿吧。

本书有奖征集“结尾”

在写这部纪实文学之前，我便和方燕商定要做到五真：写真人、记真事、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

做到这五真，也需要勇气，因为不容易！

写真人，却不能全用真名真姓，陈曾、孟花、章星、纪凡便不是真实姓名。为统一，便只好把有关材料中的姓名也改过来了，好在这书并非真正诉状。其实，写的全是真事，也便全知真人姓名。不用他们的真名，绝不是怕他们告作者侵犯了名誉权。作者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完全尊重事实，文责自负。为维护作家权益，已请律师做法律顾问，欣然接受对本书的指控。本人也希望当此被告，对簿公堂，那样，诈骗事实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说真话就更不容易。我并不否认，比之过去作家，在开明盛世，已获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有力的标志。但习惯势力、社会风气都往往难以让人说真话。本书敢说是大胆地写真话了！它把老百姓在

生活中说的真话记录下来，这恰恰证明我们国家正走向高度的民主，这是对
外国敌对分子攻击中国没有人权的回答。

书里所讲的是不是真理？要让社会的历史实践去检验。谁能说，真理
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不过作者写方燕同学的经历，就是一个寻求真理的
过程。抒真情这一点，作者是可以保证的。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写出自己
的真情，是一种健康的需要。

因为五真，我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去创作本书的结尾，因为事情的发展
也难以预料。也许这个“寻找结尾”的过程还可以补写一部长篇纪实作品。

本书尚无结尾，请读者诸君用你们对生活的判断，为我创造一个结尾。
让我们共同参预此书的结尾创作吧！

好在，我已真实地告诉给诸君目前的状况。

请预测一下该事情的结果吧。

陈曾能够受到应有的惩处吗？

珊月的 10 万元钱（或者按陈曾写的借条说是 9 万）能够依法追回吗？
如果从 1996 年 1 月计算利息，到今天也该有 3 万元了。

此事会不会如名记者所预测的那样“不了了之”？

公安部门会不会以合同诈骗惩处陈曾、孟花？而珊月、赵华等人的钱
还能追回来吗？

地质局的和迪公司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如此等等，都没有结论，请君给予回答。

作者和本书日记、材料提供者方燕共同商定：本书稿酬除留下方燕准
备最终民事诉讼所用的费用外，将全部作为奖金，奖励读者参预创作本书的
结尾。如创作的结尾与现实结果相同，获本书读者创作大奖；部分预测相同
者，也将根据预测程度给予奖励。

请读者将创作结尾连同您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一并寄出版社转给作
者。谢谢您，我不相识的读者朋友！

1998 . 3 . 13 记于保定耕耘斋

